

对后现代主义的研究需要深度解析模式

贺玉高,鲁傲雪

(郑州大学文学院,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我们从西方引入的后现代主义话语留下许多模糊和混乱的问题,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我们被后现代主义思潮自身所提倡的反深度模式所误导,并用这种方式来考察后现代主义思潮本身所导致的。运用唯物辩证法所提供的那种用客观解释主观的深度分析模式,我们可以把后现代主义话语分为:作为社会结构的基础层、作为文化现实的中间层和作为哲学与价值取向的悬浮层。这个框架结构有助于我们厘清后现代主义这个庞杂话语系统的层次及其相互关系,为今后对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历史化、语境化研究提供了大的思考框架。

关键词:后现代主义;深度模式;唯物辩证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1

中图分类号:I10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01-05

一、反深度模式与后现代主义的乱象

“后现代”一词来自西方,与之相关的词汇还包括“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后现代主义”一词。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在20世纪60年代开始引起讨论,在80年代达到顶峰。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则于20世纪80年代被引入中国,并在90年代引起讨论热潮。今天,虽说作为一股话语热潮的后现代主义已经有些消退,但在某种程度上它已经渗入到人文学科各个分支,比如文化研究领域,从而在更深层次上对人文学科发挥着作用。如黑格尔所说,密涅瓦的猫头鹰只在夜幕降临时才开始飞翔,哲学反思总是迟到的。与此相似,真正的学术研究也是在事物成熟、定型、沉淀之后才有可能进行。在后现代主义热潮渐渐退去的时候,也到了我们拂去浮躁、沉下心来真正思考和总结它的时候了。

现在回顾过去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讨论,我们最深刻的印象是这个概念的庞大、笼统、晦涩、含混与矛盾。与此相应,后现代主义给人们留下了一系列的难题,它们包括:

第一,“后现代主义”是什么?它是主观地看待世界的新方式、新理论、新体验,还是一种客观的社会阶段或社会类型,抑或是一种新的艺术形式或文化状态?这些混在一起的意义背后是否存在着同一性的东西?

第二,如何评价后现代主义?这是一个始终存在着的争论。当代西方文化研究领域的主流看法认为后现代哲学所提供的方法和后现代的大众文化都具有解放的功能,为边缘人群提供了说话的平台。但坚持传统左翼价值的人士则一直批评后现代主义与当今西方社会的右倾趋势相一致。为何会有如此不同的评价?这个争论的实质又是什么呢?

第三,作为一种艺术形式的后现代主义与现代主义艺术的关系如何?前者声称是对后者的超越,但为何被称为后现代艺术的很多特征在现代艺术中都已经有了显示?对此应如何解释呢?

造成这些乱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后现代主义本身的一种反深度模式所带来的迷惑性。詹明信在论述后现代文化的构成元素时,首先就提到,“后现代文化给人一种缺乏深度的全新感觉,这种‘无深

收稿日期:2020-01-08

基金项目:郑州大学教改项目“双一流建设背景下的汉语言文学建设研究”(2019ZZUJGLX303)

作者简介:贺玉高(1975—),男,河南洛阳人,文学博士,郑州大学文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文艺美学、西方现代思潮。

度感’不但能在……新文化形式中经验到,甚至可以在当代‘理论’的论述本身找到”^{[1]433}。他列举了被后现代抛弃的四种深度阐释模式:辩证法、精神分析、存在主义和符号学。简单地说,深度模式是一种认为真理与非真理、本质与表象、物质与意识之间存在着对立的认知方法,而认知的目标正是追求前者而抛弃后者。但是后现代“理论的使命之一,正是要批判及质疑任何以内外二分为基础的阐释模式;不少当代理论家痛斥这一类阐释方法为意识形态的、形而上的”^{[1]443}。

显而易见,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主义哲学过分强调了真理的多元性,而在审美和伦理领域,后现代主义也都到处打着“反抗理性压迫和文化霸权”的旗号,强调着多元与“怎么都行”的价值信念。这一切都说明后现代主义有一种强烈的反理性和不可知倾向。笔者认为,正是这种反理性和不可知论的思想倾向,使后现代主义的话语绕来绕去、不知所指,并造成了以上所说的各种混乱与难题。

然而,对非理性的对象的科学研究,却必须使用理性。即使我们赞同后现代主义对理性的质疑具有某种合理性,但我们要在学理层面上研究后现代主义的时候却不能不依靠理性。学术研究的结果只能是理性的知识。伦理、文化思潮或情绪可以是非理性的,但学术一定不是非理性的。即使是提倡非理性的学术,也必须以理性的方式来提倡。以后结构主义为代表的后现代话语,在许多情况下不应被称为学术,因为它是以反对真理与意义确定性的、非理性的方式而言说的。“索卡尔骗局”这一极端的例子证明了这一点。美国纽约大学的量子物理学家索卡尔教授怀疑后现代主义的种种话语都是胡扯,由此做了一个试验。他有意胡编乱造了一篇文章,用物理学来证明后现代哲学的各种主张,但同时也故意往文章里面塞进无数显而易见的科学常识性错误。他把这篇充满各种后现代理论流行术语的、文理不通的文章投到美国著名的刊物《社会文本》,编辑竟然全文刊发了。这个例子并不能否定后现代话语的全部合理性,但它确实可以说明,以后现代方式写作的文本有时候只是一种唬人的知识欺诈。

如果我们以后现代理论提倡的反深度模式来研究后现代主义,那么必然只能导致一种纯粹的现象描述。在这种五光十色的现象描述之中,我们只会走向混沌,并沉浸在无知和快乐之中。实际上,无论是西方的还是我们自己的一些后现代文化理论话语,确实就处于这种状态之中。而要解决这个问题,

就必须回归理性,回归正常的深度模式。

二、唯物辩证法解释模式下的后现代主义

深度模式有不同的类型,对于中国学界而言,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模式是影响最大的一个现成学术资源。它区分了客观与主观、物质与精神、存在与思维、经济基础与意识形态等二分的概念,并强调前者对后者的本原地位。我们首先可以用这种模式来解决“后现代主义”是什么的问题。

后现代主义话语的混乱最直接的原因是这个概念自身太泛、太大,以致失去了概念自身的确定含义和认知表意的价值。有学者说:“有多少个后现代主义者,就可能有多少种后现代主义的形式。”^{[2]18}为了澄清这种混淆,许多学者都做出了努力。比如W.哈德逊分别分析了“后现代性”的12种含义,包括:1.一种神话;2.一种历史分期;3.一种社会境况;4.一种经验;5.一种历史意识;6.一种感悟;7.一种氛围;8.一种危机;9.一种知识型;10.一种话语;11.一种诗学;12.一种从现代启蒙立场的退却。^[3]这种语用分析式的解读,对于我们理解“后现代主义”这一概念的内涵是非常有价值的,但是他以及其他许多人的文章却大都限于罗列,而缺少分析,特别是缺少这些含义相互之间关系的分析。这样仍然无法有效地把这些意义联系成一个整体。下面笔者先列出“后现代主义”的几种含义,然后通过分析评价这些话语所指对象的客观性程度,尝试在这些不同含义之间建立起一个整体的关系模式。

“后现代主义”“后现代性”“后现代”这几个词都是以“现代”为自己的对照物而存在的,强调与“现代”的断裂与差异。“后现代性”是指“不同于现代性”的特征,它的意思很大程度上要取决于对“现代性”的界定。“后现代”和“后现代主义”也分别带有“不同于现代的”“不同于现代主义的”或“反思现代主义”的意思。这组概念经常被交叉运用于不同的语境,主要有以下几种:

第一种,把“后现代”看成是一种新的社会类型。这主要存在于社会学领域。在西方,有很多学者常常把“后现代”用于指一种不同于早期现代社会模式的新型社会。其中,有些学者(如丹尼尔·贝尔)强调它“后工业社会”的特征,有些人(如鲍德里亚)强调信息技术与大众传媒在这个新社会中的重要作用,有些学者(如利奥塔)则强调“社会的计算机化”对知识的影响,有些学者(如费瑟斯通)强调消费在此社会中的重要性,有些人(如詹明信)把它与“晚期资本主义”相联系,还有人把它与加尔布雷思首创的“富裕社会”联系在一起。尽管这些学

者描述新社会特征时强调的重点不同,但他们在一个重要的方面有相同的认识:他们都强调文化在整个社会中前所未有的重要地位。比如鲍德里亚与詹明信都认为,当代社会影像与商品符号无处不在,文化进入到商品,进入到所有的领域,以至于今天的一切都是文化。

第二种,在审美领域,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主体在新的社会现实(尤其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大都市)中的一种新奇体验。它上接波德莱尔和本雅明对“现代性”经验的探讨,强调从主体感受、审美领域来讨论当代社会文化不同于“现代”的特征。在这方面,詹明信的影响可能是最大的。詹明信受到鲍德里亚的启发,强调现代信息技术与大众媒体对主体的影响。詹明信以《后现代主义,或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为代表的一系列有关后现代主义的论文,详细讨论了后现代主义的文化审美特征(包括对无深度感、历史感的消失、精神分裂感、具有全新“强度”的情感状态、后现代建筑空间给人的感觉的精彩描述),在全世界人文学科都引起了巨大反响。尽管詹明信的论文标题显示了对于社会历史分析的兴趣,但实际上他还是把主要精力用于这种审美感受的分析。

第三种,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艺术活动的特定形式,或一种艺术潮流。这种用法的内涵相对而言是最明晰的。它是相对于艺术的“现代主义”而言的。现代主义先锋派以反体制的方式呈现自己的合法性,但是后来它们自己在博物馆和学院中又变得体制化了。20世纪60年代,纽约的一群艺术家开始用“后现代主义”来表示对于体制化的现代派艺术的超越。在艺术中,与后现代主义相关的关键特征便是:“艺术与日常生活之间的界限被消解了;高雅文化与大众文化之间层次分明的差异消弭了;人们沉溺于折中主义与混合之繁杂风格之中……”^{[4]10}不同于现代主义的精英姿态与抵抗锋芒,后现代主义艺术刻意模糊高雅文化与通俗文化、艺术与商业的界线,并且在外表上与社会体制日益妥协,显得乐在其中。

第四种,把“后现代主义”看成是一种哲学潮流。后现代主义哲学分为多个派别,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德里达、拉康为代表的法国后结构主义。这种哲学流派主要通过由索绪尔结构主义语言学发展起来的方法,论证了真理和意义的不确定性,质疑传统形而上学的根基,揭露以理性、真理为名义而存在的观念与权力之间的联系。它是对二战以来欧洲启蒙运动所衍生出来的理性化、现代化的批判的一个延

续,体现出极端的个人主观性、反权威性和极端平等主义。^[5]

第五种,把“后现代主义”当作一套反对现代进步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取向来使用。如法国学者伊夫·瓦岱在谈到“现代性”的多种含义时认为,只有在现代性表示“现代进步主义的意识形态叙事”这种情况下,“现代性”这个词可加“后”这一前缀组成“后现代”。^{[6]35}这里“后现代主义”被看作是一套价值主张,它最经常地指向对现代以来积极乐观的进步主义意识形态(集中体现在康德的理性启蒙价值观和黑格尔的进步主义历史观之中)的批判与反思。在这个意义上,后现代主义继承了尼采对现代性的批判,也继承了浪漫主义对现代化的反抗情绪。

第六种,用“后现代主义”“后现代转向”或“后现代状况”来指20世纪后半期开始的一种文化转型或转型后的文化状态。这种用法是上述前三种用法的综合。它既包含着精英的现代主义艺术与通俗文化走向融合这样一层意思(第三种用法),也包含着文化在整个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的意思(第一种用法),还可以指个体在这种雅俗融合、到处都被影像文化浸染的社会中的审美感受(第二种用法)。

在上述六种含义中,第一种把“后现代”当作一种全新社会类型的含义,离客观现实的距离是最近的。无论这种新的社会的具体含义是“富裕”“后工业”,还是“媒介”“消费”,它们都构成了我们理解“后现代”的现实基础。这种解释指向了科技变革、经济结构、知识结构及社会组织结构等社会深层结构,具有非常实际的所指。其中有些社会学家(如布尔迪厄和费瑟斯通)更是把对后现代文化的研究具体到一些具体职业群体(新型文化媒介人)与具体文化场域的层次,对于我们把握后现代思潮的历史脉络特别具有启发性。这层含义的“后现代”在所有层面的含义中处于最基础的地位,属于第一层。

在第一层较为实指的社会经济现实层面之上,是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个层面,即文化现实层。上述“后现代主义”的第二、三、六种含义,都处于这个层面。与第一层面相比,这一层更多涉及文化的内容,它偏重指向对现实的主观体验与反映,因此它离社会现实基础相对较远,属于经济基础之上的一层。但与哲学意义上的和价值取向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相比,它与现实有较为直接的关系。无论是作为一种艺术形式,还是作为“日常生活的审美呈现”,抑或是指当代西方大都市中人们的日常感受,这一层面的“后现代主义”都有明确的实际的物质

载体,并能在人的感官层面得到直接落实。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称它为一种文化的现实。

哲学意义上的和作为价值取向意义上的“后现代主义”最为抽象,离社会现实的基础最远。它属于恩格斯所说的“那些更高地悬浮于空中的思想领域,即宗教、哲学等等”^{[6]703},这属于“后现代主义”的第三个层面。这一层距离位于中间的文化层较近,是对文化层中零碎、模糊存在的情绪、观念的更系统、抽象和精致的表达。它一方面从文化层获得灵感与动力,反过来也推动了第二层面的文化实践活动。(见表1)

表1 “后现代主义”概念的层次结构

悬浮层:作为哲学和价值取向的“后现代主义”
中间层:作为新艺术样式、审美体验和文化状况的“后现代主义”
基础层:作为社会类型的“后现代”

三、唯物辩证法解释模式的功能与扩展

唯物辩证法深度解释模式首先有可能在一个既统一又分层的框架内解释什么是“后现代主义”这个问题,并且可以回答各个不同层面的“后现代主义”之间的基本关系,为绘制一幅关于“后现代主义”的完整地图提供了可能。它作为一种基本思路可以与其他深度模式进行比较、综合与扩展。比如在中间层,即作为新艺术样式、审美体验和文化状况的“后现代主义”这一层面,西方已经存在有若干种深度解释的模式。它们包括:

1. 法兰克福学派的文化工业批判理论模式(资本主义社会中文化的商品化与大众操纵);
2. 鲍德里亚的媒体技术决定论模式(消费社会中媒体技术革新导致符号生产的过剩与界限的消失);
3. 詹明信的“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模式(跨国资本主义推动了不同文化符号的拼贴杂糅);
4. 费瑟斯通的“后现代社会学”模式(不同代际知识分子的文化权力争夺、新型文化媒介人和新型资产阶级审美意识形态的兴起共同导致的文化符号的越界);
5. 贝尔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模式(资本主义的贪婪攫取性压倒禁欲苦行主义导致的个人非理性主义盛行);
6. 比格尔模式(后现代主义文化是先锋派艺术理想的虚假实现形式);
7. 艾恺模式(几百年来世界范围内的反现代化思潮的延续,新的富裕社会及知识分子身份危机的反映,以及左派意识形态工具)等等。^[7]运用唯物辩证法的深度模式,按照距离经济基础的远近的标准,我们可以对这些解释进行统一的比较、分层和排列:文化的资本主义商品化—跨国资本主义—新型媒介技术—富裕社会与消费社会;新媒介人—新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代际权力争

夺;反现代化的理性化压迫—资本的贪婪性压倒道德—左派或新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这些解释进一步地细化,可以不断把原来的研究成果综合进来,使这个模式具有很强的扩展能力和理论生长性。

其次,这种深度模式可以通过为一些争论寻找其历史和现实的依据,从而找到他们所争论问题的本质。比如当我们观察有关后现代的争论的时候,会发现很多争论所指向的现实都是如何处理大众民主社会的兴起这个并非全新的问题。这些在很多情况下都是卢梭为代表的民主派与古斯塔夫·勒庞、奥尔特加为代表的反民主派之间争论的历史回响。只有在认识到这一点时,我们才会把这种争论历史化、具体化和深入化,而不仅仅是限于他们所争论问题的表层。

最后,这种辩证法的深度模式可以为解释现代主义艺术与后现代主义艺术之间复杂纠缠的关系提供思路。在后现代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中,后现代主义艺术强调打破精英艺术与流行文化,艺术与商品和日常生活之间的界线,并因此超越现代主义艺术的精英化与体制化。对此,我们不能仅看表象,或者以后现代主义艺术家的自我意识为依据来判断它自身。相反,已经有很多学者指出,现代艺术与后现代艺术之间有许多相似之处,并把它们看成是同一趋势的发展。如丹尼尔·贝尔就把后现代主义文化看作是“现代主义逻辑推到了极端”的潮流。^{[8]98}它们之间的连续与断裂关系到底怎样,对此问题的真正解决同样需要从社会结构的发展与变化中寻找答案。比如,有可能将科技、经济、政治的变化与近几百年来资产阶级民主化趋势联系起来,在贵族等级制日益式微的背景中来看待艺术的去等级化和去分化趋势。现代主义虽然有极强的独创意识、批判意识和艺术的独立意识,但从大的历史政治、经济趋势中来看,它的这种精英气质却只是贵族文化的最后遗留。它的批判在无意识中却恰恰加速了精英的传统古典艺术的瓦解,并最终走向艺术的后现代状态。^[9]

对于以上问题的解答本文不可能在此完全展开,而只是尝试性地提供了一些大体的思路。不同学者对唯物辩证法深度模式的运用也有可能提供与此非常不同的解释,笔者认为这不仅是正常的,也是学术研究向前推进所必需的。

四、结语

当前对“后现代主义”的讨论与研究已经到了该进行总结与客观分析的阶段,而在这个阶段确立这样一个具有深度的基本结构是非常必要的。首

先,这有利于对不同领域、不同学科的后现代主义话语与研究进行分类,厘清各种话语与相关研究的边界,使它们在一个深度结构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这个深度结构与框架中,各种不同层面的话语与研究就有了一个可以相互借鉴与对话的平台。

其次,这种具有深度的研究框架有利于后现代主义研究的历史化与语境化,使复杂、悬空的话语重新回到社会现实的坚实地面。只有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对它进行客观、深入的分析与评判,揭示出各种争论背后的实质性问题。

最后,也是最重要的一点,这种深度的研究才使我国学者能够深入到实际中来,思考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于中国到底意味着什么。这种深度的研究将使我们把握后现代主义的各种主张分别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中,针对什么样的问题,在什么样的政治和道德立场上提出的。在这些方面,我国的社会现实和历史与西方有何相异和共同之处。比如,我国的青年亚文化、网络文化及整个大众文化存在的狂欢、戏谑和反叛情绪,表面看来就与20世纪60年代欧美的青年亚文化、后现代主义文化非常相似。只有认真借鉴他们在这方面的相关研究成果,才能更好地反思我们的这些文化现象的深层原因,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当代文化思潮,并为我们自身的文化建设提供

扎实的学理基础。

参考文献:

- [1] 詹明信. 晚期资本主义的文化逻辑[M]. 陈清侨,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97.
- [2] 波林·罗斯诺. 后现代主义与社会科学[M]. 张国清,译. 上海: 上海译文出版社,1998.
- [3] W. 哈德逊. 后现代性与当代社会思潮[J]. 文征,译. 国外社会科学,1994(2).
- [4] 费瑟斯通. 消费文化与后现代主义[M]. 刘精明,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2000(10).
- [5] 艾恺. 后现代主义批判[J]. 南京大学学报,2008(3).
- [5] 伊夫·瓦岱. 文学与现代性[M]. 田庆生,译.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
- [6] 马克思,恩格斯.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1995.
- [7] 贺玉高. 后现代文化转型的深度解释模式举要[J]. 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4).
- [8] 丹尼尔·贝尔. 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 赵一凡,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89.
- [9] 贺玉高. 民主化视角下的后现代文化转型[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5).

(责任编辑 刘海燕)

Study on the Necessity of Deep Explanation Models for Postmodernism

HE Yugao, LU Aoxue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e postmodernist discourse introduced from the west has left many problems of ambiguity and confusion. To a large extent, these problems are caused by the fact that we are misled by the anti-deep model advocated by the postmodernism and use this model to examine the postmodernism itself. By means of the deep model of objective explanation of subjectivity provided by materialist dialectics, we can divide postmodernist discourse into the basic layer of social structure, the middle layer of cultural reality and the suspended layer of philosophy and value orientation. This structure helps to clarify the hierarchy and interrelations of the complex discourse system of postmodernism, and provides a broad thinking framework for historicization and contextualization study of postmodernism in the future.

Key words: Postmodernism; deep models; materialist dialectics

哈格洛夫与中西环境美学之辨

岳芬

(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江苏常州 213022)

摘要:尤金·哈格洛夫是美国著名的环境保护论者和环境伦理学家,他将环境伦理与环境美学相结合,试图通过环境伦理学来理解环境美学,并在观念上对后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在中西环境观的比较研究方面,他坚持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强调中西方各自文化的独立性,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保持谨慎的态度。哈格洛夫对于中西环境观融合的积极作用在于:虽然他不赞同用中国传统思想对环境伦理学进行彻底变革,但是,他已经开始接受中国传统自然观并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的生态价值。

关键词:尤金·哈格洛夫;环境美学;中西之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2

中图分类号:B83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06-05

尤金·哈格洛夫(Eugene C. Hargrove)是美国著名环境保护论者和环境伦理学家,他于1979年创建了该领域的第一本学术期刊——《环境伦理学》。值得注意的是,他将环境伦理与环境美学结合起来,试图通过环境伦理学来理解环境美学,并在观念上对后者进行一定程度的提升。

无论在伦理学思想还是审美观念方面,哈格洛夫都是一个相对比较保守的环境主义者,他对自然的美与权利持否定的态度,他甚至消解了由环境伦理学者逐步建立起来的自然权利的观点,但是,他又同18世纪的传统美学观之间保持着距离,坚持以新的环境伦理思想作为其观念的基础。在中西环境观的比较研究方面,他则坚持环境决定论的观点,强调中西方各自文化的独立性,对中国传统哲学中的自然观保持谨慎的态度。

一、“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观

在《环境伦理学基础》一书中,哈格洛夫从生态学、美学及形而上学的三种视角出发,深入探索古希腊哲学中反环境观的起源,进而理解现代哲学中反自然观念的形成及其主要内容。

哈格洛夫认为,古希腊对于世界持久、永恒、不

可变的简单认识,与生态思想中的非持久、短暂、动态变化的复杂观念相违背,同时也阻碍了对自然美的欣赏,而这些都可以归因于对自然不完善的形而上的解释。在此基础上,现代哲学思想中的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第一属性与第二属性的区分,继而促使大部分哲学家忽视对自然的保护。但是,他也看到,在西方主流传统观念之外仍保存了环境观转向的可能,这一非主流观念也为他尝试通过东方文明解决西方环境危机提供了可能性。

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思想倾向于“弱人类中心主义”^{[1]279},这一观念主要体现在他对于环境伦理学中权利概念的辨析上。他否认物种权利的存在,但承认自然所具有的内在价值。对于权利概念的来源,他认为:其一是对内在价值的替代,其二是对环境伦理学与动物福利伦理学关系的误解。他不赞同用物种权利来支持那些非人类物种所拥有的价值,同时也不支持动物福利伦理学作为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但他并不反对动物福利运动。

为了证明自己的观点,哈格洛夫引用了各个时期不同伦理学家对物种权利的看法。如克里考特(J. Baird Callicott)否认物种权利的存在,他认为虽

收稿日期:2020-01-15

基金项目:2020年度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课题“欧美环境美学中的中国元素研究”(20ZXD001)

作者简介:岳芬(1983—),女,山西太谷人,文学博士,常州工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跨文化研究。

然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赋予了非人类的动植物与人类同等的权利和道德地位,但对于个体生命而言,人们只需给予尊重。权利并非人类与生俱来的,其起源于现代西方社会。“权利”一词要求具体限定的对象,而“物种”一词指向的是某一类别或阶层。诸如此类,因此,所谓物种权利是无稽之谈。玛丽·米哲蕾(Mary Midgley)同样否认物种权利,她认为权利的说法极易引起混乱,权利一词除了具有法律赋予的特权,还有很强的道德意味。

一直以来,动物福利学与环境哲学的关系相当混乱,直到20世纪70年代,人们仍视环境伦理学与动物福利伦理的研究为同一领域。1980年,克里考特在《环境伦理学杂志》上发表的论文——《动物解放:一个三角事件》,使得学者们意识到了双方存在的巨大差异,因而各自分开独立发展。

哈格洛夫并不认可美国作家和哲学教授玛丽·安妮·沃伦(Mary Anne Warren)对于动物弱权利的观点。沃伦认为,由于智力发展的缺陷,动物无法具有与人相同的权利;然而,它拥有一种弱权利,这种权利的存在意味着:人类除非为了必要的生存或发展的需求,否则便不能随意滥杀动物。哈格洛夫认为:“她所谓的弱的权利似乎不会给人类行为带来任何重大改变。同时,这种对动物弱权利的认可,将会因逐渐弱化人类权利而损害到人权的有效性,削弱目前某些国家对人权的保护。”^[2]

尽管到目前为止并没有找到一种合适的可以替代动物权利的说法,哈格洛夫仍在努力探寻解释人们对待动物的方式有所改善的原因。第一种解释来源于帕斯莫尔(John Passmore)的观点,并非动物获得了权利,而是人类的权利受到了限制。第二种阐释借鉴了理查德·沃特森(Richard Watson)的权利与义务互惠的原则,拥有权利的人类出于义务的责任,学会了尊重动物。第三种说法可以追溯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伦理,这种说法由于对何为有德性行为的模糊界定而很容易引起冲突。第四则源自保罗·泰勒(Paul Taylor)的生物中心的平等主义观点,这种有趣的观点承认一切生命体所固有的价值,但因为过于复杂,阻碍了其进一步的推广。第五是彼得·辛格(Peter Singer)的功利主义的阐释,即关怀动物的原因是他们也能感受到痛苦。这一阐释可以解决对生命个体保护的原因,却无法更好地认识个体生命之上物种存在的价值。

由此可见,哈格洛夫在其《环境伦理学基础》中认为环境哲学最终会走向消亡,当科学、伦理学、美学、社会学和政治哲学等主流学科可以恰当解决目

前存在的环境问题,或者说当这些主流学科把需要环境伦理学解决的问题归入其研究范畴的时候,环境伦理学也就没有其存在的必要了,人类可以在更具体的实践层面解决环境危机。

二、介入东西方环境审美观念论争

哈格洛夫从跨文化研究的视角出发,一直致力于探索东西方环境伦理学之间的相互影响与借鉴的可能性。哈格洛夫对跨文化研究的兴趣源自他对东方文化的关注,他试图借助东方文化来帮助西方环境伦理学解脱困境。

1967年《科学》杂志上刊登了美国历史学家林恩·怀特(Lynn Townsend White, Jr.)的一篇演讲论文——《环境危机的历史根源》,这篇文章随后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在创造和维持西方破坏性开采自然世界观念中所扮演角色的延伸性的争论。怀特认为,基督教无疑是造成当今环境危机的最重要的历史原因。对于基督教的否定和失望,他尝试寻找另外一种可以摆脱目前困境的宗教。由于当时佛教在西方学者中的盛行,怀特尤为青睐佛教中的禅宗思想,但是佛教植根于亚洲的文化历史性,也使他对东方文化是否能够解决西方危机持保留态度。随后他期望人们重新发掘基督教中的生态思想,如圣·芳济(San Francesco di Assisi)的教义等。

西方世界是否需要求助于东方传统智慧,东方文化能否适用于解决西方危机,不同学者持不同的观点。有学者认为,东方宗教如亚洲的禅宗,较之基督教蕴含更多的生态思想、整体主义精神及对自然的关怀;他们甚至持有更为激进的看法,坚持非人类中心主义的环境伦理学观点,如以罗尔斯顿为代表的环境伦理学家,提倡对西方传统文明进行变革或革命。此外,关注于生态文明研究的澳大利亚女性学者弗瑞亚·马修斯(Freya Mathew),对中国传统道家思想在当代全球化背景下如何适应社会发展并发挥其作用,有独到的看法。她高度评价道家思想。她认为,在中国历史中,儒家负责主导经济和社会政治生活,佛教作为辅助,保护那些受到伤害的个人,而道家文化消解了二元对立的思想,拉近了人与自然的联系:

尽管儒家和佛教在中国古代文明中占据主体地位,儒家致力于社会管理,佛教关照人的精神世界,但道家代表着一条更加深入、更加贯通的线索,这一线索可以一直追溯到中国文明最早的、前文明的也就是本土的文化的源头。儒家和佛教都承载

着不可避免的文明的二分化印记,而道家则一直承载着那些非二元化的、更加生态的(或者强调关系的)本土文化源头的印记。换句话说,中国文明通过道家传统依然保持了与其前文明祖先的生态智慧间的对话。^[3]

她相信经过重塑、清理出糟粕之后的道家思想所构建的整体性的生态文明,将有益于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的环境危机的改善。

另外一些学者认为,受东方宗教影响的国家,其环境状况也并不比基督教信仰地区的生态乐观,因此,没有必要去寻求新的宗教来改善目前的困境。他们期冀于现有宗教的修正与完善,但他们并不排斥有选择性地借鉴东方的生态智慧。如柯布等思想家,他们期待从环境哲学的角度对现有的基督教观念进行改善,建立一种新的生态神学,并向东方传统智慧寻求帮助。

以约翰·帕斯莫尔为代表的第三类哲学家则认为造成环境危机的主要原因是人们没有奉行西方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再加上因为过度担心会出现非西方传统取代西方传统的危机,切断了跨文化研究的可能。

较之帕斯莫尔等人的观点,哈格洛夫的建议并没有阻碍东西方环境伦理学之间的融通,但他认为:“对我来说,一种普适的环境伦理是否真的有朝一日会取代建构它的各种文化传统,似乎是值得怀疑的。我相信,尽管不同的文化传统在跨文化的交际和理解中会起到一定作用,但他们总是在自己的文化环境中才更有效。”^[2]显然,他所持有的文化观是比较保守的,他更强调文化的根性前提,以及文化同环境的对应关系。

对于是否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环境伦理学,哈格洛夫引用了迈克尔·波兰尼(Michael Polanyi)的“默会知识”理论,借以批判不恰当地将他国文化传统移植到本国所带来的问题与冲突。“默会知识”指的是那些我们不知道自己拥有但却潜在的知识与能力,是漫长历史文化的沉淀:

默会知识的问题,令我们很难想象会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环境伦理。问题不仅简单地因为帝国主义式的、专制主义的、精英化的和殖民主义的西方环境伦理不恰当的入侵,而在于来自任何文化或国家的任何环境伦理的引入都存在障碍。如果有人试图为所有国家、所有文化创造一种环境伦理,必然会与各种地方性传统

和直觉发生各种冲突,产生各种问题。当一种伦理被引入其他国家,试图对其作出调整以包容这些国家传统的努力,很可能只会在取得进步的同时创造新的冲突,陷入一种新问题、新冲突不断产生的永久循环中。^[4]

基于以上认知,哈格洛夫显然无法接受这种不加任何改变与思考地滥用任何一种环境理论的思想。例如,由于对西方环境理念的生硬照搬,印度人民为了保护野生动物,建造国家公园,被迫背井离乡,甚至饥寒交迫。哈格洛夫认为:“尽管也许我们永远都不会拥有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环境伦理,但我们最终可能创造一个环境伦理家族。”^[4]

三、从对立走向调和观

哈格洛夫的环境伦理学观念是建立在西方环境美学基础之上的,在《环境伦理学基础》中,他试图为现代环境观念源于西方传统文化寻求合理证明。他认为:

现代环境观念是几个世纪以来对自然的观念持续变化的产物,而且与19世纪博物学学科中的植物学、生物学和地质学以及艺术(特别是诗歌和美国的风景画)的发展紧密相关。不像帕斯莫尔,我认为,现代生态学家和环境主义者的世界观与早期的植物学家、生态学家和地质学家的美学观念没有太大的区别,而且可以直接追溯到这些美学观念。^{[1]98}

哈格洛夫虽然承认西方传统哲学中存在阻碍现代环境伦理学发展的观点,但他仍坚信西方文明同时也存在保护自然的基础,“从怀特海的‘友好的环境’到利奥波德的‘生命共同体’只有一步之遥,这一步并不需要迂回借助于东方的哲学和宗教”^{[1]133}。他希望人们不是由于经济价值等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的原因保护自然,而是出于自然本身所具有的美丽和兴趣而永久地保护她。

帕斯莫尔认为,可能存在自然欣赏的三个阶段:其一是欣赏那些被修剪并整齐规划的植物园林,其二是欣赏虽被认为栽种修剪但尽量尊重自然原貌的不规则园林,其三是对原始荒野的欣赏。由于人与荒野的疏离关系,他认为第二个阶段,对不规则园林的欣赏是最为完美和文明的。相反,哈格洛夫认为,人与自然是和谐的,在精神上是有某种联系的。

类似出于保护艺术美的义务,因为其本身善的存在,人们有必要保护自然美。然而,较之艺术品,

自然物被毁坏后很难修复,即使重新创造也不能完全恢复原物所具有的美。哈格洛夫认为,造成这些差异的原因是:“自然美无法提前存在于想象或艺术家的蓝图里,因而要想在任何意义上存在,自然美必须先具有物质的存在。”^{[1]237}

哈格洛夫认为,科学与艺术的相互作用影响了环境思想,“审视重要的环境主义者和科学家的科学和美学取向,也能为我们提供科学、艺术和自然保护之间密切联系的充分证据”^{[1]119}。“对自然世界共同的认识——既强调事实,又强调价值”^{[1]107}的影响,使得西方环境观无法摆脱科学知识的浸染,也深受艺术审美的熏陶。

哈格洛夫“倾向于把自然的内在价值归结为大自然的美,故他对环境伦理学的本体论证更像一种美学论证”^[5],他支持卡尔松肯定美学与自然全美的主张,他甚至强调自然从来就总是美的,而且这种美没有任何负面的审美价值:

之所以说自然最了解它自己(Nature knows best),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的任何随意创造都是美的;更重要的是,自然创造的最终结果是那样一些富于创造性的产物,其复杂性远远超出了人类能够复制、超越,甚至充分参与的程度,正因为如此,它们才是独特又无法替代的。^{[1]238}

哈格洛夫肯定了中国园林对西方美学所产生的悠远而深刻的影响,在另一篇名为《西方环境伦理学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的论文中,他论述了:

对中国园林的记叙始于13世纪末马可·波罗(Marco Polo)游记的出版。18世纪,在西方园林从形式园林向非形式园林或绘画园林的转变过程中,中国园林提供了可资比较的作用。这些最早出现于英国的园林,最初被称为“中国园林”(Chinese Garden)或“英国中式园林”(Anglo-Chinese Garden),但是,最后只被称为“英国园林”,强调其如绘画般的特点,而淡化(或遗忘)其中国的影响。^[5]

哈格洛夫甚至承认包括中国园林在内的景观园林可以作为西方环境伦理学的基础。但同时他也持一种保留的态度,“虽然西方环境伦理学中有一些‘中国园林’,但是,其中多数也许是无用的——它们和非西方环境伦理学所应当立足的意会知识或个人知识并不相容——即使是其中的‘中国园林’,也许也要经过‘内在化’,或者‘亚洲化’,才能真的有用”^[6]。

哈格洛夫试图寻求一种能够超越经济学和功利主义的美学价值体系,最终走向价值的平衡——“它包含了排除了自我利益的利他主义和排除了工具价值的内在价值,并使人们认识到除愉悦满足之外的善。”^{[1]260}他的美学观虽然并非真正意义上的综合的生态美学体系,但是已经为环境美学观念的拓展提供了空间,尤其是促进了环境伦理学与环境美学的结合。

在东西方文化不断碰撞与交融的时代,作为环境伦理学家的哈格洛夫也不断探索东西方环境哲学与环境伦理学融合的可能性。早在1989年,他在《亚洲传统思想中的自然:环境哲学系列论文》一书的序言中指出:

虽然多年以来,人们反复提到将亚洲哲学视作解决环境问题的灵丹妙药,同时亚洲哲学已经悄悄进入大众文学对生态问题的关注。但是,到目前为止,人们只是偶尔关注到东方环境哲学在人与自然关系中的潜在作用。该著作有意识地弥补这一疏漏。^[7]

哈格洛夫对环境伦理的贡献还在于建构一座观念的桥梁,在同其他环境伦理学者进行论争的过程中,他逐渐意识到西方环境伦理并不完全适用于解决东方环境问题,而且,纯粹的西方环境观也具有某种片面性。

正因如此,在环境保护与环境伦理学的研究领域,从最早创立环境伦理学开始,哈格洛夫便一直在思考是否存在一种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的环境伦理,显然,东方智慧的介入给了他新的启示。

四、结语

哈格洛夫对于中西环境观融合的积极作用在于对东西方环境伦理和环境审美的调和。其观念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他不赞同用中国传统思想对环境伦理学进行彻底变革,拒绝彻底抛弃和否定西方传统思想,试图从西方思想根源中追溯适应现代社会亟须的古典智慧,以推动现代环境伦理走向更为丰富和多元的价值体系。

另一方面,同很多较为保守的西方学者相比,哈格洛夫更为接受并赞同中国传统的自然观,他深切认识到中国传统思想中的生态价值,希冀从中寻找充实和修正西方环境美学的养分。此外,他对传统的以科学主义为核心的环境伦理观是有反思的,他能够在弱人类中心主义的伦理基础上,不断修正自己的“欧洲中心主义”观,从而形成综合的环境伦理及相应的美学思想。

参考文献:

- [1] 尤金·哈格洛夫. 环境伦理学基础[M]. 杨通进,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2007.
- [2] 尤金·哈格洛夫. 宗教与西方环境伦理学[J]. 郭辉, 译.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06(4).
- [3] 弗瑞亚·马修斯. 中国能引领世界走向生态文明吗? [J]. 郭辉, 译.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2).
- [4] 尤金·哈格洛夫. 是否且应该存在单一的、普世的、国际的环境伦理[J]. 郭辉, 译.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3(1).
- [5] 卢凤. 生态文明的哲学阐释: 与美国北德州大学环境哲学学者对话[J]. 南京林业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5(1).
- [6] 尤金·哈格洛夫. 西方环境伦理学对非西方国家的作用[J]. 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05(3).
- [7] Baird Callicott, Roger T. A. Nature in Asian Traditions of Thought: Essays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C]. New York: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1989, P. xii. "Although over the years, repeated allusions to Asian philosophy as a panacea for environmental ills have crept into popular literature on ecological issues, little sustained and professional attention has so far been given to the potential role of Eastern attitudes toward nature and the human - nature relationship in environmental philosophy. This book is consciously designed to make up for that neglect."

(责任编辑 刘海燕)

Hargrove and His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YUE Fen

(School of Humanity, Chang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Changzhou, Jiangsu 213022, China)

Abstract: Eugene C. Hargrove is a famous American environmentalists and environmental ethicists. Combining environmental ethics with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he tried to define the latter by the former, and promoted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to a higher level. In comparative study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views, he adhered to the concept of environmental determinism, emphasized the independence of Chinese and western cultures and held a cautious attitude towards how Chinese traditional philosophy view the nature. Hargrove's positive role in the integra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environmental views lies in that although he does not agree with the thorough reform of environmental ethics with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he has begun to accept Chinese traditional view of nature and become aware of the ecological value of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Key words: Eugene C. Hargrove; environmental aesthetics; discrimination between Chinese and Western

论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

张翼

(河南师范大学 文学院,河南 新乡 453007)

摘要:科学家形象的大量出现是晚清文学的重要景观,却始终未得到研究者的重视。事实上,科学家形象与物理、天文、医学等现代新知紧密联系在一起,承担着普及科学知识、引导读者认识中国现状、见证现代科技负面影响等功能,推动晚清小说叙事形态由故事到人物、由全知视角向限制视角的变革。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形象既应被视作复杂的文学现象加以厘清,也应被作为丰富的思想资料加以辨析。

关键词:科学家形象;晚清科学小说;晚清知识者;科技认知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3

中图分类号: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11-06

19世纪中后期,现代科技进入中国社会的速度明显加快,触发了晚清科学小说的创作热潮。《月球殖民地小说》《新石头记》《新法螺先生谭》《电世界》《发明家》等科幻小说,《元素大会》《蚊之友爱》等科普小说相继问世。天文学、化学、物理、医学等科学知识,电灯、电话、火车、汽车、飞船等科技发明在小说中频频现身,一批行状传奇、性格特异的科学家形象也竞相出现在读者面前。

科学家现身晚清小说的意义非凡。首先,科学家的出现丰富了中国文学的表现对象。古典中国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与以儒家为主导的价值体系,并不适宜科学的生长,因此科学技术很少受到文学的关注,与科技紧密相关的科学家也很少出现在文本之中。晚清小说中科学家形象的大量涌现,拓展了文学的表现对象。其次,科学家形象承载了晚清知识者复杂的现代科技认知。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不同于古典的文人墨客,他们不再以才志情思取胜,而多凭借科学知识、科技发明创造奇迹,力挽狂澜,偶尔也因为过分依赖技术而表现出谬误偏执,成为被嘲笑的丑角或怪人甚至暴徒。形形色色的科学家形象,凝聚了晚清知识者面对外来科学文化、面对现代科技冲击时的微妙情绪。最后,书写科学家推

进了晚清小说叙事形式的变革。晚清科学小说叙述科技如何影响民生、改造国民时,多依赖科学家的行动、心理推进情节,叙事重心向科学家倾斜,呈现了晚清小说由故事向人物、由情节向性格演进时的某些关键环节,也将限制视角带入小说叙事之中。

科学家必与专门知识紧密关联。晚清科学小说中,科学家的专业领域主要集中在物理、医学、天文等方面。

晚清科学小说中,掌握物理知识的科学家不在少数。电学、光学、力学等原理赋予他们神功伟力,帮助他们创造了种种超自然奇迹,建构出各式各样的乌托邦图景。《电世界》里的“电大王”黄震球就是一位精通电学的科学家,他利用“电”缔造了完美的“电帝国”。他致力于发明各种高效率的电学工具、机械,在他的万余种发明中,作为交通工具的“自然电车”速度“比沪藏铁路火车的速率增加五千倍”^{[1]33};作为筑路机械的“平路电机”“每小时可以平得十里五十丈阔的长路”,“滚过处没有不荡平如砥”^{[1]29};作为农用机械的“电犁”则“可以入地七八尺深。一耕便可二三百亩。”^{[1]32}借助工具,他不断

收稿日期:2020-12-10

作者简介:张翼(1978—),女,河南新乡人,文学博士,河南师范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近现代文学研究。

挑战自然极限。譬如他制造的“电翅”，能帮助人摆脱地球引力，飞升自如。他发明的“钨灯”，能散发超乎想象力的光与热，使南北极终日长明，温暖如春，将苦寒极地转变为宜居沃土。他设计的“消雨云电车”可以将雨云吹散或聚拢，自由控制天气阴晴、降水多少。黄震球还将电学运用于国家治理。他创办电学大学堂，通过电筒发音机、电光教育画等教具刺激学生学习兴趣，提升教学效率，普及教育，教化民众。他推行“电光审判”，用强光照射罪犯，使罪犯在强光刺激下供认不讳。他凭借“电翅”和“电气枪”，单枪匹马战胜了西威国装备精良的舰队。黄震球不仅仅将“电”应用于具体事务，还从“电”中抽象出价值观念，向民众渗透电的精神，即“积极的”“新生的”“光明的”“永久的”“缜密的”“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1]55}。

黄震球凭借现代电学获得无穷力量，也不得不见识电学所带来的对文明和人性的破坏，并最终陷入难解的困惑之中。为了斩草除根，黄震球一举引爆西威国的都城，看到战火摧毁城市、百姓痛苦挣扎，黄震球既为胜利而激动喜悦，也因残酷而内疚自责。此后他一直陷于被复仇的恐惧，引发了关于复仇是否合理的困惑。在他的主导下，“电帝国”仓廩实、衣食足，然而民众却渐渐滋生出奢靡纵欲之风，原本用于改善民生、造福大众的电学发明却成为犯罪工具。面对人心沦丧，黄震球有心改良却屡屡受挫。《电世界》终结于黄震球要去金星探险，虽然名义上他此去是为了寻找解救社会沉沦的良方，实质上却是避世归隐。

医学家也是晚清科学小说中常见的科学家类型。《生生袋》中的“客”，《月球殖民地》中的白子安、哈克参儿，《介绍良医》中的“医学博士”都具有医者的身份。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医学家医术精湛，面对种种疑难杂症往往能药到病除。《月球殖民地小说》中的医生白子安就是这样一位全才医生。当龙孟华乍闻妻子儿子仍活在世上，惊喜交加昏厥倒地时，白子安将几瓶药水“红的白的，黄的绿的，配搭均匀”^{[2]250}，灌送下去，使得龙孟华即刻便苏醒过来。白子安还掌握了解除睡意的药水，克制毒气侵害的药水等等。他还具备高超的检验技术，利用分析仪器，通过药理分析，洞察死者的真正死因。

以常识观之，白子安的医术已属高超，但在晚清科学小说的众医学家中他并不突出。晚清科学小说青睐的是对人进行全面身体置换，进而进行彻底精神改造的医学家。他们并不拘泥于治疗人的局部病痛，而是要用手术等医学手段、器械等医疗工具使人

脱胎换骨、获得新生。《新法螺先生谭》里的“造人术”体现了这一类医生的神奇。“造人术”是将已死老者的头颅打开，取出旧物，灌入新质。它的效果惊人，“齿秃者必再出，背屈者必再直，头发斑白者必再黑，是能将龙钟之老翁而改造一雄壮之少年”^{[3]12}。遗憾的是，此番描述重在介绍神奇的“造人术”，忽略了主导手术的非凡的医学家，仅以“二三人”一语带过。这一遗憾在短篇小说《介绍良医》里得到了弥补。《介绍良医》中的神奇手术是“换脏腑”，配套机械为“换脏腑机”，小说不仅对“换脏腑”这一手术方法、手术效果给予展示，还分出笔墨着重描写了主持这场手术的外国医学博士。他的外表迥异于中国人，“一身青衣裤，头上戴顶拿破仑帽，足穿一双高筒皮靴，黄黄的胡须，高高的鼻梁，凹凹的眼睛，拿着一根手杖，在椅栏上敲得砰砰的响”^{[4]50}。他的见识更是异于中国人，他发明换脏腑的机器，目的是要将受毒化的脏腑取出，换上完好的，以“恢复天然的精神”^{[4]51}。换人脏腑已然惊世骇俗，但洋博士并未止步于此，他发现世人心肠大多已被破坏，反倒是动物精神饱满，于是他大胆提出将动物脏腑替换给人，并通过各种努力将这一想法付诸实践。晚清科学小说显然更推崇这些通过置换脑汁、脏腑对人进行全面改造的医学家。这一点在《月球殖民地小说》的人物设置上也有明显体现。白子安的药唤醒了龙孟华，却难从根本上消除他的心魔。等龙孟华再次遭遇大喜大悲失了方寸，小说只字不提白子安，偏偏安排众人不远千里寻到了哈克参儿医师。哈克参儿擅长的恰恰就是类似于“造人术”“换脏腑”的“洗心术”。最终哈克参儿彻底治愈了龙孟华。小说从不吝啬对白子安神药的渲染，但危急关头每每遣出的却总是哈克参儿。如此人物设置、情节构建，显然是为了强调哈克参儿及其所擅长的全面置换、彻底改造的医学方法更胜一筹。

天文学家是众多科学家形象中格外引人瞩目的一类。借助天体构造、运行规律等专业知识，这些天文学家拥有了“宇宙”的观念，认识到是“地球”与其他星球共同构成了“宇宙”，不断思考着“地球”在“宇宙”中的位置，“地球”与其他星球、“地球人”与外星人之间的结构关系。《新法螺先生谭》（1908）中的“余”熟谙地球、月球、金星、水星等天体的性质与规律，所以当他在宇宙间各星球的吸力而灵肉分离，并没有惊慌失措，而是顺势而为，借机游历宇宙，有了一番奇遇。穿行于浩瀚宇宙之间，“余”获得了一种崭新的角度去观看自己置身于其中的地球。他发现地球原来并非如自己所想的是宇宙之中心，而

只是“如盆子口大小”^{[3]11}。地球之外的诸多外星球,也刺激“余”油然而生比较的意识,他好奇地望向外星,观察地球所未有之物,积极学习地球所未经之事。当他与水星相遇,暗暗思忖的是“正可细心考察,比地球有若干差异之点”^{[3]11}。初见金星,他想到的也是“必将他星球奇异之术,学成一二”^{[3]12}。宇宙间的遨游、星际间的探索共同开阔了“余”的视野,当他构建交通版图时想的就不仅仅是“地球”,而是要建立“从太阳至各星球,及各星与地球,各开通往来之航路”^{[3]16}。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天文学家经历宇宙间的“奇遇”,展示着他们豪迈雄壮的一面,也总是遭遇因天体碰撞而引发的世界“末日”,流露出他们感伤通透的一面。《世界末日日记》描述了月球将与地球相撞,众人慌作一团,嘈杂纷纭的乱象。饶有趣味的是,月球逐渐逼近,海啸冰暴席卷地球的危难关头,小说特意安排一位天文学家向大众发布消息。这位天文学家,一方面依据天文学知识从学理上宣告了地球必将毁灭,另一方面又从精神上抚慰惊恐不安的民众,向众人指出:世界毁灭虽令人惊恐,但却是进化的一种形式,是会蜕旧易新的。在这一过程中,精神并不会消散,“渺渺天空,宁无寄我精灵之地,一念及此,又何用增其悲怀耶?”^[5] 天文学家的这番表述既有颓势难挽的伤感,也包含着劫后新生的期待。

二

晚清科学小说中的科学家掌握的科学知识各有侧重,外貌性情、举止行动千差万别,但其在叙述中所承担的功能却不外乎以下三种:

首先,科学家承担普及科学知识的任务。晚清科学小说往往借科学家们的言谈,向读者介绍各种专业术语,解释各种科学原理。《水底潜行艇》聚焦20世纪的新型武器潜艇。为向读者介绍潜艇的构造及工作原理,小说最初通过“我”的视线将潜艇的说明图引入叙述之中,然而对于缺乏足够专业知识、初见潜艇的读者而言,即便看到详细的说明图也很难了解潜艇究竟为何物。于是小说特意安排一位青年博士登场,向众人进行宣讲,以便再次向读者介绍潜艇的发展历史,解释潜艇的工作流程,以解说的方式强化读者记忆。这位年轻的科学家先向围观的众人介绍潜艇的历史演进、设计标准与各国的潜艇数量、种类,接着便细致讲解潜艇构造,陈述包括“空气装置”“电炉装置”“安全装置”“磁针装置”“潜望装置”“武力装置”“通信装置”“水柜装置”“推进机械装置”等部分的名称与用途。随后,他以鱼鳔作

比,阐明潜艇升降的原理。末了,他特意指出潜艇所适用的动力为“内燃机”,尤其是“最新式的内燃机,又名狄瑟机”^[6]。“说明图+科学家”的情节结构,其意在向读者解释科学、普及新知。较之不能开口说话的“说明图”,能表达、有表情、有情感的“科学家”显然更贴近读者,也因此更适合承担这一叙事功能。

晚清科学小说不仅借科学家之口使读者熟悉专业术语、科学原理,更借科学家之思培植读者的数理意识、实证精神。科学家受其专业影响,数理意识突出。他们的一举一动都流露出这一特点。譬如《新法螺先生谭》中的“余”,观察描述事物多采用数字与比例,形容自己的灵魂之人是“用一万万亿之显微镜始能现其真相,其重量与氢气若一百与之一比例”^{[3]12},形容此灵魂所散发之光热则用“其光力之比例,与太阳若一万与一,与月若二百万万与一”^{[3]13}。科学家也具有实证精神,他们不再执着于义理与情绪。《元素大会》里的化学家“我”向读者郑重宣称:“某之好为散步田间者,以有科学的兴味也。默识平日之所闻,一一证诸其事。”^[7]“我”刻意地要挣脱传统文人托物言志、借景抒情的思维模式、情感结构,见花即分析花所属之门纲目科,陈述其繁衍方式、实用价值,见山则分辨其岩石种类、地质类型,见水偏想到水中所含的无数微生物,告知读者为保障健康必须饮用沸水。

其次,科学家引导读者认识中国现状。《新法螺先生谭》的作者徐念慈陈述自己之所以写科学小说的原因是:“皆本科学之理想,超越自然,而促其进化者也。”^[8] 徐念慈道出了大多数晚清科学小说作者的心声,他们陈列展示种种科学知识,其意却在剖析中国现状、探寻恢复强大中国的良策,科学新知、科技发明都只是实现这一终极目标的手段。因此,科学家解说知识原理是晚清科学小说的表层结构,小说的深层用意是要借科学家提醒读者关注时局政事,启发读者思考文明竞争等问题。

晚清科学小说中不乏直接参与政事、介入时局之中的科学家。这类科学家往往还兼具政治家、军事家的身份。如《电世界》中的开创“电帝国”、以一己之力抵御外寇入侵的黄震球,《新纪元》里的统帅水陆大军远征寰宇、大战白种联军的黄之盛。但更多的科学家是通过类比、隐喻的方式提示、启发读者的。譬如《新法螺先生谭》中“余”,就是用“光”“迷梦”指代希望与现实。“余”欲借其灵魂之身所散发的光芒警醒中国人的“迷梦”,使中国人能够“奋起直追,别构成一真文明世界,以之愧欧美人,而使黄

种执其牛耳”^{[3]5}。但中国民众仍是“嘘气如云，鼙声如雷，长夜漫漫，梦魂颠倒……而置刺眼之光明于不顾”^{[3]5}。图强意愿与严峻现实之间的巨大落差，使得“余”陷于愤怒、焦躁之中，甚至想与之同归于尽，以自身之毁灭破解中国之“迷梦”。“余”时而振奋、时而失望的焦灼情绪，贯穿小说始终，仅仅陈述自己的经验不足以纾解，“余”还就“迷梦”问题与他人展开对话。与“余”对话的是居于地心中国旧址的一位白发老者。此老者姓黄名祖，虽子孙众多，流布广泛，但多依赖祖宗，鲜有振者，大多“消夜方酣”^{[3]10}。老者已经垂垂老矣，欲唤醒子孙却心有余而不力，他希望“余”能代自己传语子孙，打破子孙的迷梦。老者作为“中国”的化身自不必解释，“余”与老者的对话，老者对“余”的希望，也隐含中国民众萎靡不振、科学家“余”肩负唤醒国民重任等多重意蕴。

再次，科学家见证科技的负面与恶果，引发关于“现代”的反思。晚清科学小说并非一味地畅想科学昌明、科技发达，它们也没有忽略科学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科学家负责普及新知，也必然见证科技恶果。战争是晚清科学小说用来刺激各类科技发明诞生的重要引信。《新纪元》描写了百年之后的黄白之战，它一方面反复强调科技已然发达，战争不再是斗力，而是斗智、斗学问；另一方面它又无法回避战争，无法解释战争仍然是以人的生命为代价。战场成为各种科技发明的竞技场，也成为绞杀无数血肉之躯的屠宰场。那些水底潜行雷艇、可化水为火的药水、能产生巨大热量的日光镜越是先进，杀伤力也越大。被潜行雷艇击中之后的战舰“震作数十块，并合舰的兵弁、器械纷纷然如蝴蝶一般飞起来，有的直飞到半空之中然后落下，只见满海面尽是黑雾浓烟，弥漫不散，把那一片坦平如镜的海水震得巨浪如山，掀腾不已。可怜舰上的一众兵弁，有的被震得血肉模糊，有的虽不曾受伤，然被它震到半天之上，又跌落海中，不保性命”^[9]。虽然小说中也提到各国设立战争公约的情节，希望借规则限制武器使用，也通过刘绳祖因化水为火的药水杀伤力惊人，所以不向任何人透露药水的制作方法的情节，传达道德或可约束残酷行为。但战火如荼，人心炽烈，远非规则、道德所能控制，白种联军仍然使用了公约不允许使用的氯气，尸体横陈的惨烈场景在小说中仍十分触目。

科技的负面不容忽视，科学家也并不总是英雄。一些科学家凭借科技作恶，成为科学狂魔，如《消灭机》里哈味借“消灭机”随意使人消失。另有一些科

学家成了丑角。他们为提升效率、解决问题发明种种器物，但他们并不能完全控制局面，甚至会受制于自己的发明。《发明家》里的施门士，热衷于机器发明，但他总是弄巧成拙。邻居黑莲夫人使用他所造的扫地毯机，结果在地毯上留下了无数小孔。另一位邻居司葛氏，使用他所造的宰鸡器，结果直接将鸡一分为二。施门士为制造机器耗尽家财，所造之物却使他逐渐成为众人厌弃、嘲弄的对象。终有一日，他误触机关，被自己发明的擦鞋器涂了满脸的鞋油。虽然小说的主旨是告诫科学家们必须要将科学与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以发明一大有用于世界之物，则利用厚生，为惠滋大愿，勿为此琐屑之发明也”^[10]。但是这个让人哭笑不得的科学家的意义远远大于此。滑稽的施门士透露出了晚清知识者在崇拜科学、排斥科学之外的第三种态度。

三

科学家形象一方面是由小说家们召唤而来的，用于呈现晚清科学技术、科学观念的发展动向，寄托小说家们关于中国与世界、时局与未来、传统与现代的复杂思考；另一方面，科学家形象自身也具备主动性，一旦他们进入叙述，就会向小说家们提出如何塑造他们，又如何处置他们与其他叙事要素之间的关系等问题。阿英在论及晚清科学小说时认为：“大都是以小说的形式，说明科学的原理，作提倡科学、启发冒险精神的运动。惟就艺术上讲，殊无成就可言。”^[11]阿英对晚清科学小说文学价值的否定已成定论，后世研究者基本上遵循了这一判断。然而从小说叙事形态的流变考察，晚清科学小说还是提供了某些演进的动力，尤其是科学家形象的出现促使小说出现了从故事到人物的叙事重心的倾斜，从全知到限制的叙事视角的转变。

不能否认，晚清的科学小说仍以“讲故事”为主，叙事的主要目的是要“输入文明思想”^[12]。可是所谓“科学”毕竟是“分科之学”^[13]，晚清以来涌入中国的科学知识、科技发明种类繁多、体系庞杂，加之作家们介绍新知、输入文明的愿望极其迫切，要想真正使科学小说成为“启智秘钥，阐理玄灯”^[14]，小说家们必须直面如何尽可能多、尽可能全地向普通读者推介科学原理的难题。小说家们纷纷选择人物连缀来拼接科学知识、组合科技发明，科学家形象由此深度参与了文本叙事。如果说种种新知、新技术是一颗颗明珠的话，科学家就是串联明珠的丝线，使原本独立的科学知识、散落的叙事单元融汇为统一的整体，共同服务于教化民众、富强中国的

叙事目的。如《新法螺先生谭》既涉及天文学的“星球”“宇宙”“卫星”，也包含物理学的“爱涅耳其”“离心力”“墮物渐加速之公纽”，还囊括化学的“氧”“氮”，更有一些很难被归类的、亦科学亦玄虚的“造人术”“动物磁气”“脑电”等等。作家本人缺乏对这些知识的深入研究，他获取概念的方式本就零碎^①，唯有通过科学家“余”的经历，这些天文学、物理学、医学、化学的只鳞片爪的知识方才得以融会贯通，并突破各自的学科界限共同成为打破“迷梦”的工具，甚至突破具体“知识”的藩篱而试图构建新的道德体系。

晚清科学小说以人物为线索黏合叙事单元，或许受到了中国古典小说的影响。《镜花缘》《水浒传》《儒林外史》已然娴熟地运用了这一方法。然而，晚清小说的人物连缀自有其新质。较之古典小说多依赖人物的行踪、言谈串联情节，晚清科学小说还不时地借助科学家的心理、情绪进行缝合，由此形成一明一暗两条连缀线索，明线是科学家的行为，暗线则为科学家的观念。《新法螺先生谭》《元素大会》等文本均明显表现出了明暗双线结构。科学家的心理活动因此被带入到叙事之中。《新法螺先生谭》开篇即是科学家“余”自述其科学观，之后“余”的喜怒哀乐与新知、新技术紧密交织在一起。如其身体一分为二后，“余于此时，不觉大喜，想从此考察一切，必易为力；然有一困难之问题也，因量过轻，不能留于空气中，则此身不知漂泊何所；将若行星之旋转空中乎，抑被大力者所吸，而牢固附丽于一处，将成永静性乎。余思及之大惧，幸也”^{[3]2}。惊惧与侥幸的交错，物理定律与天文知识的融汇，孰重孰轻，已经很难分辨。通过这样的叙事安排，小说在普及知识的同时，也隐约呈现出一个血肉饱满、性情淋漓的“余”，表现出叙事重心由故事向人物的倾斜。

科学家本就在晚清科学小说中举足轻重，一旦他获得了性格，就不甘心只充当故事中被叙述的人物，而要成为讲故事的人，通过故事的讲述更深入地影响读者。出于解说科学的目的，不少科学小说都是让科学家充当叙事者，为增强科学故事的可信度，文本又总是会安排科学家们以“我”的身份发言。作为人物的科学家，了解诸多常人所不知的专业知识，甚至掌握着宇宙间的奥秘；然而作为叙事者的科学家，却只能说出自己看到的，而且只能从自己的角度陈述这一切。仍以《新法螺先生谭》中的“余”为例。“余”穷尽高山、极地，游历宇宙、地心，与形形色色的人事遭遇，看似无所不至、无所不知，但一个值得玩味的问题是，他的所知所说全然来自他的个

人经验，丝毫不涉及那些他所未经之事。比如灵肉分离这一匪夷所思的事件是他亲身经历的；那些奇特的外星景观、外星生物是他亲眼看到的；玄妙离奇的脑电也是他本人学会并熟练加以运用的。但凡涉及他人的故事，文本就需要借助对话将“余”代入其中，如地心老者黄祖的所思所想，就要以“余”与老者相遇为契机，以“余”与老者的对话为主要形式，才得以展示。“余”执着地以自己的信用保证所言非虚，文中所说的一切都是真切发生的。这种极力想证明真实的叙事视角的确立，恰恰说明：“余”已经不再是古典小说里那个可以了解所有人、掌控一切事的叙事者了，他必须也只能从自己的经验出发叙述故事。

当然，此时的“余”还与五四时期那些成熟的、可以完全沉浸在自己世界里的第一人称存在着差距。“余”还带有明显的“说书人”的痕迹，他总是不由自主地要召唤读者出场。《新法螺先生谭》开头，即以新法螺先生的名义提醒读者关注“余”的探险经历：“‘诸君乎，抑知余之历史，其奇怪突兀，变幻不可思议，有较甚于法螺先生者乎？诸君其勿哗，听余之语其事。’”^{[3]1}之后，当灵肉分离发生之后，“余”一边描述自己由恐惧到超脱的情感变化，一边不忘向读者解释：“诸君乎，余灵魂之四分之一，爆出于数十丈外者，果何往乎？”^{[3]5}但“余”与传统的说书人也不尽相同，他敢于向读者承认，自己经验有限，并非无所不知。如“余”来到了金星，一边感慨景观奇特，一边自知所知有限，于是他向读者说：“诸君乎，余所见仅一隅，实令人不可思议。”^{[3]12}他也不掩饰自身局限，坦陈存在着他也无法解释之事。如《新法螺先生谭》结尾处，“余”分离的肉身与灵魂重新合并，他实在无法解释此事，只有告诉读者：“诸君，诸君，余已昏晕，实不能再举两身合一之原因，以报告于诸君之前。”^{[3]17}

“余”既不同于五四的限制式的第一人称，也不同于传统的全知式的第三人称，他就处于二者的夹缝之中，呈现出过渡的色彩。“余”是无所不知的科学家，又是有所不能言的叙事者，这一独特的叙事特征也可以理解为隐喻：所知愈多，所能言者、所敢言者愈少？此种心态不仅仅属于“余”，也应该是晚清知识者的苦恼吧。

总而言之，科学家在晚清小说中的频频现身，既是一个不容忽视的文学现象，引发了文学表现对象及叙述形态的变化，也是一份蕴藏丰富的思想资料，留存了晚清知识者面对外来科学知识、文化冲击时的复杂情绪，应引起研究者足够的重视。

注释:

①据考证,徐念慈很有可能是从《政艺通报》等报刊上的科普文章获知了以上概念。武田雅哉.东海觉我徐念慈《新法螺先生谭》小考:中国科学幻想小说史杂记[J].复旦大学学报,1986(6):40-44.

参考文献:

- [1]许指严.电世界[J].小说时报,1909(1).
[2]荒江钓叟.月球殖民地小说[C]//章培恒.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0卷)[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6.
[3]东海觉我.新法螺先生谭[C]//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4]阎异.介绍良医[C]//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滑稽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
[5]笑.世界末日日记[C]//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93.
[6]梅梦.水底潜行艇[C]//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216.

- [7]端生.元素大会[C]//于润琦.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121.
[8]觉我.《小说林》缘启[C]//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C].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256.
[9]碧荷馆主人.新纪元[C]//章培恒.中国近代小说大系(第50卷)[C].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89:474.
[10]毅汉,天笑.发明家[C]//清末民初小说书系·科学卷.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7:138.
[11]阿英.晚清小说史[M].上海:东方出版社,1996:209.
[12]包天笑.《铁世界》译余赘言[M]//迦尔威尼.铁世界.上海:文明书局,1903.
[13]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M].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8:319.
[14]小说林社.谨告小说林社最近之趣意[C]//陈平原,夏晓虹.二十世纪中国小说理论资料(第一卷).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83.

(责任编辑 刘海燕)

On the Images of Scientists in Science Novels of Late Qing Period

ZHANG Yi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Normal University, Xinxiang, Henan 453007, China)

Abstract: The emergence of numerous images of scientists is an important landscape of literature in Late Qing Period, but it has not been paid much attention by researchers. In fact, the image of scientists was closely linked with modern knowledge of physics, astronomy, medicine and so on. It bears the functions of popularizing scientific knowledge, guiding readers to understand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China, and witnessing the negative effects of modern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t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narrative form of novels in Late Qing Period from story to character, from omniscient perspective to limited perspective. The images of scientists in science novels of the Late Qing Period should not only be regarded as a complex literary phenomenon to be clarified, but also as a rich ideological data to be analyzed.

Key words: image of scientists; science fiction in Late Qing period; intellectuals in Late Qing period; knowledge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日本“国语高考”中汉文试题的选文来源研究

宋时雨

(华中师范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9)

摘要:汉文试题是日本“高考”——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大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国语科目中固定的考试题型,其考查内容源于我国古代的文史经典原著。在选取2001—2019年日本大学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为研究对象的基础上,发现“汉文”试题的选材主要来自我国“子部”典籍中的笔记小说、史类随笔、议论散文三类,以及“集部”典籍中的别集与诗文评论。在选材标准上,汉文试题多选取200字左右短小的文段,前期选文主要选取小说,重情节叙事,内容多表现美德品质;近年来的选文更青睐散文、重议论说理,淡化寓意、偏重抽象思辨。

关键词: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研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4

中图分类号:G40;I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17-06

中日两国交流历史悠久,文化同根异株。经过一千多年的发展,“汉文教育”依然是当代日本基础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如今的日本,相当于我国“高考”的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大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的国语科目中就有固定的汉文阅读考试题型,其考查内容完全源于我国古代的文史经典原著。本文选取2001—2019年日本大学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为研究对象,在对试题进行翻译的基础上,对该试题的选文来源情况进行了总体概括与分析,以期对我国语文学科基础教育改革提供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一、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制度与国语科考试概述

(一)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制度简述

1979年,日本正式开展了第一次由国立大学统一考试机构——大学入试中心组织的全国大学入学统一考试,并由此确立了“官方+自主”的两考制度:即首先由入试中心组织第一次全国统一考试,根据统一考试成绩各大学再自行组织第二次考试。这种“官方+自主”的考试模式一直延续至今。今天的日本“高考”正式名称为“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大

学入試センター試験,以下全文简称“中心考试”)。从2009年起,该考试确定在每年1月举行,为期两天。考试科目有国语、公民、地理历史、数学、理科、外语共六大科,每一大科下又有若干小科,共计31门。考生只需要根据各大学的报考要求自行参加相应的考试科目即可。由于该考试的官方性与权威性,几乎所有的国立大学、公立大学,以及绝大多数私立大学均使用该考试的成绩作为录取依据。^[1]

(二)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科考试概述

日本大学入学统一考试的“国语科”相当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招生全国统一考试中的“语文”科目,其地位与重要性不言而喻。国语科满分共200分,是中心考试各大科中分值最高的科目之一(另一门200分科目为外语),考试时间为80分钟。^[2]如上文所述,六大科31门的考试选择依据各大学录取要求而确定,自1997年开始,国语试题分两套试卷,即“国语I”与“国语I·II”,这两套试卷在试题结构上没有明显差异,只是后者的考查难度更大,几乎绝大多数日本大学都要求考生“国语I·II”的成绩。2006年始至今,国语科下取消了“国语I”与“国语I·II”的分别,统一为“国语”单科。以下

收稿日期:2020-12-20

作者简介:宋时雨(1997—),男,湖北武汉人,华中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日本国语教育。

将从几个部分简要谈谈国语考试的基本情况。

1. 命题内容与素材

中心考试国语科目的命题内容比较丰富,全卷均考察学生的阅读理解能力。试卷总体上可分为现代文阅读、古文阅读、汉文阅读三大部分。

“现代文阅读”分为两部分,每一部分各有一篇文章。其中一篇是论述文,一篇为小说。论述文的命题范围较广,涉及日本社会、经济、哲学、文化等多方面的内容,字数3000字左右。论述文命题素材一般来源于当代学术专著,且近年来试题选取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材料居多。如2016年试题素材来源于家庭教育类学术专著《角色化/被教育的孩子们》(《キャラ化する/される子どもたち》)。小说部分选取的一般是日本现当代作家的小说作品,字数5000字左右。小说素材的选择一般有节选或全文两种形式,另外,如果选取的是距离当下社会较为久远的作品,试题会在开头给予一段100字左右的小说背景提示,帮助考生迅速了解与文本相关的社会历史状况。如2016年试题选取的是日本现代女作家佐多稻子的《三等车》(《三等車》)。

“古文阅读”与“汉文阅读”均为古典文学阅读,其中“古文”指日本古典文学,“汉文”指中国古典文学。古文阅读的命题素材往往来源于日本古代随笔、日记、诗歌等,所选文章长度约1000字,如2014年的古文试题选自日本古代经典《源氏物语》中三十八回《夕雾》中的一节。汉文阅读选取的素材来源于中国古典史书、诗话、笔记、文集等,字数在200字左右。如2014年的汉文试题选自我国明代文人陆树声的文集《陆文定公集》。值得说明的是,针对距离考生更加遥远的古文,试题在题头与小说阅读一样一般会给予相关时代背景的解释说明(甚至包括《源氏物语》这样在日本脍炙人口的经典)。但汉文阅读部分却几乎很少配有说明文字。

2. 考试题型与分值

中心考试国语科目的命题内容相对单一,全卷均以客观选择题形式考查。

其中,现代文阅读中的论述文阅读一般设有6题(试题上称“問”),每一题考查形式有所差异,但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分值共50分。有的题下又分设几个小题,因此一般设有11个小题。这些选择题的选项一般为5个,少数题为4个。试题主要考查对于文章的理解分析,选择题主要考察相关的语法知识、词语解释、句子理解与全文的分析把握等。题干约在80字左右,选项一般在90字左右,且各选项

间字数差别相当小。现代文阅读中的小说阅读一般设有6题(問),题型包括单项选择题与双项选择题,分值共50分。与论述文类似,小说部分共有9小题,前7题一般为单项选择题,选项为5个。最后一题一般设置为6个选项中选择两项的形式(视为2小题)。试题主要考查词法、语法、人物内心活动分析、对文章主题把握等。题干的字数与论述文差别不大,部分小题选项的字数较之论述文略多,可达120字左右。

古文阅读一般设有6(問),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分值共50分。题目的选项均为5个。该部分主要考查古代日语语法的常识、文中人物的相关描写、理解文章整体内容等。题干约在60字左右,选项字数根据考查题型的不同差异较大,在25—120字不等。汉文阅读一般设有7(問),题型均为单项选择题,分值共50分。题目的选项均为5个。该部分主要考查对汉字含义的掌握、汉文的阅读方法、整体内容的理解等方面。题干约在50字左右,选项字数根据考查题型的不同差异较大,在4—120字不等。

二、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阅读选文研究

前文已经提及“汉文阅读”试题在选材上的特殊性。在当今世界的高等学校选拔考试中,极少有国家在本国的官方选拔考试中直接以他国的古典文献作为考试材料。在韩国、越南废除汉字的同时,日本国内虽也有相关汉字存废的争议,但其汉文教育却自千年以来坚如磐石地延续了下来。同时,与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相匹配的日本高中汉文教科书选文虽然十分浅显,往往从《论语》《孟子》《史记》等古代汉语入门典籍选择。^[3]但在考试上,命题人员可谓下足了功夫,他们阅读了海量的中国古典文献,所选取作为命题素材的典籍甚至是我国高中生乃至中文系学生所陌生的。由此,对汉文试题的选材进行较为详细的统计分析很有必要。下文分两个角度讨论2001—2019年试题的选材概况,即“选材来源:选什么”与“裁选特征:怎么选”。

(一) 选材来源:选什么

2001—2019年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的选材来源情况统计结果,如表1所示。

由表1可知,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的一大特色在于其选材类型的多样性与丰富性。总体可以分为中国古代史书文集、诗话、笔记、小说、散文等多类。以下将根据古典文献学中常用的“四分法”归类,进行简要分析。

表1 2001—2019年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选材来源统计

试题年份	选文内容	年代	选材来源	作者	体裁
2001 国语 I	《晋文公伐原》	汉代	《淮南子》	刘安	散文
2001 国语 I · II	《唐临为大理卿》	唐代	《大唐新语》	刘肃	笔记小说
2002 国语 I	《吴兴僧昼》	唐代	《因话录》	赵璘	笔记小说
2002 国语 I · II	《典家塾难其人》	宋代	《清波杂志》	周焯	笔记小说
2003 国语 I	《华佗善医》	宋代	《太平广记》	李昉等	笔记小说
2003 国语 I · II	《柴窑片磁》	清代	《阅微草堂笔记》	纪昀	笔记小说
2004 国语 I	《杨光远叛青州》	宋代	《泃水燕谈录》	王辟之	史料笔记
2004 国语 I · II	《楚人谓虎为老虫》	明代	《雪涛小说》	江盈科	散文
2005 国语 I	《工之侨献琴》	明代	《郁离子》	刘基	散文
2005 国语 I · II	《鲍叔固已识管仲于微时》	明代	《千百年眼》	张燧	史论随笔
2006 国语	《胡子夜卧》	明代	《胡祭酒集》	胡俨	文集
2007 国语	《钱明经善诗赋》	明代	《竹叶亭杂记》	姚元之	笔记
2008 国语	《隋田杨与郑法士俱以能画名》	明代	《衡庐精舍藏稿》	胡直	文集
2009 国语	《西施非能亡吴也》	清代	《壮悔堂文集》	侯方域	文集
2010 国语	《世之学者》	清代	《野鸿诗的》	黄子云	诗话
2011 国语	《敏学斋记》(节选)	元代	《金华黄先生文集》	黄潜	文集
2012 国语	《东坡元丰间系御史监》	宋代	《西斋琐录》	孙宗鉴	笔记小说
2013 国语	《问双棠赋》序	宋代	《张耒集》	张耒	文集
2014 国语	《苦竹记》(节选)	明代	《陆文定公集》	陆树声	文集
2015 国语	《家蓄一老狸奴》	明代	《篁墩文集》	程敏政	文集
2016 国语	《张荷宇梦母图记》	清代	《抱经堂文集》	卢文弨	文集
2017 国语	《听雷霆于百里之外者》	江户	《白石先生遗文》	新井白石	文集
2018 国语	《王嘉祐》	宋代	《续资治通鉴长编》	李焘	史书
2019 国语	《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清代	《杜诗详注》	仇兆鳌	集注

1. 经部

中心考试的汉文试题几乎不涉及经部文献。至少目前已知的2001—2019年十九年间的24份试卷中,无一年的试题选用经部文献。经部是儒家经典著作,是中华古典学术书籍的核心内容,而有着上千年汉文教育传统的日本不可能对经部文献缺乏了解。由此可以得出结论:中心考试中的汉文试题在命制时,对我国儒家经典著作有刻意的回避,这可以视为是中心考试在试题命制上的“反押题”策略,也使得日本当代汉文教育跳出了读经式的传统体制。

2. 史部

2001—2019年中心考试中的汉文试题所涉及的史书极少。目前可知的仅有2018年试题中所选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属史部。另外,2005年国语I·II卷考试中选取张燧《千百年眼》是一部史论随笔,虽然有较强的历史评述性质,但其语言与记录方式都较为随意,《四库禁毁丛刊》也将其列为子部。中心考试绝少选用史部书籍的原因可能有二:一是史部文献的文学性相对不足。作为国语科而非历史科的选拔考试,其试题内容在一定程度上需要反映文学语言的审美性,这一点在前三大题中都有所体现。“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因此汉文试题几乎不选用史书作为命题素材。第二即是上文所提到的刻意回避经典现象。史部文献的正统在于正史,如《史记》《汉书》等,这类书自然几乎不选,而

其他的别杂史、诏令奏议等材料不仅相对冷僻,且语言难度较大,不利于初学者学习掌握,而其文学性就更难以保证了。因此,史部文献就成了汉文命题素材中的绝对冷门。

3. 子部

子部文献是2001—2005年期间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的命题重要来源。子部收录诸子百家著作和类书,除诸子之书还包括天文算法类、术数类、艺术类、小说家类等,而汉文试题所选用的文献绝大多数来源于小说类。此处将汉文试题的子部文献简要分为三类:

(1) 笔记小说

笔记小说从魏晋时期发端,学界一般均按照鲁迅的观点分为“志人小说”和“志怪小说”两种主要类型。由于我国的志怪小说基本上受到史书体例的影响,在创作时没有自觉的虚构意识,而是以史家的态度书写笔记,所以其并不属于有意识的文学创作。但是这类作品语言文采丰富,富有想象色彩,具有一定的文学魅力,因此是汉文试题所青睐的选材对象。例如2001年国语I·II试题所选刘肃《大唐新语》就是笔记小说。2002、2003连续两年的四套试卷所选《因话录》《清波杂志》《太平广记》《阅微草堂笔记》均为此类。笔记小说所选的故事往往情节较为生动,寓言性强。例如2003年国语I·II试题《柴窑片磁》讲述一位商人贩卖“柴窑片磁”的故事,寥寥

数笔,百字之间就讲述了一个饶有趣味的见闻,读来轻巧灵动,不乏哲理思辨。

(2) 随笔

主要为历史掌故类笔记。主要记风俗遗事、民情轶闻等。如王辟之《澠水燕谈录》、张燧《千百年眼》、姚元之《竹叶亭杂记》等均属此类。此类多为随笔记录某段历史的杂事见闻,其内容兼具史料与文学,但相较于史书而言缺乏系统性与可靠性,笔法更加真切活泼,因而不归为史部。该类笔记文有一定的文学色彩,而较于笔记小说而言情节性与寓言性稍弱。不过总体而言,此类文章也基本符合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的选材要求。如2004 国语 I 卷试题《杨光远叛青州》讲述一只家犬在叛乱期间救助全家人的故事,故事生动,寓言性极强,该文本在我国也被无名氏改写为《犬负米救主》,在民间流传。

(3) 议论散文

主要指西汉时期刘向所编《淮南子》与明朝刘基的《郁离子》。根据文献学中不同的分类法,亦有将《淮南子》归入笔记类的。此处将《淮南子》《郁离子》归于“议论散文”主要是相对前两类而言的。它们相较于随笔作品往更具理论性,同时对时政有一定的议论,反映作者较为系统化的政论、哲学思想等,同时不乏寓言性的表达。如2005 国语 I 所选《郁离子》的《工之侨献琴》即是一篇非常经典的寓言作品,情节生动的故事背后亦能给人以启迪与警戒。

4. 集部

子部文献是2006 年以来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的另一主要命题来源。在2006—2019 年的24 篇汉文试题中,有11 篇试题的选材来源于集部文献,可见自2001—2005 年时期以子部文献为主过后,命题人将目光投注到了集部之上。该11 年的文献来源可分以下几类:

(1) 别集

即相对总集而言,收录个人诗文的集子。如《胡祭酒集》《衡庐精舍藏稿》《壮悔堂文集》《金华黄先生文集》《张耒集》《陆文定公集》《篁墩文集》《抱经堂文集》等均属此类。其中多数为作者个人所编,少数为后人所撰。此类别集内容、风格差异较大,不太具有统一性。

(2) 诗文评论

主要有黄子云《野鸿诗的》、仇兆鳌《杜诗详注》两部文献。《野鸿诗的》是一部诗歌评论,一卷。此处“的”,即准的,标准。“诗的”,即诗歌的标准,这里指风雅精神。^[4]“野鸿”是黄子云的号。本书在论

诗叙事上虽有偏颇失当之处,但不失为清诗话中有特色的理论著作,对于袁枚诗歌理论的形成具有一定的奠基作用。^[5]《杜诗详注》由仇兆鳌耗费二十余年的精力,广搜博取,几经增补而成,是一部带有集注集评性质的鸿篇巨制,其资料极为详尽,为阅读杜诗的重要的一种参考书。^[6] 诗文评论的阅读理解难度相对较大,但命题者却并不一定摘选评论者的论述文字,有时只是把文献作为自己命题的辅助工具。例如2019 国语汉文试题所选虽然来自《杜诗详注》,但选段为杜甫《唐故万年县君京兆杜氏墓碑》的原文节选,不涉及仇兆鳌的评论,因此难度并不大。

(二) 选材标准:怎么选

由上可知,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的选材极为丰富,所选文献朝代自汉代至清代一应俱全;文献体裁涵盖史、子、集三大部分,史书、笔记小说、随笔、散文、别集、评论无所不包。总体而言,选材来源巨细无遗、包罗万象。而能在浩如烟海的中国古代典籍中筛选出一篇篇“短小精悍”的选文,命题人势必秉承着较为清晰的出题理念与原则,才能让默无声息的文献典籍为其所用。本部分拟将在弄清“选材来源:选什么”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探寻2001—2019 年试卷中“作为试题选文的文本”共同符合的特点,并尝试进行归纳总结。在分析维度上,本文拟选取“意旨”“结构”“文体(风格)”“选文字数”“段落数”“理解难度”六要素,进行统计分析。

所谓“理解难度”是一个较有主观色彩的维度。由于没有办法将这二十四套试题在同等的环境下进行样本测试,因此概括起来也相对模糊。但是,笔者在操作中尝试将这一“难度”系数进行客观化。由于汉文试题的考试对应的日本高中学生,其学习文言文的学力水平相当于我国初中学生,因此以我国《义务教育语文课程标准(2011 年版)》、日本文部科学省《高等学校学习指导要领》为基础,结合选文的长度、难点字词、注释数量、句式特点进行综合判定,划分为“容易”“中等”“较难”“困难”四个维度。

具体统计结果如表2 所示。

由表2 的统计,对中心考试汉文试题的选材标准做出以下简要总结。

1. 选文篇幅:多选取200 字左右的短小选文,且往往人为分段帮助考生整体理解。

字数的多少直接决定了考生的阅读量与思考时间。据统计,2006—2019 年选文平均字数为216 字,2001—2005 年“国语 I 卷”的平均字数为142 字,“国语 I · II 卷”的平均字数为263 字。可以看

出,在2001—2005年间,出于区分国语I卷的难度的目的,国语I·II卷在字数上远多于I卷。目前更有参考价值的是2006年改制以来的试题。可以看出,2006—2019年的选文字数总体趋于稳定,其中字数最多的为2010年与2011年并列的254字,最少的为2007年的161字,两者相差近百字。除此之外,近十年的选文基本稳定在220字,考生总体的阅读量不会太大。同时,段落的人为划分也值得关注。以上所统计的选文,除极少数如陆树声《苦竹记》本身有分段,其他作品几乎都没有事先的分段。

表2 2001—2019年日本大学入学中心考试国语科汉文试题选文辞章要素统计

试题年份	选文内容	字数	段落	文体	意旨/内容	行文结构	理解难度
2001 国语 I	《晋文公伐原》	110	1	叙事散文	言而有信	叙事	容易
2001 国语 I·II	《唐临为大理卿》	256	2	笔记小说	为官正直	叙事	中等
2002 国语 I	《吴兴僧昼》	122	1	笔记小说	扬长避短	叙事	容易
2002 国语 I·II	《典家塾难其人》	240	3	笔记小说	尽心善教	叙事	中等
2003 国语 I	《华佗善医》	146	1	笔记小说	机智行医	叙事	中等
2003 国语 I·II	《柴窑片磁》	249	4	笔记小说	玩物丧志	叙事	较难
2004 国语 I	《杨光远叛青州》	164	1	笔记小说	忠犬有灵	叙事	中等
2004 国语 I·II	《楚人谓虎为老虫》	286	2	叙事散文	狐假虎威	叙事+议论	较难
2005 国语 I	《工之侨献琴》	170	1	叙事散文	重视实质	叙事	容易
2005 国语 I·II	《鲍叔固已识管仲于微时》	285	3	史论	君子之交	叙事+议论	较难
2006 国语	《胡子夜卧》	173	1	随笔	物各有长	叙事+议论	容易
2007 国语	《钱明经善诗赋》	161	2	随笔	奇人轶事	叙事	容易
2008 国语	《隋田杨与郑法士俱以能画名》	210	3	随笔	画工之道	叙事+议论	中等
2009 国语	《西施非能亡吴也》	222	3	史论	亡国遗训	议论	困难
2010 国语	《世之学者》	166	3	文论	杜甫诗学	议论	困难
2011 国语	《敏学斋记》(节选)	254	3	议论散文	为学之道	议论	困难
2012 国语	《东坡元丰间系御史监》	254	1	笔记小说	谐音幽默	叙事	中等
2013 国语	《问双棠赋序》	232	1	序言	观花之思	叙事+议论	较难
2014 国语	《苦竹记》(节选)	217	1	随笔	无用之用	叙事+议论	较难
2015 国语	《家蓄一老狸奴》	248	2	随笔	血缘亲情	叙事+议论	中等
2016 国语	《张荷宇梦母图记》	225	3	随笔	精诚所至	叙事+议论	中等
2017 国语	《听雷霆于百里之外者》	198	2	散文	古今之思	议论	中等
2018 国语	《王嘉祐》	237	1	史书	少年聪慧	叙事	中等
2019 国语	《唐义姑京兆杜氏之墓》	228	3	碑文	追忆亡姑	叙事+抒情	较难

2. 思想内容:前期选文多表现美德品质,近年来淡化寓意、偏重抽象思辨。

选文的思想内容是考试命题中值得审视的核心部分。我国高考强调“立德树人”,日本前期的汉文选文也基本应和了这一点。在2001—2005年的10份试题中,几乎每一篇文言短篇都有比较明显的寓意,基本上均表现美好道德品质,教化意味较强。例如2001年的国语I·II选文《唐临为大理卿》记述了唐临为官刚正不阿,所断案件绝无冤狱;2004年国语I·II选文《楚人谓虎为老虫》批判了当时社会中狐假虎威、冒名欺世的现象,规劝人们轻名尚实。需要注意的是,作为初学者,阅读此类寓意明显的小短文较为合适,但在考试中,这样的内容容易造成试题难度整体偏易,因为考生往往在阅读完整篇文章后就可以立即“猜出”选文的主旨。因此,具有过

而在2006—2019年的14篇选文中,有9篇被命题者进行了段落划分。段落的划分一定程度上能让考生更好地把握文章层次,理解文意,也就从侧面降低了少许阅读的难度。另外,本文认为命题人在裁选时是有较为明确的字数意识的,而不是根据字数实际数量全篇选入。因为多篇文献都有较为精细的删节,如《问双棠赋序》删除了原文最后一句,《敏学斋记》摘选了2—4段,并删节了第2段第一句、第4段后两句,而非整段节选,由此可见命题人对选文的篇幅把握是用心谨慎的。

于明显寓意或说教色彩的篇目在2006年及以后就很少出现了。近十年来所选的选文往往淡化了寓意性,或本身就没有明确的寓意,而是更多体现作者较为多元、复杂的思考。例如2013年所选张耒《问双棠赋序》,起初由作者栽植的海棠花入手,表达对植物、自然的热爱,但文章不仅停留于此,随后作者赋予海棠拟人化色彩,把海棠当作自己的挚友来看待,遥想自己不在时海棠的处境会如何,这就加强了文章内容的思辨性与情感的细腻化。

3. 体裁与结构:前期多选小说、重情节叙事,近年来多选散文、重议论说理。

体裁与结构是选文文本的形式层面。中心考试在2001—2005年期间的选材类型较为单一,除了2005年国语I·II试题所选为一篇史论之外,其余各年无一例外均为笔记小说或叙事散文。这两种体

裁最大的共同点是叙事为主,较少有说理成分。2003年国语I·II试题所选《柴窑片磁》首次出现了议论文字,难度明显提升。2006年以来的试题则很少出现全篇均为叙事的选文,“一段叙事、一段议论”模式的选文开始出现,2009—2011连续三年甚至出现了通篇议论的情况。与之相配的选文体裁也出现了多样化,如随笔、史论、文论、序言、碑文等,可见随着考试的变迁,命题人的选文眼界愈加开阔。且近几年来来的试题明显在体裁与结构上有自觉的蜕变,如2018年首次将史书列入选文范畴,突破了文与史的界限;2019年直接将杜甫写给亡姑的碑文选入,通篇饱含深情,出现了首篇有明显抒情色彩的文章。这些变化无疑给日本考生带来了更为严峻的考验与挑战,因为考题选文已由传统的“故事型”转变为了“思辨型”甚至“哲理型”,这不仅要求考生有更缜密的思维,还要有更丰富的知识储备。如2009年试题《西施非能亡吴也》,对吴国的灭亡进行了深刻的历史反思,如果日本考生对这段中国的历史缺乏了解,则必然满头雾水,难以顺利作答了。

三、结语

总而言之,中心考试的选材具有丰富的研究价值。以近十年的体裁考查情况来看,命题人有意识地在进行体裁的更替,不拘泥于某一种或几种体裁,

而是想尽心思进行创新。值得一提的是,当前直到2019年的汉文试题全部是“文”,从未出现过诗歌,但日本2020年最新一度的中心考试汉文阅读首次考查了一首杜牧的诗歌,而非散文。这种具有明显反押题意识的命题选材,更加体现出命题者富于变化的命题思路。由于国别的差异,直接进行横向比较难以得出具有说服力的结论,但这种命题思路、选材方法却值得我国教育工作者借鉴、探究。

参考文献:

- [1]高升.日本大学招生考试制度及其对中国高考制度改革的借鉴[J].考试研究,2011(4).
- [2]独立行政法人大学入学考试中心.平成29年度大学入学試験センター試験出題教科・科目[EB/OL].<http://www.dnc.ac.jp/albums/abm.php?f=abm00004981.pdf&n>
- [3]三角洋一.国语综合·古典编[C].东京:东京书籍,2012.
- [4]赵传仁.中国书名释义大辞典[Z].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7:996.
- [5]何宝民.中国诗词曲赋辞典[Z].郑州:大象出版社,1997:1273.
- [6]张忠纲.全唐诗大辞典[Z].北京:语文出版社,2000:1057.

(责任编辑 刘海燕)

Research on the Source of Selected Articles of Chinese Test Questions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Subject for the Japa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SONG Shiyu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Central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Wuhan, Hubei 430079, China)

Abstract: In Japa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Chinese reading test is a fixed section in the National language subject, and its content is derived from ancient Chinese literary and historical classics. On the basis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test questions of the Japa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from 2001 to 2019 as the research object, it is found that the sources of this part mainly come from three categories in the “Zibu” classics in China, including the notebook novels, historical essays and argumentative essays, as well as special anthologies and poem reviews in the “Jibu” classics. In terms of material selection criteria, it prefers those short paragraphs around 200 words. The early selection of articles mainly focused on novels which are plot-oriented with contents demonstrating virtue and quality. In recent years, the selection shifted to prose, which emphasizes arguing and reasoning, downplays implications and focuses on abstract speculation.

Key words: Japanese University Entrance Examination; National Language subject; Chinese language; analysis of questions

论民间文学中爱国主义资源的价值及其开发

钱东晓¹, 孙家栋²

(1. 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 江苏 南京 210023; 2. 河南大学文学院, 河南 开封 475001)

摘要:现代社会的民族文化遭遇发展瓶颈,影响到民族优秀文化的传播和国人信仰体系的构建。民间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载体,蕴含着丰富的爱国主义教育资源,对培养民族认同感具有重要意义。除了神话故事和传说,民间文学的很多补充形式都是民族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和基因。民间文学的教育和传承缺乏顶层设计,培育和开发力度亟待加强,民间文学培育和开发体系急需优化或重建。民间文学的发展史表明,在传统与现代的对话中,民间文学传播及培育是人们接受爱国主义精神洗礼的过程。

关键词:民间文学; 传承创新; 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5

中图分类号:I207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23-05

民间文学是民族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不可替代的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载体。民间文学发端于民间,群众基础深厚,有利于培育和加深乡土情结和家国情怀。精彩纷呈的各民族民间文学,是多民族国家文化大家庭中不可或缺的璀璨明珠。

一、民族文化、民间文学及爱国情怀

(一) 民族文化

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文化是血脉和灵魂。历经数千年历史积淀、具有广大群众基础的民族文化博大精深、底蕴丰厚。历史证明,一个民族或国家的强盛往往以民族文化的繁荣为支撑。中华文化历经劫难而薪火不断,散发出愈加旺盛的生命力,拥有持续稳定的民族文化是重要内因。

经济全球化时代,外来文化猛烈冲击,资产阶级思潮甚嚣尘上。在意识形态建设的战场上,优秀传统文化更是起着定海神针的作用。民族文化有力地传承中华民族的价值观念和审美观念,涵养中华民族的文化基因。民族文化凝心聚力,对推动民族复兴伟业发挥着重要作用。

民族文化蕴含丰富的教育价值。以爱国主义为

核心的精神追求潜移默化地熏陶着炎黄子孙,强化国人的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

(二) 民间文学

文学是以语言为手段,艺术地、形象地反映社会生活的意识呈现形式。文学按体裁可分为诗歌、小说、散文和剧本;按时间分为古典、近代、现代和当代文学。把文学分为作家文学和民间文学则是按文学创作的主体来划分的。

民间文学来自民间劳动人民,具有流传性、口头性和集体性特征。民间文学是广泛流传于人民群众并反映他们生活、观念和感情的口头文学。民间文学是人民的集体创作,渗透人民的集体情感,是人民生活的“百科全书”,包括天文地理、民风民俗和人情世故。

从表现形式上来说,民间文学可以是高雅的史诗、故事和歌谣,也可以是散落各地的民间说唱、民间小戏,包括内容比较固定的远古神话和传说,也可以是口头文学形式的谚语、歇后语和谜语等。当然,文字作品的民间文学是主流,但口头民间文学也富有强大的生命力,遍布于人类生活各时空。

收稿日期:2021-02-28

作者简介:钱东晓(1994—),男,河南平舆人,博士,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研究人员,研究方向: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民间文学、民族文化与爱国情怀

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辩证统一、相辅相成。前者是后者的土壤,后者是前者的反映。爱国情怀则是民间文学与民族文化的共同主题。

从承载内容看,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都是民族意识的积淀,包括风俗习惯、伦理道德。从功能作用看,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都有助于增强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民间文学孕育于人民又哺育后人,民族文化则是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总汇。民族文化和民间文学都关乎民族的内聚力,对民族优秀文化传承起着重要作用,是民族发展和民族续存的土壤和柱石。

民间文学集中反映着民族文化的精神内核,体现劳动人民独特生活情趣,在内容上是生活的、大众的和民俗的,是最古老也是最年轻的民族文化表达形式,是祖国同胞沟通情感的纽带。

二、民间文学的爱国主义资源及价值分析

(一)民间文学蕴含丰富的爱国主义精神资源

随着全球化进程加快,民族文化的发展遭遇各种瓶颈和威胁。国外错误思潮严重侵蚀青少年的精神世界。有些孩子对自己国家的传统文化知之不多,却乐于过洋节、吃西餐。人们的内在信仰体系受到外来文化的空前影响,弘扬中华民族优秀文化以重建国人文化自信成为当务之急。

民间文学能够胜任文化传承重任。民间文学中的很多传说和故事,传承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核心理念,传递价值观念、道德观念和审美情趣。以民间文学为抓手强化民族精神建设,是提高民族凝聚力、民族向心力和民族自豪感的重要举措。很多脍炙人口的民间文学作品很好地传播了传统文化的精神内核。比如夸父追日,情节虽然简单,但其中表达的“鞠躬尽瘁、死而后已”奉献精神千古流传;神农氏尝百草,反映了舍己为民的大无畏精神;阿凡提和济公的文学形象则表现了中华民族的聪慧与勇敢。许多爱国题材的民间文学,采用故事、歌谣和谚语等灵活的形式,易于传播。虽然篇幅短小,但节奏明快、含义深刻。

(二)民间文学有益于培养民族认同感

民族认同感是关于民族认知系统在感情上和心理上的趋同。一个民族的民族心理就是民族认同的结果。换句话说,民族认同是民族心理形成的基础。有了民族认同和国家认同才会产生爱国爱民的深厚情感,从而产生践行民族道德规范的动力。民族认同感是个体产生爱国德行的基础和原点,是支撑爱国主义行为的源泉和动力。民间文学滋养人的灵

魂,影响个体内心世界。很多人在自己一生的经历中,通过活学活用民间故事,重建与国家和民族的联系。^[1]

民间文学可以让人们通过具体而生活化的文学体验,培育现代人的“情商”。学校教育往往只注重智力发展而忽视了情商的培养。而通过阅读民间文学激发对国家和民族的认同感,提高对道德规范和道德情操的感悟,以青少年所喜闻乐见的文学形式培育爱国情怀。

(三)民间文学有益于活跃民族传统文化

民间文学包括史诗、故事和传说等国学经典,也包括丰富多彩的民间艺术形式,如民族音乐、舞蹈和美术等。甚至民间节日也可以作为民间文学的补充形式,普遍存在于祖国的各个地方。以民间文学形式出现的民族音乐、舞蹈、美术和节日呈现,与以文字形式出现的民间文学一起,构成民族文化传播的立体系统。丰富多彩的文学表达形式对于活跃地方文化、熏陶民族情感、构筑家国情怀都是十分重要的。民间文学及其补充形式无不渗透着中华民族的精神血脉。

中国民俗学家周作人早在1919年就表达过对中国民俗学发展系统的主张。他详细梳理了民俗学与民间文学的发展脉络,研究民众日常生活的艺术化、平民生活与国民文化、小品文的民间文学价值等,为民间文化发展做出早期贡献。^[2]他后来曾要求《歌谣》周刊对“方言成语当加以解释”。他认为“歌词文俗不可加以润饰”“俗字俗语不可改为官话”等,可见其把民间文学纳入民俗学研究的主张。^[3]

(四)民间文学的知识普及与民族教化功能

由于民间文学分布时空的广泛性,其对教育普及的意义远远大于“文学”。在人类历史长河中,相当长的时期内口耳相传的民间文学传承方式是广大劳动人民对文化传承的主要方式。尧舜禹的故事传说、节气变化及农作物播种规律认识的传承、河水涨落及灾害预防知识的流传,往往都是缘于民间文学方式。在一定历史阶段和范围内,通过民间文学实现了对天文地理和风俗习惯等人类基本文化知识的传承,民间文学成了国民教育的手段和内容。马林诺夫斯基(英国文化人类学家)认为,故事、历史、格言和谜语都是艺术和知识的混合物。

于民间文学所能影响之处,对个体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进行社会性教育。对人的自身素质和终身发展产生持久影响。民间文化因其强大的生命力,发挥着传承民族文化的“根”和“本”的作用,包

括风俗习惯、信仰、价值观念、审美理念等“根本”内容。特别是对于民间生活来说,渗透着传统文化的伦理常道、承载着民族情感与精神的民间文学是最好的“民间历史教科书”。民间文学让历史人物和民族英雄成为榜样,使优秀文化代代相传,使古老智慧得以流传。

爱国情怀养成和故乡情结培育是民间文学民族教化功能的重要体现。盘古、女娲、大禹、妈祖的故事传说能够激发人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之情。通过对民族起源和民族历史的解说,培育爱国爱家情节。民间文学在潜移默化中培养民族情感,提高民族认同感。不同地域的特色文学还有助于培育故乡情结,河洛文化、巴蜀文化、岭南文化、齐鲁文化、湖湘文化、吴越文化等各有特色。同样是人类的混沌出世,汉族、水族、阿昌族、布朗族、彝族、布依族、侗族和傣族各有自己的传说;同样是盘古开天的传说,汉族有《五运历年记》、彝族有《梅葛》、白族有《创世纪》等不同的版本。通过民间文学激发人们热爱家乡的情感,热爱家乡的一草一木,热爱祖国的大好河山。另外,不同地域有各自的民族节日,节日情怀有助于提高民族归属感,通过继承和发扬传统节日文化传递爱家爱国感情。人口较少的锡伯族历史上多次迁徙,但锡伯族的民族节日和民间信仰等通过民间文学传承得到很好的保存。^[4]

民间文学有利于培育国人文化自信。民间文学与百姓生活融为一体,通过传承民族文化最为核心理念,实现培育文化自信的效果。民间文学体现的生态意识和生存智慧,体现远古人类对大自然的敬畏,阐释了古人的生态伦理观。民间文学承载的“和”“合”观念和人文情怀对人的自身修养具有启示意义。在弘扬优秀文化过程中,民间文学值得进行充分的演绎与重构。^[5]

民间文学传承对于民族团结的意义,在于各族人民在相互交流和沟通中因为相同的文化渊源而找到共同点,共同的文化心理和文化情结是中华民族万众一心、风雨同舟的内在基础。

三、民间文学爱国主义资源价值的开发路径

(一)民间文学教育和传承的顶层设计

很多民间文学富含理想信念、家国情怀,蕴含爱国与奉献精神,是民族凝聚力的纽带和根源。在祖国和民族的危难时刻其凝聚功能和作用不可替代。开发和运用民间文学的时代价值,要有顶层设计,国家设立专门机构,可以是教育机构也可以是宣传机构,聚焦现实生活中的文化需求。当前我们的社会面临挑战和风险,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指出,凝聚全

国人民的聪明才智是中华民族挺过紧要关口的关键,也是我们早日实现复兴伟业的关键。时代呼唤着民族认同和价值认同,和谐社会建设需要用民族精神融合时代精神,在凝聚力中发挥传统文化的时代价值。民间文学的智慧建立在长期的社会实践中,是人民群众生活的总结,开发和运用其中的时代价值意义重大。政府和很多学者关注民间文艺,为民俗学、民间文学、人类学、社会学等多学科融合建设不断努力。^[6]

民间文学的顶层设计要着眼于民族文化存续。民族文化的生命力在于原有“土壤”基础上的不断创新,把时代最需要的精神融入民间文学,用科学理论、先进文化和正确方法实现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化,把文化意识转化为治理效力,从国家和民族发展大势中谋划传承和重构的顶层设计。用国家制度规范文化创新的过程、原则和方法,整合民间文学的发展和传播渠道,打通家庭、学校和社会的教育和影响渠道,推动优秀文化回归寻常百姓的生活。在文化政策制定上,实现顶层设计和制度建设全国一盘棋,保证文化创新持续性。

民间文学的顶层设计要鼓励对不同地域的民间文学素材进行挖掘和再造。过去的文学史思维上存在着两个层面的缺陷,要么把整体的文学史看作是地域文学史的总和,要么是认定地域文学史只有在整体文学史中呈现才显重要。这两种偏见不利于地域文学的认识和处理,为地方的民间文学发展制造了多种局限。鼓励不同地域重构自己的文学结构,实现“地域文学”到“地方路径”的转换。鼓励采取地方路径,去挖掘吸纳“地域文化的内部视野”。^[7]从当地文化特色入手,使民间文学传承内容与生活相关联。在古老而美丽的地方传说基础上,培养对家乡、对民族和对祖国的热爱。

民间文学的顶层设计中,需注重功能价值的引导。弘扬传统文化的内容功能导向至关重要。民间信仰避免陈旧芜杂,只有经历一番打磨才能体现民众实践的自洽逻辑,在保存民间特有的知识体系的基础上服务人民文化事业。^[8]

(二)民间文学教育和传承的场域设置

随着城镇化、都市化生活方式的推进,流传于底层的民间文学的传承面临极大威胁。民间文学面临着传承与传播的困境。从纵向发展看,民间文学的代际传承出现断层,主要原因就是年轻人不断走出传统的山区和农村;从横向传播看,传统民间叙事的公共空间日渐萎缩,主要原因是现代生活方式形成的空间私密化;从认知结构看,一些民间叙事的合理

性受到质疑,原因是现代社会的知识基础发生了改变。^[9]以民间文化组成的民间故事为例,民间故事对于群体团结、文化传承和价值建构起着重要作用,但当前的民间故事普遍面临着传承动力不足、传承人渐少问题,严重影响了民间故事的传播与传承。^[10]需要现代人主动创造时机和场合,让民间文学在人们生活中再现,可以换一种形式存在,或者换一种场域展演。

民间文学教育和传承需要一些基本要素的共同参与。传承场域和传承人是两个基本要素。就传承场域来说,互联网及其衍生品等新媒介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民间文学传承渠道或场域。新媒介使民间文学的口头性削弱,变异性增强,集体性消解。就传承人来说,民间文学传承人出现分层和分化现象,随着各种非遗项目传承人的认定,出现了很多地方文化代言人,民间文化传承出现职业化倾向。但是,遍布人类生活时空的民间文学之传播,还是要由人民大众的共同参与才能完成。

民间文学的生命力来源于现实生活的需要。民间文学体现的知识、价值和道德信仰体系的需求仍在,只要这种需要没有削减,民间文学就会保持旺盛生命力。传承场、传承人、传承内容都有新特点出现,这要求我们适当调整对策,以便更好地传承民间文学。

要发挥好民间文学经典传承场的作用。民间文学的神话、史诗和传说等的传播,常常出于祭祀或某种仪式需要,按照严格规程,由祭师或其他专门人员导引或主持,遵循特定内容和程序进行。在民间,文学经典传承场容易受到时代观念变迁的影响,演述人和受众是其中的稳定因素。应鼓励一定范围内存在的演述人角色,避免演述场域的断流。在传统传承场中,火塘、庭院、田间地头、街头巷角、墓地、祭场等都可以成为传承场所。但随着新媒体的出现,民间文学的传承场域不断扩大,传统形式逐渐被新的媒体形式和新的展演形式打破进而取代。口耳相传为传统的民间文学形式——民歌、谚语、笑话、故事等,借助新媒体,更多地以文字、图画甚至影视形式传承,民间文学知识传播加速。但是加速传播后的民间文学,对于其来源地的广大山区和农村,影响仍然有限。

而对于广大的新兴城镇甚至大都市的人们来说,也仍有民间文学传承的需要和空间。民间文学的传播场域当然更多地让位于图书和影视。书面介质在民间文学传承中扮演重要角色。随着技术进步和艺术形式多样化,民间文学呈现方式必然愈加多

样化,诸如广播电视、各类舞台、各类课堂、各地的导游资料中。民间文学数字化可以得到更大的网络效果,智能设备和网络终端都成为民间文学传承的重要场域。我们要做的是,把握好民间文学创新发展在内容上的质量和方向,使民族优秀传统文化得以发扬光大,正确而科学地进行“传”和“承”。

民间文学教育途径多种多样。我们要合理利用民间文学的教育资源,发挥家庭、学校和社会教育的三大支柱,全民参与,构成完整的教育结构系统。民间文学是劳动人民的集体创作。很多民间艺术家集民间文学创作者、传播者、保存者和发扬者等多种身份于一身。要发挥这些民间艺术家的独特作用,让他们发挥专长,根据不同类别故事的特色,巧妙而高效地传播民间文学和民间艺术。优秀的讲述者能够借助人物形象活灵活现地表达思想主题,感染和教育听众。

(三)民间文学教育和传承的创新转化

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5G时代,民间文学有了更好的传播平台。民间故事等民间文化也是信息传播的重要内容,其情感和趣味常常是人们运用影像传播呈现民间文学的考虑内容。^[11]同时,民间文学的创新发展空间需要打开。民间文学发展的新空间设计,要融合民族文学的艺术标准,也要立足价值追求,从爱国主义情感培育高度思考民族文学的建构和布局。^[12]

民间文学创新中,注重培养自强不息、团结奋斗的中华精神,立足民族文化的总体价值取向进行创新转化。神话故事中哪吒的形象与事迹仿佛早已定型,但由饺子执导的《哪吒之魔童降世》敢于立足时代,确立中华民族在挫折面前不气馁、力图扭转命运的主题,“我命由我不由天”的呐喊赋予哪吒以新形象,也喊出了很多人内心的潜台词。^[13]

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为民间文学传承注入动力。今后的民间文化发展仍然以民众生活为中心,以口头语言为中心,以人为中心,以活化传承为方向,把民族传统融入当代社会生活,赋予民间文学以新的生命和发展机遇,充分挖掘其潜藏的巨大能量。^[14]近些年来民间文艺发展的历史也证明,其概念、价值以及基本特性都存在着传统与现代的对话,科学重构和积极建构不失为发展民间文化的良策。^[15]

参考文献:

- [1]张高领.民间文学、方言体验与阅读史重构:张家口如何滋养汪曾祺[J].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20(6):46-

- [2]周星.平民·生活·文学:周作人的民俗学思想[J].西北民族研究,2020(3):144-160.
- [3]赵世瑜.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M].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94-96.
- [4]詹娜.锡伯族文化的当代建构专题[J].文化遗产,2020(4):114.
- [5]杨林霞.民间传说、社会事实与集体记忆:一项关于“打生桩”传说的社会史研究[J].青海民族研究,2020(2):212-217.
- [6]毛巧晖.郝苏民与新中国民间文艺:“在场者”的历史表述[J].民族文学研究,2020(4):149-156.
- [8]陈泳超.近世民间信仰中的神话层累:从海盐神歌《伏羲王》到《三天三宝》[J].民族文学研究,2020(4):119-127.
- [7]张光芒.论地方路径与文学史的重构[J].当代文坛,2020(5):110-116.
- [9]王卫华,霍志刚.乡村振兴战略视野下民间文学的传承与传播:基于喇叭沟门满族乡的分析[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2):163-168.
- [10]徐金龙,曾晓梅.新媒体时代民间故事的传播困境及其对策:以重庆走马民间故事传播传承为考察中心[J].湖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1):143-152.
- [11]刘秀梅,董洪哲.民间故事影像传播的创新策略研究[J].青海民族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55-162.
- [12]龚举善.空间正义视域下中华民族文学史观的价值向度[J].河北学刊,2020(2):86-93.
- [13]刘春梅.《哪吒》:民间传说的流变与再建构[J].电影文学,2020(4):124-126.
- [14]林继富.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化传承的基本遵循[J].中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20(4):57-63.
- [15]毛巧晖.文本与理论,民间文艺学的双重建构(1949—1966):以《民间文学参考资料》为中心的考察[J].民俗研究,2020(1):90-98.

(责任编辑 谢春红)

On the Patriotism Value of Folk Literature and Its Application

QIAN Dongxiao¹, SUN Jiadong²

(1. Research Center for Socialist Ideology,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jing, Jiangsu 210023, China;

2. College of Literature,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culture in modern society has encountered the development bottlenecks, which affected the spread of national excellent culture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people's belief system in modern society. As an important carrier of national culture, folk literature contains rich educational resources of patriotism, which is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cultivation of national identity. In addition to fairy tales and legends, many supplementary forms of folk literature are an important part of national culture, and are the spiritual blood and genes of the Chinese nation. The education and inheritance of folk literature lack top-level design, and th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efforts need to be strengthened urgently, and the folk literature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system needs to be optimized or reconstructed. The development history of folklore shows that in the dialogue between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the dissemination and cultivation of folklore is the process of people receiving the baptism of patriotism.

Key words: folk literature; inheritance and innovation; application

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及对策研究

——基于 DEA - Tobit 模型

荀守奎^{a,b},程若静^a,兰国辉^a,李珑莹^a,张梅芳^a

(安徽理工大学 a. 经济与管理学院;b. 金融科技研究所,安徽 淮南 232001)

摘要:基于 DEA - Tobit 模型,对 2018 年安徽省 16 个地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和影响因素加以评价和分析。研究发现: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效率高,但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高;科技研发人员、仪器设备购买费用和专利申请数都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有很强的促进作用。最后基于上述分析,针对性地提出解决对策。

关键词:科技创新;效率评价;DEA - Tobit 模型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6

中图分类号:F06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28-05

一、文献综述

2019 年制定的《长江三角洲区域一体化发展规划纲要》将长三角地区定义为我国又一个高发展、高开放、高创新的地区,明确其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建设过程中有着战略性的地位。而安徽省作为长三角地区的重要一环,始终立足创新优势,坚持科创兴皖。安徽省不仅提出要构建长三角地区科技创新共同体,还承担起了带领三省一市编制科技创新共同体规划的重任,旨在全力将长三角区域建设成为全国的创新先行地区,并希望以此促进国家的全面综合发展。可见,安徽省科技创新在长三角地区乃至全国范围内的作用与地位越来越突出。因此,很有必要对安徽省科技创新问题展开研究。

目前,有关科技创新效率评价的研究有很多。比如陈振等人(2018)运用 DEA 法测算了 2015 年河南省各地市的农业科技创新效率^[1];Lin Shoufu 等人(2019)采用 DEA 法对 2006—2015 年我国七类工业企业的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评价^[2];康旺霖等人(2020)运用 DEA 法对我国 2006—2015 年海洋科技创新总体效率、科研效率、技术转化效率及教育效率

进行了测度^[3];陈娜等人(2020)将 DEA 法与 SFA 法相结合,对我国西部地区高技术产业的创新效率进行评价,并对其影响展开研究^[4];张峰等人(2020)利用 SFA 法,对 2008—2017 年全国内地 28 省市的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进行了测度^[5];魏厦(2019)利用 PCA 法对 2016 年全国各省科技创新竞争力进行测算,再基于此对河北省科技创新竞争力展开深入研究^[6]。

此外,刘钊等人(2017)将 PCA 法、DEA 法和回归分析中的 Tobit 模型相结合构建组合模型,对 2004—2015 年全国和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7];张璇等人(2018)运用 DEA - Tobit 模型测算了中国 30 个省份 2004 至 2014 年多种类型的环保投资效率,并深入探讨了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8];田红宇等人(2019)基于政府与市场耦合角度,运用 DEA - Tobit 模型对 1997—2016 年中国各省份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度及影响因素分析^[9];王义新等人(2019)同样运用该模型对中国 36 个工业细分行业的科技创新效率展开研究,发现不同行业科技创新效率差距

收稿日期:2020-01-30

基金项目:2019 年度安徽省领导圈定课题“安徽产业集群创新发展问题研究”(SQKTF19-02);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基地项目“安徽省煤炭安全事故与经济景气度的相关分析及对策研究”(SK2019A0100);安徽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煤矿企业安全事故经济学分析和风险管理研究”(SK2019A0103)

作者简介:荀守奎(1968—),男,安徽淮南人,安徽理工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教授,研究方向:区域经济、金融科技等。

显著,且并非科技创新投入越多效率越高,关键在于投入与行业特点要匹配^[10]。

综合上述文献研究发现,从研究方法来看,主要包括数据包络分析法(简称DEA法)、随机前沿分析法(简称SFA法)、主成分分析法(简称PCA法)、DEA-Tobit模型(将DEA模型与Tobit模型相结合),并且最后一种方法可以对科技创新效率问题进行更全面、深入的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大多是对中国各省不同领域的科技创新效率值进行测算及对比,仅以安徽省为研究对象,并对其科技创新效率和影响因素同时进行的文献较少。因此,采用DEA-Tobit模型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及其影响因素进行分析,并基于此提出客观且具有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提高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提供借鉴意义。

二、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实证分析

(一) 指标体系的构建及指标的选取

1. 指标体系的构建

虽然有关区域科技创新效率的研究众多,但迄今为止并没有一套固定的评价指标体系。基于区域科技创新相关理论,借鉴前人研究的成果,根据系统性、动态性、有效性和数据可得性原则,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进行选取及优化。将科技创新活动分为研发和成果转化两个阶段,并且分别从投入和产出两方面选取指标。由于劳动力和资金是投入产出系统中两大最基本的投入要素,因此,主要基于这两大要素选取投入指标。产出指标基于科技创新成果数量和科技创新带来的经济效益进行选取。最终构建的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包括4个一级指标(2个投入指标和2个产出指标),13个二级指标(见表1)。

2. 指标的选取

以安徽省及其16个地市作为研究对象,根据《安徽省统计年鉴2018—2019》和《安徽省科技统计年鉴2018—2019》,结合上述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选取安徽省及其16个地市的相关数据。但考虑到科技创新活动具有一定的时滞性,因此决定投入指标选取2017年的数据,产出指标选取2018年的数据。

3. 研究方法

数据包络分析法(Data Envelopment Analysis, DEA)是一种用来测量决策单元生产效率的方法,具有以下优势:①适用投入、产出变量都包含多个指标的模型效率评价问题;②投入、产出值的量纲选取对效率值不会产生影响,无须对数据进行无量纲化处理;

③模型可以通过实际数据求得最优权重,无须提前设立权重,避免许多主观因素影响;④模型假定各种投入和产出变量之间确实存在某种联系,但不需要给出明确的函数表达式,有效简化了整个模型,并且使结果更客观。文章采用DEA-BCC模型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进行评价。

表1 科技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

阶段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科技创新研发	投入指标	R&D 人员折合全时当量(X_1)
		R&D 经费内部支出(X_2)
	产出指标	仪器设备购买费用(X_3)
		技术购买及引进费用(X_4)
		R&D 研发机构数(X_5)
科技成果转化	投入指标	专利申请数(Y_1)
		发表科技论文数(Y_2)
	产出指标	出版科技著作数(Y_3)
		新产品销售收入(Y_4)

DEA-BCC模型基本形式:

$$\min \theta = V_D$$

$$s. t \begin{cases} \sum_{j=1}^n x_j \lambda_j + s_i^- \leq \theta x_{i0} \\ \sum_{j=1}^n y_j \lambda_j - s_i^+ \leq y_{i0} \\ \sum_{j=1}^n \lambda_j = 1 \\ s_i^- \geq 0, s_i^+ \geq 0, \lambda_j \geq 0, j = 1, 2, 3, \dots, n \end{cases}$$

上式中, θ 表示相对效率, x 为投入指标, y 为产出指标值, s_i^- 表示投入指标的松弛变量, s_i^+ 表示产出指标的松弛变量。

(二) 实证分析

运用DEAP2.1软件对2018年安徽省各个市的科技创新效率进行测算并对其结果进行分析(见表2和图1)。

(三) 结论

通过上述研究可以看出,2018年安徽省及其16个地市的科技创新活动大多属于高研发—高转化或者高研发—低转化状态,科技创新研发效率平均在0.96左右,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平均在0.77左右,说明安徽省科技创新总体效率较好。

具体来看:(1)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效率较高,全省总体和12个地市的科技创新研发活动都达到效率最佳状态,只有4个地市没有达到效率最佳状态,但综合效率值都在0.78及以上。这说明安徽省近年来加大科技研发投入力度、完善科技平台建设

等措施成效显著。(2)安徽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效率不强,只有6个地市科技成果转化达到了效率最佳状态,其余10个地市效率值并不高,其中淮南市的科技成果转化综合效率值只有0.138。这说明安徽省科技成果转化方面具有很大的提升空间。因此,安徽省需要不断加大力度促进科技创新成果的转化。

表2 2018年安徽省及其16个地市科技创新投入、产出效率结果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TE	PTE	SE		TE	PTE	SE	
合肥	1.000	1.000	1.000	-	0.659	1.000	0.659	drs
淮北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亳州	1.000	1.000	1.000	-	0.921	1.000	0.921	irs
宿州	1.000	1.000	1.000	-	0.844	1.000	0.844	irs
蚌埠	1.000	1.000	1.000	-	0.802	0.812	0.988	drs
阜阳	1.000	1.000	1.000	-	0.458	0.474	0.966	drs
淮南	1.000	1.000	1.000	-	0.138	0.153	0.903	irs
滁州	0.780	0.960	0.812	drs	1.000	1.000	1.000	-
六安	0.940	0.966	0.973	irs	0.420	0.444	0.947	irs
马鞍山	0.791	0.842	0.939	drs	0.795	0.838	0.948	irs
芜湖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宣城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铜陵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池州	1.000	1.000	1.000	-	1.000	1.000	1.000	-
安庆	0.868	0.871	0.996	irs	0.669	0.731	0.916	irs
黄山	1.000	1.000	1.000	-	0.808	1.000	0.808	irs
全省	1.000	1.000	1.000	-	0.570	1.000	0.570	drs

注:(1)TE表示综合效率;(2)PTE表示纯技术效率;(3)SE表示规模效率;(4)irs表示规模报酬递增;(5)drs表示规模报酬递减;(6)“-”表示规模报酬不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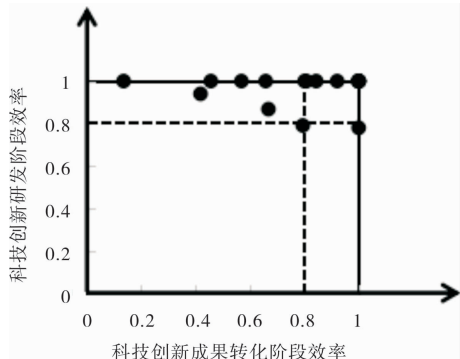


图1 安徽省及其16个地市两阶段创新效率矩阵

三、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一) 选取指标

从投入角度对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分别选取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阶段和成果转化阶段的各投入变量作为解释变量,选取DEA评价结果的综合技术效率作为被解释变量。

(二) 提出假设

针对模型,提出相关假设(见表3)。

(三) 构建模型

采用Tobit模型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的影响

因素进行分析。主要是因为经过DEA分析得到的效率值具有截断性,即值均在0到1之间,此时如果用普通的最小二乘法进行回归分析,会出现偏差或估计量不一致的现象,而运用Tobit模型进行分析,可以有效避免上述问题。

表3 回归分析的基本假设

阶段	基本假设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H_1 : 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越大,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H_2 : R&D经费内部支出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H_3 : 仪器设备购买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H_4 : 技术购买及引进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H_5 : R&D研发机构数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H_6 : 技术吸收及改造费用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H_7 : 专利申请数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H_8 : 发表科技论文数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H_9 : 出版科技著作越多,科技创新效率越高

Tobit模型最初是James Tobin在分析家庭耐用品的支出情况时提出的一种计量经济学模型,它的标准回归模型如下:

$$y^* = \beta'x_i + u_i \quad (1)$$

$$y^* = y_i, \text{若 } y^* > 0 \quad (2)$$

$$y^* = 0, \text{若 } y^* \leq 0 \quad (3)$$

基于上述指标体系,建立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影响因素分析的Tobit回归模型如下。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Y_1 = \beta_0 + \beta_1 X_1 + \beta_2 X_2 + \beta_3 X_3 + \beta_4 X_4 + \beta_5 X_5 + \varepsilon \quad (4)$$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Y_2 = \beta_0 + \beta_6 X_6 + \beta_7 X_7 + \beta_8 X_8 + \beta_9 X_9 + \varepsilon \quad (5)$$

Y_1 和 Y_2 分别为两个阶段的综合技术效率, X_1 至 X_9 分别为两个阶段的投入指标, ε 为误差项, β_0 为常数项。

(四) 回归分析

首先对科技创新研发阶段和科技成果转化阶段的投入指标数据运用归一法进行无量纲化处理,再运用Stata15软件对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两个阶段进行回归分析。根据回归分析结果(见表4),可以得到如下模型。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Y_1 = 1.43 + 14.14X_1 - 4.25X_2 + 11.97X_3 - 2.72X_4 - 5.32X_5 \quad (4)$$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Y_2 = 0.95 - 0.91X_6 + 3.35X_7 - 3.35X_8 + 0.27X_9 \quad (5)$$

(五) 结论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X_1)、仪器设备购买费用(X_3)与科技创新研发效率成正比,说明R&D人员折合全时当量和仪器设备购

买费用的投入增多,可以使得科技创新研发的效率提高,这表明假设 H_1 、 H_3 成立;R&D 经费内部支出 (X_2)、技术购买及引进费用 (X_4)、R&D 研发机构数 (X_5) 与科技创新研发效率成反比,即随着 R&D 经费内部支出、技术购买及引进费用和 R&D 研发机构数的投入增多,科技创新研发效率反而下降,这表明假设 H_2 、 H_4 、 H_5 不成立,说明这些指标存在投入冗余现象,可能是因为经费投入主体单一使得经费没有得到充分合理应用、安徽省科研人员水平较低无法有效使用购买和引进的技术、研发机构管理体制不合理等。

表 4 Tobit 模型实证分析结果

	解释变量	系数	标准差	P 值
科技创新研发阶段	x_1	14.14223	12.00732	0.264
	x_2	-4.253987	4.010338	0.312
	x_3	11.96967	9.555083	0.236
	x_4	-2.717447	2.087262	0.220
	x_5	-5.32015	3.671665	0.175
	_cons	1.427995	0.305988	0.001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	x_6	-0.906750	0.598893	0.156
	x_7	3.108388	2.468032	0.232
	x_8	-3.352014	2.716833	0.241
	x_9	0.267488	1.952813	0.893
	_cons	0.945194	0.139833	0.000

科技成果转化阶段:专利申请数 (X_7)、出版科技著作 (X_9) 与科技成果转化成正比,即专利申请数、出版科技著作投入增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提高,这表明假设 H_7 、 H_9 成立;技术吸收及改造费用 (X_6)、发表科技论文数 (X_8) 与科技成果转化成反比,即随着技术吸收及改造费用和发表科技论文数增多,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反而降低,这表明假设 H_6 、 H_8 不成立,说明技术吸收和改造费用运用不合理,论文数量过多质量却不高,难以转化为实际生产、生活所使用。

综合上述分析结论,本文接下来将对安徽省科技创新效率稳定增长的制约因素进行深入剖析,并提出针对性的对策建议,为提高安徽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以及整体科技创新效率提供借鉴。

四、制约因素与对策建议

(一) 制约因素

1. 科研成果转化能力较低

安徽省近年来不断加大科技创新投入,科技创新平台建设成效显著,大多地区科技创新研发活动已经达到效率最佳状态,但是其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不高,效率值仅有 0.57。这可能是因为安徽省近年来投入建设的研发平台多是从事基础研究、理论研究的高校和科研院所,这些机构大多将论文专著

或科研项目作为研究成果的主要判断标准,没有充分重视科研成果的产业化、市场化,并且这些科研机构的研究很少与企业研发、生产活动相结合,最终导致安徽省科技创新成果转化能力不强。

2. 科技创新人才结构不合理

研究发现,相对于其他因素而言,R&D 人员数量对科技创新效率有很强的正面影响,可见创新型人才是科技创新发展的一大关键要素。虽然安徽省科研人员的数量越来越多,但是,高水平人才增长趋势缓慢,占比仍较低,导致科技创新缺乏人才动力。因此,人才结构不合理可能是安徽省科技创新研发效率高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低的一大原因。

3. 科技投入主体单一

研究发现,安徽省 R&D 经费内部支出与科技创新存在负相关关系,这与“投入越大产出越大”的一般规律不同。可能是因为安徽省科技发展的经费来源主要是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政拨款,企业和社会资金都没有被充分地吸纳,导致安徽省科技创新投入主体单一、结构不合理,最终资金没有得到有效利用。

4. 区域间科技创新效率差距较大

安徽省各地市的科技创新效率分布不均,有些地市科技创新研发和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已经达到最佳状态,比如淮北、芜湖、宣城、铜陵、池州。但是大部分地市的科技创新效率一般,少部分地市科技创新效率很低,比如淮南市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仅有 0.138。此外,合肥作为安徽省省会城市,其科技创新投入最多,但科技成果转化效率并不高,投入冗余现象严重。因此,安徽省还需要重点关注科技创新投入在区域间的统筹协调问题。

(二) 对策建议

1. 不断提高科技成果转化效率

安徽省科技创新能力不强的一大障碍就是科技成果转化效率不高,因此,科技成果转化问题亟待解决。首先,继续完善科技创新基地的建设,为科技成果转化提供支撑平台。其次,不断调整优化相关的法律制度,明确科技成果的评判标准、处置权力,以及收益分配等问题,激发科研机构、企业等主体进行科技成果转化的动力,促进科研机构研发活动和企业研发生产活动相结合,进而有效推动科技研发成果的转化。

2. 构建完善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任何活动的主体是人,最关键的影响因素和根本的动力是高层次人才。科技创新活动也不例外,其关键在于创新型人才的培养。首先,安徽省应

继续完善重点高校和科研机构的建设,为科技创新提供一个良好的人才基础;其次,加大对学生创新意识的培养,在提高专业技能的基础上,培养实践能力、思维发散能力等;最后,制定合理的选拔机制、激励机制、晋升机制、培训机制等,在留住内部高水平人才的同时,不断引进外部创新型人才,建立完善的创新型人才培养体系。

3. 不断建立多元化科技资金投入体系

安徽省应当坚持由政府引导投资方向并投入财政支持资金,在此基础上,大力吸引外商投资和社会投资作为科技资金投入的主要来源。同时,不断加大创新经费的投入,优化经费投入结构,为科技创新提供良好的资金条件;不断探索不同主体共同出资和运营管理的组织新机制。例如,中央与地方共同出资、不同区域政府共同出资、政府与企业共同出资等多种出资模式、出资比例和运营管理的组织新机制。

4. 加强区域间科技创新能力的协调统筹发展

根据各地市科技创新发展现状以及自身特点,给予不同的科技创新发展定位,并实施相应的措施,以增强其科技创新效率,进而提高安徽省整体科技创新发展能力。对于科技创新效率较高的地市,如芜湖市,应该继续执行以往的政策,持续加大投入;对于科技创新效率不足且科技创新投入规模报酬递增的地市,比如淮南市,应该不断加大投入,激发其科技创新潜在的效能;对于科技创新效率不强但科技创新投入呈规模报酬递减的地市,比如合肥市,应该及时对其科技创新发展模式进行调整,尤其要注重对这些地区投入结构和规模进行调整,避免盲目投入,造成资源浪费。

参考文献:

- [1] 陈振,郑锐,李佩华,等. 河南省农业科技创新效率评价与分析[J]. 河南农业大学学报,2018,52(3):464-469.
- [2] Lin Shoufu, Sun Ji, Wang Shanyong. Dynamic evaluation of the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China's industrial enterprises[J]. Science & PublicPolicy (SPP), 2019, 46(2):232-245.
- [3] 康旺霖,邹玉坤,王垒. 我国省域海洋科技创新效率研究[J]. 统计与决策,2020,36(4):100-103.
- [4] 陈娜,林军. 剥离环境因素的高技术产业技术创新效率评价:以我国西部地区为例[J]. 科技管理研究,2020,(6):93-99.
- [5] 张峰,任仕佳,殷秀清. 高技术产业绿色技术创新效率及其规模质量门槛效应[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20,37(7):59-68.
- [6] 魏厦. 河北省科技竞争力评价研究:基于主成分分析[J]. 调研世界,2019(6):45-48.
- [7] 刘钊,邓明亮. 基于改进超效率 DEA 模型的长江经济带科技创新效率研究[J]. 科技进步与对策,2017,34(23):48-53.
- [8] 张璇,袁浩铭,郝芳华. 财政分权对环保投资效率的影响研究:基于 DEA-Tobit 模型的分析[J]. 中国环境科学,2018,38(12):4780-4787.
- [9] 田红宇,祝志勇. 政府与市场耦合进程中的区域科技创新效率[J]. 软科学,2019,33(10):26-31.
- [10] 王义新,孔锐. 价值链视角下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科技创新效率及关键影响因素研究:基于 DEA-Tobit 两阶段模型[J]. 科技管理研究,2019,39(3):136-142.

(责任编辑 刘成贺)

Efficiency Evaluation and Countermeasure Research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Anhui Province: Based on Dea - Tobit Model

XUN Shoukui^{1,2}, CHENG Ruoqing¹, LAN Guohui¹, LI Longying¹, ZHANG Meifang¹

(1. School of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2. Institute of Financial and Technology, 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Huainan 232001, China)

Abstract: Based on Dea - Tobit model, this paper evaluated and analyzed the efficiency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16 cities in Anhui province in 2018.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efficienc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in Anhui province is strong, but the transformation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achievements is not high. The R&D personnel, the purchase cost of instruments and equipment and the number of patent applications all play a strong role in promoting the efficiency of scientific and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in Anhui province. Based on the above analysis, this paper puts forward the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Key words: science and technology; innovation efficiency evaluation; Dea - Tobit model

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 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

徐琼¹,程慧²

(1. 中南大学商学院,湖南长沙410083;2. 湖南师范大学旅游学院,湖南长沙410081)

摘要:采用超效率—DEA模型分别测算2008—2017年中国31省(区、市)的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再结合耦合协调模型测算评价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及其时空耦合特征,最后借助地理探测器探究二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因素。结论表明:1)研究期内,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主要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时序演变不大;省域耦合协调主要处于中级协调阶段,其次为勉强协调、濒临失调阶段。2)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正相关关系,空间分布演变不大,中西部省份主要处于“低—低”“低—高”空间集聚区,东部发达省份主要位于“高—高”集聚区,“高—低”集聚区自“东—中—西”方向移动。3)影响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显著因素,按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政府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

关键词:旅游生态效率;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影响因素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7

中图分类号:F590.3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33-08

一、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深入贯彻“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引领经济走向科学发展的可持续发展道路;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指出“加快生态文明体制改革,建设美丽中国”,坚定不移地推进“五大发展理念”,创新引领发展,交出绿色答卷。旅游业作为与生态环境紧密依赖的新兴产业,实现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是其优质发展的重要途径。创新驱动是旅游业发展的战略支撑,绿色发展是旅游业发展的必然要求,因此,加快旅游业的创新变革,可为旅游业的绿色发展破解难题。但当前中国旅游业的发展逐渐显露出“高污染、高耗能、高排放”等恶性特征,面对旅游业“三高”现实问题,各地区及相关产业也日益迫切紧抓“绿色创新”引擎,寻求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生产方式改革、生态效率提高的有效路径,以期通过自身旅游绿色创新水平的提高驱动旅游生态化水平的提升,缓解旅游业与生态环境之间的矛盾。旅游生态效率作为旅游生态化

水平的量化指标,能够直观反映旅游业的绿色发展状况;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反映旅游业绿色创新投入与产出的比例情况,是对其绿色创新能力的直观表述。因此,二者的耦合协调水平能够反映出地区旅游生态化水平与旅游绿色创新水平的关系优劣、二者联系的程度。探讨二者耦合协调的时空特征及其影响因素对于提升二者耦合协调度,实现旅游业的创新驱动、绿色发展具有重要的意义。

随着可持续发展理念的深入人心,经济与产业的可持续发展问题也引起了足够的重视,旅游与环境的关系以及与其他系统的协调发展问题同样成为近些年的研究热点。学者们分别从定量、定性角度对旅游生态效率的研究进展^[1]、实证分析^[2]及其发展路径^[3]等展开研究。随后一些学者依据统计模型,深入探究旅游地生态安全系统的等级及机理、旅游目的地开发等。在旅游关系研究方面,旅游与城镇化、旅游与脱贫、旅游与交通等一直备受国内外学者关注,旅游生态系统的耦合协调关系研究也日益

收稿日期:2020-01-28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我国旅游生态效率测评及俱乐部趋同效应研究”(19CGL030)

作者简介:徐琼(1995—),女,安徽马鞍山人,中南大学商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旅游资源经济。

丰富起来,如吴英玲等对旅游与人居环境耦合关系进行探究,并进一步识别其障碍因素^[4]。但在创新驱动,绿色发展战略背景下,关注到旅游生态化水平与其绿色创新能力的耦合关系研究少之甚少,大多数学者关注在如何实现生态旅游的制度创新、开发创新、模式创新方面,而对二者的关系研究涉猎较少,刘佳等研究发现中国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存在较强的空间关联性,且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结构与省际旅游发展水平差异、省际旅游环境污染差异、省际旅游资源消耗差异均呈显著相关^[5]。鉴于此,探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关系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

在绿色、创新、协调发展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文献梳理,以中国 31 省(区、市)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为研究对象,采用超效率—DEA 方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科学测度的基础上,结合统计计量方法与空间自相关分析,对其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演变特征展开实证分析,并进一步引入地理探测器,探测影响其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的因素,最后立足现状,结合影响因素,提出促进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发展,实现旅游业创新驱动,绿色高效发展的可行性建议。

二、研究方法 with 数据来源

(一) 研究方法

1. 超效率—DEA 模型

数据包络分析法(DEA)是效率评价的经典方法,通过对多个投入产出指标进行线性规划来判断效率的有效性。超效率—DEA 模型是在传统 DEA 模型基础上改进的,它克服了传统 DEA 模型可能造成多个有效单元存在的缺陷,对有效单元再进一步比较,存在效率大于 1 的情况。因此,本文借鉴超效率—DEA 模型实现对中国旅游生态效率和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准确测度,模型构建如下:

$$\begin{cases} \min \theta \\ \sum_1^k = \lambda_k x_{nk} \leq \theta x_n \\ \sum_1^k = \lambda_k x_{mk} \leq \theta y_m \\ \lambda \geq 0; k = 1, 2, \dots, k \\ n = 1, 2, \dots, N; m = 1, 2, \dots, M \end{cases} \quad (1)$$

2. 耦合协调模型

耦合协调度是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二者系统相互影响、协调发展程度的描述,耦合协调度越高,表明二者系统协调统一,和谐发展状态

越好,建立二者耦合协调度测算公式^[6]:

$$\begin{aligned} C &= \sqrt{\mu_1 \cdot \mu_2} / (\mu_1 + \mu_2) \\ T &= \frac{\mu_1 + \mu_2}{2} \\ D &= \sqrt{C \cdot T} \end{aligned} \quad (2)$$

(2) 式中, μ_1, μ_2 分别表示旅游生态效率值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值, C, T 分别表示二者系统的耦合度与综合协调指数, D 表示耦合协调度,借鉴刘丹丽等^[6] 研究,我们可将其耦合协调度细分为如下类型(见表 1)。

表 1 耦合协调类型评判标准

D 值区间	耦合协调类型	D 值区间	耦合协调类型
0.0 < D ≤ 0.2	极度失调	0.6 < D ≤ 0.7	初级协调
0.2 < D ≤ 0.4	中度失调	0.7 < D ≤ 0.8	中级协调
0.4 < D ≤ 0.5	濒临失调	0.8 < D ≤ 1.0	优质协调
0.5 < D ≤ 0.6	勉强协调	—	—

3. 空间自相关

地理学认为任何事物之间存在相关性,这种相关性与空间距离相关,且距离越近的事物相关性越大。空间自相关分析建立在地理学第一定律的基础上,是衡量空间事物与其周围事物属性上相关性程度,空间分布上集聚与关联情况的空间分析方法。空间自相关分为全局自相关和局部自相关,全局自相关用莫兰指数(Moran's I) 表征,用来检验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是否存在空间相关性且相关程度如何。局部自相关用 Lisa 指数表征,用来考量局域空间上的集聚与分异程度。二者指数计算公式如下^[7]:

$$\begin{aligned} Moran's I &= \frac{n \sum_{i=1}^n \sum_{j=1}^n w_{ij} (x_i - \bar{x})(x_j - \bar{x})}{\left(\sum_{i=1}^n \sum_{j=1}^n w_{ij} \right) \sum_{i=1}^n (x_i - \bar{x})^2} \\ Lisa &= \frac{n(x_i - \bar{x}) \sum_{j=1}^n w_{ij} (x_j - \bar{x})}{\sum_{i=1}^n (x_i - \bar{x})^2} \end{aligned} \quad (3)$$

(3) 式中, x_i, x_j 分别表示第 i, j 省份的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 n 表示省份的数量,本文 n 为 31, 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的元素,若 i, j 省份为邻省,元素取为 1,否则为 0。

(二) 评价指标体系建立与数据来源

旅游生态效率是对旅游生产过程中环境、经济投入与旅游效益产出之间量化关系的表述,是对旅游业可持续发展能力的衡量。目前,关于旅游生态效率的评价指标还未统一,本文借鉴林文凯等学者已有研究^[8-9],从资源、人力、资本、环境污染四方面选取投入指标 8 个,产出指标选取直接描述旅游效

益的旅游总人次与旅游总收入,构建旅游生态效率评价指标体系。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是指旅游生产过程的创新活动、创新要素的投入所带来的旅游绿色效益,是对旅游创新要素的投入与环境产出之间关系的衡量,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评价指标体系的构建参照刘佳等^[8]研究,从人力、物力、财力三个方面选取5个投入指标,产出指标从期望产出与非期望产出两个方向选取7个指标,构建评价体系(见表2)。

表2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评价指标体系

评价系统	指标类型	指标类别	指标构成
旅游生态效率	投入	资源投入	星级酒店数量 旅行社数量 旅游景区数量
		资本投入	旅游业固定资产
		劳动力投入	旅游业年末从业人员
	产出	环境污染	旅游废水排放量 旅游废气排放量 旅游固体废弃物
		旅游效益	旅游总收入 旅游总人次
		投入	人力
旅游绿色创新效率	投入	物力	旅游类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数 旅游高等院校数
		财力	旅游科研经费
		产出	期望产出
	非期望产出	万元旅游收入能耗	万元旅游收入电耗
		旅游产业废水排放 旅游产业废气排放 旅游产业固定废弃物	

表3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相关性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相关系数	0.784	0.797	0.786	0.817	0.821	0.819	0.814	0.817	0.819	0.821
显著性水平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0.000

(二) 时序特征

基于耦合协调度模型,测算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并依据评判标准对其进行分类(见表4)。从统计特征看,2008—2017年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平均值总体变化不大,围绕0.59上下起伏,波动发展,其中2012年耦合协调度最高,2017年耦合协调度最低,表明近十年来,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平稳发展,基本维持在勉强协调阶段,仅2011—2013年处于初级协调阶段,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这与党的十八大我国重点突出生态文明建设,强调“创新驱动发展战略下加快生态文明建设”有关。耦合协调

(三) 数据来源

本文指标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2009—2018年)、《中国环境统计年鉴》(2009—2018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2009—2018年)、《中国旅游统计年鉴正本及副本》(2009—2018)、《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以及各省份《统计年鉴》、统计公报、统计局官网上的资料等,其中旅游“三废”指标借鉴林文凯等^[8-9]方法,采用旅游总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值对其进行换算,旅游申请专利数通过在中国国家知识产权局专利检索数据平台搜索“旅游”关键词进行统计汇总。

三、实证分析

(一) 耦合协调关系检验

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之间耦合协调关系检验是后期耦合协调时空特征分析的前提。借助SPSS21软件,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二者进行Pearson相关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均通过了显著性检验,表明二者存在显著的相关性关系。二者相关系数呈现缓慢上升的态势,其中在2012和2017年相关系数达到最高,表明该两年二者系统相关性最大,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二者联系度最紧密,且二者系统的相关性也呈现出不断增强的态势,这也与姚治国等学者研究认为环境管理系统、清洁生产理念等有利于旅游生态效率的优化与管理相符^[1],表明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存在着耦合协调关系,二者的耦合协调机理为后面进一步探讨时空特征提供依据。

度的方差基本稳定,级差呈现缩小态势,表明研究期内,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省际差异呈现不断缩小趋势,这与近几年全域旅游的发展,省际合作的增强等有关。

从耦合协调度等级比例来看,研究期内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的省市居多,其次为勉强协调阶段、濒临失调阶段,最后为中度失调、初级协调以及优质协调阶段,表明大多数省市在研究期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较好,二者相互响应,协调发展,而处于二者失调对抗发展和完全协调发展两极阶段的省份较少。研究期内,中级协调阶段的省份大多占到三分之一,甚至个别年份将近占到半壁江山,如2011、2012年,中级协调阶段省份占比

总体变化不大。勉强协调阶段省份占比总体来说比较均衡,除 2010 年为 3.23% 外,其余年份维持在 20% 左右。濒临失调阶段省份占比呈现先降低后增长的态势,2011—2015 年间省份占比较少。中度失调省份占比近些年基本保持平稳,变化不大,2010

年占比最多,达到 41.94%,表明 2010 年中国大多数省份处于中度失调阶段,协调程度较差。初级协调省份占比呈现上升态势,而优质协调阶段省份占比不断下滑,2011、2012、2014、2015 以及 2017 年均没有省份位于优质协调阶段。

表 4 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统计特征及等级比例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平均值	0.57	0.59	0.48	0.61	0.62	0.60	0.59	0.59	0.59	0.55
方差	0.03	0.03	0.03	0.02	0.02	0.02	0.02	0.03	0.02	0.02
级差	0.59	0.57	0.66	0.52	0.48	0.54	0.54	0.54	0.51	0.56
中度失调	16.13%	16.13%	41.94%	9.68%	6.45%	9.68%	12.90%	12.90%	9.68%	16.13%
濒临失调	22.58%	9.68%	29.03%	9.68%	9.68%	16.13%	19.35%	16.13%	22.58%	25.81%
勉强协调	19.35%	32.26%	3.23%	29.03%	22.58%	25.81%	22.58%	22.58%	19.35%	22.58%
初级协调	0.00%	0.00%	0.00%	3.23%	16.13%	6.45%	3.23%	6.45%	9.68%	9.68%
中级协调	38.71%	35.48%	22.58%	48.39%	45.16%	38.71%	41.94%	41.94%	35.48%	25.81%
优质协调	3.23%	6.45%	3.23%	0.00%	0.00%	3.23%	0.00%	0.00%	3.23%	0.00%

(三) 空间特征

1. 空间分布特征

基于上述耦合协调度测算结果,借助 ArcGIS10.2 软件绘制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图(图 1),根据自然间断法,选取 2008、2013、2017 年为代表年份,进行耦合协调度空间特征对比分析。

由图 1-a 所示,2008 年有河北、内蒙古、广西、甘肃、新疆五省(区)位于中度失调,分布较集聚,大多集中在西北一带,它们大多经济欠发达,技术创新力量薄弱,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处于失调阶段,二者抗衡发展,关联性小。吉林、陕西、云南等 7 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以中部省份为主,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在失调边缘徘徊,耦合协调度也较差,这与它们旅游产业结构以及技术创新水平紧密相关。江苏、辽宁等 6 省份位于勉强协调阶段,他们为东部沿海省份或是邻近东部沿海省份,在承接创新技术转移方面具有优势,耦合协调度一般。西藏、北京、上海等 12 省(区、市)位于中级协调阶段,占比高达 38.71%,他们大多为旅游热点区域或是经济高度发达地区,所以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方面具有独特的优势,实现了二者的耦合协调发展,协调状态较好。仅天津一市实现优质协调,协调水平很高,表明天津市在利用自身科技创新力量推动旅游生态化发展上取得了瞩目的成绩,实现二者协调共振,和谐发展。

由图 1-b 所示,2013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仅新疆、宁夏、内蒙古三省(区)位于中度失调阶段,他们为西北三省(区),从 2008 年以来,耦合协调度没有提升起来,

而河北、广西两省份脱离该队伍,实现跨越发展。吉林、河北等 5 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相比 2008 年,安徽、江西、河北中部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但福建省耦合协调度下滑剧烈。青海、湖南等 8 省份位于勉强协调省份,他们大多为中部省份,在吸收东部先进技术,实现自身生态旅游发展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耦合协调度保持在勉强协调水平,仍有待提升。湖北和广西二省份实现初级协调,耦合协调度均有所上升,可能与当地的政府规制,产业结构调整有关,广东、江苏等 12 省份位于中级协调阶段,与 2008 年相比,省份基本相似,青海、浙江、黑龙江三省份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上升,而北京的耦合协调度有所下降。同样仅天津市的耦合协调度达到优质协调阶段,实现最佳。

由图 1-c 所示,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位于中度失调阶段的省份除了上述西北三省(区)外,北京和云南也位列其中,表明近年来,北京耦合协调度呈现下降趋势,未有效利用自身旅游绿色创新力量,旅游生态效率较差。而云南省在平衡旅游技术创新与旅游生态化水平之间关系上也需要加强。黑龙江、浙江等 8 省份位于濒临失调阶段,省份数量相对有所增加,且空间上向东移动,浙江、山东等东部省份也位列其中,说明近年旅游生态效率有所下滑,在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上成效不佳,还要多下功夫。四川、重庆等 7 省份位于勉强协调阶段,与前两年相比,省份变化较大,但同样以中西部省份为主,山西、江西、海南三省实现初级协调发展,表明该三省牢牢抓住技术革新机遇,加快旅游生态化建设,二者相互影响,取得了良好的成效。西藏、青海等 8 省(区)位于中级协调阶段,同样以东部发达省

份与西部旅游资源禀赋省份为主,但省份数量有所减少,一些省份耦合协调度有所降低。2017年没有省份达到优质协调发展。

综合来看,研究期内,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但区域仍存在一定的差异,其中东部地区耦合协调度处于下降趋势,地区耦合协调水平差异不大,从勉强协调阶段居多下滑到濒临失调阶段居多,可能与东部省份在伴随着科技创新力量不断增强的同时,旅游

生态效率却呈现下滑趋势,生态环境恶化、设施设备老化等均加重了其旅游生态化与科技创新的投入负担。中部省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省与省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少数省份耦合协调度实现逐级上升。西部省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总体变化不大,西藏、内蒙古、甘肃三省(区)一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还有一些省份耦合协调水平也未发生转移,但地区间耦合协调水平存在一定的差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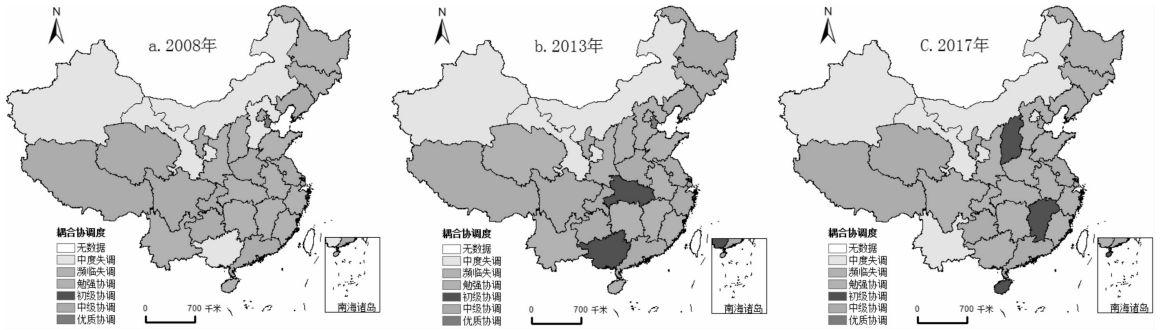


图1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布

注:文章地图均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2893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2. 空间相关性特征

(1) 全局空间自相关

基于 ArcGIS10.2 和 GeoDa 软件,测算 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 Moran's I 指数(见表 5)。如表 5 所示,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 Moran's I 指数均通过了 0.001 的显著性检验,且均呈正值,表明二者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即某地区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

较高,那么其邻域地区耦合协调度也会较高,反之该地区耦合协调度较低,那么其周围地区耦合协调度也较低。整体来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空间分布呈现“高一高”或“低—低”聚类。从 Moran's I 指数数值看,整体呈上升态势,其中 2012 年 Moran's I 指数最低,为 0.507,而 2017 年 Moran's I 指数最高,为 0.656,表明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相关性呈现增强的态势,与空间距离的联系度愈发紧密。

表 5 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 Moran's I 指数

年份	2008	2009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2016	2017
Moran's I	0.532	0.542	0.627	0.625	0.507	0.512	0.603	0.649	0.609	0.656
Z 得分	74.698	50.713	63.305	86.991	73.265	73.400	54.023	64.310	62.868	64.415
P 值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0.001

(2) 局部空间自相关

同样结合空间相关分析,借助 ArcGIS10.2 和 GeoDa 软件,测算并绘制 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 Lisa 指数,直观透视其耦合协调度的空间聚集情况(如图 2)。

由图 2-a 所示,2008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低—低”区间的有内蒙古、甘肃、河北等 6 省(区),占比 19.35%,他们大多位于西北和西南地区,地理位置偏僻,经济发展水平低,自然环境较恶劣,人才技术资源紧缺等,因此使得它们旅游生态化和旅游绿色创新力量投入较大,而回报相对较少,二者效率较低,且耦合协调度较

差,周围地区也面临着同样困境,耦合协调度也不高,处于“低—低”的落后区。云南、江西、湖北、吉林四省位于“低—高”区,他们大多位于中部,毗邻发达地区,在吸收东部优势资源方面具有优势,因此自身耦合协调度较低,但邻域较高。北京、天津等一线发达省份位于“高一高”区,占比 16.13%,他们经济发达,位置优越,自身及邻域耦合协调度均高,处于“领跑区”。福建、广东、青海位于“高一低”区,自身耦合协调度可观,但是邻域地区较低,需要向邻域地区加强空间溢出,实现均衡发展。

图 2-b 所示,2013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低—低”区间的除了 2008 年

的甘肃、内蒙古、河北外,还新增了新疆和云南,占比16.13%,与2008年相比,省份数量有所减少,但是同样为中西部省份。位于“低—高”区的省份有湖南、江西等5省份,比2008年省份数量有所增加,同样以中部省份为主。上海、江苏等发达省份同样位于“高一高”区,省份数量达到7个,占比达到22.58%,相比2008年,北京退出“高一高”区,重庆、辽宁、广东三省份跻入其列,“高一高”聚集更显著。青海、广西、湖北位于“高一低”区,表明这些区域自身耦合协调度提高的同时,未带动邻域耦合协调度的提升。

图2-c所示,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位于“高一高”的区间有内蒙古、新

疆、甘肃、黑龙江、云南五省(区),与2013年相比,河北退出了“低—低”区,而黑龙江新加入,省份占比16.13%,仍以西北省份为主。河北、安徽、陕西、河北位于“低—高”区,省份数量有所减少,中部省份居多。天津、上海等6省份位列“高一高”区,除了传统的经济发达省份外,还加入了西藏和青海两省份,该两省份近年来旅游业发展迅猛,政策扶持也吸引了不少人才技术资源,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都有所提升,耦合协调度实现提升与发展。海南、江西、湖南三省位于“高一低”区,自身耦合协调度提升的过程,也要注重对邻域耦合协调度的空间溢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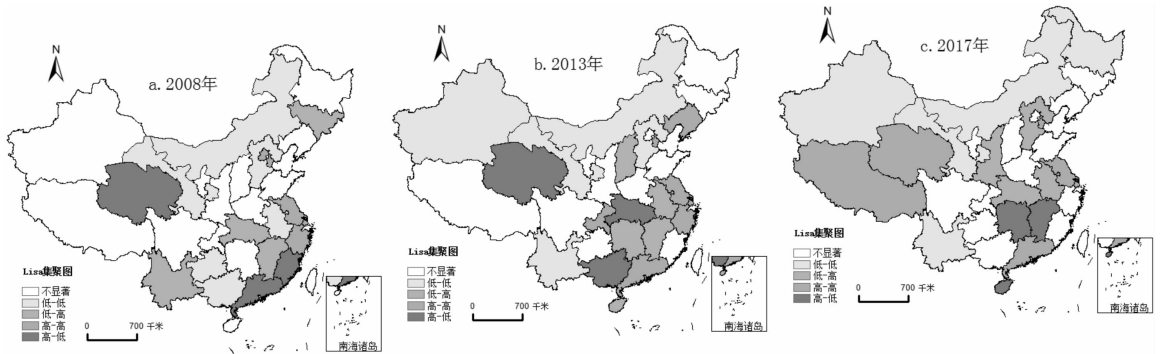


图2 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Lisa分布图

注:文章地图均基于国家测绘地理信息局标准地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2016)2893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四、耦合协调度影响因素分析

(一)模型构建与指标选择

由上述实证分析可知,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虽呈现显著的耦合协调度,但在时间序列和空间特征上仍存在一定的差异,根据相关研究,省际耦合协调度差异除了与其空间邻域关系有关外,还与地区的产业结构、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以及政府规制等密切相关,鉴于此,本文采用适用于探测空间分异特征的地理探测器方法,来实现对影响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异因素的分析,该方法与其他统计方法相比较而言,假设条件较少,控制变量及误差也较小,因此被广泛应用于经济地理的空间分异因素探测中,本研究以2008—2017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为因变量,选取各地区产业结构水平(第三产业占比)、经济发展水平(人均GDP)、城镇化水平(城市人口所占比重)、对外开放程度(进出口贸易额)以及政府规制(政府旅游业的固定资产投资额)5个指标为自变量,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探测各自变量对因变量的影响力,模型构建如下:

$$P_{D,U} = 1 - \frac{1}{n\sigma_U^2} \times \sum_{i=1}^m n_{D,i} \times \sigma_{D,i}^2 \quad (4)$$

(4)式中, $P_{D,U}$ 表示影响因素对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 $P_{D,U}$ 越大,则表明其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越大, n 、 m 分别表示整个区域里的省份个数以及次级区域里省份的样本数, $n_{D,i}$ 表示次级区域里省份的个数, σ_U^2 、 $\sigma_{D,i}^2$ 分别表示整个区域里省份耦合协调度的方差与次级区域里省份耦合协调度的方差。

(二)影响因素分析

基于地理探测器模型,测算上述影响因素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力及显著性,结果如表6所示。2008—2017年间,产业结构对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均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表明产业结构状况对二者耦合协调度影响很大,二者紧密相关,影响力系数大体呈现下降的趋势,2010年影响力最大,达到0.2636,2017年影响力最低,表明近几年随着各省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合理配置旅游产业结构,使得省际产业结构差距不断缩小,对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影响呈现减弱趋势,但在5个因素中

是最为显著且影响力最强。城镇化水平在 2009、2011、2013、2015 及 2016 年呈现显著,可见后期显著性和影响力都有所增强,主要是由于后期随着乡村旅游、全域旅游的发展,城镇化水平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会愈发显著。经济发展水平也均为显著,同样影响力不断缩小,这与产业结构原因相似,近几年省际合作联系不断增强,实现东中西部互相扶持,发挥自身特色,实现跨越发展,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也不断减弱。对外开放程度在 2010、2013、2016 和 2017 年对耦合协调度的影响显著,且影响力较小。政府规制一直保持着对耦合协调度的显著影响,影响力变化不大,一直保持在 0.1 左右,表明政府规制对二者耦合协调的影响力较大,它在二者耦合协调中起到重要的作用。综合来说,影响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因素从显著性和影响力来看,从强到弱依次为产业结构、政府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与对外开放程度。

表 6 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影响因素结果

年份	产业结构	城镇化水平	经济发展水平	对外开放程度	政府规制
2008	0.1589***	0.2197	0.1584**	0.1531	0.1109*
2009	0.1631**	0.1839*	0.1510**	0.1383	0.0822**
2010	0.2636**	0.0071	0.0595**	0.0597*	0.1889***
2011	0.1898**	0.0395*	0.0434***	0.0964	0.1181**
2012	0.0955*	0.0719	0.0106*	0.1147	0.1048**
2013	0.2448***	0.0894*	0.0366**	0.0819*	0.0322*
2014	0.1812*	0.0464	0.0231*	0.043	0.0767*
2015	0.1062**	0.1639*	0.0665*	0.0883	0.1167**
2016	0.1508*	0.0574*	0.0555**	0.0950*	0.0079*
2017	0.0807**	0.1023	0.0528***	0.1041*	0.1445**

注:***表示通过了 10% 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 5% 的显著性检验,*表示通过了 1% 的显著性检验。

五、结论与讨论

基于超效率—DEA 模型与耦合协调模型,测算 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以及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再结合经济统计方法和空间自相关分析,对二者耦合协调度的时空特征进行分析,最后采用地理探测器方法,剖析影响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的影响因素,得到如下主要结论:

(1)时序特征上,2008—2017 年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均值基本处于勉强协调阶段,时序变化不大,相对稳定,省际耦合协调度差异也呈现不断缩小趋势,其中研究期内,处于中级协调阶段的省份最多,大多数年份超过三分之一,其次为勉强协调与濒临失调阶段,省份数量

相对均衡,最后为中度失调、初级协调和优质协调阶段。总体来说,处于两极耦合协调等级的省份较少,大多数省份集中在中级耦合协调度等级状态。

(2)空间特征上,研究期内,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空间分布特征总体变化不大,其中东部地区省际耦合协调度水平差异较大,耦合协调时序水平呈现下降趋势,从勉强协调阶段居多下滑到濒临失调阶段居多;中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时序总体变化不大,省际之间存在一定的差异,少数省份耦合协调度实现逐级上升。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时序变化同样较小,西藏、内蒙古、甘肃三省(区)一直处于中度失调阶段。空间相关性上,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的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正相关关系,且相关系数不断增强,其中“低—低”集聚省份变化不大,以中西部省份为主,内蒙古、宁夏二省(区)一直在内;中部省份居于“低—高”集聚区较多;处于“高—高”集聚的省份由开始的东部发达的一线省份为主,发展到后期西部旅游热点省份也不断加入。“高—低”集聚省份从东部向中部再向西部省份转移。

(3)影响因素上,研究期内产业结构、政府规制二因素对中国省际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影响均呈现显著,影响力较强,其余三因素在部分年份呈现显著,综合考量显著性与影响力,影响其耦合协调度的因素,按影响力从大到小依次为产业结构、政府规制、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以及对外开放程度。

以上实证结论表明:首先,中国旅游生态效率与旅游绿色创新效率耦合协调度整体水平不高,近些年来变化不大,提升较慢。其次,虽然二者耦合协调度呈现显著的空间自相关关系,但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水平存在一定的差距,且部分省份耦合协调度还存在下滑态势。立足于影响耦合协调度的相关因素,针对耦合协调发展现状,提出以下参考性建议:第一,产业结构是影响耦合协调的显著因素,因此在不断促进产业结构升级的过程中,也要注重优化旅游产业结构,减少高耗能、高污染、高排放产业,增强旅游资源绿色创新力量,使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为二者耦合协调度创造机遇,提供平台。第二,政府规制对二者耦合协调同样具有显著因素,扮演着“黏合剂”的作用,在绿色创新政策的引导下,紧跟主流,大力提升整体的耦合协调度,省际绿色创新政策的偏向与监管,可以调整省际耦合协调度差异,实现均衡发展。第三,对于经济发展水平、城镇化水平、对外开放程度等因素,各省份应根据自身特色与

独具优势,合理规避缺点,大力发扬优势,增强区域协作,提升自身耦合协调度的同时,缩小区域间差距,实现绿色创新、协调开放发展。

参考文献:

[1]姚治国. 国外旅游生态效率优化与管理[J]. 生态学报, 2019,39(2):700-708.

[2]Peng H S, Zhang J H, Lu L, et al. Eco-efficiency and its determinants at a tourism destination: a case study of Huangshan national park, China[J]. Tourism Management, 2017,60:201-211.

[3]朱梅,汪德根. 旅游生态效率优化中旅游者参与的困境及出路[J]. 旅游学刊,2016,31(10):11-13.

[4]程慧,徐琼. 基于地理探测器的中国城镇化—旅游—生态时空耦合关系研究[J]. 中州大学学报,2019,36(4):21-27.

[5]刘佳,宋秋月. 中国旅游产业绿色创新效率的空间网络

结构与形成机制[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2018,28(8):127-137.

[6]刘丹丽,汪侠,吴小根,等. 全球贫困国家旅游竞争力与经济耦合协调度及时空变化[J]. 地理科学进展, 2018,37(10):1381-1391.

[7]高建岗,黄锐. 基于耕地质量指数和空间自相关的苏南地区耕地保护分区[J]. 水土保持研究,2019,26(3):213-218.

[8]刘佳,陆菊. 中国旅游产业生态效率时空分异格局及形成机理研究[J]. 中国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6(1):50-59.

[9]林文凯,林璧属. 区域旅游产业生态效率评价及其空间差异研究:以江西省为例[J]. 华东经济管理,2018,32(6):19-2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Temporal and Spatial Characteristics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Between China's Tourism Eco-efficiency and Tourism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XU Qiong¹, CHENG Hui²

(1. Business School,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3; 2. College of Tourism, Hunan Normal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81, China)

Abstract: The paper uses the Super-DEA model to measure the tourism eco-efficiency and tourism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of 31 provinces (cities, districts) in China from 2008 to 2017. Combining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model, it evaluate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and its spatio-temporal coupling characteristics. Finally, it explores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with geo-detectors. The conclusions show that: 1) During the study period,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China's tourism eco-efficiency and tourism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is mainly in the reluctance coordination stage, and the time series evolution is not large; the inter-provincial coupling coordination is mainly in the intermediate coordination stage, followed by reluctance coordination and on the verge of coordination stage. 2) The coupling degree shows a significant spatial positive correlation, and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does not evolve much. The central and western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mainly in the "low-low" and "low-high" space gathering areas, and the eastern developed provinces and cities are mainly located in the "high-high" cluster area, "high-low" cluster area moved from "east-medium-west" direction. 3) The influence degree of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from large to small is the industrial structure, government regulation, economic development level, urbanization level and degree of openness.

Key words: tourism eco-efficiency; tourism green innovation efficiency; coupling coordination; space-time characteristics; influencing factors

“互联网+”环境下商品或服务类别认定的困境与出路

章子旋

(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 上海 200042)

摘要:当前“互联网+”环境具有行业融合、信息聚合的特点,同时带来了商品和服务种类的叠合交叉、界限模糊,更有新型商品和服务类别不断涌现,致使《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的局限性和滞后性日益凸显。商品和服务类别认定标准不一成为我国商标保护的一大难题。应当明确《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在行政审查和司法保护中重要的参考效力,及时更新完善。同时聚焦商品服务本身,以相关公众认知为准,综合考察所有相关因素,以应对社会发展带来的挑战。

关键词:互联网+; 商标侵权; 商品类似; 行政审查; 司法保护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8

中图分类号:D923.4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41-05

随着电子商务时代的出现和繁荣,人们的生活得到了极大的改善和便利。“互联网+”概念的提出和发展更是使传统业态受到了颠覆,它让互联网不再仅仅是一个新兴的行业,而是使其成为一种方式和载体,与所有行业接轨、融合,将所有信息抓取、聚合,从而形成一个巨大的支持社会运作的系统。至此,许多业已形成的稳定体系都可能受到冲击,尤其是对商标的注册和保护具有重要意义商品或服务类别的认定,旧有规则在现如今的商业环境下已暴露出诸多弊端并陷入新的困境。

一、“互联网+”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类别现状与认定难点

(一)与互联网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类别黏合度更高

传统业态下,经营者的经营能力和范围受到天然的限制,专业性和指向性较强。伴随着技术创新,一是距离屏障已然可以跨越,通过计算机、手机等网络终端的普及,原本需要当面提供的服务可以跨地域实现,例如网络租车,缩小了由于物流行业急速发展导致商品与服务在销售地域范围上拉开的差距;二是通过网络,商品和服务拥有了更统一的销售对象、销售渠道,取得了更多共性。在北京商咨知识产权代理有限公司等诉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

商标评审委员会因商标权无效宣告请求行政纠纷案中,法院认定诉争商标核定使用的“计算机编程”等服务与引证商标核定使用的“计算机程序(可下载软件)”等商品之间存在较为密切的关联性,已构成类似商品和服务。^①该案针对与计算机相关的商品和服务做出了类似认定,可以预见到,不久的将来,在案件中认定商品和服务类似的情况将会愈发常见。

(二)互联网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的类别界限模糊

实际上,并非互联网导致商品和服务类别发生了变化,而是互联网与其他行业的结合容易导致人们对商品或服务类别的认定产生误解。如今的互联网已不再作为某一种行业出现,而是出现在几乎所有行业中。目前正在适用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别表》(以下简称《区分表》)中,与互联网相关的有第9类(计算机和数据处理装置)、第38类(电信)和第42类(科学技术服务、计算机硬件与软件的设计与开发服务),然而并非所有利用互联网进行销售或运营,或者与互联网相关的商品或服务都与上述商品或服务构成类似。不应仅因传统商品或服务在形式上使用了互联网、移动通信信息服务与应用程序,就机械地将其归为计算机程序商品或者通信服

收稿日期:2020-02-03

作者简介:章子旋(1997—),女,安徽六安人,华东政法大学知识产权学院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知识产权法学。

务,即不能以是否使用计算机软件作为确定是否属于计算机程序这一类商品的标准,也不应仅因传统商品与应用程序的表现形态存在区别,就绝对地认为两者不存在相似性,而应从商品或服务的整体进行综合性判断。在睿驰公司与小桔科技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中,法院最终认定,借助移动互联网及软件客户端进行信息采集,为具有需求的乘客和司机提供信息匹配和交流服务的“滴滴打车”,虽然需要利用电信服务,但并不直接提供源于电信技术类服务,因此与原告商标核定使用的电信类商品不构成相同或类似。^②法院最终还是回归服务方式、对象和内容等因素综合考虑,对于与互联网有关的类似商品或服务类别的认定规则进行了整理。

(三)《区分表》的局限性和效力问题

除了商品和服务特点的变化、公众认知的误区和困难外,《区分表》本身也存在局限性。即便在与互联网无关的商品或服务上,也出现了跨类别认定类似商品或服务类别的情况。^③由于《区分表》是静态的,且相对稳定,在动态的实际案例适用过程中将会存在局限性和滞后性。

针对《区分表》的效力,我国《商标法》第19条至第21条规定,申请商标注册的,应当按规定的商品分类表填报使用商标的商品类别和商品名称。在商标注册制度和环节中,《区分表》既是申请商标时指定商标或服务的依据,也是核准商标注册后界定所使用商品或服务范围的依据。因此,其在认定商标专用权范围上具有原则性的作用。而在认定商标禁用权范围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2条规定,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商标注册用商品和服务国际分类表》《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可以作为判断类似商品或服务的参考。加之《区分表》在司法判决中体现的局限性,绝大多数学者对于僵化适用《区分表》的做法并不认同,并积极表明了认为应当仅将其作为参考依据的观点。然而该解释对《区分表》在司法判决中的参考性大小却未予以明确,是将其作为主要参考依据,抑或是与商品的功能、用途、销售渠道、销售对象等要素同地位的参考要素,抑或是更低。在目前已有的司法判决中,已有不少法院突破《区分表》,对分属于不同类别的商品进行了类似商品的认定。

上述学界观点与实践做法虽对于以《区分表》为唯一标准的错误理解进行了纠正,但却可能导致矫枉过正。《区分表》虽然不是知识产权审判中必须遵守的“金科玉律”,但由于其在商标注册实践中

的广泛运用,又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1]在“互联网+”环境下,《区分表》的滞后性将会更加凸显,惯常地突破《区分表》进行认定将会降低其依据科学性建立的和长时间使用累积的参照作用。

(四)法律规定的理解与适用模糊

除上述问题外,针对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构成近似需要综合考虑的其他因素,对现有法律规定的理解和适用也并未趋于统一。国家知识产权局2020年6月印发的《商标侵权判断标准》第12条第2款规定,对于《区分表》未涵盖的商品,应当基于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综合考虑商品的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因素认定是否构成同一种或者类似商品。其中,“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反映的是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属性,而“商品的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因素”指的是商品的自然属性或客观因素。二者在判断过程中的地位如何,学界存在不同观点。有学者认为,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在商标侵权判断中,类似商品的认定应当更加关注商品的社会属性,而非商品的自然属性。^[2]也有学者认为,判断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应考虑商品或服务本身的自然特性。^[3]在“互联网+”环境下,相关公众对商品或服务的认知可能呈现转变,商品的功能、用途、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因素也将走向复杂化、多样化,该条规定的正确适用和效力发挥将至关重要。

二、域外类似商品和服务认定标准借鉴

(一)美国互联网环境下类似商品或服务认定标准

美国在商标侵权案件中认定商品或服务间关系时并没有单纯地以“类似”一词为核心进行判断。美国商标法对商品的保护范围共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为早期的“竞争”原则。当时假冒商品是主要的商标侵权行为,因此,禁止他人使用的商品范围是直接竞争的相同性商品。第二阶段为1905年《联邦商标法》中规定的“相同描述属性”原则。侵权行为开始多样化,间接竞争的替代性商品或具有“相同特征”的商品也被包含在内。第三阶段为非竞争性双方当事人间的“关联商品”原则。即1946年《兰哈姆法》将间接混淆行为纳入侵权行为的范围,因此商品保护范围也扩张到足以产生来源联想的“关联商品”。当被控侵权者在与商标权人相关联的产品上使用相同或近似商标并可能引起普通消费者对二者来源或赞助关系等产生混淆的,即使产品之间不存在竞争关系也可以认定存在商标侵权行为。至此,“关联商品”原则成为美国商标侵权判定

中划定商品或服务保护范围的原则。

在该原则指引下,美国互联网商标侵权案件中对商品和服务关系的认定存在特殊性。GoTo. com, Inc. v. Walt Disney Corp. 案中,GoTo. com 是一个提供付费搜索引擎的网站,网页上自然附有由公司名称“GoTo”构成的标志。而被告 Disney 公司在其运营的网站上使用了一个形同“GoTo”但字母实为“Go Network”的标志,用于推出与其相关网站的链接集合,包括“disney. com”“abc. com”“abcnews. com”“abcsports. com”等,目的是方便浏览其网站的消费者进行跳转和查询。二者的服务类别并不相同,后者的经营范围集中在娱乐和休闲领域。但法院却认为双方的服务是相似的,两个公司在经营网络搜索引擎方面属于直接竞争对手,当他们同时将网络作为营销渠道时,近似的两个标志就容易致使消费者产生混淆。在 Pure Foods Inc. v. Minute Maid Corp. 案中,法院认定原告使用的冷冻果汁产品与被告使用的冷冻肉类产品构成类似商品。理由是,案件双方当事人销售冷冻食物。一些企业已经扩大了业务以销售足够多种类的产品。相同的消费者通过相同的渠道在冷冻产品区域中可以购买到原告的冷冻果汁和被告的冷冻肉类,二者相隔距离并不远,消费者有合理的理由认为某一生产商要同时对这两种产品负责。

美国商标法和司法案例在认定商品之间具有足以影响商标侵权判定的“关联关系”时,并不要求它们之间具有竞争关系。只要在消费者的观念和认知中,可能认为带有相同或者近似商标的商品拥有同一来源,来自于同一企业或者认为两个企业有关系,相关商品就是“关联商品”。与类似商品相比,关联商品的范围更广,即并非所有关联商品都构成类似。这在商品和服务多样化、综合化的情况下具有更强的合理性和适用度。但“关联商品”原则过多地偏向相关公众对商品的主观认知,更加具有不确定性。并且可以看到,在美国法院对“关联商品”的判断过程中,销售环境可能会成为一项重要的考量因素,而在当前的“互联网+”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的销售渠道具有聚合、统一的趋势,过多考虑销售渠道要素可能会造成商标权事实上的“垄断”。

(二) 欧盟互联网环境下类似商品或服务认定标准

与美国商标法中的“关联商品”原则相对应,欧盟采取的是与我国相一致的“类似商品”标准。只不过欧洲法院指出,在评估商品或服务的类似性时,应当考虑所有相关因素,包括它们的本质特性、消费

者和使用方法等,以及它们是竞争关系还是互补关系。

由于欧盟法院曾在司法案例中运用“整体鉴别”方法来判断争议商标是否造成混淆,即对商标的相似性、商品或服务的类似性和在先商标的显著性(分为商标显著性和声誉两种)进行融合考虑而非各自独立判断。这也就意味着商标的知名度越高,其保护范围就越大。换言之,商标知名可能会跨越商品、商标带来的鸿沟。对此,英国高等法院法官 Jacob J. 则认为还是应当对商品相似和最终的商标混淆进行区分,因此他在 British Sugar v. James Robertson & Sons 一案中提出了商品或服务相似性认定标准,希望能够改善因商标强度带来的跨类别类似的任意性。在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应当考虑以下六个相关因素:第一,商品的用途;第二,商品或服务的消费者/使用者;第三,商品或服务的物理属性;第四,商品进入市场的贸易渠道;第五,在超市自助购物的环境中,商品在货架上的摆放位置;第六,商品或服务相互竞争的程度,该要素要求将分类表的分类情况和商业习惯纳入考虑,例如市场调查公司对商品种类的划分结果等。即便如此,上述六要素并非穷尽式列举,对于类似商品或服务的判定而言并不足够。在 Canon Kabushiki Kaisha v. Metro - Goodwyn - Mayer Inc. 案中,欧盟法院对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的认定标准也作了详细的分析,认为所有与商品或服务自身特性相关的因素都应列入考虑,包括但不限于产品类型、消费对象、使用方式以及产品或服务间的竞争关系或互补关系。法院认为,因为每个案件都会有我们无法预料的新情况、新特性出现,因此设定一个“一刀切”式的认定标准是不科学的,而最为合理的方法就是列举出一些个案通常都会参考的一般因素,并在此基础上依据案件的具体情况对因素进行填充或因素替代。

在商品或服务类别认定标准上,相较于“关联商品”原则的相关公众主观性,欧盟法院参考所有相关因素的做法更为客观和全面,针对互联网带来的新环境也能够更加灵活地应对。只不过,这一方法对法官提出了更高的能力要求,需综合考察具体案件中与商品或服务相关的所有要素,包括物理性质、产品用途、消费者、销售渠道、产品关系、行业习惯等等。

三、“互联网+”环境下商品和服务类别认定规则完善

(一) 明确区分表的重要参考效力

《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一般遵照商品功能

或用途、组成的原材料等为依据进行分类。作为行政部门发布、供商标注册申请人参照的商品分类表,其核心功能是为商标的注册审查及行政管理提供商品或服务的分类依据,对于行政和司法机关判断商品或服务是否相同或类似不具有必然的约束力。但其使注册审查及行政管理中认定类似商品或服务的标准清晰、操作简易、结果统一,具有良好的公众可预测性,并且已在商标注册实践中得到了广泛运用。特别是在商标审查环节,审查员所面对的商标申请信息具有相对有限性,为了体现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原则,保持审查标准的统一性,直接依据《区分表》进行类似商品与服务的判定具有合理性、必要性。如果在所有个案中审查员都去寻求《区分表》以外的因素来重新判断类似商品或服务的划分问题,即便因此而提高了判断的准确性和个案的公正性,商标法律制度的运行也会由于效率低下而陷入停滞。^[4]因此,需明确《区分表》仍具有重大的参考价值。只有对于《区分表》中尚未明确规定的商品或服务类别,或仅依据《区分表》无法实现对商标权的合理保护时,才应当结合商标的实际使用情况进行判断。

为了发挥《区分表》的参考效力,需要改善其局限性和滞后性。目前,国家知识产权局商标局约每半年发布一次《关于更新〈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以外可接受商品和服务项目名称的通知》,以适应新的商品和服务种类注册商标的需要。然而除此以外,当旧的商品或服务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方面发生变化时,还应当及时对原有部分进行调整,特别是与互联网有关的商品和服务类别。

(二) 预留自由裁量空间

即使《区分表》规定得再过完善,也不可避免出现由于时代发展、技术更新需要突破《区分表》的情况。为此,商评委从《商标法》维护诚实信用原则的立法宗旨出发,在法律适用方面,制定了突破《区分表》的审理标准。突破《区分表》,必须具备以下要件:第一,在先商标具有较强的显著特征;第二,在先商标具有一定的知名度;第三,系争商标与在先商标具有较高的近似度;第四,系争商标所使用的商品或服务与在先商标核定使用的商品或服务具有较强的关联性;第五,系争商标所有人主观恶意明显;第六,系争商标的注册或者使用,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和误认。^[5]

对此,笔者认为,突破《区分表》进行认定的目的和结果是商品和服务是否构成类似,而商品和服

务是否类似与商标是否近似以及在先商标的显著性、知名度应当处于同一位置,共同判断系争商标的注册或者使用是否容易导致相关公众混淆和误认,再结合系争商标所有人的主观恶意程度,判断系争商标是否应当获得注册或者是否构成侵权。因此,应当为商品或服务类别认定预留自由裁量空间无可非议,但突破《区分表》进行认定的前提须聚焦于商品或服务本身,即结合商品功能、用途、原材料、消费对象、销售渠道、商业习惯等要素,相关公众有可能认为二者类似或存在关联关系,从维护诚实信用原则、保护商标权人和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的目的出发,个案适当突破《区分表》。

(三) 以相关公众认知为准

实际上,对于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到底应当采取注重商品自然属性的客观标准说,还是注重商品社会属性的主观标准说,不仅在学界存在争议,法律法规中也有不同侧重。《商标审查及审理标准》对类似商品的定义为“在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销售渠道、销售场所、消费群体等方面相同或者具有较大关联性的商品”。《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商标民事纠纷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规定的类似商品,是指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对象等方面相同,或者相关公众一般认为其存在特定联系、容易造成混淆的商品。显然,前者更倾向于客观标准说,而后者则关注到了商品或服务的社会属性。

笔者认为,在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应当以相关公众的认知为准,同时综合考虑商品或服务的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消费对象、销售渠道等因素。这不仅是因为在商标保护实践中,司法解释应当具有更高的效力,还是由于商标具有一定的地域性,而我国地大物博、幅员辽阔,不同地域的人们对于具有相同或相近物理属性的商品可能具有不同的认知。另外,商品服务特性和相关公众应当是互相印证、互相决定的一对概念,商品服务性质特征是确定商标“相关公众”范围所需考量的主要因素。^[6]相应地,商品和服务是否类似,也应当以相关公众的认知为准,即基于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是否可能认为两项商品(或两项服务或商品与服务)之间类似或具有相当的关联关系。但需要明确的是,这里仅指相关公众对于商品或服务类别本身的认识,并不涉及来源混淆的判断,否则又将进入“混淆”与“相同或类似”的循环论证。

(四) 适当增加判断因素

结合前述对域外判断标准的比较研究,可以看

出我国在认定商品或服务是否类似时综合考量的因素较少,或者说对于“具有较大关联性”的规定过于模糊。除了功能、用途、主要原料、生产部门、销售渠道、销售场所、消费群体外,商品组成部分、附属品的存在,以及消费者的消费习惯等其他与商品或服务相关的因素都可以纳入考虑,可明确予以纳入。

除此以外,商品之间的关系非常复杂。一个种类的商品价格降低、销量增加,不仅意味着具有竞争关系和替代关系的商品销量下降,也意味着与其具有互补关系、附属关系的商品销量上升。因此,不仅要考察竞争关系存在与否,还有替代关系、互补关系等,同时还需结合销售环境、商业习惯的改变考虑可能出现的其他关联关系。

四、结语

“互联网+”环境下对商品或服务类别进行判定时,作为商标申请注册重要参照文件的《类似商品和服务区分表》在商标保护环节中虽然效力有限,但仍具有其适用的合理性和必要性。对此,行政部门应当保持及时的更新和调整。出于维护诚实信用原则、保护商标权人和消费者权益、规范市场秩序,对于确有必要突破《区分表》进行认定的情况,应聚焦于商品和服务本身,基于相关公众的一般认识,综合考察与商品和服务有关的各种因素及其他关联关系。

注释:

①参见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2016)京行终5670号行政判决

书。

②参见北京市海淀区人民法院(2014)海民(知)初字第21033号民事判决书。

③参见最高人民法院(2018)最高法行再22号行政判决书。动物剪毛机、电动剪刀与电动理发器、电动理发推子在《区分表》中分属于不同的类别,但在安迪士公司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总局商标评审委员会商标行政管理纠纷案中,法院认为二者在功能用途、生产部门、销售渠道、消费群体等方面具有高度重合性,如果使用相同、近似的商标,易使相关公众误认为是同一企业生产的商品或认为存在特定联系。

参考文献:

- [1]陈胜蓝,周林彬.商标法中“同一种商品或服务”的司法认定[J].东南学术,2016(6):153-159.
- [2]范静波.注册商标核定使用类别为非具体商品的类似商品判断:评北京友宝科斯科贸有限公司等诉福州友宝电子科技有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J].中华商标,2016(6):22-25.
- [3]谭颖,赵青.作为动态概念的类似商品应根据个案综合分析认定[J].人民司法,2014(22):69-71.
- [4]段晓梅.商标评审案件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判定的审理实践(下)[J].中华商标,2015(5):41-48.
- [5]段晓梅.商标评审案件中类似商品或者服务判定的审理实践(上)[J].中华商标,2015(4):63-69.
- [6]李永明,刘筱童.商标法中“相关公众”的范围界定[J].浙江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9(6):103-115.

(责任编辑 刘成贺)

Dilemma and Outlet of Identifying Goods or Services under the Environment of “Internet Plus”

ZHANG Zixuan

(School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Political Science and Law, Shanghai 200042, China)

Abstract: The current “internet plus” environment bears the characteristics of industry integration and information aggregation, which has brought about overlapping and blurring of goods and services, as well as the continuous emergence of new types of goods and services. As a result, the limitations and lag of the 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have become increasingly prominent. Different standards for the classific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have become a major drag on the trademark protection in China. Therefore, the important reference effect of the Chinese Classification of Goods and Services in administrative review and judicial protection should be clarified and updated in a timely manner. At the same time, in order to address the challenges brought by the social development, more efforts should be focused on the goods and services themselves, and a comprehensive investigate into all factors related to goods and services based on relevant public perception should be carried out.

Key words: internet plus; trademark infringement; similar commodities; the administrative review; judicial protection

回应性刑事立法反思

——以《刑法修正案(十一)》为视角

曹 叶

(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 澳门 999078)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刑法规范随之发生变化是必然的,但是刑法修正是一项科学严谨的工作,不应当随意被民意影响而动摇其立法价值。回应性刑事立法旨在解决当下社会中已经发生且引发广泛关注的问题,屈从民意在刑法中作出回应的非理性立法模式。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近年来社会热点问题进行了回应,包括长生疫苗问题、冒名顶替上大学问题、性侵幼女案件问题,回应性刑事立法的应急性使其仓促、粗浅,并且非理性,在刑法体系中时常会出现兼容难问题,而且容易使得刑法沦为社会治理的工具,所以刑事立法应当坚持其自身规律,保证立法品质,维护法律权威,坚持谦抑主义,发挥好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

关键词:《刑法修正案(十一)》;回应性立法;谦抑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09

中图分类号:D92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46-06

刑法是维护国家安全、社会稳定的最后一道防线,其调整范围关系到人们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利,人们希望自己的权益得到刑法更全面的保护,也惧怕刑法减损自己的权利,随意增加需要负担的义务。因此,人们往往对刑事立法抱有极高的关注度。近年来,针对社会上出现的热点问题,例如山东疫苗非法经营案等食药领域的严重事件,还有持续到现在的新冠肺炎疫情对公共卫生安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再如民营企业融资难问题,鼓励科技发展与知识产权保护不足的矛盾等重大社会问题,要求刑事立法审时度势、因时而变,根据日益发展变化的政治、经济、文化形势和犯罪出现的新变化、新特点对刑事法律进行必要的调整和修改,以适应惩处犯罪的需要。因此,在《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对上述人民群众关注的热点问题进行了相应回应。然而这些“回应”的正当性和有效性如何是本文研究的核心问题。

在开始解决本文的核心问题之前,有必要说明回应性立法与民主立法、科学立法的关系,笔者认为立法中回应人民群众要求不能等同于民主立法,也

无法实现科学立法的目标。法律是治国之重器,良法是善治之前提。为了实现全面依法治国的总目标,首要环节就是立法,提高立法水平、完善立法程序,实现科学、民主立法是必由之路。自《刑法修正案(七)》以来,刑法修正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审议过程中征求民众意见已成为常态,立法的民主性明显提高,虽然法律的权威源自人民群众的内心拥护和真诚信仰,在刑事立法中,倾听人民群众的声音,保障人民群众参与立法,是实现刑事立法科学化、民主化和提升公众接受程度的重要途径。但是不能将民主立法简单等同于在立法中回应民意,同样的,立法中反映人民群众要求也不代表立法就具有正当性、严密性、协调性和科学性。

一、回应性刑事立法

作为一种社会控制手段,法律应当顺应社会发展的方向,立法时考虑民意、尊重民意,维护人民群众最根本的利益,是法律得到人民群众拥护的唯一选择。《刑法修正案(十一)》制定过程中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对民生问题给予了极大的关注,着力

收稿日期:2020-02-03

作者简介:曹叶(1991—),女,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奇台人,澳门科技大学法学院2019级法学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刑法理论。

保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安全生产、药品食品安全、环境保护、公共卫生等方面,加强对引发人们广泛关注的社会问题的法律规制程度。这种做法容易造成回应性立法,即法律作为应对已然发生的社会失序行为的控制机制时,仅将或主要将规制既有行为、破解既有矛盾作为基本定位,而未将制定根本性破解某类失序行为与未然行为的策略作为首选目标,进而出现立法始终应对特定行为的新型变种加以规制而发展的现象。概言之,回应性立法是仅聚焦于实时问题而缺乏前瞻性的立法方式。^[1]所以,“回应性立法”是带有贬义含义的。在讨论何为回应性立法时,象征性立法、情绪性立法这两个概念容易出境,因此,有必要厘清三者之间的关系。

(一) 回应性立法与象征性立法

“象征性立法”这一概念最早来自德国、瑞士学者有关立法理论的讨论,例如瑞士学者皮特·诺儿指出,立法的核心价值就是提出一套解决纠纷的理性方法;德国学者克雷姆斯指出,如果立法只是为了做一份“规范申明”,其规范的目的只是国家期待在社会大众之间形成一定的合法与不法意识,实质上并不想影响任何个人的行为取向。日本学者松原芳博指出:“与其说这些立法是要保护国民的实际的具体利益,毋宁说是为了回应国民‘体感治安’的降低,试图保护其‘安心感’,作为象征性刑法的色彩要浓一些。”^[2]

可见,象征性立法传递的是立法者在特定时空与社会背景下对于社会问题的态度或者价值偏好,而并不发挥实质的规制效果,此时,法只具有形式上的象征意义,立法者通过制定或修改法律宣示国家对某些社会问题的关注与重视,目的只是单纯满足社会的期待。这里,象征性刑法是一个具有贬义色彩的存在,其立法目的“不是服务于法益保护。对于保障和平的共同生活不是必要的,但为了谋求刑法之外的目的,就像安抚选民或者表达国家自我姿态的法律规定”^[3],法律化作斩断社会问题这团乱麻的快刀,通过新罪的设立、加大处罚力度来安抚民众的不安感,至于能否实际上达到规制行为、预防犯罪的目标在所不问,法律几乎成了画在纸上充饥的大饼,刑法成为一种感情层面自我完结的规定。

象征性立法最大的特点是,立法是一种对犯罪施以威胁的姿态或情绪。象征性立法是以积极的一般预防为导向的,刑法的目的在于维护法秩序在公众心中的效力,迅速对犯罪行为作出回应,正是出于安抚民众,增强法律信仰,维护法律权威的考量。象征性立法具有抽象性,从立法目的看,安抚的是公众

抽象的安全心理;从保护的法益看,超个人法益不断扩张,多以抽象危险犯的形式存在。虽然象征性立法可以达到回应人们规避风险的迫切愿望,但是缺乏执行力的法律规范存在本身也会导致许多问题,谦抑性原则首当其冲。

通过对象征性立法概念的介绍,可以看出其与回应性立法有重合的部分,特别是对社会问题的回应,区别在于前者更多的是一种态度、立场的展示,后者则是立足当下,缺乏前瞻性、根本性解决问题的非理性决策。

(二) 回应性立法与情绪性立法

刑事立法是保护人民群众最基本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调整的是个人或社会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利义务,人们对刑法的制定、修改投注了极大的热情,尤其是新闻媒体传播的社会热点问题,经过短暂发酵就会如同热带风暴一样席卷全国,人们对刑事立法的热情会化作100摄氏度的沸水,所以我们才会说“民意汹汹”;但是,正是因为刑法调整的是人们最核心、最重要的权利义务,并且刑罚手段又是最严厉的,所以立法时应当慎重、严谨、专业,使得刑法真正发挥“最后一道防线”的作用。因此民意需要经过冷却才能成为刑事立法因子之一,舆论内容只是立法的引子,我们应当对人民群众关注的问题进行分析,寻找其核心和本质,而不是囿于舆论讨论内容的高墙,所以并不是受到民意影响的立法就是情绪性立法,在这里专业的立法者要发挥极其重要的作用。

情绪性立法多源自社会舆论或民意,立法时尊重民意是正当的,但是民意具有从众性、易操纵性,很多时候最广泛的民意往往是非理性的。另外,谁又代表民意?例如之前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讨论,网络上众说纷纭,此时民意为何如何判断?简单机械地看某帖子的点击量、转发量恐怕不可行,民意是与民主制度紧密相连的,“要很精确地来谈民意,与了解圣灵的工作没有两样”^[4]。至于民意的易操纵性,可以从近年来的热门事件导致的刑事立法中看出端倪,例如对冒名顶替上大学的行为,进入刑法修正案的过程可以概括如下:个案揭发—民意沸腾—舆论推波—法院纠结—中央震动—立法动议^[5],这样的立法历程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条修正是受到舆论压力下的无奈之举,在经受立法正当性拷问时很难站得住脚。

近年来,受舆论影响的刑事立法越来越多,民意介入刑事立法的程度越发过度,非理性的情绪性立法也愈发常见,由此导致的恶果危害巨大,不但无法

保护人们的合法权益,还会损害法律的权威。如果过度尊重社会舆论进行刑法制定和修改,会导致情绪性立法,还会使得社会舆论影响刑事立法成为常态,最终使刑法沦为警察法。^[6]我们可以发现,情绪性立法与回应性立法几乎重合,二者的来源都与社会舆论或民意有关,但是回应性立法外延更大。

二、《刑法修正案(十一)》中回应性立法表现

2020年12月26日,《刑法修正案(十一)》(以下简称《修十一》)经过两次审议最终表决通过,纵观修正案全文,我们会发现所有规定都是围绕着人民群众展开的,关注人民群众的生活的方方面面,保障其生命健康权利、财产权利,使人民群众出行放心、生产放心、饮食放心、医疗放心,在良好的生态环境中追求幸福生活。因此,本次刑法修正回应了许多社会热点问题,不少规定直接表现出回应性立法的特征。

(一)《修十一》中犯罪构成的回应性色彩

近年来,随着自媒体时代的到来,许多未成年人重大犯罪案件呈现在大众面前,给人们带来难以淡化的冲击,就如2015年湖南邵东3名未成年学生抢劫杀害女教师案,本案中除了3名犯罪人不满14周岁不负刑事责任之外,还有两处细节令人难以忘怀,其一是3人手段极度残忍,用棍棒袭击受害者头部,用毛巾捂住口鼻致死,而受害者与施暴者此前没有任何纠纷;其二是3人心理素质极强、内心极其残忍,杀人后冷静藏尸、清理现场,逃离后去网吧上网直至被抓获。从犯罪情节看,他们已经具有完全不逊于成年人的心理、生理能力,与3人不负刑事责任的处理结果形成鲜明对比,故而引起民众热议,降低刑事责任年龄的议题再次成为焦点。此后2018年湖南沅江12岁男孩因母亲管教太严持刀杀母,2019年陕西神木15岁少女被6名未成年人要求卖淫、殴打致死并肢解掩埋,2019年辽宁大连13岁男孩杀死10岁女童等案件,都冲击着公众的认知底线。

随着媒体对此类恶性案件细节的公开,未成年人犯罪问题成为社会热门话题,从民众热议到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提出降低刑事责任的议案,面对舆论和民意,最高检、公安部在2019年12月20日通过新闻发布会表态依法严惩未成年人犯罪案件,所以《修十一》中有关降低未成年人故意杀人、故意伤害案件刑事责任年龄规定,正是回应社会呼声的表现。但是某一条法律规范若想经得起立法正当性的诘问,就不能仅是出于解决当前社会问题的考虑,而要契合社会发展背景,符合刑事立法的内在规律,综合考虑立法的必要性、正当性。关于降低刑事责任的

规定,是在民众热议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背景下生成的,缺乏翔实的实证分析、严格的论证过程,更多地像是对社会热点问题的解决,因而这一规定带有“回应性”色彩。

(二)《修十一》中新增罪名的回应性色彩

1. 高空抛物、抢夺方向盘入罪

高空抛物事件近年来一直困扰着人们,一方面人们担忧出行安全,希望国家重视对高空抛物行为的规制;另一方面人们也害怕承担高空抛物的侵权责任,因为依据《民法典》的规定,如果无法查明直接侵权人,可能的侵权人都要承担部分责任,这两方面的冲突形成了人们的矛盾心理,对于高空抛物行为如何处理难以达成统一的观点。但是近年来由于高空抛物造成的伤亡事件,例如,2020年深圳市发生了多起高空抛物事件,某小区内婴儿被半个苹果砸中头部,某幼儿园操场飞来保温瓶险些砸中学生,一清洁工被四楼抛下的铁架床砸中头部等事件,让人直冒冷汗,在加强规制高空抛物行为的天平一端增加了砝码,社会民众普遍担忧出行安全,忧心“头顶安全”。此外,抢夺方向盘造成的人员伤亡危险也与公共安全有关,例如2018年在重庆公交车上一女乘客因错过站与司机发生争吵后抢夺方向盘,使得公交车与小轿车相撞后坠下江中,造成15人死亡的惨剧,举国震惊,此后乘客抢夺方向盘的事件时有发生。例如2020年3月合肥一男子因坐过站与公交车司机争吵后抢夺方向盘,导致司机在路边紧急停车,后该男子获刑3年,其实抢夺方向盘的事件大多发生在公交车上,多因为错过站、想让同伴上车等小事发生,且车上人员不特定,所以容易引发社会公众的恐慌,民众希望刑法对此类行为进行规制的呼声也越来越大。

基于对公共安全的保护,《修十一》将高空抛物行为、抢夺方向盘行为入罪是对民情的安抚,也是对民众担忧公共安全的回应。但是,刑法不是普通的社会治理工具,其保护的利益核心、手段严厉使得动用刑法需要尤为慎重,社会问题的解决不能总是依赖增加刑法规范。

2. “冒名顶替”入罪

2020年6月山东女子苟晶自爆被人两次顶替上大学在网上掀起轩然大波,各地类似人物频出,例如湖南罗彩霞、湖北王俊亮、山东王丽等,更有媒体报道称2002—2009年山东共242人冒名上大学,涉及高校14所。此类事件很快成为人们讨论的热点问题,除了对涉案人员表达愤怒外,人们更关心被冒名的权利保护问题。此前只能依据《民法典》中姓

名权、人格权的规定,还有无法直接援引的《宪法》中受教育权的规定,对受害者的权利进行保护,相比受害者无法逆转的人生而言,顶替者付出的代价实在微不足道,民众普遍认为对被冒名者保护不足,太过轻微的代价也无法威吓今后冒名顶替行为,应当将此类情形纳入刑法。鉴于民众的呼声,在没有经过严谨论证,《修十一》中仓促、随意加入对冒用他人身份上大学、入职公务员入罪的规定,无疑是一项缺乏前瞻性的回应性立法。

3. 非法讨债行为入罪

近年来,金融市场活跃度高,滋生出许多非法乱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的案件频出,具有涉及金额巨大、受害人员众多等特点,与本罪处在同一犯罪链条上的是高利贷等非法放贷行为。例如,2018年惠州公安打击的周某犯罪团伙,周某通过在网上开设的借贷平台从事高利贷业务,并专门成立“地下出警队”“催收专业队”,采取线上、线下两种手段收债,涉及打砸等暴力手段和电话轰炸、视频短信威胁、非法侵入住宅等软暴力手段,该犯罪团伙在多地进行讨债,严重威胁社会治安稳定。基于近两年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经验,高利贷行业是其他众多犯罪的温床,容易聚合成为黑恶势力,《修十一》中提高了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法定刑,也将采取暴力、软暴力等手段催收非法债务的行为入罪,对于维护人们人身、财产安全,保证社会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然而将非法讨债行为单独规定为寻衅滋事罪的一款,并设立较轻的法定刑,其必要性、合理性值得探讨,非法讨债行为此前被定性为寻衅滋事罪,或者认定为黑社会性质犯罪,能够完整评价其犯罪行为,《修十一》将其单独定性、定罚,除了可以直接认定寻衅滋事构成要件外,在一定意义上避免了对催收行为处罚过重的做法,并无其他大的价值,所以这一规定更多的是对当前社会金融乱象的解决,属于回应性立法。

(三)《修十一》中量刑情节规定的回应性色彩

1. 增加奸淫幼女罪加重处罚情节

日前韩国素媛案的罪犯刑满出狱,占据了韩国新闻的头条,就连我国新闻中也有报道,因为性侵女童是很严重的犯罪行为,类似案件一旦被曝光,社会舆论几乎众口一词地谴责这种不道德的犯罪行为,公众对此类事件容忍度极低。例如,2013年云南大关一办公室主任性侵幼女获刑8年,2018年因减刑提前2年出狱的新闻一经报道就点燃了舆论的火药桶,虽然昭通监狱方面作出了减刑符合规定的回应,社会大众仍然议论不止,很多人发表了加重处罚性侵幼女

行为的意见,究其原因是性侵幼女行为是对社会公众的道德底线的挑战。而2019年4月曝光的鲍某性侵幼女案件将这一话题刷新,鲍某几乎以一己之力“重建”了社会道德价值体系,刷新了公众认知。

《修十一》中对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或造成幼女伤害的行为规定为加重处罚情节,是对未成年人加强保护的体现,也是对社会热点事件作出反应的体现。然而奸淫不满10周岁幼女或造成幼女伤害,完全可以适用刑法第236条第3款第1项情节恶劣、第5项重伤、死亡或其他严重后果的加重处罚情节规定,《修十一》中增加的奸淫幼女罪加重处罚情节并未超出修改前的范围,也未设置较轻或较重的法定刑,并未实质改变现行刑法规范中对奸淫幼女罪加重处罚情节的规定,更像一种注意规范,这种强调是对当前社会问题的简单解决,所以是回应性立法。

2. 为暴力袭警行为单独设立法定刑

警察在执行公务中经常会遭到袭击,此类新闻时有出现,且有愈演愈烈之势。针对袭警问题在2020年1月10日两高和公安部联合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袭警违法犯罪行为的指导意见》中,明确了袭警行为的入罪标准,加大了惩处力度。2020年7月6日江苏省淮安市发生一起恶性的暴力袭警事件,两位年轻警察被两个通缉犯持刀重伤,抢救无效死亡,这起重大的刑事案件牵动着社会公众的心,对执行公务中的警察的保护成为舆论的中心,民众普遍认为要对暴力袭警行为加重处罚,因此,《修十一》对暴力袭击正在执行公务中的警察单独规定法定刑,还规定了加重处罚的行为类型,这一规定也是对社会实践中暴力袭警事件做出的回应。

但是,这一规定的合理性饱受质疑。首先,将警察独立于公务人员行列,加大保护力度容易造成罪刑不均衡,法官、检察官等其他公职人员工作过程中同样可能面对较大风险,特殊保护警察缺乏合理性;其次,出于限制公权力的考虑,不应当扩大警察权,而对暴力袭警行为的加重处罚实际上达到了这一效果,这一做法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背离了现代法治的应有之义。

三、回应性立法存在的问题

刑事立法不仅具有作为社会成员的规范意识、价值意识的诉求的一面,而且还具有作为表现立法者的刑事政策的姿势的一面,立法活动本身就是价值选择的过程,国家为了社会大众通过刑事立法彰显价值观也无可厚非。刑法及时回应民众的不安,并非只为了“安抚民众,赢得选票”,而是因为这种不安和焦虑可能会深刻影响社群的稳定以及民众对

法律规范和社群的认同,并且最终又会反过来伤害个体法益。这种回应性立法,“虽然具有防控犯罪、维护稳定、保障权利、贯彻党和国家刑事政策等多方面的积极意义,但也存在着一些值得反思的问题”^[7]。从我国刑法修正的范围和频率来说,在公共情绪支配下明显增加,且重刑化做法抬头,若不能坚守刑法谦抑主义,坚持刑事立法的内在规律,刑事法律就会向着“又严又厉”趋势前进。另外,刑法更新的速度过快会产生隐藏的法律风险,因为理论界和实务界缺乏足够的时间考察评估。回应性立法存在以下三个重要缺陷:

(一)非理性

回应性刑事立法多源自民意,优点在于立法时容易得到公众认同,能够激发公众尊法、守法的意识,回应性立法解决的是当下社会发生的现实问题,而且一般是由民间议论为开端,具有被动性、仓促性;解决问题的手段是通过刑事立法将某些行为入罪或加重处罚,具有粗浅性,所以非理性的回应性立法可能难以承受立法正当性的质疑。而大数据时代任何决策都会受到数据影响,刑事立法也不例外,近年来,司法数据研判法被许多学者接受,通过数据统计分析,发现实践中真实存在的法律问题而不受舆论的声音的蒙蔽,实证分析的过程和结论说服力更强,回应性立法的仓促性和被动性更需要实证研究的过程,否则立法就会缺少坚实的现实基础。再者,上文提到象征性立法、情绪性立法与回应性立法有重合的部分,学界目前对前两者大多持批判态度,如果某项法律规定被贴上“象征性”“情绪性”的标签,就会逐渐失去已经得到的公众认同,法律规范实施过程中,会面对立法者和社会公众的质疑,那制定该法律规范的初衷将难以实现。^[8]

(二)非兼容性

科学立法要求做到刑法之外和刑法之内两方面的协调,前者是指立法时处理好刑法与其他部门法的关系,考虑其他法律规范的变化。例如,随着《民法典》的出台,公民首部权利法案诞生,对公民权利作出类型化规定,为刑法保护提供可能,也可提高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后者指的是在刑法体系内,新增、修正罪刑与原有罪名的协调性,包括罪名设置的协调性、个罪犯罪构成和法定刑的适配、个罪与个罪法定刑配置的均衡等。

回应性立法容易出现片面性,某个新罪的增加可能造成刑法体系内罪名设置的不协调,例如《修十一》中高空抛物行为入罪,一方面是基于高空抛物事件造成人员伤亡在公众心中的恐慌,另一方面

是《民法典》中对高空抛物侵权行为的明确规定,客观上依据《民法典》关于此类事件私力救济与公力救济的结合,可以保护人们的生命财产安全,高空抛物行为入罪并无必要。另外,即使需要用刑法规制高空抛物行为,完全可以使用以危险方法危害公共安全罪这一规定,将高空抛物这种行为方式单列出来并无必要,而且《修十一》中为该罪设置的法定刑是管制、拘役,远低于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犯罪的法定刑,使这条规定与刑法分则第二章的其他规定的衔接出现问题。回应性刑事立法的兼容性问题会影响刑法的司法适用,最终损害刑法的公正性。

(三)工具性

国家提倡刑事立法参与社会生活,面对生活中出现的许多难题、怪相,人们总会要求国家发挥作用,直接提出刑法修正建议的不在少数,从11个刑法修正案中可以看出刑法顺应时代发展的变化不断做出改变,尤其是法定犯的剧增,说明“刑法已经由解释的时代转向立法的时代”^[9]。但我们不能回应所有的社会现状,回应的过度会导致刑法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而丧失其独立价值,纯粹的工具主义几乎完全视法律为推行政策的工具。哈贝马斯称这种现象为“法律对人类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如果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都用刑法解决,那刑法规范将无穷无尽,最终成为比行政法繁杂庞大的存在,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一旦刑法没有达到人们的预期,将会失去公众认可,人们也不再会相信法律的权威和政府的治理能力。

若刑法成为社会治理的工具,尽可能多的回应舆论民意,将会使隐藏在国人心中的重刑主义的思想蔓延到刑法规范中。因为受到我国传统文化的影响,国人存在部分严重报复心理,由于复仇引发的刑事案件从古至今都不稀缺,并且很多人对复仇者都有同情、宽容心理。对于容易挑动人们神经的刑事案件,例如性侵幼女、猥亵儿童,公众都呼吁加重处罚力度,如果刑事立法满足人们的要求,增加新罪名、加重法定刑,会使得刑法向着又严又厉的方向前行,这不符合世界范围内刑事立法趋势。

四、刑事立法的应然选择

首先,我们要清楚法律只是社会治理的手段之一,面对社会问题,我们可以采取政治、经济、行政、法律等多种手段解决,法律具有的滞后性难以及时应对社会难题,就像新冠疫情期间出现的个别人员不服从防疫管理问题,我们无法紧急召开人大会议以立法的方式进行规制,但是可以发布行政命令的方式迅速处理,还有的社会问题要靠经济发展解决,

强硬的法律规定未必有效。

其次,刑法只是众多法律规范的一种,作为保护人民群众权利的最后一道防线,在其他法律规范能够解决问题的情况下,就不需要动用刑法,“一个行为只有在道德规范体系以及第一次法规范体系无法有效予以调整,并且符合刑法调整的要求时,该行为才能被立法者赋予刑事制裁的法律效果”^[10]。因为施用刑法的后果非常严重,所以应当坚持刑法的谦抑性。社会生活中出现的问题,首要考虑的是从现有的各个部门法中寻找解决途径,如果非刑罚路径足以维护个人、社会的合法权益,就无须寻求刑法保护。刑法的保障法地位是符合现代法治精神的,源于国家公权力的自我限定,我国刑法修正的基本样态是国家刑罚权的逐步扩张,这也就意味着公民权的缩小,所以如何保证风险社会理论背景下国家刑罚权的合理扩张是我们必须要解决的难题。

最后,在刑事立法时,应当遵循其内在的规律,如此才能保证刑事立法的科学性。其一,立法时必须坚持犯罪化标准,例如损害原则、冒犯原则、法律家长主义、法律道德主义、功利原则、比例原则……在当前回应民意保护社会利益的同时,我们必须谨慎对待犯罪圈的扩大,只有将那些真正符合犯罪化标准的行为予以犯罪化,才能经得起立法正当性的考验。其二,刑事立法要符合罪刑法定原则,使得法律规范具有明确性,减少内容重复的强调性立法;坚持罪刑均衡原则,使刑法规范具有体系性、协调性。其三,坚持刑事立法的稳定性,法律作为一种行为规范不可朝令夕改,否则人们无法安排自己的工作与

生活,势必会陷入秩序混乱的无所适从中,虽然随着社会生活的发展,新的犯罪现象不断涌现,刑法条文不可能一成不变,但是我们不能采取“出现一个,制定一个”的做法,因为频繁变动的刑法规范的不确定性,反而会影响人们的正常生活。

参考文献:

- [1] 刘志伟,尤广宇.超越“回应性”立法:中国腐败犯罪刑法立法体系发展70年之检视与完善[J].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0(1):180-181.
- [2] [日]松原芳博.刑法总论重要问题[M].王昭武,译.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4:17.
- [3] [德]克劳斯·罗克辛.刑法的任务不是法益保护吗?[J].樊文,译.刑事法评论,2006(2):155.
- [4] 彭怀恩.政治传播与沟通[M].台北:风云论坛出版社有限公司,2002:103.
- [5] 于志刚.刑法修正何时休[J].法学,2011(4):11.
- [6] 王强军.刑法修正之于社会舆论:尊重更应超越[J].政法论丛,2014(3):106.
- [7] 彭辅顺.回应性刑法修正反思[J].山东警察学院学报,2019(2):11.
- [8] 齐文远,吴霞.对环境刑法的象征性标签的质疑:与刘艳红教授等高权[J].安徽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5):118.
- [9] 张明楷.法益保护与比例原则[J].中国社会科学,2017(7):88.
- [10] 梁根林.刑事法网:扩张与限缩[M].北京:法律出版社,2005:43.

(责任编辑 刘成贺)

Reflection on Responsive Criminal Legisl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CAO Ye

(Faculty of Law, Macau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Macau 999078, China)

Abstract: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society, it is inevitable that the criminal law norms will change accordingly, but the amendment of the criminal law is a scientific and rigorous work, and its legislative value should not be arbitrarily influenced by public opinion. Responsive criminal legislation refers to an irrational legislative model that submits to public opinions and make corresponding amendments when severe issues occurred in the current society and sparked widespread concern. The *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has responded to hot social issues in recent years, including the issue of Changsheng vaccines, imposters going to college, and cases of sexual assault on young girls. The urgency of responsive criminal legislation makes it hasty, superficial and irrational. In the criminal law system, problems of compatibility often arise, and criminal law is easily reduced to a tool of social governance. Therefore, criminal legislation should adhere to its own rules, ensure the quality of legislation, maintain legal authority, adhere to modesty, and play a good role as the last line of defense.

Key words: *Criminal Law Amendment* (11); responsive legislation; modest and restrained

战时妇女动员

——以1948年冀鲁豫边区冬季生产为例

刘志鹏, 李艳丽

(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 山东 济南 250358)

摘要:1948年冀鲁豫边区的冬季生产,是战时中共进行妇女动员的典型案列,冀鲁豫边区在结束土改、整党建政中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并提出和实施了各种有效措施,从而在支援前线战争、提高妇女政治经济地位、进一步摆脱传统束缚等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和作用。同时,冀鲁豫边区妇女动员工作也存在着不足之处,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

关键词:冀鲁豫边区;妇女动员;冬季生产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0

中图分类号:C913;G21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52-06

解放战争时期,在中国共产党的动员和领导下,根据地的妇女不仅自己参加革命、从事生产运动,而且送丈夫与儿子参军支援前线,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和牺牲。目前学界主要以革命根据地为基础,对中共妇女动员工作及其为战争胜利所做的贡献进行了深入的考察,取得了众多的研究成果。然而,对于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动员工作等问题的研究明显不足,尚未见系统的论述。冀鲁豫边区作为抗日战争时期形成的革命老区,边区的妇女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和革命精神,在解放战争时期为中共取得革命的胜利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基于此,本文以冀鲁豫边区为研究对象,以1948年边区的冬季生产运动为视角,主要利用河南省档案馆馆藏档案,重点廓清中共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原因、措施及其影响,以期深化对中共革命史和近代女性史的研究。

一、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原因

(一)冬季生产计划的客观要求

抗日战争胜利后,国内阶级矛盾成为主要矛盾。

1946年6月,国民党为了独占胜利果实,撕毁“双十协定”,发动第三次国内战争,即解放战争。1947年7月,在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反攻、解放区范围不断扩大的背景下,1946年5月4日颁布的《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已经无法满足新形势的需要,1947年9月,为了统一制定新的更适合的土地政策,中国共产党在西柏坡召开了全国土地会议,通过并颁布了《中国土地法大纲》。随后,在冀鲁豫、陕甘宁、晋察冀等新老解放区开展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冀鲁豫边区的土地改革,使广大贫农翻身成为土地的主人,为了保卫土地改革胜利的果实,翻身人民踊跃报名参军,积极支援前线,掀起了声势浩大的参军运动。1948年9月,华东野战军攻克济南,揭开了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大反攻的序幕。为了争取人民解放战争最终胜利、渡过灾荒、为前线提供粮食衣服等必备物资,1948年11月10日,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冬季生产的指示,提出生产“增长一寸”的目标,并指出要总结宣传土改中妇女生产的经验教训,以动员妇女积极参加冬季

收稿日期:2021-02-15

基金项目:2020年度山东高校“青创科技计划”(人文社科)“抗日战争与近代中日关系研究创新团队”项目“山东区域抗战史研究”(2020RWD002);2020年度山东省社会科学普及应用研究项目“山东省县域红色文化溯源——以博兴县为例”(2020-SKZZ-71)

作者简介:刘志鹏(1980—),男,山东博兴人,历史学博士,山东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抗日战争研究中心主任,主要从事中共党史、抗日战争史研究。

生产。^[1] 11月13日,冀鲁豫行政公署根据华北人民政府关于冬季生产的指示,结合冀鲁豫边区实际情形,制定并颁发冀鲁豫边区冬季生产计划。^[2]

冬季生产“增长一寸”这个战略任务,是冀鲁豫边区党委1948年冬季生产重要的工作,具有重要的意义。其一,自解放战争开始以来,广大河南地区在两年的游击战争中,已经饱受国民党军队摧残,人民生活十分困苦。又因河南许多地区遭受水灾,加大生产度过1949年春荒是冬季生产中紧迫的任务;其二,河北部分村庄亦受到水旱虫灾的影响,秋季收成降低,亦急需加大冬季生产以度春荒;其三,在收成较好的地区,在修正政策、确定地权后,人民则迫切要求发展生产,改善生活。^[2]因此,不管河南、河北,不论灾区或一般地区都要以生产节约、发家致富、支援前线为中心制定冬季生产计划。但在冀鲁豫边区男子积极参军支前情况下,要完成冀鲁豫行署布置的冬季生产计划必须高度发挥妇女的作用,动员广大妇女参加冬季生产。

(二)解放妇女的根本要求

冀鲁豫边区妇女人口众多,凝聚起来具有巨大的作用,是建设新中国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力量。在中国抗日战争和两年的解放战争中,妇女工作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她们积极动员丈夫、儿子参军,为前线战士缝衣做鞋,在敌人扫荡村庄时掩护中国共产党的干部与伤员。遇到灾荒时,广大妇女群众不是惊慌失措、怨天尤人,而是日夜纺织积极自救,并为前线补充粮食和衣服。在冀鲁豫边区土地改革中,广大妇女群众通过诉苦、清算浮财,进行斗争。历史证明,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在土地改革、支援前线、参加军事战斗以及边区生产建设中贡献了巨大的力量。同时,整个过程中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家庭中和社会上的地位均有了明显的改变。经济上,封建土地制度被彻底摧毁,妇女在土改中获得了土地,妇女经济地位得到提高,妇女基本人权受到尊重;政治上,由于妇女在抗日战争、土改与支援前线和后方生产中,均表现出伟大的力量,得到了群众的称赞,政治地位获得了提高;在社会上,农村开始移风易俗,一些压迫妇女的封建传统思想、鄙视奴役妇女的观念受到打击。^[3]这为妇女解放开辟了道路。

恩格斯曾经指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4]⁵⁵因此,妇女解放的道路,必须从提高其经济地位入手,只有多生产多积蓄,改变物质条件,才能最终改变其政治地位,以致最后解脱封建束缚。中共中央指出:“组织妇女广大劳动力走上生产战线,和男子共同

恢复发展生产,实现生产长一寸的任务,这不只是争取全国胜利的战略任务,同时也是保护妇女利益的中心环节。”^[5]因此,冀鲁豫边区在布置冬季工作时,必须认真检查、研究、总结妇女工作,并对妇女工作进行具体布置,使冬季工作中妇女队伍不失时机加以整顿,在完成“增长一寸”这个战略任务中高度发挥妇女的生产力,以保证解放战争取得彻底胜利、妇女进一步解放。

(三)贯彻党完整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必然要求

妇女的解放是整个革命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1946年5月4日,河北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提出:“必须重视妇女工作”,“全党做妇女工作。”^[6]但是冀鲁豫边区领导对这一指示没有认真贯彻和执行,导致妇女工作得不到应有重视。有的把妇女工作放在整个革命斗争之外,认为妇女工作只是妇女解放斗争中的事,是妇女干部的任务,继而将妇女工作放在可有可无的地位,认为革命斗争没有妇女工作的支持也能取得胜利,因而只将妇女工作交给少数妇女干部去做而放弃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有的甚至为传统的重男轻女的封建思想所支配,对妇女工作持轻视态度,不但不积极负责,且予以嘲笑或讽刺。^[6]1948年召开的中央妇委工作会议,要求各地区各党委加强对妇女工作的领导,认真总结与提高妇女工作。冀鲁豫边区党委随即召开妇女工作会议,正式转达中央妇委工作会议的内容和精神,即要在冀鲁豫边区积极开展妇女工作,将妇女动员并组织到冬季生产的工作中去。

妇女约占全国总人口的一半,是中国共产党完整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的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冀鲁豫边区要贯彻党的政策和路线,离不开女性同志的帮助和支持,任何轻视妇女工作的思想行为,都会削弱中国共产党领导革命的基础,从而影响革命最终取得胜利。为了发挥妇女自身优势争取解放战争的胜利,边区的妇女工作必须积极开展,必须把妇女工作看成整个革命斗争中的重要部分。在开展任何工作时都必须将妇女工作包括在内,把妇女作为重要的群众基础,从各个方面加强妇女工作,积极贯彻党完整的群众路线和群众观点,这是冀鲁豫边区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二、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措施

土地改革运动完成后,冀鲁豫边区农村发生了巨大的改变:封建土地制度已经基本消灭,土地大体被平分,农民得到大体相当于平均数的一份土地。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要求就是民主与生产,这决定

了以后一段时间内,整个农村的工作方针是恢复发展生产、完成整党建政、结束土改、支援前线。土改后,妇女工作的基本要求得到了满足,妇女基本人权已初步确立,但仍有遗留问题:成分问题、地权问题、家庭内部的民主与和睦问题、婚姻自主问题、妇女干部问题、领导权问题等。这些问题不解决,便难以顺利地组织妇女转向生产,因此冀鲁豫行署在颁发冬季生产工作指示时要求,在结束土改、整顿组织、实行建政工作中,必须结合冬季生产,总结妇女生产经验与教训,积极动员妇女参加1948年冬季生产。

(一)修正政策,端正妇女工作态度

冀鲁豫边区是国共两党军队反复较量的重要地区,土改复查期间又正逢黄河固堤防洪时期,^{[7]214}冀鲁豫边区男子绝大多数上前线,女子成为土地改革与复查运动的主要力量。在冀鲁豫边区妇女的努力下,在土地改革完成的地区,农村阶级发生了根本变化,男女老少分得土地,妇女成为区、村代表等干部,妇女的觉悟程度和积极性也获得了提高,总之在土地改革中,冀鲁豫边区妇女在政治上、经济上、家庭和社会地位上都发生了根本改变。^[8]但同时冀鲁豫边区妇女工作也存在若干缺点。其一,土改过程中,错定成分,斗争中农,以及在各种工作上伤害与排挤中农,引起中农妇女不满和恐慌,导致中农妇女脱离边区党组织,生产情绪消沉。在土地改革中,中农妇女虽然也参加了斗争,但在实际工作中中农利益受到侵犯,如在斗争割地、支差代耕中加重中农负担。而在分胜利果实中,中农却一无所得,在各种会议上均受到排挤,因此中农妇女发出“小小虫跟着蝙蝠飞,有熬的眼没吃的食”的感慨,心中不满,生产情绪也不高。其二,在土改中,对地主乱打乱杀,强迫妇女参加“拉滑子”(滑轮),导致妇女不满,生产情绪低落。其三,分配果实不公,干部脱离群众。在土改中,很多浮财被清算,但这些浮财却分配不到贫农手中,群众认为“开会不如纺花”,情绪低落。另外,干部在布置工作时,强迫命令的方式也引起贫苦妇女的不满,如强迫命令妇女剪发、放脚、扭秧歌等。其四,村组织混乱,新老干部不团结,也导致妇女情绪低沉,生产积极性不高。运动一次,老干部被打下一次,新老干部之间积压很多问题:不团结、闹乱子、互相攻击。

在结束土改的工作中,冀鲁豫边区各地通过修正政策、处理土改中遗留的问题、解决妇女的各项问题,以安定和提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热情。首先冀鲁豫边区党委及各级干部通过再度检查是否真正贯彻1943年2月中央发布《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方针的决定》,即“以动员和组织广大妇女

群众积极参加生产视为妇女工作的基本环节”,^{[9]126}改正正在思想上尚存在着的各种错误观点。冀鲁豫边区妇女干部一改以往“强迫、命令”的工作方式,采取“自愿”与“两利”的原则,动员妇女参加各种合作社,如农业变工互助组、纺织小组之类的生产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等。其次,冀鲁豫边区注重培养与提拔大批党与非党的妇女干部,并注意提高妇女干部政治、理论、文化的水平及工作能力。对农村新起的劳动妇女干部,冀鲁豫边区通过对其原有的工作岗位加强教育、耐心培养、逐步提拔,并发展其为党员。另外,冀鲁豫边区各级党校和政府主办的训练班也有计划地吸收妇女干部学习,提高妇女干部的工作效率及培养妇女干部理论、政策、文化、生产等方面的知识和技能。最后,为了保证妇女在土改中分得的土地,冀鲁豫行署积极宣传保护妇女土地权,并且在以家庭为单位发放土地证件时,皆注明:“男女均有同等的土地权,全家成员有民主处理财产之权。”^[8]

(二)整顿妇女队伍,恢复妇女组织

1947年,在河北省召开的全国土地会议上,中央提出“必须重视妇女工作”“全党做妇女工作”。^[6]但是经过轰轰烈烈的土改复查运动,农村妇女表现依旧消沉,甚至某些地区农村妇女积极分子受到孤立打击。主要原因是冀鲁豫边区在整党中及整党后对妇女工作没有做很好的总结清算。冀鲁豫边区从1947年9月结束复查工作开始整党后,由于未完全做好详细计划,冀鲁豫边区整个工作陷于停顿状态,工作失去方向,村干部“躺倒”,整个农村工作陷于停滞混乱状态,妇女工作也不例外。在整党工作中,有些地方批评妇女运动伤风败俗,不堪一提。并且由于未对妇女工作进行总结清算,使得妇女工作是非界限不清,不知道妇女工作中哪些是成绩应该肯定,哪些是错误应该否定,工作没有方向。这些问题不解决是非常不利于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工作并向前发展的。

针对以上问题,冀鲁豫边区党委要求在整党建设中,要结合整顿妇女队伍来动员妇女进行冬季生产。冀鲁豫边区党委要求:“支部在检查整个土改工作,研究结束土改转向生产特别要检查妇女工作,检讨过去对妇女工作的观点、做法,解决妇女工作遗留问题,提出今后方向,以支部为领导,在群众中发扬民主作风,对过去工作中的毛病要很好地自我检讨,对受孤立打击的要分清是非,分清责任加以解决。”^[6]

其中,关于整顿活跃妇女组织问题。在整党中曾一度取消了妇女群众的单独组织,或者名存实亡,

这是不利于妇女动员运动的。冀鲁豫边区党委指出,妇女经济、政治、家庭和社会等权利尚未确定时,单独的妇女群众组织是领导和推动妇女工作、团结和教育广大妇女群众的最好组织形式。例如,动员妇女参加妇会、妇女识字班、纺花组、织布组等组织,并在各种组织基础上组织妇女成立妇女代表会。

妇女代表会的职能,是代表妇女群众的意见,讨论当地妇女工作的方针任务及重要工作,传达民主政府及上级组织的政策、法令或决议,发动广大妇女群众共同执行。村级妇女代表会议,是妇女代表会的基层组织。为了保证妇女代表会的民主性,妇女代表会的代表是由人民代表大会的女代表、妇女团体的代表(如纺织组、合作社、识字班等的女代表)及广大妇女群众直接选出的代表,按照一定的选举条件实行差额选举产生的。同时由妇女代表会议选出委员会,贯彻决议,主持日常工作,并定期召开代表会议检查妇女工作。委员会的名称,可根据群众意见确定。在群众对妇联会已经熟悉的地方,可称为妇联会的委员会,为充实有组织的群众基础,妇女代表会议的委员会,应运用各种各样的形式,如识字班、合作社、互助组等,去组织各种要求不同的妇女群众;同时也必须经常与无组织的妇女群众联系,并为其服务。^[8]

对妇女工作组织的整顿是最基础的工作,另外加强冀鲁豫边区各级党委对妇女工作的领导是极其必要的工作。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工作在土改复查中是有运动、有成绩、有基础的,但是由于缺乏经常性系统性的组织领导,没有及时总结工作、肯定成绩和纠正错误,因此妇女工作受到损失。为了动员广大妇女群众参加1948年冬季生产工作,冀鲁豫边区党委决定:

第一,改变民运部妇女科的形式,县委以上妇女科在党委领导下建立妇女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妇委”)组织,以加强妇女工作的领导。规定妇委由三到五人组成,由党委委员兼任妇委书记,原作妇女工作的干部可选任副书记。妇委负责研究、检查、总结妇女工作并提出方案,经边区党委批准后交由各级妇委组织执行,妇委定期向党委禀报妇女工作,党委要定期研究妇女工作,下级党委和妇委对上级党委和妇委要建立定期报告制度,县级呈送地委级报告的同时呈送区党委一份,报告一定要经同级党委审阅,重要问题要事先请示事后报告。冀鲁豫边区党委要求,各地委、县委的妇委组织应迅速建立起来,妇委名单要提交上级党委批准,地委、县委的妇委名单必须于1948年11月底以前呈送区党委。^[6]

第二,区委及乡支部设的妇女委员在党委统一领导下,负责妇女工作。^[6]任何工作的向前发展都需要有一个发动机,对于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工作而言,妇女委员就是区、乡妇女工作向前发展的发动机,用以推动冀鲁豫边区妇女工作不断向前发展。

第三,妇女干部要加以调整,按工作需要加以合理配备。冀鲁豫边区党委强调,边缘区妇委工作难以大力开展的地方,妇女干部要适当调整,加强巩固工作,区以下妇女干部要加以审查,发现、培养有前途的劳动妇女干部,对不能作工作的干部要加以调整,不称职但有培养前途的加以训练给以学习机会,无培养前途的动员其回村工作或参加生产,但必须注意解决其具体困难,不能简单从事。^[6]

这样就在冀鲁豫边区建立了严密的妇女组织系统,有利于妇女工作的积极开展,有利于促进冀鲁豫边区妇女积极投入冬季生产的工作中去,为解放战争的胜利奠定了深厚的物质基础。

(三)动员妇女参加民主建政,保证妇女特殊利益

1948年中共中央文件指出:“以生产为中心,并在生产过程之中,加强对于妇女的教育工作,提高妇女政治觉悟、文化水平,动员妇女参加民主建政……”^[8]阻碍妇女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的是残留的封建思想和传统习俗。在土改过程中,由于对妇女解放目标的不明确与观点偏差,造成妇女与家庭关系紧张、妇女被禁止参加生产运动等。主要表现为:第一,把妇女工作与家庭利益、家庭幸福对立起来。土改中过分强调男女平等,妇女参加社会政治活动,不适当地号召妇女“走出大门”,脱离家中生产生活,经常开会娱乐代替农民家庭日常生活。典型事例如下,范县五里侯正月十五组织妇女踩高跷两个多月,皆是婆婆在家看孩子、做饭侍候媳妇,媳妇不参加家庭生活只吃现成饭,引起婆媳矛盾,不利于家庭团结和发展生产。第二,在家庭民主以及妇女在家庭中政治经济地位问题上,主要进行了反虐待和反推穿工作。在反虐待问题上,一味强调斗争而忽视团结方针。片面认为妇女解放就是发动媳妇向婆婆斗争,造成婆媳关系紧张,削弱了反封建力量。在反推穿问题上,强迫家庭给妇女衣服和棉花等,加重家庭困难,使得家庭关系紧张,不利于生产。第三,在婚姻问题上,主要表现在妇女没有婚姻自主权。据统计,冀鲁豫边区从1947年下半年至1948年6月,计有妇女自杀案件且诉诸政府的有183件。^[10]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是因没有婚姻自主权、年龄大小悬殊、双方没有感情、夫妇不和而自杀。事实

证明,关于妇女特殊要求的解决,必须是有步骤地、分别地加以解决,不能操之过急,并且团结起来发展生产的方向不能被忽略。

为了调动妇女参加生产的积极性,解决阻碍冀鲁豫边区1948年冬季生产的障碍,冀鲁豫边区针对家庭内部的民主与和睦问题、婚姻自主问题提出以下具体措施:

第一,关于家庭民主与妇女在家庭中的政治、经济地位问题。冀鲁豫边区党委民运部指出:“要提倡家庭民主和睦、团结生产,提倡共同劳动共同享受。”^[3]如何建立民主和睦的家庭,首先要加大宣传,反对旧封建、旧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向封建思想作斗争,建立新的民主和睦的家庭关系。其次,从两方面进行教育,达到民主平等基础上的和睦团结,以利于生产,即在具体婆媳关系上规定:其一,媳妇方面。一方面,应承认婆婆是家庭主妇,生产的主持者和领导者,承认她有生产经验、治家经验,在生产领导上,要建立民主基础上的管理,媳妇是要接受指挥的;另一方面,婆婆是长者,对其要有态度,但对其封建思想,也要进行反对。其二,婆婆方面。婆婆应当肯定媳妇是家庭生产劳动发家致富的主要力量,要尊敬媳妇人格,爱护其劳动热情,在整个劳动中发扬民主,树立共同劳动共同享受观点,克服封建思想,纠正对媳妇单纯使用的观点。

第二,关于婚姻自主问题。在土改中,冀鲁豫边区关于婚姻自主问题处理不彻底,导致妇女自杀事件频发,这是不利于生产建设的。因此冀鲁豫边区提倡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同时强调在实现婚姻自主中,不能一概而论,必须分别对待:其一,对于未婚青年男女要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向他们宣传婚姻自主、反对包办婚姻的意义,说明这是关系人终身幸福的大事,使群众自动接受,这是积极建设方面。其二,对于已经结婚的家庭要采取和睦的方针,不能到处发动离婚,造成社会混乱,群众不满,影响生产;但对于家庭关系极度恶劣的,要在和睦的原则下,加以调解或批准离婚。其三,对于寡妇改嫁问题,要强调自愿的原则。冀鲁豫边区民运部强调,反对寡妇守节这种封建礼教对妇女的束缚压迫,阻止对寡妇改嫁的歧视和打击。其四,针对地主富农与贫雇农结婚的,对已经存在婚姻纠纷的情况,要调解、教育,如实在不能维持,可经过正式手续离婚。

第三,关于妇女参政问题。在昆吾一区,曾错误规定限期更换女村主任,结果导致村中男干部工作消极,村中政务混乱。因此,冀鲁豫边区强调,提倡妇女参政,参加各种社会活动,但这个过程需要在动

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过程中逐步实现,不能操之过急,避免妇女参政过程中受到打击,影响冬季生产工作和妇女解放的进程。^[3]1948年12月20日,《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妇女工作的决定》指出,“应在生产过程中,通过各种群众组织和会议,经常对全体农民进行男女平等的思想教育,批评封建思想和传统习俗”,^[8]使妇女慢慢参政。

三、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影响与作用

(一)为支援前线做出重要贡献

1948年秋,受战争和天灾的影响,秋季收成有所下降,为了度过1949年春荒,支援前线战争,冀鲁豫边区积极采取措施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且取得良好的效果。妇女参加冬季生产的主要内容是农业生产和副业生产。特别是在支援前线中,妇女曾很好地完成了后方生产任务,如耕地、纺花织布、缝衣做鞋等。但是因为妇女受到封建思想束缚、家庭婚姻等问题牵制,影响到生产情绪,不利于生产建设。因此冀鲁豫边区采取积极措施保护妇女权利,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在农业生产方面,妇女积极埋土造肥、选种,为1949年春耕做准备。在副业发展方面,妇女们采取因地制宜的方针,大力发展副业生产,以补充因农业生产不足而面临的粮食短缺问题。如董营共三百户人家,有二百户妇女编蒲包卖。

(二)妇女觉悟进一步提高

冀鲁豫边区在冬季生产中针对土地改革后妇女工作中的问题积极制定措施,使冀鲁豫边区妇女在生产中的地位得到提高,妇女走出家门,积极参加政治、经济、文化活动。1949年1月12日,冀鲁豫边区党委公布了中央建立全国民主妇联的通知。冀鲁豫边区选出13名非党的妇女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其成分包括了女工、女学生、女自由职业者以及保育院、医院、财政经济、军队各机关的女工作人员。^[11]由参加全国代表大会的妇女成分可知,冀鲁豫边区的妇女进一步解脱了封建束缚,经济地位获得提高,其政治和社会地位也得到进一步提升。

妇女组织系统进一步完善,确立了两级选举制度。冀鲁豫边区通过民主方式选举妇女代表参加全国妇女代表大会,具体步骤为:由各县召开有代表性的会议,建立县妇联,并选出出席行署级妇女代表大会的代表,由行署再选出出席全国和华北的妇女代表大会代表。同时冀鲁豫边区党委规定,建立县级、行署级、全国民主妇联,妇女组织层层递进,进一步解放与保护妇女权力和利益。

(三)提高了妇女的家庭和社会地位

妇女受封建传统观念束缚,其家庭和社会地位

中的利益几乎难以保障。冀鲁豫边区动员妇女参加1948年冬季生产,不仅提高了妇女在家庭中的地位,妇女的社会权利也进一步得到了保证。第一,一定程度上实现了家庭民主,保证了妇女在家庭中的话语权。卓高王庄于秀轩参加完妇女会,回家建议召开家庭会议,得到其丈夫认同,“咱是新家庭,家里也要实行民主,不管老的、少的、媳妇都发表自己的意见,大家想办法过好日子”^[12]。这证明妇女在家中有了话语权,逐步实现了家庭民主。其二,妇女在社会上的特殊权利得到了保证,一定程度上实现了男女平等。例如,妇女在教育培训上有了与男子平等竞争的机会。1948年12月2日,《冀鲁豫日报》发布的《冀鲁豫行政公署电讯训练班招生广告》与1949年1月5日发布的《冀鲁豫行政公署干部学校行政财政班继续招生》等都不再限制性别。

总之,在解放战争进入战略大反攻的大环境下,冀鲁豫边区以1948年冬季生产为契机,积极总结土改经验,通过一系列措施成功动员妇女参加生产以度春荒并支援前线战争,在动员过程中提高了妇女的政治、社会和家庭地位。但是受历史条件的限制,冀鲁豫边区的妇女工作中亦暴露出了一些问题。其一,冀鲁豫边区各级党委对妇女动员工作的自觉性不够,有时上紧下紧,有时又上松下松。其二,在结束土改动员妇女参加冬季生产时,冀鲁豫边区各级党委召开的会议较多,但实际深入工作不够,导致工作成绩不大。这些不足也是此后妇女工作的目标和任务,正如1949年冀鲁豫第一次党代会议上万丹如所提出:“今后必须结合大生产运动,深入发动妇女参加农业生产,并根据各地条件发展副业生产及手

工业生产,并有意识地注意逐渐解除妇女封建束缚(如强迫包办婚姻以及限制妇女参加社会活动自由的封建陋俗),以提高妇女生产积极性。”^[12]

参考文献:

- [1] 华北人民政府发出冬季生产指示[N]. 冀鲁豫日报,1948-11-26.
- [2] 行署颁发冬季生产工作指示[N]. 冀鲁豫日报,1948-12-30.
- [3] 冀鲁豫区土改以来妇女工作总结及今后在结束土改与整党中妇女工作方针草案[Z]. 河南省档案馆藏,档号:G0007-003-00226-004.
- [4]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导读[M]. 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
- [5] 清丰县委. 清丰加强领导克服妇运自流[N]. 冀鲁豫日报,1948-12-05.
- [6] 关于目前妇女工作的指示[Z]. 河南省档案馆藏,档号:G0007-003-00226-001.
- [7] 黄河水利委员会黄河志总编辑室. 黄河志·卷1·黄河大事记[M]. 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2017.
- [8] 中共中央关于目前解放区妇女工作的决定[Z]. 河南省档案馆藏,档号:G0007-003-00225-002.
- [9]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央档案馆. 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20册[M]. 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
- [10] 区党委关于妇女自杀案件的通报[Z]. 河南省档案馆藏,G007-003-00226-004 档案附件.
- [11] 河南省濮阳市妇女联合会. 冀鲁豫边区妇运史料选编(内部资料)[M]. 1985.
- [12] 徐克. 于秀轩的家庭会议[N]. 冀鲁豫日报,1948-12-0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The Mobilization of Women in Wartime

—Taking the Winter Production in 1948 in Ji-Lu-Yu Border Region as an Example

LIU Zhipeng, LI Yanli

(School of History and Culture, Shandong Normal University, Jinan, Shandong 250358, China)

Abstract: The winter production in the Ji-Lu-Yu border region in 1948 was a typical case of the CPC's mobilization of women during the war. The Ji-Lu-Yu border region proposed and implemented various effective measures to mobilize women to participate in winter production in the end of land reform, party consolidation and political building. It has produced a positive influence and effect in supporting front-line wars, improving women's political and economic status, and further freeing themselves from traditional shackles. At the same time, there were also shortcomings in the mobilization of women in the Ji-Lu-Yu border region, which affected women's enthusiasm to participate in production to a certain extent.

Key words: Ji-Lu-Yu Border Region; women's mobilization; winter production

多元与单一族群政策导向下社会治理刍议

——基于阿米什与阿伊努的典型性

高小岩¹, 薛长礼¹, 全美英²

(1. 北京化工大学 文法学院, 北京 100029; 2. 北京市工贸技师学院, 北京 100097)

摘要:美国阿米什人基于恪守信仰规约的原因,至今不用电与汽车等现代科技,形成与主流社会有别的独特文化。日本阿伊努人经历了从最早定居列岛的原住民到生存空间被蚕食的反抗者、同质化运动中被隐藏到发出本民族声音的历程。阿米什人与阿伊努人的例子体现了多元化与同质化的不同治理思维与政策脉络,导致亚社会群体迥异的发展轨迹。

关键词:阿米什人;阿伊努人;族群文化政策;社会治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1

中图分类号:D5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58-07

阿米什人(The Amish)基于自身信仰与教规的原因,不用电与汽车不仅在美国社会独一无二,在全世界上也难觅同例。阿伊努人(The Ainu)是北海道原住民,过去不被政府承认和国外所知,以至于日本一度被误认为单一民族国家。虽然相距万里,文化各异,但两个族群一如美日两国一样既价值趋近又特质迥然。

一、阿米什人:现代社会的隐逸者

阿米什人,宾夕法尼亚州荷兰语称 Amisch,德语称 Amische,可追溯到再洗礼派的基督会团契组织,是德裔瑞士移民后裔。按天主教教规,婴儿要接受洗礼,宗教改革后的再洗礼运动主张成人受洗。1525年,再洗礼运动者为纪念运动领导人门诺·西门,这一教派被称为门诺派。教徒行为如果与《新约》相违,告诫无效就剥夺其教徒权利,起初只限于脱离圣餐桌,后来神父雅各布·阿密(Jakob Amman)坚持在社会、经济和家庭关系等方面都要隔离。1694年,阿密及追随者从门诺派中分离,被称为阿米什人。阿米什人向北美移民正值18世纪法国大革命席卷欧洲时期,早期聚居在阿米什人的“母亲殖民地”宾夕法尼亚兰开斯特的西卡内斯托加和诺斯基尔,后向西迁徙,东起宾夕法尼亚,西到

印第安纳,其中俄亥俄州 55000 人,宾夕法尼亚州 47000 人,印第安纳州 37000 人,三个最大聚居区是宾夕法尼亚州兰开斯特县(Lancaster County, Pennsylvania)、俄亥俄州霍姆斯和韦恩县(Holmes and Wayne Counties, Ohio)、印第安纳州埃尔克哈特和拉格朗日县(Elkhart and LaGrange Counties, Indiana)。霍姆斯柏林镇(Berlin)的阿米什和门诺遗产中心(Amish & Mennonite Heritage Center)是了解阿米什文化的窗口。阿米什人反暴力,不服兵役,着装以黑灰白青为主,因为欧洲军服上缝有纽扣,阿米什人在衣服上不缝纽扣,只用襟袷连接两襟。男子上身穿白色或淡色无领衬衣,套西装外套或坎肩背心,下身穿背带长裤,头戴黑色有边礼帽,留修道士式齐耳短发,因为欧洲军人常蓄唇上髭须,阿米什男子婚前不蓄须,婚后蓄无髭须的络腮胡。妇女不化妆,穿连衣素裙,头发在脑后挽成发髻,上套白色双圆弧小软帽,用细带系于颌下,裙子长度在膝盖和脚踝间,无图案花色。少儿穿戴和成人一样,男孩穿衬衣、马甲、吊带裤,女孩穿联肩高领长筒裙和双圆弧帽。

三个世纪以来,阿米什教派一直是美国社会一部分。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对技术的不同态度导致了阿米什人内部分裂。1927年,赞成拥有汽

收稿日期:2021-02-17

作者简介:高小岩(1978—),男,甘肃兰州人,博士,北京化工大学文法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是公共管理和民族社会学。

车、电话的新派阿米什人(Beachy or New Order Amish)分离出去,老派阿米什人(Old Order Amish)抵制汽车、电话、交流电和电器等,这样才确保他们不被科技和物质控制,达到真正接近上帝。有人家里有自制发电机,因为觉得通过电力公司传输到家庭是对私人领域的侵犯。学者困惑于阿米什人的族群性问题,因为仅靠民族、种族、宗教、行为习惯等任何分类界定都难以自圆其说,但不妨碍阿米什人作为稳定共同体的存在。人们享受电力与科技的便捷,觉得这样的生活是不言而喻的,但是,阿米什人以内省力量来隔绝外界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对精神家园的侵蚀。

阿米什人对迫使他们改变的外部力量充满疑虑与抵触。他们反感被纳入国民义务体系,拒绝参加任何形式的商业保险,依靠农业及手工业等自然经济自给自足。阿米什人依法纳税,但他们和政府达成协议,不享受美国的老年福利金,不交税收中用于社会养老的社会安全基金。他们以传统方式颐养天年,极少出现老无所养的问题。阿米什社区紧密的人际纽带与虔诚信仰对生老病死的坦然,缓释了内心对老无可依的焦虑。他们也不接受义务教育等公共产品,按社区需要决定阿米什孩子的教育年限,时间短于美国最低教育年限,阿米什人希望孩子继承他们的价值观,害怕失去凝聚力的传统。1972年,3个阿米什家庭因为拒绝送15岁的孩子上学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美元,此后威斯康星州最高法院推翻初审判决,并得到联邦最高法院肯定,理由是宪法第一修正案的信教自由条款比义务教育有更高权威性。也有解读为美国宗教氛围浓厚,美国人对坚守信仰的阿米什人抱有敬意与理解。阿米什的成功在于,一是有强大的保护传统的内在力量,二是有能够容纳阿米什存在的外部环境。阿米什人认为八年教育已够用,受教育程度高会徒增烦恼,他们的老师仅是初中毕业生。这与国民教育理念相悖,为了弥合双方认知偏差的分歧,折中办法是阿米什孩子八年级后重复学习直到凑够年限毕业为止。阿米什父母不送孩子去附近的公立或私立学校,而在本社区给儿童提供教育。他们学校的特别处在于所有孩子不分年級的都在一个大教室里(One Classroom School)上课,使用德语方言之一,他们将说英语的人统称为English(英国佬)。如此一来,阿米什儿童迟早面临语言文化障碍,除非不和外界接触。阿米什人不培养孩子的竞争意识,与大家协同一致被认为是遵照上帝旨行事。

阿米什人农忙时节在谷仓周日聚礼,寒冬时则

在各家轮流,聚礼前把家具抬出去,在前厅摆上一排排长凳。除非卧病在床,否则必须参加聚礼。牧师进入后,依次是老中青年人。唱完德语歌谣再听布道。牧师布道时不允许记笔记。阿米什人做礼拜一是为增加自己被救赎的机会,二是巩固与社区的联系。阿米什人教区由共同礼拜的25到35个家庭组成,社区被保守的宗教秩序Ordnung(德文:秩序,条令)支配,规定应遵循的方方面面。每半年他们会审视Ordnung是否需要补充,确保生活没有偏离正确轨道。阿米什人认为,虽然人类有罪,但生活在“有纪律的信徒团体”中可以被救赎,称其为服从Gelassenheit(德文“信条”或顺服上帝),成员们从精神和世俗上将“顺从”与“不顺从”的人分离。他们坚持自己的精神信条,避免“世俗的危险”是阿米什社会的精神基点,也是阿米什社会存续的外部防线。阿米什社区依靠严格的宗教道德约束,带有理想主义的乌托邦色彩。社区边界既是有形的地理区分,也是无形的理念、行为建构的。阿米什人在社区内解决问题,万一社区不能解决,会寻求另一阿米什社区帮助。他们基本不用电话(即便有的家庭有电话,也装在离住房较远的地方),认为写信或预约上门是更礼貌得体的方式。阿米什人平常都坐马车,遇到相距太远的情况,也会乘汽车、火车或飞机。阿米什社会是“熟人社会”,生活区域高度重叠,影响了私人空间成长,个人言行在群体相互监督状态下。群体规范塑造出高度格式化的个人,带有美国社会少有的集体主义倾向,个人行为好坏的判断以是否符合Ordnung规范为准,他们采取称之为“Shunned(闪避)”惩罚不遵守规范的人,迫使举止不规范的人改变行为。阿米什人到十六岁叫作Rumspringa的时期,周末聚会接触同龄人,到外面看看,来决定留在当地还是出去。有青年去大学读书,还有女孩成为阿米什人最不能接受的模特。如果一个人不想过阿米什生活,他的至亲比如配偶子女或父母都会对他闪避,如果不悔改,闪避会持续终生。Rumspringa后无非去留两条路(To be The Amish or not to be)。阿米什人有圈子里的自制报纸,在共同价值观基础上分享感悟,建构出不同于美国主流社会的社区。

阿米什人住在自建的木质平房里,院子里有菜园,还有自制的天然气发电设备,车库里停的不是汽车而是马车。他们从事农业、种植业、畜牧业、手工业等,称自身为“地球之盐”(Salt of the earth),认为创世纪、圣经时代汗水耕作是最接近上帝的生活方式。他们打谷、贮备饲料、整修农舍,过程中家人、邻

里相互支援,熟悉生产技艺与交换经验。他们认为传统必须保留。阿米什人从小喂鸡、挤牛奶、饲养家畜、除草、制作农具,他们喜欢享受谷仓饲养的乐趣。他们耕种小麦、玉米、番薯等作物和各种蔬菜瓜果,生产蜂蜜、牛奶用以自用和出售,食用农场里生产的无农药天然食品。把多余农产品在就近市场上出售。由于他们不施化肥、杀虫剂、抗生素,其有机农产品受到消费者信赖。每年庆祝丰收时,女人们举办“拼布蜜蜂会”,一边闲聊一边用旧衣服和剩布缝制拼布被毯。阿米什人的家禽养殖场利用物理条件使空气流通,比电控温度的成本低。由于不用电机,劳动强度大,阿米什男子通常清晨五点起床做农活,女子也是五点起来准备早餐。一对夫妇有四五个甚至更多孩子,孩子自小参与劳动。阿米什人修建大型房屋时,邻里也会帮助。因为他们勤劳俭朴,因此能积累较多财富。肥胖在美国已成严重问题,得益于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规律作息,阿米什人很少有肥胖的。

阿米什人家庭陈设简单,家具多木质,床单、桌布及其他家纺品都是缝制,图案简单,色泽素雅,大餐桌供家人沟通与祷告。由于不用洗衣机与烘干机,手洗完衣服在外晾晒,这在美国很少见。阿米什人在选择性适应主流社会,特别是在工作和寻求经济来源方面。他们也开店出售土特产,有些店里也有读卡机。一些阿米什人拥有的企业依赖旅游业,另一些则为依赖旅游业的企业工作,但是旅游业并未威胁阿米什文化的核心要素。阿米什商店从煤油灯、自制棉麻鞋袜到钉马掌都有。他们手工做的拼花被毯和脸上无五官的布娃娃(寓意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已入围非物质文化遗产。店门口垂着沾苍蝇的棍子,兰卡斯特一个叫“Bird in hand”的阿米什市场里,有各种面酱、辣酱、蔬菜酱和果酱,装入密封瓶罐里,仅以标签区分。家庭作坊里生产各种酱腌菜、乳酪、面包等。阿米什食品包装简单无商标,仅有名称与生产日期,盈利并非唯一目的,只不过是处理多余物品的一种方式而已。阿米什人偏爱有糖蜜馅的shoo——fly pie“赶苍蝇派”,是用面粉、牛奶、鸡蛋、蜂蜜、白糖制成的圆形蛋糕,这种甜点糖分高,易招苍蝇,是家家会做的特色甜点。阿米什人友好内敛,言谈举止中散发一种从容气质,他们不追求以风俗为噱头获取利润,当有人拍照时,阿米什人会转过脸去,因为他们认为拍照或摄像会掳走人的灵魂。

二、阿伊努人:同质化中被隐身者

阿伊努人是日本土著民族,现多居住在北海道,

人口约24 000人,占北海道总人口的0.4%,关东地区约有5000人。然而,这些人中很少有人会讲阿伊努语,或保有传统生活方式。阿伊努人最早见于《日本书纪》。该书景行天皇二十七年(公元97年)二月条记载:武内宿祢从东国回来上奏,东夷之中有日高见国。其国之人男女椎结文身,为人强悍。皆曰虾夷。“日高见国”即本州东北,“虾夷”即阿伊努人。《新唐书·日本传》记载日本遣唐使提到“山外即毛人”,“毛人”就指阿伊努人。元、明时期将库页岛、北海道、千岛群岛及堪察加的东北亚诸族称为骨嵬、苦夷和库野,他们与黑龙江入海口的通古斯靺鞨诸族常接触,属骨嵬南支之一。阿伊努人比日本和人稍矮,男子1.6米左右,女子平均1.48米,肤色较深,面部棱角分明,眼眶高,眉毛粗黑,眼窝深,睫毛长,双眼皮,眼珠棕褐色,鼻根低,嘴大,毛发粗黑厚重弯曲。成年男子多连鬓胡须,个别还有棕红胡子,女子上唇有鬍状痕迹的文身。阿伊努人五官有混血感,小时候与和族人差不多,越老区别越大。A型血发生率高于B型。阿伊努人在弥生时代(公元3—4世纪)曾遍布日本。从7世纪后半期起,和族人鄙视并驱逐“自古未沾王化”的阿伊努人,将阿伊努人蔑称为“虾夷”,意为夷狄,有未开化野蛮人之意。奈良、平安时期大和朝廷的“征夷大将军”(せいいたいしょうぐ,1192—1868日本的实际统治者)就是为征讨虾夷人而设的高级军职,很多留存至今的绘卷刻画了虾夷与和人交战的场景。阿伊努人自13世纪开始在津轻海峡以兽皮、鲑鱼交换和人的稻米、刀具,一次争执中阿伊努人被和人杀死,阿伊努人遂围攻和人据点道南十二馆,1457年,客居花泽馆的武田信广(后继任家督,改姓蛎崎,后代获“虾夷奉行”,改苗字松前)射杀虾夷酋长考西亚马,此后,阿伊努人多次反击,1669年,阿伊努首领沙牟奢允(日语:シャクシャイン、阿伊努语:saksaynu或Samkusaynu,1606—1669)被暗杀,直到北海道为松前藩所征服。然而,对阿伊努人形成致命打击的并非明治拓殖前的武装冲突,而是其后的柔性同化。

在德川时代(1603—1867)后三分之二时间,松前藩将日本人和阿伊努人居住地分开。18世纪晚期,松前大名将阿伊努人聚居的东虾夷地分为78处,分赐给家臣,在明治维新前60多年间(1804—1868),松前藩辖内的阿伊努人减少近三分之一。明治维新(1868年)后,政府于1869年在虾夷地设置开拓使,将虾夷地更名为北海道,日本政府鼓励本州、九州、四国的日本人移居北海道,同化阿伊努人。1899年《北海道原住民保护法》做出了对阿伊努人

实行授产、救济、医疗、教育等方面的规定，阿伊努人丧失了独立发展的主体性与可能性，被迫告别渔猎生活和传统居住方式，被纳入政府设定的轨道中，阿伊努文化在打着国家名号的强势政府与和族占多数的主流社会的双重挤压下，濒临断代的危险，只能在夹缝下生长。明治政府推行从血缘与文化双轨并进的政策同化阿伊努人。在此过程中，和族人和阿伊努人通婚相当多，所以，今天的阿伊努人很少是“纯种”。在建构单一民族的政策框架下，加快同化步伐。要求阿伊努人剃去胡须，剪发洁发，将姓名改成日本名字，学习日语，穿和服与制服。借助各种途径手段，将阿伊努人从形貌、语言到生活习惯消融殆尽在主流文化中。阿伊努人的服饰、图腾与文身作为认同载体的文化元素日渐式微，以与和族人无差别的举措被推行，通过或刚或柔、或明或暗的手段，将一个民族的集体记忆彻底切断。之所以采取这样的政策，反映了日本社会比较单一的文化结构与日本人的某种思维定式。日本存在强烈的同化异质的社会环境，亦即长期单一民族神话所追求的效果，意味着任何人只要不同化于日本社会，便会遭到排斥和打压。

阿伊努人不被外界所熟知，与日本一直营造和构建单一民族国家的目标有很大关系，在这种取向导引和舆论氛围的环境里，阿米什人被认为是一个族群单位和社会组成部分，甚至于长久以来，连这种提法和概念都不被承认，只以某地域的特殊风俗人群被学术界看作文化遗存，或者被掌握话语权的国家机器任意解读，因为日本人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同质的、单一民族的社会。阿伊努由于没有政治地位，加上经济状况弱势，很难发出自己的声音，即便有微弱信息发出，也因为相悖于单一民族国家的政治神话而被选择性忽视。日本主流社会和阿伊努社区间的关系成为超过 100 年的研究课题，这一切都是在关于所谓日本人纯洁性的政治意识形态不断变化的背景下发生的。日本作为一个同质国家的观念深入人心，直到最近 20 年，这种观念才变得谨慎起来。人们惊讶地发现，从北海道到琉球，族群差异存在是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在跨越 20 个纬度，绵延 3000 公里跨度的岛屿链上，并不存在所谓的同质化因素。即便在日本本部岛屿间，差异也是不争的事实，毕竟明治后形成现代日本不到 200 年，历史上由绳文系到弥生系的转承也不是一以贯之的传承脉络，所谓单一民族的说法完全经不起从现实到历史的推敲。过去相当长一段时期，社会学家们或多或少认为，北海道阿伊努人是已经灭绝或即将灭绝的

族群。这种认知基于民族中心主义观点的建构，把阿伊努人描绘为原始落后的民族，把他们的生活方式冻结在一个模糊的过去，把他们的民族认同置于灭绝种族的背景中。这种对阿伊努民族及文化的误解在社会政治言论中一度曾是共识，多数人的概念和目标依然坚持日本是由一个同质群体组成。尽管这种状况给阿伊努人带来了许多苦难与障碍，但并没有阻止他们挑战和人（わじん/wajin 倭人）的等级秩序和身份固化，也没有阻止他们参加属于其文化传统的活动。阿伊努人的族群认同，建立在他们面对镜子里的自己，祖先留下的不同于和人的轮廓外貌，也建立在阿伊努人的语言、风俗习惯等文化符号。特别是置身北方寂静的星空下，呼吸阿寒湖的空气，听到口弦琴 MUKKURI 和歌谣，阿伊努人似乎听到祖先的召唤，提醒自己到底是谁。

后现代主义思潮伴随着后工业社会出现，促使人们在物质需求得到满足的情况下，思考“我们是谁”的元身份问题。在世界原住民与土著人人权事业勃兴的国际气候下，加上阿伊努民族意识复苏与权利意识觉醒，以及日本政府对以往族群政策的反省，迎来了阿伊努人历史上有里程碑意义的时刻，1997 年，日本政府通过了《阿伊努文化振兴法》，这是阿伊努人不懈努力争取得来的权利，标志着阿伊努人的文化传承迎来转机。这项决定的创新性法律推理植根于日本宪法和国际人权法，对阿伊努人和世界各地土著人民的未来都有深远影响。然而，政府不太愿意承认阿伊努的土著权利。这项法律制定十年后，联合国提出了《土著人民权利宣言》，这是一项不仅加强文化权利，而且加强土地和自决权利的宣言。尽管日本代表对《宣言》的评价大多是负面的，但对《宣言》投了赞成票，近年来的考古发现已经让社会舆论与共识实现巨大逆转，日本人不得不承认，比起和人，阿伊努人祖先更早踏上了列岛，可是，200 多年来，阿伊努人一直被殖民在祖先的土地上，并在所谓单一民族的日本社会中受歧视。于是，阿伊努人通过与世界各地的土著民族建立联系，参与了全球关于贫困问题的讨论。通过这些努力，阿伊努人引起了人们对他们的关注，尽管他们在日本历史记忆中一度被隐形。即便在各种强制政策与利诱措施挤压下，传统社会结构瓦解，被迫放弃传统生计方式，民族意识被虚无化，在漫长的同化过程中，政府事实上已经将阿伊努人改造成了颇标准的“日本国民”，在经过了双语共用的阶段后，阿伊努人几乎都以日语为母语了。然而，民族意识等深层次的东西并没有完全消失，阿伊努后代还是对祖先

和家乡的文化有血缘上的亲近感,一旦在强势的主流文化中发现还有星点本族文化的种子,久已沉睡的民族意识就被唤醒,长期被否定的集体人格爆发,受压抑的民族情绪被激活,说明同化政策并没有从潜意识层面扼杀阿伊努人的认同,企图消融一个数千年历史、有深沉文化自尊的民族的计划,还是难逃失败宿命。政府重新反思对阿伊努人的政策,与其费尽心思压制适得其反,还不如正视阿伊努人问题。2008年,日本国会首次承认阿伊努人是土著民族。为响应这项历史性决议,同年8月成立了未来阿伊努政策咨询委员会(ACFAP)。日本政府对阿伊努人的立场变化,从同化和否认,到承认土著人地位和土著权利,族群政策的改弦更张是迫于国际土著人运动的压力,还是对以往做法的反省忏悔,抑或为了在国内外塑造日本形象的考虑,前后反差之大,令人错愕,因为仅凭阿伊努人的抗争,并无足够力量对政府施政产生决定性影响,无论如何,这种行为至少比过去是不小的进步,有助于促进族群和解与社会进步。

三、多元化和同质化下的宿命

阿米什人与阿伊努人由于环境、背景与历史际遇不同,发展轨迹与生存状态大相径庭。阿米什人的生活方式和宗教风俗得到了保留,阿伊努人作为一个民族被接受的过程并不顺利。相对阿伊努人,阿米什人并不能称为真正意义上的民族,因为他们是300年前从瑞士迁来的德裔移民后裔,只不过因为信仰原因自成一派,无论对迁出国或迁入国都不是另一民族。作为脱胎于宗教联系、内部通婚和用德语非英语的德裔移民后代,阿米什人有对信仰和习俗而非民族的认同,但从政府对其养老税豁免、教育年限的妥协、内部自治的不干预以及适应他们生活的变通措施看,看不出和被官方承认族群所有的权益有何差别。阿伊努人则从历史起源、语言文化、风俗习惯到体质特征都和日本主体民族有不小区别,其实官方早已意识到他们是与和人并立的另一民族,但是却把他们当民族对待。在有文化趋同效应和价值取向的日本社会里被选择性忽略,被和人排挤到当时十分偏僻的北海道,明治维新后也未赋予其民族地位,使作为一个民族实体的阿伊努人从历史到近代,并未享受到自由发展自身的权利,直到前几年才略有改观。

造成阿米什人与阿伊努人截然不同的经历与状态,与所在国的文化背景与社会环境不无关系。美国幅员辽阔,人群间因为资源和土地的争夺比人均资源紧张的日本宽松得多。同时,移民来源国情使不同族裔处于相差不多的位置,有条件、有能力允许

各地人群自由发展。文化差异塑造了今天的美国。美国人很小就被告知是移民国家,移民是社会的力量,他们振兴了经济,促进了文化,促进了社会。众所周知,除了印第安人作为数千年前就在美洲生活的原住民外,大多数人在美国生活的历史不超过300年,因此各移民群体都处于相对平等的地位。阿米什人作为18世纪左右的瑞士移民,和17—19世纪的盎格鲁—撒克逊(Anglo-Saxon)人几乎同期抵美。由于美国地域辽阔,资源丰富,欧洲移民即便族属来源不一,相互争夺资源与生存空间的竞争并不激烈,为完整保留自身文化信仰和生活方式创造了条件。反观日本是一个面积不到美国1/20左右的岛国,火山、地震、台风、海啸等灾害频繁,人群自然而然形成了紧密联系,深信共同协作才能生存下去的信条,个性化文化特质很难产生,却极易形成单一民族的人文地理和心理基础。7世纪前后建立的大和王权与阿伊努人在本州东北相遇,因为争夺资源和土地冲突,和人将尚处渔猎社会的阿伊努部落向北驱赶,将“不服王化”的虾夷卷入和人的同化机制中。经过数世纪的大和虾夷战争,和人推进到阿伊努人聚居的虾夷地,1869年明治政府将虾夷地更改建置为北海道,拓殖中移入大量日本人,颁布《北海道旧土人保护法》,强迫阿伊努人说写日语、穿和服西服、与和人通婚,将阿伊努人从血缘到文化融入主体民族中,20世纪90年代到本世纪初,日本政府在国内外压力和对以往族群政策的反思中,意识到有必要承认阿伊努人,然而此时阿伊努人只剩下北海道白老町、平取町、阿寒湖等处的2万多人了,经过数代被改造,其余有阿伊努人血统的20万人已与和人无异了。

多元文化主义作为一种理论和实践,主张文化在塑造个体认同中的中心作用。多元文化主义者批评自由民主政策将个人仅视为原子化的公民,导致不平等和歧视。多元文化主义关注的是文化不公,它要求承认和容纳不同于主流思想和信仰体系的人。民主是要调和分歧,把来自不同社会文化背景的人融入一个共同整体中。美国政治哲学是建立在多元主义和自由民主博弈的动态平衡上的,它既承认多元文化的群体权益,也与自由民主所侧重的个人权益并行不悖。阿米什人无论是寻求与主流有别的集体诉求,还是个人选择什么样的生活方式,并不存在任何机制化的力量或压力迫使个人或群体改变行为准则。如霍布斯鲍姆(Eric Hobsbawm)所言国家“创造了民族”,日本基于非移民国家、单一民族国家建构与社会高频互动的特点,对外来文化或异

质成分包容度不高,对与多数不一致的文化有纠偏倾向与同化机制,意味着任何个体或亚群体需要淡化或摒弃其文化个性因素,才能参与到社会协作与资源分配上。传统价值追求整齐划一的集体主义倾向,因此有些阿伊努人即便知道不同,也被同质化压制而隐藏起来。由此经历数代同化,除了北海道不多的聚居社区,阿伊努人已习惯于作为标准国民生活。众所周知,母语在社会文化、认知和学习在身份认同中保持着突出地位,由于学校不教阿伊努语,只会说日语的阿伊努后代的民族意识淡薄,阿伊努文化被作为一种博物馆或文化村的观光性质存在,有将生活在北海道、介绍阿伊努文化的人称为“观光阿伊努”的不礼貌说法,为数不多的阿伊努协会在召集族人活动时,反应寥寥。

然而,多元化是否预设了某种价值评判体系,从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我们是谁:美国国家特性面临的挑战》的多元化对WASP(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冲击的担忧得到佐证。阿米什人虽然不讲英语、宗教规约区别于WASP在内的社会多数,但还是白人社会一员,政府让渡出部分权限,保证其生活方式受到尊重。但是有色人种虽然是多元化组成部分,却不能改变作为主流社会点缀的本质,形式上被承认不等于实质上被承认,因为评判权力始终掌握在握有话语权的人手中。比起日裔美国人与美国白人的先天差异而言,阿伊努人与白人即便不同,但没有多元化社会的肤色、种族之分,却也受到基于文化的主流价值观左右。因此,无论是多族群、多肤色的多元化社会,还是人种结构与文化相对单一的社会,并不影响掌握话语权与评判权的主流价值观形成,只不过包容度因为人文历史与社会空间各异有级差。从文化多元主义和文化同化模式中得出的结果表明,强调差异的同时,关注自我可以减少偏见,尽管相似性可以调节与那些被认为更不同的人的关系。阿米什人只被视为较小教派,由于美国社会基督教氛围浓厚,再洗礼派并未因教派差异而受干预,他们的信仰与生活方式得到笃信宗教的多数人的同情与理解。而日裔美国人则因为肤色文化差异,在特定情境中考验出是否被所在国看作自己人,二战中美国将数十万美籍日裔送进集中营证明这绝非多虑或臆测。在单一民族国家建构指针下,阿伊努人被日本人认为是有区别但并非不可改观的族群对待,社会上把阿伊努人当成未开化的野蛮人,有将族裔身份与社会角色、阶层固化和刻板印象联系的消极倾向,把阿伊努人、琉球人和当时殖民统治的台湾土著列为落后族群,

感到有改造后者的使命感,认为只有让阿伊努人剪掉大胡须,说日语,穿和服西装,摒弃渔猎生活才是正路,代替阿伊努人做选择,否定阿伊努文化的价值。施政方有悖于人本主义和文化平等的现代价值,导致阿伊努文化迷失的后果。从历史维度看,是令人遗憾与惋惜的,但在所在国社会的主流史观里则认为发展中不可避免的。

四、结语

美国多元化氛围给阿米什社区保有前现代风格生活的空间,即便再洗礼派教义与主流有别,但也是后者分支,其德语方言也是美国人数仅次于英裔的德裔移民的母语分支,因此阿米什人并未因不用电、汽车及教派不同受到不友善对待,阿米什社区始终按照自身步调运行,和两三百年前区别不大,成了今天难得一见的文化风景。

日本阿伊努人被驱赶到北海道,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指挥棒下,被强制和柔性同化,直到全球土著人运动兴起,日本才承认阿伊努人的民族地位,然而只有2万多阿伊努人还保有自身文化,20万有阿伊努血统的人已经对文化无感知了。历史证明,文化被卷入同质化经历各种侵蚀后很难复归本初,民族存在被隐瞒数代后,亡羊补牢式的挽救也不晚,但是对边缘化族群的境遇并无决定性改观。

平心而论,无论是阿米什人所在的美国,还是阿伊努人所在的日本,都属于最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经济总量分列全球首位与第三。然而,除了物质保障外,是否拥有自由选择的权力和事实上是否拥有自由是衡量人类发展水平的重要指标。无论基于肤色、文化或其他因素划分,政策制定方都有左右亚社会单元发展走向的能力,但是基于多元化与单一民族的氛围分野,导致对族群文化空间尺度有别,造成两民族状态迥然。多数人是否有替少数人做选择的合法性?比如符合我们的习惯与常态,就属正常,反之不一样的就反常,需要按照我们的设计而改变。人类是否在放大不同的过程中,忽视了共性,从阿米什人与阿伊努人双面镜,使人困惑多元化究竟是多元并存还是多元仅作为一元的装饰而存在,还是必然以强势吸纳弱势为唯一归宿,抑或是走入了思维瓶颈还不自知的窘境?对典型个案深入思考,有助于真正理解文化相对主义,从“他山之石”汲取经验教训,从而更理性地面对复杂的社会人文环境,探索出更务实、经得起检验的政策造福人类。

参考文献:

[1] 邵燕祥. 阿米什人:客居小礼[J]. 瞭望周刊, 1987(52):

- [2] Holliday A E. The Amish and Compulsory Education [J]. Pennsylvania Education, 1972(1).
- [3] 赵丽杰. 美国社会的隐士:阿米什人[J]. 世界文化, 2008(6):41.
- [4] 官昊. 阿米什人对当今电视文化的启示[J]. 中国广播电视学刊, 2008(5):55.
- [5] Newcomb T L. The Amish, A Bilingual - Multicultural Phenomenon. [J]. Amish, 1990, 6.
- [6] Quinlan P T. Solidarity Among the Amish [J]. American Journal of Economics and Sociology, 1947:6.
- [7] Savells J. Survival and Social Change among the Amish in Five Communities [J]. Journal of Family and Economic Issues, 1985(2):85 - 103.
- [8] 马晓毅. 阿米什人:“旧式”美国的活化石 [N]. 光明日报, 2011 - 08 - 23.
- [9] Cheung S C H. Ainu culture in transition [J]. Futures, 2003(9):951 - 959.
- [10] 张海萌. 阿伊努历史与传统文化探析 [J]. 黑龙江民族丛刊(双月刊), 2016(3):167.
- [11] 张小龙. “阿伊努印象”与近代西方视野中的日本人种族身份认知 [J]. 世界民族, 2016(2):94.
- [12] 川圭介. 阿伊努人的历史:文化特征 [J]. 世界民族, 1996(3):53.
- [13] Low M. Physical Anthropology in Japan [J]. Current Anthropology, 2012(S5):57 - 68.
- [14] Levin M. Essential Commodities and Racial Justice: Using Constitutional Protection of Japan's Indigenous Ainu People to Inform Understandings of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 [J]. Social Science Electronic Publishing, 2010.
- [15] Porter C. After the Ainu Shinpō: The United Nations and the Indigenous People of Japan [J]. New Voices a Journal for Emerging Scholars of Japanese Studies in Australia & New Zealand, 2008(3):415 - 430.
- [16] 初祥. 东北亚小民族现代化问题的研究 [J]. 西伯利亚研究, 1999(5):7.
- [17] Tanabe Y. The UN Declaration Of The Rights Of Indigenous Peoples And The Ainu Of Japan: Development And Challenges [J]. Indigenous Policy Journal, 2014(1):141 - 162.
- [18] Mcgrogan D. A Shift in Japan's Stance on Indigenous Rights, and Its Implications [J]. International Journal on Minority & Group Rights, 2010(2):355 - 373.
- [19] Glazer N, Hing B O. To be an American: Cultural Pluralism and Rhetoric of Assimilation [J]. International Migration Review, 1999(4):1076.
- [20] Carpenter S, Zúrate M A, Garza A A. Cultural Pluralism and Prejudice Reduction. [J]. Cultural Diversity and Ethnic Minority Psychology, 2007(2):83 - 93.
- [21] White. A Survey of the Amish Movement [J]. Social Forces, 1999(2):840.

(责任编辑 谢春红)

Social Governance under the Guidance of Pluralistic and Single Ethnic Policy

——Based on the Typicality of Amish and Ainu

GAO Xiaoyan¹, XUE Changli¹, QUAN Meiyong²

(1. School of Humanities and Law, 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 Beijing 100029, China;

2. Beijing Industry and Trade Technician College,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 The Amish in the United States, due to their adherence to the rules of faith, do not use modern technologies such as electricity and cars, forming a unique culture different from the mainstream society. The Ainu in Japan experienced the process from the aborigines who first settled in the archipelago to the rebels whose living space was eroded, from being hidden in the homogenization movement to making their own voice. Amish people and Ainu people reflect how different governance thinking and policy context of diversification and homogenization lead to different development trajectories of sub social groups.

Key words: The Amish; The Ainu; ethnic culture policy; value orientation; social governance

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困境与提升路径研究

张林贺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本研究在分析主流媒体面临的塔西佗陷阱、与年轻读者兴奋点错位、网络重要议题发源地旁落、伪正能量毒化误导舆论、群体极化加高圈层壁垒、西方意识形态渗透和攻击加剧等挑战的同时,提出了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不断致力于高质量内容生产,用权威、真实、客观、理性、感人的内容说服、打动受众(用户),通过让用户高度认可,来提升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的新举措。

关键词: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影响力;困境与挑战;提升路径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2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65-06

一、打造新型主流媒体的根本目的是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

2021年2月3日,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CNNIC)发布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12月,我国网民规模达9.89亿,互联网普及率达70.4%,中国手机网民规模达到9.86亿,手机上网比例达到99.7%。^[1]

随着中国移动互联网的高速发展与快速普及,移动端传播的灵活性、便捷性大大满足了当前传播环境下用户的随时化、碎片化、便捷化信息获取需求,中国互联网新闻资讯的覆盖人数也大幅增长。CNNIC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12月,全国互联网新闻用户达7.43亿,占网民整体的75.1%。手机网络新闻用户规模达7.41亿,占手机网民的75.2%,^[1]成为网络新闻用户的绝对主力。

以中青年群体为主的多元网民,构成了庞大的数字社会。其中,30—39岁网民占比最高,为20.5%,20—29岁网民占比17.8%,40—49岁网民占比18.8%。近年来,学生族和50岁以上的银发族纷纷加入互联网,网民占比连年提升。在网民学历结构上,初中文化程度最高,占比40.3%,其次是

高中、小学以下、大学专科,分别占比20.6%、19.3%和10.5%,大学本科及以上占比9.3%。在网民职业结构中,学生、自由职业者、农村外出务工人员、专业技术人员、公司员工等成为网民主力军。可以说,谁占据了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谁就赢得了最大的传播渠道和提升自身影响力的主动权。

从2014年到2019年,6年时间,习近平总书记两次正式提到建设“新型主流媒体”,并为新型主流媒体确定了准确的概念、内涵、外延和实施路径。所谓新型主流媒体,是与传统主流媒体相比较而言的,它依托新型传播平台,特征是具有强大影响力、竞争力;目的是在众声喧哗中发布权威信息,扩大主流价值影响力版图,让党的声音传得更开、传得更广、传得更深入,用主流价值观说服和影响主流人群和广大受众,整合非主流受众;实施路径是内容建设为根本,先进技术为支撑,创新管理为保证。

新型主流媒体的“主流”地位具体体现在两个方面:内容标准和传播力、影响力标准。所谓内容标准,是指在互联网时代,主流媒体依然需要及时报道权威真实信息、承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主流价值

收稿日期:2021-01-20

基金项目: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新媒体环境下新型主流媒体‘四力’重塑研究”(2019BXW009);河南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基金项目“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与影响力建设研究”(2020-ZZJH-470)

作者简介:张林贺(1970—),男,河南许昌人,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访问学者,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教授,郑州晚报资深编辑、高级摄影师,研究方向:新闻传播学。

观,忠实履行党的新闻舆论工作职责和使命;而在传播力、影响力标准方面,要求新型主流媒体必须要具备互联网尤其移动互联网环境下的强大传播力、能够影响到足够广泛的主流人群。这是构建新型主流媒体的关键所在,是新时期提高主流媒体舆论引导力的当务之急。

二、传播力和影响力互动与制约关系辨析

1. 传播力:新闻舆论有效抵达受众的能力

所谓媒体的传播力,即媒体的信息生产和扩散能力,通俗来讲,就是新闻舆论能够抵达受众的能力,具体体现在传播渠道要多元畅通、传播内容能覆盖尽可能多的目标受众,并实现有效传播。所谓有效传播,即媒体传递给受众的信息不能被无视,否则,传播就没有力量,也就难以代表舆论、形成舆论和引导舆论。所以,新闻媒体要能够生产公众感兴趣的信息,并形成有效的传播,才称得上具有传播力。

换言之,传播力体现在受众对媒体产品的接触程度,其中主要包含接触广度和频率、接触深度和时间两组指标。美国南加州大学安纳伯格传播学院院长、英国剑桥大学社会学系研究主任曼纽尔·卡斯特在其著作《传播力》一书中认为:“传播空间的权力来自多元主体所提供的信息,以及这些主体间的互动,信息来源越广、互动的频率越快、传播作为社会变化的动力就越强。”^[2]

关于主流媒体传播力的测量体系,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观点,但立足传播效果进行测评是比较普遍的共识。比如,清华大学新闻传播学院沈阳教授的研究团队从微信传播特性出发,建立了“微信传播指数(WCI)”指标体系,通过8个指标进行测量,包括总阅读数、平均阅读数、总点赞数、发布文章数、最高阅读数、最高点赞数、平均点赞数、点赞率。^[3]

人民网研究院研究构建的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指标体系,则通过抓取全国三级党报纸报、网站、微博、微信、自有新闻客户端、入驻聚合客户端、入驻抖音平台、入驻喜马拉雅FM的相关数据对党报的综合传播力进行年度评测。^[4]

2. 影响力形成的根本:事实与道理、情怀与温度、品质与人文

至于新闻舆论的影响力,即一家媒体及其生产的新闻或观点影响到的人越多,越具有影响力。新闻舆论影响力要通过新闻舆论传播力来发挥效用。这里所说的主流媒体的影响力,主要是正面影响力。

在各种观点都在奋力争夺读者和受众的新的传播环境下,主流媒体更应该通过摆事实来开化人,通过讲道理来征服人,通过真情感来打动人,通过真善

美来温暖人,通过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有人文关怀的内容和传播来影响人,通过求同化异,使公众认同媒体观点,改变已有观点,这是影响力提升的根本。

3. 传播力是影响力形成的基础

主流媒体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的形成,都有赖于自身的传播力。因此,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建设的基本任务就是做好党和政府与人民之间声音传播的桥梁,根本目的则是进一步提升自身的影响力和新闻舆论引导能力,最终取得良好社会效益和舆论引导效果。基于传播效果和传播力、引导力和影响力并驾齐驱,能够实现有效引导的新闻舆论,必然同时能从正向影响公众。而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最终都要立足于公信力。^[5]

三、中国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的融合转型路径梳理

1. 党媒背景下的内容为王、渠道为要、技术支撑和经营管理体系的互联网化

中国主流媒体从最初的报业集团化、传播矩阵化,电视广播频道专业化、娱乐化,到后来各自不断适应网络传播新特点,充分依靠新技术手段,建成一体化采编中心“中央厨房”等转型标配,不断改变内容生产、呈现、表达与传播方式,加强网络互动,重视网络舆论引导,注重全渠道占领,先后入驻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音短视频、喜马拉雅等平台,建成自己的移动传播平台新闻客户端APP,全力打造全媒体传播矩阵,形成了强大的传播合力。比如,《人民日报》、央视新闻和新华社三大央媒已在微信、微博等新媒体传播平台上形成了强大的市场辐射力。而上海报业集团旗下主打时政新闻与思想分析的“澎湃新闻”则成为网络原生新型主流媒体的典型代表,在内容生产、技术创新、吸引用户和商业盈利等方面均有不俗表现。各大党媒背景的主流媒体纷纷依托互联网,在内容、平台、渠道、人才、经营、管理等方面不断创新,新闻传播渠道呈现出鲜明的移动化、多元化、平台化特色。

2. 传统主流媒体依托自身特点,探索出不同的融合转型模式

各大主流媒体依托自身特点进行适应变革,走出了不同的融合转型模式。比如,人民日报的“中央厨房”一体化编辑部模式,上海报业集团的体制性整体挺进互联网融合发展模式与浙江报业集团的传媒控制资本、资本壮大传媒的融合转型模式等,受到业界瞩目。此外,北京日报报业集团依托“长安街知事”等品牌新媒体带动转型的模式,以及湖南日报报业集团“三湘华声全媒体”、江西日报社“赣

“鄱云”平台等转型模式也颇具特色。而大众日报报业集团、河南日报报业集团、重庆日报报业集团等也在“中央厨房”统领下,发力内容和原创,不断提升自身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将互联网这个最大的变量转化为新闻事业发展的最大增量。

3. 走好全媒体时代的群众路线成为深度融合的共识

2020年9月,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为主流媒体进一步融合发展指明了方向。除了要求主流媒体融合要加快向纵深发展外,《意见》指出,要走好全媒体时代群众路线,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工作导向,坚持贴近群众、服务群众,强化媒体与受众的连接,以开放平台吸引广大用户参与信息生产传播,生产群众更喜爱的内容,建构群众离不开的渠道。^[6]多家主流媒体通过及时追踪时事热点并依据用户喜好,持续打造特色栏目,构建传播矩阵,将自身网站和手机应用打造成输出资讯和观点的重要渠道,发力视频账号,打造热门栏目,并在B站、抖音、微博等视频网站、社交媒体平台上第一时间进行推送,收效良好。

四、主流媒体进一步提升传播力影响力面临的挑战

1. 个别主流媒体存在塔西佗陷阱风险,舆论引导难度增加

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所作的重要讲话中就谈到了塔西佗,他明确指出:“古罗马历史学家塔西佗提出了一个理论,说当公权力失去公信力时,无论发表什么言论,无论做什么事,社会都会给以负面评价。这就是‘塔西佗陷阱’。”他接着说,“我们当然没有走到这一步,但存在的问题也不谓不严重,必须下大气力加以解决。^[7]”个别地方政府在应对重大突发事件时,表现失范,或者因为种种原因失声不语,甚至提供不实信息,不仅严重损害自身的公信力,而且导致刊登这些不实信息的主流媒体也陷入失信的境地。比如,2020年1月初武汉市卫健委代表市政府发布的不明病毒“人不传人”的信息,被钟南山院士否定。武汉卫健委和报道其信息的当地主流媒体被网民严重质疑,公信力受损,就是惨痛的教训。

与此同时,当前社会多元利益群体并存、不同阶层心理隔阂加剧,一些民生事件、阶层特权、贪污腐化、贫富分化、执法不公等问题侵蚀群众利益,也加剧了公众与政府、不同圈层之间的信任危机,极易形成舆论热点,增加舆论引导难度。

2. “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依然是主流媒体面临的结构性难题

早在2013年,习近平总书记就敏锐地指出,很多人特别是年轻人基本不看主流媒体,必须正视这个事实,主流媒体需要解决好本领恐慌问题。^[8]近年来,尽管主流媒体做出了许多占领年轻人头脑的新尝试,加强了技术迭代与渠道占领,也纷纷开发了自己的互联网传播平台,比如新闻客户端,但这类新闻客户端在年轻人中下载率并不高。传统媒体与年轻人的“最后一公里”依然打通困难。比如,河南日报报业集团倾力打造的“顶端新闻”客户端,华为应用市场下载量为47万次,在课题组随机抽取的300名来自河南各地的年龄在18—24周岁的大学生中,下载比例不足百分之一,这与第一人口大省巨大的人口基数不匹配。而在一些聚合平台,被“置顶”的主流媒体发布的内容信息,年轻群体的点击率并不高。

分析发现,在年轻用户居多的自媒体场域,信息传播和接受模式呈现出明显的去中心化特征,碎片化、微观化、形象化、娱乐化的叙事方式广受欢迎。主流意识形态本身就具有一定的抽象性和全局性,多年来承担主流意识形态传播重任的传统主流媒体在信息传播和叙事方式上存在诸多程式化和符号化特征,在受众心目中留下较为生硬的刻板印象。而且主流媒体最为擅长的思想深度、崇高与庄严、意义和价值、宏观叙事、理性化、系统化、结构化等主流意识形态传播与呈现方式,与年轻人热衷的非主流、亚文化之间存在二元分离,与互联网文化基因存在较大错位。而全球化带来的外来文化冲击,消费主义和追求物质等因素的综合加持,在自媒体“集市”,大众尤其是年轻群体难免对主流意识形态敬而远之。

3. 主流媒体难以成为网络重要议题发源地,制约自身传播力和影响力提升

舆论是特定时空里公众对于特定社会公共事务公开表达的基本一致的意见和态度。^[9]而能否引发舆论、代表舆论进而引导舆论是媒体增强传播力和影响力的关键。当前热点舆论的原材料大多出自自媒体。舆论的形成虽然有很强的偶然性,但一个事件能够快速成为舆论热点,也有其必然性。在平时的报道中,对于容易引发公众舆论的社会问题报道,主流媒体往往动力不足,或者顾虑较多。正面报道按部就班,冲击力和趣味性不足,很难形成话题性的调查和发酵力量。而自媒体往往靠一个偶发话题就能掀起舆论热潮。比如最近网络上的热点话题毕节“草包书记”被质疑、济源“耳光书记”被免职,四川高校教授跳楼自杀,大连街道办副主任搞特权进小

区让书记说情等重要舆情话题事件都是如此。

如果形成舆论的新闻原材料和热点话题基本来自主流媒体以外的其他媒体,那么这样的媒体或者自媒体就会轻易成为影响舆论的重要平台。当受众的注意力大都被自媒体吸引,主流媒体的线上线下传播力和影响力必然会大打折扣。

4. 伪正能量失去底线拉仇恨,收割网络流量,成为舆论引导障碍

“正能量”指的是一种健康乐观、积极向上的动力和情感,是社会生活中积极向上的行为。当下,中国的正能量是指所有积极的、健康的、催人奋进的、给人力量的、充满希望的人和事,并贴上“正能量”标签。^[10]但当前的互联网传播环境中,却不同程度充斥着脱离人民、误导舆论的所谓“低级红”“高级黑”等“伪正能量”,毒化舆论空间,连带主流媒体。

所谓“低级红”就是有意或无意把党的信念和政治主张简单化、庸俗化。“低级红”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站在个人立场上,认为自己的言行就是“替党说话”,不顾及群众的反应,用无知或极端的态度来表达自己的“正义性”。另一种则是有意识地夸大事实,靠无原则的吹捧引发人们的反感情绪。^[11]“低级红”缺乏对基本事实的尊重,不惜通过别有用心议题设置制造谣言、颠倒黑白,有意曲解党的理想信念和主张,通过编造“正能量”的谣言和所谓的“爱国事件”,来消费爱国,影响网民,造成严重后果。

“高级黑”则更善于对国家的路线、方针、政策进行极端化解读,脱离实际,鼓吹时则极尽夸大和美化,反对时则乱扣帽子,制造仇恨,企图蒙蔽人民,洗脑民众。他们秉持二元思维,认为唱赞歌就是支持体制,有不同见解就是反对体制。个别网络大V失去人格操守,为了赚钱,不惜挑唆矛盾,哗众取宠,制造事端,甚至会违心地传播和自己真实立场完全相反的观点,只不过他们以前是假扮公知“忧国忧民”,赚国家的钱,如今却高呼爱国,割爱国的流量,鼓自己的腰包。这种话语环境极易给网民造成所谓“正能量”就是唱赞歌、说假话、背后一套当面一套的感觉。新型主流媒体要传递理性的主流声音,传播理性正确的价值观,就应该正确面对“伪正能量”,矫枉过正,深入人心。

5. “后真相”时代,群体极化效应为主流价值观传播带来困难

“后真相”时代,“弱事实、强情绪”成为网络传播的新特征,个人情绪和理念不断影响网民意见,网络社会心态的非理性倾向鲜明。在当前网络传播环境下,无论是百度、淘宝、微信、微博、今日头条、抖

音、快手等,网络平台无处不在的推荐算法在通过判断用户的喜好,推送偏好信息的同时,也几乎掌控了用户的信息源泉。加之一些网络议题中充斥的反智悖论、群体极化,甚至人身攻击,也加剧了网民的信任焦虑,呈现出反传统、反权威、情绪化特征,使得用户认为自己喜欢的观点就是中国大多数人的观点,从而难以接受并无视不同的信息和意见。长此以往,网民也将失去接受不同观点的能力。不同圈层在推荐算法的加持下,正不断加深彼此的偏见,甚至难以相互容忍。

网络传播中的“信息茧房效应”“回音室效应”(人们倾向与接受与自己类似的观点,忽略相反的观点)、“巴尔干效应”(网民因为利益等因素分裂成不同圈层),以及社会化媒体公共议题感性化、情绪化的传播特征,使得网络平台群体极化现象也因群体共情而产生。个人情绪会因为不同的信息闭环而不断循环放大,因此衍生的犬儒主义生存态度,都为主流媒体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价值观有效传播,提升影响力和公信力带来新的挑战。

6. 西方意识形态攻击和渗透无处不在,为主流媒体提升传播力和影响力带来新挑战

当前意识形态领域面临着国外国内的双重考验,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控制着世界的政治和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我国意识形态渗透升级;国内思想交融交锋频繁,各种思潮甚至反动言论借助互联网愈演愈烈,传统媒体在自媒体领域中话语权势减弱。战狼论、崩溃论、追责论、标签化、妖魔化等各种思潮,造成社会撕裂。面对西方意识形态攻击,主流媒体尚未找到有效对抗和反渗透西方意识形态的有力措施。

7. 主流媒体融合的初衷和路径依然是以传播者为中心,而非用户为中心

网络社会崛起的一个重要表征,平台型互联网公司正在取代传统大众媒体,成为新闻信息分发的重要枢纽节点。^[12]各大主流媒体作为供给侧,在数字平台构建与采编流程再造的过程中,确实实现了新闻资源的整合,但采编机制的重组并没有明显增强内容与用户的连接。尽管生产环节耗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和财力,但生产的能够有效抵达用户的优质内容并不多,内容生产与公众有效接收之间出现了断层。一些主流媒体比照人民日报建成的一体化编辑部难以常态化运行,“中央厨房”很少“开火做饭”,缺乏现象级作品,内容为王生产乏力。中央厨房仍是以传播者为中心,而非用户为中心。^[13]个别主流媒体建成的中央厨房甚至沦为景观工程和要钱工程。^[14]

各大新型主流媒体在技术层面、传播方式、渠道占领方面较之传统媒体很容易升级换代,硬件建设也能够做到日新月异,但内容层面的采集力、供给力、阐释力和批判力的提升,话语方式和叙事风格的转型却面临结构性挑战。一些主流媒体缺少受众细分意识,也就不能常态化分析不同用户的需求和痛点,为不同用户提供个性化服务。近年来,传统主流媒体也在自建平台方面做过不少尝试(比如网站和新闻客户端),但其建立的平台不仅兼容性不足、开放性不够,而且用户门槛过高,难以满足用户需求甚至抑制了用户的参与热情,陷入自导自演、自说自话的尴尬境地。

五、在网络上赢得民心是新型主流媒体网络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提升的根本

移动互联网时代,网络传播的海量性、随身性、超时空性、多功能性、无限扩散性、互动性、回溯性等巨大优势,是有目共睹的。新型主流媒体对互联网的运用,只有开端没有终点。网络是公共的,在去中心化的时代,每一个人都有利用网络进行内容传播的权力,从这个意义上讲,主流媒体处于与其他媒体、自媒体相同的竞争位置,谁的内容用户喜欢,谁就有可能赢得用户。从这个意义上讲,通过行政干预和强行说教来争取用户已经行不通。

近年来,随着媒体深度融合的不断加深,主流媒体通过优先发展客户端和新媒体矩阵,通过在各个平台和渠道发布内容,已经完全能够做到传播渠道的畅通,接下来,竞争的关键就要看主流媒体在网上传播的内容是否受到网民欢迎。只有网民爱看的内容,才能够赢得访问量和点击率,才能够进一步影响网民。因此,持续生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优质内容,成为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力建设的核心。

事实上,在众声喧哗、“泡沫”泛滥的互联网空间,优质的新闻内容是稀缺的。坐拥信源、采访许可、专业和人才优势的主流媒体,完全有能力在互联网空间占据主动优势,关键看这种能力如何发挥。说到底,新型主流媒体网络传播能力和影响力提升的根本,就是要具备生产和传播网民欢迎的内容的能力。生产的内容网民认账,也就具备了在网络上赢得民心的能力。

六、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是赢得传播力和影响力的不竭源泉

1. 以人民为中心的新闻理念,与党的以人民为中心的执政理念同根同源

主流媒体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就是要坚持以人民为新闻报道的主体和服务对象,满怀深情地讴歌人民群众的伟大创造,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

追求,充分报道人民群众的意见、愿望、要求和呼声,能够深入到人民群众中,想人民之所想,急人民之所急,增强服务意识,提高服务质量,用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和语言,努力创作出有思想、有温度、有品质的作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新闻信息需求。坚持党性和人民性相统一,宣传党的主张要有群众视角,反映人民呼声要有全局视野,把宣传党的主张和反映人民呼声有机结合起来。^[15]

主流媒体强化并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就是要与人民群众感同身受、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能够敬畏群众,真切回应民众关切,对问题不回避、不失声,敢于说实话、讲实情、道真言,切实守护公平正义,要“民有所呼我有所应”而不是“民有百呼我无一应”,因为“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他们能够在网络中分辨出真话、假话和不同立场。谁替人民讲真话,谁就是知己,谁就可以信任;谁欲盖弥彰讲假话,就有不可告人目的,自然就不可信任。

2.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核心就是人民性和实事求是

马克思主义新闻观的精华是:坚持新闻起源的唯物主义新闻观,坚持事实是新闻的本源,新闻报道必须准确、客观、及时地描述事实;坚持新闻事业的意识形态性,即把新闻事业作为党和人民的喉舌,坚持新闻规律,使党性和人民性高度统一和一致;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坚持正面宣传为主,坚持新闻真实;把新闻报道与社会责任有机地统一起来,使新闻报道、宣传充分体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创新媒体深度融合,构建具有鲜明时代特色的科学实用的传播体系,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16]

坚持事实是新闻的本源,就是要让人民准确把握客观世界的最新变化,而不是为了少部分人的利益刻意隐瞒什么。坚持新闻规律就是在新闻选择上去选择那些尊重新闻价值规律,真正选择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新闻。正面宣传为主,就是选择那些能够激发人民上进,带给人民希望,贴近人民生活,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精神需要的报道,而不是那些假大空、抽象晦涩、歌功颂德,或者让人颓废的内容,主流媒体不能沦为一些干部夸大政绩提升官职的敲门砖。而承担新闻报道的社会责任,则要求新闻报道作为社会瞭望者角色,既能发现社会的美好,还能发现社会存在的浅滩暗礁,警示社会及时规避。而主流媒体宣传的24字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富强、民主、文明、和谐”,就是人民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建设目标的渴望,“自由、平等、公正、法治”,是人民对社会生活的美好追求,“爱国、敬业、

诚信、友善”，是全体人民和谐相处实现美好生活的
基本个人道德。无论国家、社会层面，还是个人层
面，无不体现出以人为本的鲜明的人民性。

七、结语

移动互联网时代，新型主流媒体传播力和影响
力的进一步提升，关系到我国社会主义主流意识形
态的有效传播与行稳致远，关系党执政赢得民心永
葆初心，关系到全国人民围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凝心聚力，也关系到主流媒体自身的生存和发展。
充分认识并面对新的传播环境带来的各种挑战，进
一步强化以人民为中心、以用户为中心的新闻理念，
以互联网思维热忱满足公众的各项需求，顺应民心、
反映民意，不断改进新闻内容生产、呈现和传播方
式，从而让人民真正认可、让受众喜闻乐见、让用户
主动买账，这应该是新时期新型主流媒体提升传播
力和影响力，并实现自身良性发展的有效进路。

参考文献：

[1]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EB/OL].
(2020-12-30). [http://www.cac.gov.cn/2021-02/03/
c_1613923423079314.htm](http://www.cac.gov.cn/2021-02/03/c_1613923423079314.htm).

[2][美]曼纽尔·卡斯特(Manule Castells)传播力[M].北
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

[3]清华大学新闻研究中心.2014 政务新媒体传播力报告
[EB/OL].(2020-12-30). [http://city.qq.com/a/
20141126/117181.htm](http://city.qq.com/a/20141126/117181.htm).

[4]人民网研究院 2020 全国党报融合传播指数报告[EB/
OL].(2020-12-30). [http://yjy.people.com.cn/n1/
2020/1228/c244560-31981230.html](http://yjy.people.com.cn/n1/2020/1228/c244560-31981230.html).

[5]丁柏铨.论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
[J].新闻爱好者,2018(1):4-8.

[6]关于加快推进媒体深度融合发展的意见[EB/OL].
(2020-12-30). [http://www.gov.cn/zhengce/2020-
09/26/content_5547310.htm](http://www.gov.cn/zhengce/2020-09/26/content_5547310.htm).

[7]习近平在兰考县委常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EB/OL].
(2020-12-30). [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
2015-09/08/c_128206459.htm](http://www.xinhuanet.com/politics/2015-09/08/c_128206459.htm).

[8]倪光辉.习近平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强调/胸怀大
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刘
云山出席会议并讲话[N].人民日报,2013-08-21(1).

[9]李良荣.新闻学概论[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8:
77.

[10]百度百科[EB/OL].(2020-12-30). [https://baike.
baidu.com/item/%E6%AD%A3%E8%83%BD%E9%
87%8F/79859?fr=aladdin](https://baike.baidu.com/item/%E6%AD%A3%E8%83%BD%E9%87%8F/79859?fr=aladdin).

[11]桑林峰.严防“低级红”“高级黑”[J].党建,2019(4):40.

[12]张韵.网络中立:平台型媒体的传播公共性[J].学术
界,2018(8):168-177.

[13]陈国权.中国媒体“中央厨房”发展报告[J].新闻记者,
2018(1):50-62.

[14]传播君.人民日报“中央厨房”何以爆款频出?来听幕
后“大厨”怎么说[EB/OL].(2020-12-30).网络传播
杂志,2018-06-25.

[15]习近平新闻思想讲义[M].北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
版社,2018:3.

[16]高晓虹.实践中的马克思主义新闻观[M].北京:高等
教育出版社,201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tudy on Dilemma and Improvement Path of the Impact of the New Mainstream Media

ZHANG Linhe

(School of Media,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is article analyzes myriad challenges like the Tacitus traps faced by mainstream media, the dislo-
cation of excitement among young readers, the birthplace of trending online topics, the pseudo-positive energy
poisoning and misleading public opinion, the increase of group polarization, the penetration of Western ideology
and the intensification of attacks, etc. At the same time, it proposes new measures, including adhering to the peo-
ple-centered, continuous commitment to high-quality content production, convincing and impressing the audi-
ence (or users) with authoritative, truthful, objective, rational and touching content, and promoting the influence
of new mainstream by enhancing user's recognition.

Key words: new mainstream media; communication influence; dilemmas and challenges; lift path

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现实困境与提升路径

陈文泰,赵慧晴

(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河南开封475001)

摘要:政务新媒体作为依托新型信息技术实现在线治理与民心相通的支撑平台和互动工具,承载着权威发声、回应关切、政务公开等主要功能。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公众参与面临角色定位不清、回应机制羸弱、治理监管缺位等现实困境。通过主动议程设置、转变传播语态、协同传播矩阵、强化风险预警等方式能进一步提升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与公众参与意愿。

关键词:重大突发事件;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新冠肺炎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3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71-05

政务新媒体作为政府机构和部门在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利用新兴媒体平台向社会公众提供信息公开、政务互动、实时管理和服务的一种电子政务手段,已经成为新闻舆论实践中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承载着权威发声、回应关切、政务公开等主要功能。2019年12月,由湖北省武汉市爆发并随之肆虐全国的新冠肺炎(COVID-19)疫情造成大量人员伤亡,被世界卫生组织(WHO)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牵动着亿万国民的心。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的特殊时期,各级政务新媒体高度重视疫情防控的宣传报道工作,多措并举引导舆论、回应公众关切、化解公众担忧,为打赢疫情防控阻击战提供有力舆论支持,并积累了大量在线治理的成功经验。与此同时,由于重大突发事件具有突发性、不确定性与破坏性的特征,也暴露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存在目标定位不清、回应机制羸弱、治理监管缺位等问题。在此背景下,如何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正确引导舆论、促进民心相通,如何提升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传播力、影响力、引导力和公信力,已经成为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中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受众参与的理论基础

(一)政务新媒体概念辨析

随着5G、人工智能(AI)、区块链、大数据等新兴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和应用,信息传播的方式发生了急剧变化,政务新媒体的内涵也随之不断演化。金婷(2015)将“政务新媒体”定义为政府机构、公共服务机构和具有真实公职身份认证的政府官员进行与其工作相关的政务活动、提供公共事务服务、与民交流和网络问政的新媒体平台。^[1]陈强(2017)认为政务新媒体是政府机构和部门基于在线治理需求而在新媒体平台搭建的互动工具,包括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推特、政务APP等。^[2]智媒时代环境下“政务新媒体”这一概念的定义随着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具有更加深刻的外延和内涵。单纯从作用效果层面或是技术层面去定义政务新媒体是不够准确的,还要在具体的社会环境中分析政务新媒体本身所具有的独特特点。因此不能简单将“政务新媒体”的概念简单定义为政务微博、政务微信、政务推特、政务APP,而是政府机构和部门在新型媒介应用、新型媒介终端与新型媒介体系框架下实现在线

收稿日期:2020-12-10

基金项目:2020年度河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5G时代互联网传播内容的变革与影响研究”(2020CXW019)

作者简介:陈文泰(1990—),男,江苏南京人,博士,河南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际传播、国家形象。

治理与民心相通的支撑平台和互动工具。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发展与流变

与国内相比,西方的民主法治思想萌芽较早,对公众参与的基本行为和理论也进行了较为广泛和深入的研究,但由于中国社会治理有着独特的政治和时代语境,国外并无针对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问题的直接研究。国内新闻传播学界相关研究多集中于政务新媒体舆论引导方面,如吴明(2019)对政务新媒体在突发事件中的舆论引导工作进行研究。^[3]陈鹤(2014)通过内容分析法分析论述了现阶段公安政务微信在重大突发事件信息传播中存在的问题,并提出了对策建议。^[4]其他相关研究则聚焦于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影响研究,诸多学者在技术接受模型、期望确认模型、信息系统模型、创新扩散理论等理论的基础上对政务新媒体的用户使用行为、使用意愿、使用动机、影响效果、策略建议等方面进行研究分析。刘密霞等(2015)从政府信息公开的角度深入剖析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公众参与机制。^[5]王立华(2018)以政府信息公开为自变量,基于288个城市的数据论证其对于政务微博公众参与的影响。^[6]谢丽娜(2015)在技术接受模型、创新扩散理论和信任理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影响用户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府信息的因素模型,为我国政务社交媒体的发展提供借鉴。^[7]吴云(2014)基于整合型技术接受模式(UTAUT)量表,解释公民使用政务社交媒体的行为特征,为政务社交媒体的进一步改进和完善提供参考。^[8]通过梳理文献发现,对于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研究主要在管理学、信息科学等学科理论框架下开展的,此类定量研究容易忽略政务新媒体作为一种新型电子政务形式在大众传媒环境下的适用性。考量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传播效果与公众参与行为,能完善网络传播、在线治理等相关研究领域研究成果,并对我国应急管理体系建设提供有益补充。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现实困境与成因分析

近年来政务新媒体在党中央及各级政府部门的重视与关注下呈现出快速健康发展的良好态势,但在具体的实践工作中仍存在角色定位不清、回应机制羸弱、治理监管缺位等诸多问题。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现实困境

1. 角色定位不清导致公众认同缺失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媒体往往会迎来一波

“出生潮”,然而许多政务媒体作为“任务式”的产物,缺少明确的自身定位,无法有效获取公众的认同。目前,政务新媒体建设方面仍然存在“各自为战”“一盘散沙”的现象,地方教育、卫生、交通等政务新媒体数量繁多,功能定位不清晰,让人眼花缭乱,甚至是“一事一号”,违背集约化原则。特别是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相当一部分政务新媒体处在“僵尸”或“半休眠”状态,由于自身角色定位不清导致零星的信息发布无法满足公众在重大突发事件中对最新信息的关切与需求,较难建立起公众对自身平台的认同感。

2. 回应机制羸弱影响公众参与意愿

在重大突发事件中,一些政务新媒体因为常年低互动、弱联动的运营习惯,面对公众亟须的信息需求,只能做到基本发布,仅仅单向地灌输和宣传发布,自我边缘化,面对公众关切问题不能确切回复,甚至出现沉默应对的现象。在此语境中,政务新媒体的“塔西陀效应”在网络空间下更易传播发酵,直接影响公众的参与意愿和参与程度。此次疫情中,国家部委政务新媒体表现可圈可点,但是相比而言,一些地方政务新媒体仅仅进行情况通报、政令传达等职能,显然不能满足当地民众对疫情防控、生活所需等问题的回应需求。

3. 治理监管缺位破坏公众参与氛围

重大突发事件往往伴随着大量的谣言在网络空间中广泛传播,特别是在微博、微信、抖音、快手等社交网络平台当中。由于谣言的传播呈现病毒式的裂变,极易误导公众,造成群体极化,引发社会恐慌。如2020年1月31日,中国科学院上海药物所消息称,该所和武汉病毒所联合研究初步发现,中成药双黄连口服液可抑制新型冠状病毒。一些政务新媒体随即跟风报道,导致双黄连一夜脱销,当晚各大药房网上销售渠道几乎所有品牌的双黄连口服液均已售罄下架。消息传出后,各医疗、科普机构纷纷开始“辟谣”。事后,上海药物所回应态度模糊。一些政务新媒体也陷入尴尬境地。此次“双黄连口服液事件”,部分政务新媒体在未经核实专业信息的情况下,跟风报道发布信息导致大众恐慌性哄抢,严重破坏了公众参与的意愿与氛围。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困境的成因分析

1. 技术迭代重塑媒介生态

新型信息技术的不断发展,重塑了传统大众传播的媒介生态,使人们迎来了内容爆炸与即时互动的万物互联时代。面对海量信息的轰炸,公众无法

有效甄别信息的真伪,容易陷入信息迷茫状态。政务新媒体拥有的天然权威性的特点,符合用户需求。特别是新冠肺炎爆发的特殊时期,公众的紧张心理、情绪需求决定了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是政务新媒体建立权威影响力的窗口期。

2. 用户内容消费习惯变革

移动互联网环境下,内容与社交的关系增强。用户不再是单向、静态地接受,而是希望通过评论、转发、点赞等方式深度参与政务信息传播与重塑。在此环境下,政务新媒体的内容生产者不再与用户处于割裂状态,而是通过交流、互动形成深度的情感联系,用户将成为内容链条中的重要一环。在重大突发事件发生时,公众不仅单向的获取信息,其对事件的关注与评论,对信息的参与和二次传播都是当下政务新媒体发展需关注的关键一环。

3. 管理体制及运营机制局限

目前,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运营管理往往存在目标定位不清晰、运维方式陈旧、缺乏科学的管理体系以及人才激励和评价机制滞后等问题,严重制约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工作效率和传播效果。云计算、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型信息技术的发展为政务新媒体在运营管理环节提出了更高的要求,部分政务新媒体未能顺应社会与技术的发展,在管理思路与运营实践方面还停留在大众传播阶段,没有将互联网思维运用到政务新媒体的运营管理过程当中。

三、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过程分析

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与其他网络媒体相比,政务新媒体凭借其自身的天然权威性优势,吸引了更多公众关注。微信更是凭借其庞大的用户基础成为疫情传播最重要的渠道。2020年2月17日,微信平台发布《微信战“疫”数据报告》。报告显示,疫情期间有近“12亿”人次,通过微信跟踪“疫情动态”。其中,政务微信号关注量持续上涨,同时新增的100余个政务类疫情服务小程序,环比去年同期,政务类小程序用户增长近60%。国家信息中心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院发布的《“新冠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报告》显示,微信是公众获取疫情的最主要的渠道。^[9]同时,在清博数据政务榜关键词云中,“疫情”“武汉”“肺炎”也已成为新冠疫情暴发期间整个政务新媒体传播的核心词汇。本研究的案例分析单元为政务新媒体号“共青团中央”在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初期(2020年1月20日—2020年2月1日)运营状况,旨在深入分析重大突发事件中

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与用户参与行为。

(一)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传播效果分析

“共青团中央”作为政务新媒体行动的积极践行者,近年来发展了完整的媒体矩阵,除了微博、微信等主要平台,头条号、百家号、抖音等平台都取得良好的成绩,同时也积累了大量公众关注,在疫情期间各个平台活跃度,关注度,参与度等方面都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表1 “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推送 COVID-19 相关情况

发布时间	总发文数	COVID-19 相关信息条数	总阅读量	平均阅读量	WCI
1.20	14	2	128W+	92038	1593.70
1.21	10	2	132W+	94383	1579.93
1.22	14	4	131W+	93663	1590.31
1.23	9	2	82W+	91921	1565.92
1.24	8	3	71W+	89511	1528.01
1.25	12	8	113W+	94904	1574.74
1.26	11	8	103W+	93976	1535.17
1.27	14	11	131W+	93839	1569.47
1.28	11	9	104W+	95246	1544.64
1.29	11	8	107W+	97965	1524.23
1.30	11	8	101W+	92715	1522.24
1.31	12	12	108W+	90756	1545.98
2.1	14	11	126W+	90085	1560.25
平均值	12.08	6.76	110.58W+	9323.23	1541.33

根据“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推送 COVID-19 相关情况分析,公众号总阅读量在1月21日和22日达到峰值,随后逐渐下降。在1月20日至2月1日期间,“共青团中央”微信公众号共发布文章151篇,其中疫情相关文章88篇,总阅读量达1437W+次,平均阅读量为9323.23次,WCI(微信传播指数)平均阅读量为1541.33次,“共青团中央”作为政务微信的头部大号,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信息发布与公众需求一致,关注度较高,传播效果较好。

(二)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的公众参与分析

由于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话语语境的特殊性,媒体话语运用受关注度增加,公众对权力更加敏感,话语主体应更加注重自身话语方式。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共青团中央”公众号的话语框架由以往大多数政务媒体的政绩框架,逐渐转变为有主题有偏向的多话题框架,话语传播方式也从以往的单向大众传播,逐渐转向有互动有参与的新型信息交流方式。如1月20日至2月1日阅读量前十的疫情相关信息中,每条信息阅读量都超过10W+,其中1月21日,第一个高峰时段推送的《为什么突然

增加了这么多病例?》,从信息内容分类分析,属于科普知识类。1月30日最后高峰时间,《“我的城市生病了”,这2首歌听哭无数人》属于抗疫故事。在阅读量前十的信息内容中,科普知识类4条,推送时间分别为1月21号、22号、23号、25号,即疫情早期;抗疫故事类4条,主题内容符合社会核心价值观,满足公众精神期望;行为干预类1条,主要内容为返岗返工防护知识普及宣传。

除此之外,为了加强和提高公众的黏性与参与度,“共青团中央”公众号在疫情期间通过建立包含谣言粉碎、防护用品、同程查询、疫情问答、疫情地图等功能在内的“谣言粉碎”小菜单窗口,为公众实时参与提供精准服务,使得受众在接收相关信息时的参与程度与认同感明显提升,在防控高峰期的新闻舆论工作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四、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公众参与的提升路径与优化策略

(一)主动议程设置,不断完善内容质量

政务新媒体要精心做好议程设置,在内容生产端严格把控,不断打造有温度的内容产品。在重大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应积极适应新的舆论传播环境,通过满足网民的社交需求、心理需求,充分发挥舆论领袖的作用,达到精心做好议程设置目的,实现舆论引导、了解民生、参政议政、解决突发问题等重要职能。同时,内容生产一方面要讲政治、讲原则,严格与党委、政府的大政方针保持一致,另一方面要及时把握用户需求,确保自身生产的内容公众想看、爱看,进而才能提升政务新媒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和公信力。如河南项城市融媒体中心在疫情期间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宣传预案,开设了《疫情一线》《专家声音》《武汉直击》《隔离不隔爱》等23个栏目,每天播发抗疫相关新闻上千条,制作链接4000多个,短视频3000多个,全媒体点击量达到6200多万。在信息发布中,他们充分发挥在融媒体中心建设中组织起来的16万名“媒体专员”队伍作用,将本单位、本社区疫情防控的视频、音频、图片、文字上传到融媒体中心平台,平台通过各种自主移动渠道,以及由融媒体托管的70家网站、42家微信公众号,开启全天图文直播,每天发布的图文、视频上万个,实现了防控疫情的信息的及时、充分、全面报道,发挥了组织、动员、鼓舞当地人民群众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重要作用。

(二)转变传播语态,形成自身品牌特色

在后真相时代,政务新媒体要转变传统语态,将各类信息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呈现出来,保证在

突发事件中自身内容的独特性、信源的准确性以及情绪性表达的合理性。与传统媒体相比,政务新媒体虽然没有新闻机构报道的完整性,但其能根据社交网络的传播规律,针对热点事件,通过图片、视频、超级链接等多种复合表征形式表达本机构的态度和观点,并与公众进行充分互动交流,形成自身特色,能使公众在一定程度上建立与政府之间的心理认同,进而提升政府的公信力与政府形象。如“中国政府网”联合健康中国(国家卫健委政务新媒体平台)推出疫情防控知识库,并上线“权威求证”互动功能,收到不少网友的关注与提问。面对疫情,政务新媒体要切实发挥自身职能作用,主动发声引导传递政府声音,加强互动答疑消除群众疑虑,解决人民困难增加官民互动,塑造政府部门积极形象。

(三)协同传播矩阵,高效联动满足需求

随着新媒体平台和融媒体形态的变化,政务新媒体广撒网、多平台、大而全的方式,应被分众化、精准化、集约化的思路取代。在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要主动适应外部信息环境的变化,紧扣自身业务,通过各类互动方式不断了解受众、贴近受众。同时,各类政务新媒体应秉承共融互补的理念,研究各种平台的传播特点和规律,确立不同平台的核心定位和服务领域。调动不同类型、不同级别政务新媒体的积极性,打造政务信息的立体传播矩阵,实现更多媒体资源的整合创新,真正能够满足公众的各类信息需求。如成都市委网信办指导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与谈资联合出品的《当春乃发生》短视频被人民日报、学习强国、央视频等国家级平台关注推介。微博话题#成都到底有多美#登上热搜,视频全网播放量超2000万次。此外,成都市委网信办统筹成都市融媒体中心,联合微成都开设抖音话题#抗击疫情成都有爱#,截至目前话题播放量超7019万次;组织成都市互联网文化协会、听堂FM,开展喜马拉雅VIP会员公益畅听活动;联合网络文学联盟作家刘采采共同策划抗疫公益MV《绿洲》,视频播放量达100余万次;联动新华网、国际在线、封面新闻、界面、36氪等平台,主动设置议题,策划相关短视频、H5、网评文章、大V代言、专业深度稿件等产品,完善资源整合、策划约稿、推广传播等工作机制,满足不同受众的各类需求。

(四)强化风险预警,及时开展舆论引导

政务新媒体应坚持底线思维,增强防范重大风险意识,将强化社会风险的舆论引导和预警机制作为政务新媒体的重要责任,切实提升社会服务效能。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公众往往会产生群体的

心理恐慌,亟须权威、及时的信息引导。政务新媒体应充分利用自身资源优势,对重大突发事件中各个风险节点进行全程关注并及时发出告知和警示,规避舆论风险态势的行程,尽最大可能消除重大突发事件可能带来的负面影响。如国务院客户端贴近群众实际需求,在疫情期间,推出了“疫情防控线索征集”专区,并联合国家卫健委等部委先后推出“患者同乘接触者查询”“全国心理援助热线查询”等11项便民服务小程序应用,及时开展有效的舆论引导工作。

五、结语

面对重大突发事件的发生,政务新媒体应依托新型信息技术,坚守政治立场,勇于回应群众关切,以公众喜闻乐见的形式在内容层面不断创新,以多维立体的传播渠道和沟通方式与公众形成情感的共鸣,真正实现公众在网络空间中各类需求的“触网落地”,彰显政务新媒体在重大突发事件中的社会责任与使命担当。

参考文献:

[1]金婷.浅析政务新媒体的发展现状、存在问题及对策建议[J].电子政务,2015(8):21-27.

[2]陈强,曾润喜.政府视角与公众视角:中国政务新媒体研究的议题与路向[J].情报杂志,2017,36(4):141-145.

[3]吴明,张茜,李慧斌.探究突发事件中政务新媒体舆论引导策略[J].智库时代,2019(7):15-16.

[4]陈鹤,韩金成,王建成.重大突发事件中公安政务微信应急传播研究:以昆明暴恐事件为例[J].电子政务,2014(9):38-43.

[5]刘密霞,王益民,丁艺.政府信息公开推动电子政务环境下的公众参与[J].电子政务,2015(6):76-82.

[6]王立华.如何促进政务微博公众参与:基于政府信息公开的视角[J].电子政务,2018(8):53-60.

[7]谢丽娜,周庆山.公众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政府信息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以新浪微博为例[J].图书与情报,2015(5):109-116.

[8]吴云,胡广伟.政务社交媒体的公众接受模型研究[J].情报杂志,2014,33(2):177-182.

[9]国家信息中心.南京大学网络传播研究院:“新冠肺炎”公众认知与信息传播调研[R].(2020-02-26).<http://www.sic.gov.cn/archiver/SIC/UpFile/Files/Default/20200226101829580669.pdf>.

(责任编辑 吕志远)

The Realistic Dilemma and Promotion Path of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New Government Media in Major Emergencies

CHEN Wentai, ZHAO Huiqing

(School of Journalism and Communication, Henan University, Kaifeng, Henan 475001, China)

Abstract: Relying on new information technology, new government media, as a supporting platform and interactive tool to realize online governance and people's, carries the main functions like transmitting the voices of authority, responding to concerns, opening government affairs and so on. In major emergencies, the public participation of government new media is faced with some practical difficulties, such as unclear role positioning, weak response mechanism, lack of governance and supervision. Through active agenda setting, changing the communication voice, coordinating interpreting matrix, and strengthening risk warning, the communication effect and public participation intention of government new media in major emergencies can be further improved.

Key words: major emergencies; new media of government affairs; public participation; COVID-19

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研究

黄月琴

(淮南师范学院 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安徽 淮南 232038)

摘要:大学生思想活跃,在我国网民群体中占比最多,这使得高校网络舆情在主体、客体和载体方面具有诸多显著特征。在全球化深入发展的今天,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在线上线下还面临主流话语缺失、集群效应明显、管控应对能力不强、舆情传播深度受到限制等风险,为此,高校迫切需要结合实际情况着手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积极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优化高校网络内容建设、推进线上线下媒介融合、设置线上线下舆情话题等方面的探索,最终在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基础上全面推动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再上一个新台阶。

关键词:线上线下;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4

中图分类号:G20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76-05

在如今的信息时代,社会舆情的主要载体已经由大众在街头巷尾的议论转变为互联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做好网上舆论工作是一项长期任务,要创新改进网上宣传,运用网络传播规律,弘扬主旋律,激发正能量,大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要大力“加强互联网内容建设,建立网络综合治理体系,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当前的“00后”大学生作为网络原住民,对互联网的使用最频繁。由于他们的心智尚未成熟,好奇心又强,十分热衷于浏览网络信息,容易传播一些过激、虚假的言论,使网络舆论出现暴力化、情绪化、非理性化倾向,进而引发严重的网络舆情事件,这将给高校的网络舆情管理带来极大冲击与挑战。对于为社会主义建设培养合格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校而言,主动占领互联网阵地,协调线上线下强化主流价值观在广大青年学生中间的传播与引导,是营造清朗网络空间的迫切需要。做好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不仅关乎学校的和谐稳定和大学生的身心健康,更关乎高校的意识形态安全。研究高校网络

舆情在线上线下的特征及应急管理策略,对高校安全稳定和办学治校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努力做好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分析、预警与应急管理,是新时代高校迫切需要解决的一项重要课题。^[1]

一、高校网络舆情在线上线下的特征分析

分析高校网络舆情在线上线下的联系可以发现,其特征主要由某一类主体、客体和载体三者共同体现^[2]。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主要包括大学生、教职工、网络平台及各类媒体人等。其中,大学生是高校网络舆情场的主要推动者。而网络舆情的客体主要是指受到广大师生关注的社会热点或校内新闻,也可能是各类媒体人发布的与高校师生有关的事件、观点等。高校网络舆情的载体主要指网络及各类平台。

1. 高校网络舆情的主体特征

作为高校网络舆情的最主要主体,大学生的心智尚未成熟,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还没有形成,好奇心强,喜欢表达自我,但又普遍缺乏社会阅历,

收稿日期:2020-12-31

基金项目:安徽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研究”(SK2020A0419)

作者简介:黄月琴(1982—),女,安徽安庆人,硕士,淮南师范学院化学与材料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创新企业教育。

对信息没有足够的辨识和判断能力,对事物缺乏全面的分析能力,容易轻信和盲从某些观念和思想,难以站在客观的立场看待问题、发表看法,容易产生情绪化的从众心理。作为互联网上最活跃的群体,大学生的适应能力比较强,容易接受新事物。在互联网空间,大学生往往倾向于结识与自身学识、经历相似的朋友。这使大学生群体具有相互影响力大、互动频率高、目标同向性强等群体性特征。该群体在通过各类网络平台发表看法、交流思想的过程中,其思想、心理容易受到群体情绪的影响。加之他们中的很多人难以在短时间内弄清事情真相,更无法预料自己在互联网上发表情绪化言论的后果,使大学生群体的某些冲动的、偏激的情绪化言论被不断强化,最终造成群体极端效应^[3]。而且,大学生群体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对某件敏感社会热点事件纷纷通过微信、微博、贴吧、论坛等网络平台进行转发、评论、点赞,网络舆情在大学生群体的助推下不断在网络空间扩散、发酵,很容易在很短时间内产生网络群体效应。

2. 高校网络舆情的客体特征

高校网络舆情不是凭空产生的,而是以特定客体为基础。高校网络舆情的客体具有自身特征。这一客体主要是与高校领导、教职工及大学生的学习、生活、工作、思想等紧密相关的事件与话题。具体分为两类:第一类是涉及国内国际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等热点事件在高校引起的巨大反响;第二类是受到广大师生关注的高校内部问题、事件等。例如,师德建设、师生关系、纪律处分等。在一般情况下,有关高校内部的问题、事件等占高校网络舆论的大多数。但是在一些情况下,高校与高校之间也会就某一热点话题形成共鸣,例如,大学生追星族对同一娱乐新闻的关注。可以说,广大青年学生对网络舆情的关注点除了校园生活,更涉及政治、经济、娱乐、科技、体育等诸多方面。各类网络平台信息也以生动鲜明的图片、视频和简短的文字呈现给大众。而由于互联网存在很强的隐蔽性,网络信息作者和传播者纷纷匿名表达各自诉求和思想倾向^[4]。其中,一些互联网媒体和自媒体作者为赚取流量,直接略过审核关,故意炒作某些热点话题,甚至直接歪曲事实进行虚假宣传,相关信息随着网民的大量转载迅速发酵,很容易在高校迅速触发网络舆情事件。可见,高校网络舆情的性质在更多时候是伴随整个互联网舆情的变化而变化的,而不是以舆情原本的问题及诉求为标准。

3. 高校网络舆情的载体传播特征

今天的大学生大多为“00后”,思想新潮,愿意

尝试新事物,对互联网具有很高的黏度。特别是在当前互联网信息技术高度发达的背景下,大学生能够熟练使用智能手机在贴吧、论坛、短视频、微信、微博等各类网络新媒体平台上迅速浏览、编发、推送和转发大量信息。一方面使大学生兼有信息发布者和信息传播者双重身份;另一方面,也使大学生既能及时掌握社会热点动态,也能很快针对热点动态发表观点与看法,进而可能激起大范围的社会舆情爆发,从而让互联网时代的各类网络新媒体逐渐演变为高校网络舆情的主要载体。而在校内校外也逐渐演化出两个舆论场,校内形成以BBS论坛、校园网为主的舆情圈,因为受到高校的把关其影响范围比较小,有一定可控性^[5]。相比而言,校外以人民网、新华网等主流网站、论坛、网络社区、纸媒等形成的舆情圈,影响范围很大、可控性差。而随着今天微博、短视频等网络新媒体技术的迅速发展,促使善于接受新事物的大学生很快由原来的沉迷于互联网转向更关注微博、微视频,这使校内舆情圈和校外舆情圈常常交织在一起,二者的边界日益模糊。

二、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在线上线下面临的风险

1. 非主流信息的入侵导致主流话语缺失

当前,经济全球化步伐的加快带来了文化、价值取向的空前多元化。以美国为代表的部分西方发达国家及境外某些敌对势力一直图谋不轨,他们借助互联网时代网络热点事件制造舆论热点,企图左右网民的价值取向和思想走向。与此同时,西方拜金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无政府主义等思潮近年来也在我国互联网上迅速蔓延。这些文化思潮将会给我国的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带来巨大负面影响,也会给广大青年学生的国家认同、文化认同、政治认同、民族认同造成极大冲击。由于大学生的心智尚未完全成熟,面对西方部分敌对势力的意识形态渗透,一些大学生很可能发生理想信仰的转变,加之互联网高度的开放性、隐蔽性,反而在客观上增加了网络上非主流信息入侵的风险,最终导致主流话语在大学生网民中间日渐缺失^[6]。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其一,相比人民网、光明网、新华网等官方主流网站,大学生浏览热点新闻和时政资讯更多地集中在新浪微博、凤凰新闻、腾讯新闻、今日头条等网络媒体上,而且这些非官方媒体在全网的点击量也长期名列前茅。相比之下,官方主流网站在广大网民中的受关注程度远远不及非官方网络媒体,很容易造成主流话语缺失。其二,除了网络原住民身份,大学生还是手机自媒体的高频使用者。而与传统媒体发布信息需要经过层层审核不同,自媒体信息发布的审核机

制明显不健全,把关不严格,很容易造成负面信息在各自媒体平台上大肆传播,使高校突发舆情事件的风险大大增加,同时也加大了高校把控网络舆情走向的难度。

2. 线上线下同步传播造成集群效应明显

第47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20年6月,我国网民群体中大学生占比最多。这意味着大学生对网络舆情的影响相比其他社会群体将会更显著。具体而言,大学生群体虽然容易接受新事物,而且有着强烈的社会参与和话语表达诉求,但分析问题不够理性、全面,特别在面对负面网络舆论时,情绪化倾向往往较为严重。该群体在年龄、身份、心理认同等方面又有着很大的趋同性,在某一问题上容易产生相似的看法,进而在线上线下引起共鸣,形成显著的集群效应。而互联网上的传播主体在价值取向、道德水准等方面存在很大差异,造成海量互联网信息质量参差不齐。例如,一些网络自媒体从业者为了吸引网民眼球,不惜以低俗、虚假、反动等内容提升信息流量。一些别有用心的敌对势力则蓄意策划甚至编造某些子虚乌有的舆情事件,企图借助开放的互联网进行更大范围的思想渗透^[7]。一些大学生也钻了互联网媒体信息发布管理比较宽松的空子,在不少情况下他们都可以在互联网媒体上随意发表观点和看法,这都在很大程度上增加了高校发生恶性网络舆情的风险,可能使大学生的个体话语在线下加速汇集,更可能使大学生群体话语在线上迅速演变,最后导致高校网络舆情形成集群效应。

3. 高校在线上线下的管控应对能力不强

对于网络舆情,高校在线上线下的管控应对能力还比较差,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整体上缺乏危机意识和预警机制,思想僵化、理念滞后,这就导致不少高校面对突发的网络舆情危机时无法及时应对,更无法及时预判舆情发展态势和掌握舆情发展规律,常常错过应对舆情的有利时机,造成高校网络舆情失控。例如,有的高校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措施十分滞后,即使反应较快,也只是流于“会开展进一步调查”等说辞,实际的后续工作不了了之。有的高校则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回应答非所问缺少说服力。究其原因主要在于,高校网络舆情管理部门尚未高度真正重视网络舆情应对,常常对舆情采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的消极态度,缺乏足够的舆情敏感性,导致应对网络舆情十分被动。二是很多高校内部及校与校之间都缺乏信息共享等协作交流机制,信息整合不够、对网络舆情挖掘不深

入,尚未形成高校网络舆情工作合力。而且,不少高校应对网络舆情还缺乏有效的疏导方法,反而习惯简单地采用“堵”和“删”等一刀切的手段,很少对网络舆情进行主动引导。三是不少高校网络舆情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明显不足,对网络舆情发展规律、敏感话题回应、舆情危机应对、熟练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等都存在不足^[8]。有的工作人员无法在线上与大学生网友开展有效交流,更多的只是空洞说教,很难引起共鸣,反而容易引起学生反感。有的工作人员面对网络舆情危机生怕担责任,不愿回应、不敢回应。还有的工作人员不擅长使用大学生最熟悉的互联网媒体技术,无法对高校网络舆情进行有效监管。

3. 大学生受众年轻化限制舆情传播深度

对于当前的高校网络舆情来说,由于其受众主要是“00后”大学生,他们思维活跃,但是社会阅历尚浅、情绪容易波动、遇事容易冲动。而且,从社会心理学角度来看,大学生网民还受到从众心理、泄愤心理等因素影响,其浏览互联网信息更多集中在娱乐明星动态、体育生活等方面,并且往往仅限于蜻蜓点水似的了解,这使不少大学生对互联网信息的观点和看法缺少客观、深入、全面地思考和实践检验,导致他们对信息了解和信息传播都缺乏一定的深度^[9]。

三、基于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研究

面对复杂多变的网络舆情形势,高校要紧紧密结合本校实际情况着手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积极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优化高校网络内容建设、推进线上线下媒介融合、设置线上线下舆情话题等方面的探索,推动社会正能量在高校互联网深入传播。

1. 强化线上线下联动协调,加强高校网络舆情监测

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管理作为一项系统工程,离不开高校有关部门在线上线下的联动协调。第一,高校需要建立线上线下协调联动的工作机制,成立网络舆情工作组,专门负责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与应对,构建多部门参与、多方面协同的网络舆情监测体系。高校要结合本校实际情况制订舆情应急管理预案,细化应对网络舆情危机的具体流程^[10]。同时,高校要加强校与校之间的协作沟通与信息共享,促进对网络舆情的协同监测。在线上,高校要充分运用互联网信息技术完善对互联网媒体的舆情引导,充分发挥主流网络媒体的引领作用,凝聚线上舆情引导合力。在线下,高校一方面要加强校内相关部门的沟通协调,及时对网络舆情信息进行上报和

处理,在各部门之间建立融信息共享、研判、回应于一体的联动监测体系。另一方面,也要加强与地方公安、宣传、网信等部门及主流媒体的协作,为高校舆情监测及引导等环节提供帮助与支持。第二,高校要加强校内自媒体的监测管理,特别是对在大学生中间影响较大的官方微博、官方微信公众号、社团微信公众号等实施常态化监测。一方面,加强与校内自媒体运营者的沟通,引导他们自觉传播社会正能量,降低舆情风险。另一方面,也要善于发现问题苗头,及时将可能发生的舆情危机扼杀在萌芽状态。

2. 设置线上线下舆情话题,优化高校网络内容建设

高校是弘扬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加强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前沿阵地。首先,高校在网络内容建设中要始终将弘扬社会正能量作为大学生网络思想政治教育的核心工作来抓,不断强化正面宣传,从而进一步优化高校网络内容建设。为此,为进一步做好网络舆情应急管理,要联合学校学生处、宣传部、团委等部门,在线上线下同步组织开展话题讨论。在线下,高校要充分发挥思政课堂、学生社团等阵地作用,广泛传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弘扬社会主旋律。特别是在思想政治课堂上,教师要引导大学生始终坚持正确的政治立场和价值取向,让他们学会理性、客观、全面地看待互联网上泥沙俱下的海量信息,提升大学生对网络信息的鉴别与判断能力。同时,高校还要大力号召广大教师与学生积极就他们最关心的热点话题展开大讨论。在线上,高校要充分发挥校园网、学校官方微博等主流网络媒体的号召力,有效引导校内其他自媒体积极传播富有趣味、贴近师生的内容,自觉摒弃不健康的负面信息,从而在线上线下形成高校网络舆情工作的最大合力。其次,高校要定期在线上线下同步开展主题活动,特别是针对反响强烈的舆情事件向大学生发布有关话题,引导大学生自觉与错误思想作斗争^[11]。为此,高校还要加强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促使大学生用好互联网,自觉做到文明使用网络,营造良好的高校网络生态环境。

3. 推进线上线下密切融合,协调推动主流话语权建设

网络舆情表面上出现在互联网,实际上根源于现实,时时刻刻反映着现实。首先,高校开展网络舆情应急管理,就要进一步推进线上线下的密切融合,在有关的网络媒体上协调推动主流话语权建设。具体而言,校园网一方面要紧密结合本校师生工作、学习、生活的实际情况,准确把握教师和大学生的有关

需求。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完善信息发布、线上办公等工作环节,大力增强校园网服务师生的便捷度,增加用户黏度。高校官方微信公众号和官方微博不仅要进一步完善留言和评论功能建设,增强主流网络媒体与大学生的良性互动,而且要充分借助校园文化活动来提高大学生在线上、线下的参与度^[12]。除此以外,高校还要倡导校内其他自媒体积极宣传发生在大学生身边的、弘扬社会正能量的故事,将线下的真实故事移到线上,进一步推动高校网络舆情的主流话语权建设。其次,高校要进一步做好校报等线下媒介的管理,推进线下媒介在主流话语权建设方面与线上媒介的密切融合。例如,高校校报要以问题为导向,在回应大学生普遍关心的问题的同时,提前进行舆情事件研判,力争做到对高校网络舆情的精准引导。与之相适应,针对校报的问题导向,高校要大力提倡教师积极开通属于自己的微博,强化信息内容的趣味性、教育性、互动性设计,实现线上线下在问题导向方面的同向同行,进而推动线上线下媒介的主流话语权建设。

4. 加强网络舆情工作队伍建设,深化网络舆情应急管理

深化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离不开一支过硬的网络舆情工作队伍。第一,高校对内要加强网络舆情工作队伍的业务能力培训,对外要大力引进情报信息、互联网信息技术、新闻传播等方面的人才,进而大大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工作者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能力,最终畅通网络舆情预警、处置、总结等环节,提升网络舆情应急管理的整体水平。第二,高校要大力培养学生干部、学生党员、校报记者等青年骨干,促使他们成长为高校网络舆情的吹哨人,并定期对骨干学生开展培训,提升他们的政治素养,坚定他们的政治立场,提高他们的政治敏锐性,使他们能够提前发现网络舆情中可能爆发的危机,并将其控制在萌芽状态。同时,高校要引导这批学生骨干积极参与高校网络舆情监测,使他们及时掌握高校舆论动态,在遇到突发的舆情事件时,能够按照统一部署迅速投入舆情应急管理工作^[13]。只有这样深入广大青年学生中间,才能使高校精准把握绝大多数大学生的思想动态和观点倾向,深刻了解突发舆情事件背后的真相,进而有针对性地确立高校网络舆情的应急管理模式,最终做好高校网络舆情引导。

四、结束语

在当下互联网信息技术高速发展的时代,各类新兴媒体和网络媒介被广泛应用,互联网舆论信息唾手可得。作为意识形态争夺的重要阵地,高校一

向受到社会大众的广泛关注。网络舆情事件越来越成为高校必须直面的重要课题,建立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被各高校提上工作日程。高校在线上线下协调运用大数据和网络技术,不仅能够更加全面、及时地把握校园网络舆情特征,掌握舆情发展趋势,而且能够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能力和水平,提高对高校突发事件的网络舆情应对效能。高校必须高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伟大旗帜,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积极探索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新途径,在此基础上建立常态化的高校网络舆情应急管理机制,不断总结经验、吸取教训,宣传正能量,弘扬主旋律,始终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在线上线下联动协调的基础上不断提升高校网络舆情应急处置能力和水平,最终促进网络舆论实现正向价值。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 总体布局统筹各方创新发展 努力把我国建设成为网络强国[N]. 人民日报,2014-02-28(01).
- [2] 习近平. 决胜全面建成小康社会 夺取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在中国共产党第十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3] 白月. 高校网络舆情的类型、特点及应对研究[J]. 河南社会科学,2020(7):120-124.

- [4] 丁威. 基于习近平网络观视域的移动互联网时代高校舆情调控与应对研究[J]. 黑龙江高教研究,2018(4):131-135.
- [5] 王军杰,黄黎辉. 高校网络舆情特征与应对策略[J]. 传媒,2020(7):77-80.
- [6] 樊琳,张生,丁社教,等. 高校网络舆情的演化机理及其应对策略[J]. 当代青年研究,2020(4):90-95.
- [7] 王楠,王保华. 治理视域下的高校网络舆情应对策略[J]. 思想理论教育,2020(9):93-96.
- [8] 周升铭,王鹏. 高校网络舆情的生成、传播与引导机制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20(12):59-60.
- [9] 刘宁,李新春. “微时代”背景下高校网络舆情管理对策[J]. 华南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5):102-105.
- [10] 高芳放. 高校网络舆情管理方法及其功能探讨[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9(10):74-75,78.
- [11] 黎红友. 高校网络舆情传播机制与引导策略研究[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8(2):57-59.
- [12] 骆敏,王轶群,伍婵提. 高校网络舆情的传播阶段及危机管理机制[J]. 青年记者,2019(3):46-47.
- [13] 吴锋. 高校突发事件网络舆情预警系统构建与优化研究[J]. 系统科学学报,2020(4):94-97.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Contingency Management of University Network Public Opinion Based on Online and Offline Coordination

HUANG Yueqin

(School of Chemistry and Materials Engineering, Huainan Normal University, Huainan, Anhui 232038, China)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active in thought, which accounts for the largest proportion of Internet users in China. This makes the Internet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have many significant characteristics in terms of subject, object and carrier. With the development of globalization, the management of online and offline public opinion in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still faces the risks of lack of mainstream discourse, obvious cluster effect, weak management and control ability, and limited depth of public opinion dissemination. Therefore, it is urgent for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to establish an online and offline linkage and coordination network public opinion emergency management mechanism based on the actual situation, and actively explore ways of strengthening colleg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monitoring, optimizing the construction of college network content, promoting online and offline media integration, setting offline and offline public opinion topics, etc. It aims to comprehensively promote college network public opinion to a new level on the basis of online and offline linkage and coordination.

Key words: online and offline; colleges and universities; network public opinion; contingency management

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实践研究:价值、问题与对策

焦丹,赵志男

(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河南郑州450001)

摘要:通过可视化图谱分析少林功夫研究脉络,溯源和梳理少林功夫译介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历程;剖析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现状与问题,商榷翻译实践中的语言运用和译法与接受,提炼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提出应对策略,供相关研究者参考。

关键词: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实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5

中图分类号:H31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81-06

一、引言

中华文化“走出去”是我国文化发展的重要战略之一。武术,作为中国传统体育活动之一,是中华文化和中国软实力的重要代表,中华武术文化传播担负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播的使命与重任。《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与《关于加强和改进中外人文交流工作的若干意见》等文件明确指出,支持中华武术等代表性项目走出去,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内涵更好更多地融入生产生活各方面,在全社会形成参与守护、传播和弘扬优秀传统文化的良好外部环境。

少林功夫文化是中华武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河南地方少林文化和中国国家形象的代表。连续多年的《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结果显示,中华武术是最重要的中国文化元素之一,其中少林功夫曾居榜首,可见,少林功夫译介的国际翻译传播实践是成功的,对中国国家整体形象的提升功不可没。基于此,以国家文化和地方特色发展战略为纲,本文通过可视化图谱分析少林功夫研究脉络,溯源和梳理少林功夫译介的形成、发展与嬗变历程;剖析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现状与问题,商榷翻译实践中的语言运用和译法与接受;通过分析翻译传播

障碍,提炼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提出应对策略,供武术学界、翻译学者、外籍武术学习者等相关研究者参考和共同探讨。

目前,国内中华武术译介翻译传播的研究多为宏观梳理和武术术语译法等本体研究,零星可见从文化传播或套路招式技能视角的少林功夫研究,翻译学视角下的中华武术和少林功夫学术研究成果甚少,将在下文可视化图谱分析中细述。本文所指少林功夫译介立足于文化身份的中国选择,包括反映少林功夫技术和理论要旨的术语、凝练少林功夫经验智慧与规律的谚语、集聚少林功夫技法及思想大成的典籍。

二、基于 CiteSpace 文献计量工具的少林功夫研究文献可视化分析

少林功夫历经军事、语言、体育的研究转向,其外译文本在中国武术的国际文化传播进程中发挥了重要译介作用。本文运用 CiteSpace V 文献计量工具可视化软件分析少林功夫文献的来源期刊、作者、机构、关键词等领域知识图谱,探析该领域研究现状、热点和动态前沿。

(一)研究总体趋势

在中国知网以“少林功夫”为关键词进行高级

收稿日期:2021-02-10

基金项目:2020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武术外译话语体系构建研究”(20BY074);2019年度河南省教改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人类命运共同体视域下融入式和平教育在外语课程思政中的应用研究”(2019SJGLVX269);2021年度河南省高校科技创新人才支持计划(人文社科类)资助

作者简介:焦丹(1979—),女,山东泰安人,文学博士,河南工业大学外语学院教授,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检索,截至2020年3月,检索出1982年8月至2019年11月共258篇文献,以Ref-works格式将所查询数据导出、转换、提取后,绘制可视化领域知识图谱发现(如图1):2006年之前的30多年间,少林功夫研究文献均以个位数零星出现;2006年之后至2014年,文献成果数量年均呈两位数,但数量不稳定;2014年出现峰值31篇文献,但与中国武术研究文献相比数量悬殊较大;近五年间,研究成果趋于下降,平均值在每年13篇。从整体研究发展历程来看,少林功夫研究仍属于冷门绝学研究,尚无少林功夫译介和翻译传播的专题研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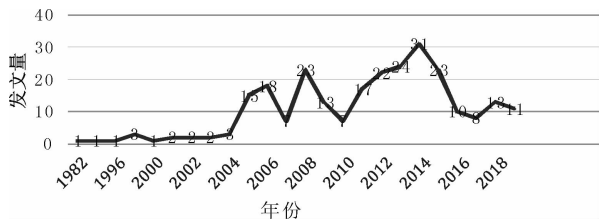


图1 中国知网发表文献图谱

(二) 研究主要机构与合作学者分布

少林功夫研究具有地域、区域、作者和研究机构的局限性,河南是主要研究地域,高校分布较少,仅有郑州大学、上海体育学院和东南大学进行此类研究;作者主要来自体育学、哲学、佛学领域,语言学、

Top 5 Keywords with the Strongest Citation Bursts

Keywords	Year	Strength	Begin	End
少林	1982	6.0102	2001	2006
僧人	1982	2.3361	2006	2008
武术	1982	2.488	2008	2012
发展	1982	2.9328	2013	2014
非物质文化遗产	1982	3.6797	2013	2014

图2 国内少林功夫研究关键词激增图

由于中外历史文化异质性和少林功夫本土化特征,国外相关研究成果相对较少,国内学者研究视角多元。2000年开始,与少林功夫相关的中华武术跨文化传播和翻译研究成果逐年增长;2004年首次出现中华武术跨文化传播研究井喷态势,研究聚焦于武术的国际传播价值与历程、动力与阻碍因素和趋势展望等;近五年来研究成果数量增长态势平缓,主要立足于中华武术国际传播成果、国际形象及跨文化译介研究。“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结合“一带一路”的武术文化研究也逐年上升。然而,针对关于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的研究少见,较多聚焦于对于中国武术的综合研究,且研究方法缺乏实证,其原因应是受到地域和学科局限。多以主观角度唱“独角戏”的文化输出,对少林功夫文化哲学思想的译介翻译及传播未有深入研究,少林功夫的核心要

翻译学视角的研究学者和机构匮乏。

(三) 研究热点发展变化轨迹

在CiteSpace V工具中得出国内少林功夫研究的关键词出现于不同文献中的频率不同,高频次关键词依次为:少林功夫、少林寺、少林文化、少林武术、释永信、武僧等主要研究对象,依次减弱的还有少林、武术、非物质文化遗产、佛教、文化节、少林武功、修习等。

此外,CiteSpace V所生成的激增图也体现了研究热点变化及前沿,图2依据激增力度从大到小排序,包含了激增内容与激增起始年限。关键词激增表示少林功夫在1982至2020年间的热点增长率,排名前5位的激增词有少林、僧人、武术、发展、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中,激增力度最大的是“少林”,激增时间均处于2001年之后,激增年限时间最长的关键词为“少林”。据笔者了解,近年来,少林寺、河南登封市政府等有关部门一直在少林功夫的省级、国家级乃至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申报方面作出积极努力,少林功夫的研究成果也因此备受关注,然而,对于少林功夫译介的忽略所造成的国际语言障碍或将成为少林功夫文化内涵不能真正融入世界的重要影响因素。

义并没有被成功译介出去。缺乏鸿篇巨制的少林功夫译介,国际上对少林功夫的认知仍停留在中国八十年代的《少林寺》等影视媒介上,对中国武术的现代化发展和科学养生知识知之甚少,从而影响中国武术走进奥运等世界级界域。在此背景下,少林功夫译介的溯源与翻译传播价值和问题探索研究具有特殊意义。

三、少林功夫译介溯源与翻译传播价值

(一) 少林功夫译介溯源与发展脉络

少林功夫对外译介包括少林功夫本体技能和哲学思想的翻译介绍。禅宗哲学是佛教思想向武术渗透的主体,禅武合一 是少林功夫追求的最高境界。少林功夫译介的国际传播离不开语言的桥梁,将少林功夫的套路招式技法与其思想文化内涵翻译成外语推介出去,是少林功夫走向世界的唯一途径和媒

介。

明清时期,少林功夫随着少林寺的兴起而广为流传,经历了少林武僧救唐王的辉煌、反清复明时期的落寞到民国之后的中日等国际文化交流,少林功夫经历了少林僧人从自然生存、舒展筋骨、防御防身、保家卫国到修身禅武的历程,其禅武合一的精髓一直在升华、内化,被国人所熟知。但少林功夫迄今只是中华武术的一支,既没有被世界奥运所接纳,也没有像太极拳一样为大众所接受和练习;国际上对少林功夫的认知仍停留在早期故事传说和现代争夺票房的武打武侠影片上,引起片面认知和文化误读。从技能技法角度看少林功夫的特点,其复杂套路招式需扎实的基本功,对习武者素质要求高;从国际传播角度看,少林功夫虽通过“少林禅宗大典”“国际少林武术节”“孔子学院武林汉韵”,以及功夫春晚、功夫影片等方式以演武和艺术欣赏形式在国际上广为传播,但从语言和译介角度看,其传播介质较少,且语种有限,主要症结在于习武者不懂外语,懂外语者不精通武技。

早期的欧洲传教士和军事领域中对武术的传播,主要依赖于口口相传,即口头翻译,迄今没有留存纸质翻译文本。直至1963年,李小龙的《基本中国拳法》英文版在美国发行,正式开启了功夫译介的国际传播;20世纪80年代以来,在世界范围内发行的英译与少林功夫相关的书籍发行量已超过3000种,如美国当代汉学家道格拉斯·怀尔的《杨家太极拳秘诀》(1983)、《遗失的晚清太极拳经典》(1996)等,Lorge(2012)的*Chinese Martial Arts: from Antiquity to the Twenty-first Century*讲述了从青铜时代至今的中国少林武术发展史,这些译介的共同特点是,其作者并非译者,均是外籍习武者或华裔直接用英语写成,且内容以少林功夫拳法为主。此外,国内出版的武术译介较多,但少林功夫专门译介较少,如2008年出版的《传统少林武术套路集成(套装上下卷)》(*A Compendium of Shaolin-style Traditional Martial Arts*),是我国首部全面系统记载少林武术套路招式的中英文对照版专著,被誉为“少林武术名家”的作者刘海超,以传统佛、儒、道思想精华为主旨,对少林武术战术、战略和武德、武风全面系统阐述,融合武术、中医理论与哲学,详解少林武术套路,是我国武术学科学术理论与武术教学实战相结合的重要代表著作之一。其他少林功夫译介多出自少林寺,如《少林寺志》《少林寺旅游手册》《少林史话》《我心中的少林寺》《走进少林》等20余本中英双语或英文版译介,这些译介多为武术或少林功夫的本

体译介,以讲述少林文化、历史和旅游为中心,笔者尚未查询到以少林功夫文化哲学思想为核心的专门译介。2019年,河南省政府为弘扬中原武术文化,组织专家团队翻译了《少林功夫》《太极拳》中英文对照图书,以国际交流外宣资料赠送外国使节和孔子学院等为主要用途,是首次以官方渠道进行少林功夫外宣之创举,这标志着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走出去步伐的速度和广度,并规划向西班牙语、德语、法语、俄语、日语等多语种外译拓展。

近年来,少林寺收集整理了《中国佛教医药全书》(101卷)、《禅宗大典》(200卷)、《中国武术大典》(101卷),被誉为当代“少林三大部”,主编了《少林武功医宗秘籍》《少林功夫》《少林戒范》《禅露集》《少林文化研究论文集》《少林寺年鉴》《少林寺大百科》等数十种著作,被珍藏于少林寺藏经阁。少林寺还充分利用互联网优势,建立“十方共建禅宗数据库”,将历代禅宗人物数理统计,追本溯源。这些都是对弘扬少林功夫所做出的努力,少林功夫也作为载体在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但这也充分体现了少林文化的典籍和著作因各种原因并没有被外译出国门,是少林文化弘扬与传承过程中的憾事。

从学术研究视角看,我国少林功夫发展主要集中在近代,通过可视化图谱的分析来看,少林功夫研究的相关文献较易挖掘、收集和整理。政府与地方对中华武术的国际推广催生少林功夫对外传播的国际认同,《中国全球国际形象调查报告》显示中华武术、少林功夫都是最受欢迎的高频词,少林功夫曾跃居榜首。从传播学视角看,田文林、黄震(2012)等认为中国武术的对外传播较其他对外传播形式更全面,应从武术技术、制度和精神文化三个层面以及充分利用新媒介环境中的传播模式,如现代多媒体、网络、数字技术,电视、影视等传播介质;李晓婧(2014)、郭玉成(2013)提出通过汉语桥和孔子学院等项目或形式传播少林功夫文化,树立国家形象,提升国家软实力;吕韵钧(2018)、陈孝慧(2018)和焦丹(2017)等提出从中华文化“走出去”和“一带一路”国家战略研究的观点。从文化译介学视角,鲍晓英(2015)、李智(2008)、谢天振(2014)等对中华文化外译的译介五要素论析;汪升(2018)从最能体现武术文化面貌的文本选取、文化译介原则、译者主体和传播效果等视角,认为国内出版的大量武术双语教材或读物仍未真正走向世界,被世界所接受认同。此外,笔者认为,少林功夫的对外传播还需要从对外传播话语体系、外译话语体系、翻译实践与翻译理论、质性与量化相结合的研究方法等方面进行更

全面、系统的深入研究。

综上所述,少林功夫的继承、传播、发展和弘扬需要依托于中华武术的国际知名度和国际话语体系,其实质是国际话语权问题,译介对少林功夫国际传播起到载体和桥梁作用,学界对其发展脉络和传播问题与价值的研究具有现实意义。

(二)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

从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出发探索翻译传播路径与方略,遵循其健身、文化、政治、历史及宗教价值等属性,使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有的放矢,首先需探析其翻译传播障碍现状。

1. 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障碍

笔者通过文献综述和调研访谈析出三类少林功夫翻译传播的障碍所在。一是文化差异障碍。中国文化国际传播的种种问题使西方国家对中华文化存在误读,西方外来文化的强势渗透使少林功夫传统、技术等发生严重异化,其表现形式及发展样式也频遭诟病。二是传播路径障碍。少林功夫译介仍停留在功夫技术描绘层面,对于其文化内涵和价值认同往往率尔操觚。译介主体单一、途径狭窄、效果不佳、原则不规范等问题凸显。三是国际认同障碍。中国少林功夫英文版图书仍以国外出版社为主,从国家文化安全角度看,“他者”翻译的“再塑造”和单方操控过程中,文化意义面临被解构与重构的危险,文化失真和话语体系的不平等地位造成国际受众认同障碍。

2. 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价值

当今形势下,“一带一路”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倡议为中华武术文化走出去提供了契机;在对外文化传播中,语言是文化的载体,翻译是文化传播的桥梁,国际交流的日益频繁赋能翻译,其传统功能远远超越了单纯的语言学范畴,逐步成为关乎国家文化软实力和利益的“国家翻译实践”“文化外译规划”等宏观战略问题。中华武术对外传播是提升中国体育国际话语权、促进中国体育产业走向世界、推动中国体育文化传播和维系华侨华人民族情感的重要载体。

从少林功夫翻译传播的学术价值上看:第一,少林功夫翻译传播丰富翻译学理论和实践研究成果。少林功夫译介立足于少林功夫文化意义的跨语言言说和表达,以完整的构建和还原少林功夫语言和文化意义为目标,是从理论到实践对中华文化外译的进一步深化和丰富。第二,丰富跨文化交际理论与实践研究成果。少林功夫译介是少林功夫文化对外传播的载体和“脐带”,打破不同国家之间的语言壁垒,获得国际文化认同,构建少林功夫外译话语体系

至关重要。第三,丰富少林功夫哲学思想对外传播的深度和厚度。少林功夫译介溯源可以析出国内外少林功夫研究现状和问题,探索通过少林功夫文化的内核外译传播中国哲学思想的路径,促进文明互鉴、文化共融。

从少林功夫翻译传播的应用价值来看:第一,少林功夫翻译传播有利于为中华文化“走出去”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以少林功夫为载体,向西方国家译介翻译少林功夫文化哲学思想,是“战略引领、解除疑虑、破除偏见”的有效途径,帮助西方国家认同我国传统文化价值观。第二,有利于通过文化融合实现民心相通的文化传播策略。对促进“一带一路”文化交流与贸易合作和国际社会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认同具有实际应用价值。第三,有利于中华文化其他译介翻译内容,如中华典籍、中医药、中华美食等以及文化、术语翻译策略与方法的借鉴。

四、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实践问题研究

(一)有关“译何”的问题

传播少林功夫需要进行基于跨文化传播理论的实践设计和科学论证,不能随意而为,源文本的选择需要从其目的性考量。正如布迪厄场域理论所言,译者、出版社或政府机构对源文本的选择决定了该译本是否会被有效传播。目前,经笔者全面梳理,少林功夫源文本主要集中在学术性文本、连环画、绘本、拳法套路、典籍、歌诀、术语、旅游手册等形态。首先,不同目的下的翻译传播对文本要求不同,译者就需要从中文撰写的标题、章节之间的连贯性、整体组织架构以及知识性和趣味性上进行科学考量。其次,具体到中文文本的歌诀和碑文而言,歌诀和碑文是中国功夫文化的典型特色,也是翻译难点。从“讲好中国故事”传播视角来看,歌诀和碑文部分是否需要和值得外译出去有待商榷,“故事”的内涵是趣味性而非学术化,歌诀和碑文部分如果确实在外译过程中需要保留以显示中文话语之精深,则需要译者在深度识解后,先翻译成现代汉语的白话文,再译成外文,即从“语内翻译”过渡到“语际翻译”的“转译”过程。再次,中国历史上对功夫发展的看法持有分歧,少林功夫一直被默认为是嵩山少林,那么莆田南少林和北少林是否有联系,是否要在中文撰写过程中加以交代来避免争议,需要译者与源语作者确认或通过其他官方渠道取得确凿信息。最后,由来已久的中国武术哲学之争辩。在笔者主持完成的《中华源·河南故事·少林功夫》外译团队中,双语武术教练兼译者提出,李小龙曾称自己既不是功

夫高手,也不是武术家,而是武术哲学家(Martial Arts Philosopher)。因此任何一种运动、艺术形式等,最终都会归于或者终将归于一种生活方式的哲学表达。现代年轻人对功夫的物理学和生理学机理兴趣颇浓,而年长者更多关注和思考功夫所隐含的哲学表达,从而指导或启迪、引领人们的日常生活,接近一种禅的修悟。

因此,在“译何”问题上,少林功夫外译源文本选择要充分考虑到译本的趣味性和可读性“供给侧”问题,即二者的平衡和倾斜,以尽可能扩大读者群体范围。统一定位丛书文本体例,增加武术套路的招式图,综合考量出版物的外在形式,包括对读者产生多模态影响功能的色彩、纸张、美观和尺寸等等。近年流行的金庸小说《射雕英雄传》等功夫文学译介也从传媒学、“迷思(myth)”理论等视角增进了世界对中国功夫的感官认知和神话神秘感;此外,在中外友好交流过程中,很多国家领导人作为功夫爱好者也成为中国功夫国际传播使者,如2019年玻利维亚外交部部长到访登封少林寺已成为一段佳话,促成了玻利维亚武术双边援外培训班等国际合作,使少林功夫既成为民间功夫爱好者交流的平台,更成为国家之间的友好交流媒介,少林功夫的国际传播在“人类命运共同体”构建过程中起到不同程度的显性和隐性作用。

此外,无论是源语文本抑或外文译本,译者首要厘清少林与功夫的关系、少林与太极的关系、少林与佛教的关系、故事性与知识性的关系、国外武官与少林功夫的关系、中国功夫与少林功夫的关系等。要洞悉“功夫”是中国武术在国内外长期传播以来形成的宏观概念,国外甚至很多国内读者将所有的中国武术都未加区分,统称为“中国功夫”,已成为一种大众认同的普遍概念;而在门派众多的中国武术当中,国际上最有影响力的中国武术主要是指少林功夫和太极拳,少林功夫更能代表河南的特色,最具代表性。

(二)有关“何译”的问题

以《少林功夫》(2019)中翻译问题为个案分析,针对中英文化异质性产生的文化不可译性,以及功夫、宗教相关的专有名词和术语在英译过程中难以实现与英文单词、短语的完全对应等问题,需要根据译本选取合适的翻译理论进行“生态”翻译,以下举例说明:

1. 词义对等缺失的选择。武术术语汉译中的词义对等缺失是普遍现象,以少林功夫“十八般兵器”中的“刀”为例,因兵器中刀的造型和功能不同,名

称也不尽相同,每一种刀都富载着一段悠久的历史 and 神话传说,将刀名冠以人物、造型亦或典故,统称为“刀”的集合。英文中的刀种类繁多,与中国武术兵器“刀”相对应的常用 broadsword 或 sabre。精确而言,sabre 是并入 broadsword 的一个子集,与中国所指的“刀”的集合中部分对应,而 broadsword 的语义范畴则是大于“刀”的集合,除了包括 cutlass, golok, machete, parang, sabre, shamshir, szabla, shashka 等刀种之外,还可指各种 basket-hilted swords (笼手阔剑),无论是刀或剑,都有其独特的地域特点和发展历史。因此,在汉译英词义无法完全对等时,broadsword 和 Dao 的译法相比之下更为可取,前者包含范畴更广,后者音译更易接受并贴近中国文化。随着中国武术运动的发展和对外传播,Dao 可以像苏格蘭战刀、瑞士战刀、阿拉伯弯刀等一样准确表达并被广泛接受的英文符号是武术文化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的目标。

2. 文化冲突下对等的取舍。翻译过程中,某些中文专有名词有极精准的英文表达与之相对应,但为了防止文化局限引起与历史事实不符的误读,有些表述被舍弃和改动,选择“动态对等”和“变译”“改译”等翻译策略。例如兵器中的“拐”,尤指短拐,英文表述为 tonfa,语义与“短拐”完全对等。维基百科显示 tonfa 是源于中国和东南亚的武术兵器(The tonfa is believed to have originated in either China or Southeast Asia where it is used in the respective fighting styles),而事实上,对 tonfa 的普遍性识解则指日本冲绳岛古代武术中的“拐”。无论是冲绳岛古武术中“拐”的应用,还是东南亚国家“拐”作为兵器的使用,均源于中国传统武术。因此,尽管中英文词义完全对等,为避免文化误解和技术理解偏差,在翻译中选取了 crutch 的译法;再如“禅”的英译也是如此,应普遍音译为 Chan 而非日式译法 Zen。

3. 第三方文化介入下的译法交融。少林武术与佛教禅宗的密切关系使少林功夫外译过程中出现大量佛教术语和偈语,如“慧”“定”“般若”“不杀生”“魔”等,这些词汇在佛教禅宗中的含义与常用语义有别。对于其中部分术语,我们选择使用该术语的梵语英译,一是减少二次翻译中的信息流失,二是这些英译本身就已具有广泛接受度和认可度。同理,如“跋陀”“达摩”“紧那罗”等出现频率颇高且在文化传播中占有重要地位的古印度人名,也选择运用梵语英译为宜。这些中文人名原本就是从梵语中音译过来,采用梵语英译,也是一种“回译”方法。如东渡日本的鉴真,他的日文音译名字是“がんに

人”，若译者在日文文本中按照日语发音转换成英语，则会使译文混乱。

4. 文化差异下忠实的妥协。以读者受众接受为目标，为实现“文化解码”到“地道编码”的翻译过程，译者需要全面考虑文化差异因素，意向性妥协于“忠实”，超越 word by word 的“形合”，实现偏向意义忠实的“意合”。如：少林功夫特点中提到“身形如泥鳅般地光滑”，在翻译中选取 eel 而非 loach 就是为实现意义忠实而妥协于字面忠实的例子。少林功夫的文化特点之一就体现在将套路、招式、动作的名称赋予历史人物、典故或是动物动作，从而极形象地传递出相关性，使读者身临其境、感同身受，而在描述这些招式、动作时，译者自然而然地高频率使用隐喻叙事等修辞手法来诠释文化负载词文化内核。

以上四种翻译情形，是少林功夫文本特征所突出需求的词汇、文化等翻译手法，少林功夫翻译以其特殊文本特征、特定文化特点以及特别外宣需求，对汉译英译者素养提出更高要求，译者主体性和译者操控等译者行为在外译传播中也至关重要。此外，在少林功夫外译过程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林林总总，还存在精炼与精准的矛盾、望文不可生义、语言发展变化和翻译陷阱、其他武术运动表达的矛盾与借鉴等问题应对和技巧策略的探索与选择，如何使国际社会认同中国武术外译话语，是对译者的考验和译作的检验，是译者新的时代任务和历史使命，因此，武术文化外译所凸显的问题亟须通过武术对外传播话语体系构建来解决和突破。

五、对策与建议

少林功夫译介溯源及其翻译传播实践价值、问题与对策的研究最终目标是通过翻译实践提升翻译传播效果，改善翻译传播人文环境，使译入语群体最大限度地接受和认同中国文化。综合而言，少林功夫译介的翻译传播效果受“微观”和“宏观”层面的因素影响：微观层面包括译介主体（译者身份、定位、动机、偏好、背景等）、译介内容（少林功夫术语、谚语、典籍、神话、歌诀、碑刻、偈语等）、译介受众（译入语受众身份、偏好、立场、受教育程度等）、译介途径（跨国、跨民族、跨语言、市场需求等）和译介效果（译介质量、出版质量、纸张、设计、颜色、外观等）因素；宏观层面包括译入与译出国所面临的国际形势，双方经济、历史、文化、政策、意识形态、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传播机制等因素的影响。针对本文少林功夫译介溯源及其翻译传播价值与问题的分析，本文提出相应对策。

第一，少林功夫对外译介翻译传播首先要考虑

源语译介、译入语特征和两种语言文化的差异性，针对“作品本身的可译性”，优先挑选易被译入语读者接受的作品译介。少林功夫译介首先要对少林功夫哲学思想所蕴含的文化内涵进行加工后译出，对译入语语言特征和译介内容可译性的掌控尤为重要。第二，少林功夫译介文本应遵循翻译历史规范，形成稳定的文化格局。文化异质性及其他多种因素决定了少林功夫文化不可能被西方国家全盘接受和认同，应将少林功夫、武学、武道等哲学理论内涵译介翻译，将少林功夫文化中天人合一、身心和谐、崇尚中和的核心哲学文化思想传递给世界。第三，少林功夫译介主体应由熟悉中国武术领域的国外汉学家、翻译家等中外译者协同合作完成，同时熟练掌握双语或多语种的语言学者和习武者多重身份译者，形成协同创新的“合译共同体”翻译模式。第四，少林功夫对外传播译介要据其用途，借助少林功夫图书出版物（文学作品、宣传手册、旅游手册、连环画、绘本等）、融媒体（少林功夫专门网站、网络小说、手机客户端、微信公众号等）、电影电视（动漫、电影、电视剧、娱乐电视节目等），以及其他多模态途径译介，充分利用 5G、大数据、人工智能等现代技术手段。第五，顶层设计。架构少林功夫译介翻译传播机制，提升国际社会对中国文化认同度。如，强化区域国别外译：突破现有海外少林功夫文化中心或机构外译格局，据其文化特征，探索新的少林功夫译介翻译路径，如依托孔子学院的少林功夫“武林汉韵”巡演、少林禅宗大典的网络模式及以表演形式走进百老汇舞台等；强化以受众为主体的实证研究，利用国内外少林功夫文化交流资源获取科学数据，使少林功夫文化外译在不断更新的当代语境下更有针对性和实用性，《中国国家形象全球调查报告》的调查研究就是效果鲜明的实例；加快制定少林功夫外译标准与规范、构建大型少林功夫专门用途语料库、智库建设等。

通过对少林功夫的学术研究现状、译介溯源、翻译传播实践价值、具体问题剖析和对策与建议的提出，本研究旨在通过提升少林功夫的译介翻译传播能力增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国际认同度，以少林功夫为载体、文化为纽带，弘扬中国优秀传统文化，促进人文互鉴、民心相通，为国家形象构建和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国家战略献策。

参考文献：

- [1] 郭琦, 洪晓楠. 中华文化走出去战略研究[J]. 文化学刊, 2016(9).

(下转第 106 页)

疫情背景下听障大学生线上教学有效性探索

谭笑风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听障学生是教育受众的特殊群体,在教学开展过程中,教学内容的有效性传递和输入,需要手语翻译等多维度教学信息传递方式的配合。突发疫情中线上教学工作的开展,为听障生教学工作的有效性开展提出了挑战,同时也为充分把握和运用现代信息技术来开展基于听障学生的教育教学改革提供了机遇。就是要充分利用现代信息技术,探索把处于物理隔离、不同场域下的主讲教师、手语翻译人员、学生置于同一学习平台的实现方式;探索不同教学平台的优势,实现软件功能的交互使用;探索主讲教师主导下的,手语翻译、课件、语音转换实现语音、语音手语、图片、文字立体化、复合式教学框架。

关键词:突发事件;教学工作;信息技术;听障学生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6

中图分类号:G434;G76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87-05

新冠肺炎疫情在世界蔓延,全国启动重大突发公共卫生事件一级响应,各高校延期开学。同时,全国各高校积极响应教育部号召,综合运用各种信息化手段,“停课不停学”,开展教师在网上教、学生在网上学的网络课程教学实践。在线教学是互联网技术发展与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相结合的必然产物,有助于整合共享教育资源、促进教学相长。本次大规模线上教学就是课堂教学和信息技术深度融合的大演练,为更深层次地利用现代技术,推进线上教育提供了借鉴和参考。听障大学生由于听觉障碍,其线上教学既具有普通大学生的共性,也存在其特殊需要和探索空间。

一、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中的运用

随着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信息技术对社会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知识大爆炸、信息资源剧增,多媒体技术和网络技术广泛应用并迅速地改变着人们的生活。教育需要针对信息社会的特点做出反应,以迎

接信息时代的挑战。特殊教育也不例外。

(一)特殊教育信息技术发展的必然性

特殊教育反映了社会的文明进步,一个国家特殊教育的发展实力能够体现一个国家的文明程度。没有特殊教育现代化的教育现代化是不完整的教育现代化,各种信息技术已经被广泛地应用到特殊教育发展之中,包括慕课等线上教学等教育方法手段的运用。特殊教育现代化可以说是改变特殊教育落后局面、促进特殊教育均衡发展、实现特殊教育跨越式发展。新冠肺炎疫情的到来,倒逼信息技术在特殊教育群体的全方位运用,尤其在上课方式方面,各种平台、语音转化、手语翻译与主讲教师的角色融合,等等,为特殊教育信息化建设提出了新的实践与开发探索视角。

(二)特殊教育信息技术发展的特点

特殊教育信息技术的特点主要表现在以下7个方面,一是个别性。信息技术作为表示、演示、交流、

收稿日期:2020-12-20

基金项目:河南省高等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特殊教育语境中‘线上线下’融合育人模式研究”(2019SJGLX567);2019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教育教学改革研究与实践项目(思想政治教育类)“高等特殊院校思想政治教育‘线上-线下’融合育人模式研究”(ZGJG2019066A)

作者简介:谭笑风(1972—),男,河南永城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思想政治教育 特殊教育。

个别辅导等活动的工具可以弥补板书、黑板等传统教学媒介功能方面的不足,加强师生之间情感和信息的及时有效互动,能更有针对性地解决特殊学生个体之间学习特质的差异,根据特殊学生的特点提供不同的教育和帮助。二是多样化。信息技术提供资源环境,拓宽了以往知识来源的单一化现象,为特殊学生提供多样化学习路径。一方面特殊学生可以根据个人兴趣与个性差异对所学的知识 and 学习进程在一定程度上进行自主选择;另一方面,他们可对某一专题的相关内容通过信息检索、收集和处理,实现问题解决学习和发现学习,培养独立思考能力。三是直观性。信息技术作为情景探究和发现学习的工具,特别是网络拓展了特殊学生的认识空间,不同于传统的纸本印刷教学材料,它能提供很多图文声像并茂的资源,将抽象的道理形象化,通过鲜明的形象感化和对比,对特殊学生产生视觉等感官方面的有效冲击,激发起虚席情趣。四是合作性。信息技术作为合作工具,在基于网络的合作学习过程中,其友好的交互环境有利于调动特殊学生积极参与,包括竞争、协同、伙伴和色彩扮演的的基本模式,通过计算机互动合作的网上合作学习,在计算机面前合作的小组作业和计算机扮演同伴角色等形式提高学习效果。五是辅助性。作为评价、教学管理工具,具有计算机化测试与评分、学习问题诊断、学习任务分配等功能。最新发展趋向是在网络上建立电子档案,对学生评价、考核具有实时、动态、全方位的特点。六是无障碍性。纵观特殊教育信息化的过程,其特征是无障碍的网络化。特殊教学信息资源可以高度共享,教学活动不受或较少受时空限制,便于进行远程异地的协同合作,实现互想想通,多向互动。七是特殊性。需要注意的是,信息技术的应用不会自然而然地创造特殊教育奇迹。任何技术的社会作用都取决于它的使用者。特殊教育技术变了,教育方式也得相应变革。教师要掌握现代特殊教育技术应用理论和技能,创建多媒体和网络化的特殊教育信息技术教学环境,建设多媒体与网络特殊教育教学信息资源库,使之能高度共享。通过实践探索构建新的有效教育教学模式,促进特殊教育信息化。由于特殊教育对象的特殊性,原有的信息技术和硬件软件设备应该具有其特殊性,以适应特殊学生的需求。

二、听障大学生线上教学的困境

在进行大规模的全媒体常态化教学应用的实践过程中,出现了若干问题与挑战,如“网络基础条件研判不足”“学生参与性和持续性不高”“优质线上资源得不到有效利用”“教学和管理策略落后”,等

等。听障大学生的听觉障碍限制了其课堂信息的声音通道,线下课堂中的手语翻译和主讲教师同时在直播课堂出现,课件、手语画面、语音文字同时呈现,为视觉信息的集成和互动带来了一定的挑战。

(一)教学对象的需求

现在高校学生很多都是00后,从出生就沉浸在数字化的社会里,手机和网络是日常生活的必需品,是信息时代的“原住民”,在思维方式、学习方法和兴趣爱好等方面更喜欢动态化、视觉冲击力强、表现方式多样化的形式,与以往学生有很大区别。^[1]听障大学生具有与普通大学生的共性特征,但在信息输入渠道和输出方式上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基于聋人为教育受众的教学用房设计规定:聋生由于听力障碍,诸多由耳获取的信息只得以眼代耳,以其他感官感受和障碍带来的缺陷,如以不同灯泡颜色的亮、灭,有规律的闪烁,利用电视通过文字、图像传达信息,相互的交流以及手语及口形变化为媒介,通过振动感受节拍的韵律等,实施教学。^[2]因此,听障学生在声音接收方面的障碍,需要教师的手语支持、手语翻译的翻译以及相关技术支持服务。教师需要同时考虑听障学生的多重需求,在寻求信息技术支持的基础上,根据听障大学生认知特点选择合适的资源和平台。教育教学设施指的是基本教育的软硬件设施,硬件设施包括校舍、操场、体育设备以及其他多媒体计算机、投影仪、实物展示台、监控器、音响等日常教学设备、现代教学器具等。软件设施包括师资力量、后勤服务、办学条件,教学管理是否严格规范,教学资源等。聋人大学生由于生理上的特点,在教育教学中对多媒体设备、康复与辅助设备 etc 教学设施的需求远远大于普通学生。有些学校已经开始在每间教室都装有一台液晶屏,将课程信息、教学通知等信息全部通过它来告诉学生;在体育馆、律动室也都设置电子屏,屋顶安装一排专用灯,使学生在进行相关活动时可以通过灯光强弱和变化踩出不同节拍。

(二)异位散布式的教学组织空间

专业教师、手语翻译、听障学生处于各自空间,缺乏同场域下的交互形式,存在异位散布式的情况。首先,在此空间中,师生需要借助媒体的支持构建特定学习环境;其次,线上课堂往往受到频繁跳转多种平台/系统等干扰,必须采用比校园课堂授课更丰富的交互手段,且教学交互需实现采集学生学习行为和学习效果数据的功能才能确保教学结构的流畅性;再有,学生学习场地转移至家中后,教师需要构建个性化教学策略支持线上教学,增加学习结构的

多样性以便满足不同个体认知习惯;最后,远程教育还需要灵活的学习架构适应不同学生所在社区及家庭的信息化条件,以实现与课堂教学实质等效的质量。^[3]听障大学生的课堂需要考虑到任课教师、手语翻译、学生三方的互动,但三方信息的沟通顺畅程度依赖于技术平台和各自的网络情况,因此会出现延迟和干扰的现象。

(三)信息技术画面、语音、文字的集成缺乏借鉴

信息技术的发展为语音文字的转换集成提供了可能,如讯飞和音书软件,可将语音转换成文字,为听障学生课堂信息的获取提供视觉支持。讯飞的听见字幕,采用科大讯飞核心的人工智能转写技术,事实验证音视频转写准确率高达95%以上。音书APP是音书科技推出的一款用于听障人士(聋人)沟通交流的工具软件,通过在APP中嵌入语音识别及语音合成等技术,实现听障人士的信息无障碍沟通,同时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行语言康复,进一步改善听障人士与外界沟通的现状。主要有字幕功能、语音训练功能、电话通信功能。可在现实空间实时转换,但在网上空间的教学领域进行手语翻译画面、任课教师语音和字幕文字的集成,还缺乏及时合适的借鉴经验,听障学生的参与度和主观性难以把握。

三、针对听障学生应急下的探索与实践

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性、学生获取信息资源的便捷性、人们生活学习场域的多变性、疫情下物理隔离的突发性等等因素倒逼教育教学改革。从基于新时代特征的教学内容、教学形式的改革探索,到基于新冠肺炎疫情传播特点教学实施,都需要对教学效果的有效开展进行不断探索和实践。

(一)平台的选择与实践

教师结合课程特点和授课需要,选择不同的在线教学平台。在线教学平台更注重师生互动。除了满足基本的直播授课需求外,屏幕共享、课堂问卷、弹幕等交互手段、在线教学平台推出的在线黑板功能(配合手写板硬件使用)。慕课等在线课程也得到广泛应用。通过筛选和反复试验,结合听障大学生的授课特点需要,采取钉钉、雨课堂等具备回放功能、互动形式多样、支持视频连麦的平台。

(二)画面的同一性呈现

为确保在线课堂的临场感,促进技术上的综合作用与创新,任课教师通过连麦手语翻译,手语翻译全程在线为听障大学生提供手语支持,教师和手语翻译开启摄像头,保障听障大学生课堂沟通教学的无障碍和师生沟通的顺畅,教师通过讯飞科技、音书

等语音文字转换的信息技术,将语音同步转换成文字,听障学生将从手语翻译、任课教师、字幕等多种渠道接收课堂的语言信息和知识技能,实现教师画面、翻译画面和字幕翻译的同一性。

(三)复合式思路与实践

互动是线上教学的重要元素。运用网络直播教学时,以带入感和互动性为第一要素。主讲教师讲授与引导,手语翻译、PPT、文字等通过手语、图片、语音的文字转换,形成复合式、立体化教学构建框架,手语、文字、图片多触角的信息达成渠道,弹幕、手语翻译听障生信息反馈的双向交互频道。充分利用问题回答、在线投票、图片和文字投稿、随堂测试、设立讨论区等功能,组织讨论、答疑、作业、作品展示交流等系列在线交互活动,设计评价方案,建立互评机制,激励学生的学习投入,保持学习的持续性。^[4]课堂教学时,将鼠标调成荧光笔状态,提高课堂教学的直观性,运用直播平台的签到、投票、平台内信息,提高互动的频率,保证教学的质量。

(四)线上线下资源的结合

从目前各高校开设课程看,听障大学生的专业以艺术类专业和电子信息专业为主,需要大量的线下作业和自主学习。为保证线上互动课程的质量,任课教师提前制作线上学习资源、布置线下讨论问题和作业。线上学习资源包括微课视频、课件、学习笔记、习题库、在线作业与试题、演示实验、课前测试、艺术作品等,教师自建或收集的影音、新闻、实验、文献等资源,也包括来自学生的电子化优秀作业、报告和讨论也是宝贵的线上资源。通过发邮件、建立QQ群、微信群、企业微信群、钉钉群、网盘链接等方式,上传给学生。学生通过结合线下教师上传的资源,提出问题、集体讨论和作品作业,结合作业批改,线上教学教师针对问题提出解决方法和思路,提高课堂教学的效果和有效性。

四、线上教学的效果反馈

通过前期的平台测试和相关试验,保证了网络的稳定性和线上教学的质量。从在线学生学习情况、交互质量、作业完成等方面反映出听障大学生在特殊情况下线上学习的成果。

(一)在线学生数量和满意度保证

河南省本科高校每周在线教学问卷调查显示,两个月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郑州师范学院两所学校的听障生线上平均到课率达到90%以上,个别同学因为网络原因等无法及时参与线上教学,但教师使用的授课平台均具有回放功能,不影响学生的补课和学习。课堂上,由于教师课前教学设计的合理

调整,问题和兴趣点丰富,学生通过投票、选择题、讨论题、小组作业等形式自我展示的形式,参与程度较高。学生对课堂的整体满意程度在60%以上,不满意程度为10%,对个人学习效果的满意度较好的学生占到70%,学习效果虽然无法完全与线下课程相较,但线上课程前期的设计、课中的互动、课下的即时反馈,形成相对完整的课程闭环,学生的收获感较强。

(二)课堂交互频率及内容保证

互动是课堂教学的重要元素,是学生主动性学习的关键体现,更是线上教学师生情感交流的纽带。在线学习场景下,听障大学生的专业课教师创设适当的交互机会,让学生与教师、同学、媒体、资源等因素的交互。如在线学习工具能够为学生提供举手、连麦、提问、反馈等多种互动功能,教师创设更多学习任务及活动,学生带着问题参与远程课堂,并预设一些跟教学内容相关的提问、测试,让学生通过小组作业展示,紧扣所学内容,保证课堂交互频率及其质量。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教学院统计,听障大学生对于在线交流、布置作业、答疑等形式的互动效果满意度为70%,不满意为1%,对授课教师的网络课程建设情况的满意度为70%,说明在课堂交互频率及内容上的质量是可以保障的。

(三)作业完成和反馈质量保障

针对“授课教师是否会通过设计测试以及布置课后作业,来了解学生对网络课程的掌握情况”的问卷调查显示,96%的同学认为教师运用了此教学手段。设计电子作业,打通了学科视界与社会视界、生活视界的联系,紧扣当下社会生活热点焦点等时代背景,创设真实的学习情景及知识运用情景,指导学生运用所学知识与方法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复杂问题,做到学以致用,知行合一。老师们在课前布置预习内容,通过问题解决的方式上课,在课后布置作业,使用雨课堂及钉钉平台的作业批改功能,以巩固和迁移所学知识技能,并通过小组展示作业的形式保障学习内容的转化。

五、听障生运用新技术开展教学工作启示

做好网课时代的听障大学生的“主播”,需要任课教师具备良好的信息选择能力、信息技术能力、组织协调能力和风格转换能力,把握听障学生的专业特点、个性需求和课程情况,对教学内容和教学流程进行系统化、精细化设计。

(一)大力引进信息技术教学手段

雨课堂技术的支持钉钉、腾讯课堂等直播平台效能、微信和QQ群的沟通功能,为线上教学提供多

方面的广泛支持。但在信息技术方面,不局限于单一技术的使用,通过多角度多层面的技术支持,为线上教学提供从课前、课中及课后的保障。同时为确保知识信息的准确性和完整性,需要依赖字幕转换的技术。信息技术的引进,对改进线下教学,促进教学改革,同样具有很大价值。同时,随着信息技术的不断进步,一线教师、教育研究工作者都要深入研究、探索信息技术与听障学生教学之间的有效衔接。

(二)发挥手语与语音文字转化多重信息传达方式

听障大学生的课堂教学与普通学生的差异在于教学沟通方式的需求多样化。需要在现有直播平台的基础上,重视手语和语音文字转化的支持,因此听障大学生课堂上手语、字幕的共同支持是提高教学质量的保证,应引进语音、字幕转换的信息技术,发挥现代信息技术线上教学的多维度呈现功能优势,以促进听障大学生与教师、手语翻译之间的高效沟通。

(三)增强教学的画面感与互动性,注重前后贯穿

听障学生依靠视觉引起注意,且以注意转移力优于分配能力,但注意的稳定性相对较差,需要教师通过调整视觉材料来引起学生视觉,并通过提问、讨论、作业分享等互动形式,保持听障学生的注意力,增强学习效果。并通过线上预习、线下学习、线上测评等引导学生通过网上教学平台,完成单元在线测试,在线讨论、评价等任务,形成疫情下的线上教学链。

(四)文字呈现和画面呈现要突出知识与趣味的结合

教学的目的就是教学效果的达成,基于线上教学背景下的聋人教学,就要考虑聋人和线上教学两个特点开展教学设计。文字呈现方面要注意删繁就简,突出重点。就是要把文本内容,正确、规范、清楚地表现出来;要适当趣话,凸显主题。可以用不同的符号对讲授内容进行标注,既增加文本呈现的效果,又不会削弱文本的主体地位,简单美化,追求实效。文本呈现的视觉效果是文本教学有效呈现的重要表达方式,因此,可以对文本进行简单美化,如对文本设置背景等,更加突出文本效能。图片呈现,图形呈现包括图形、图像等,用点、线、符号、文字和数字等描绘事物几何特征、形态、位置,以及大小的一种形式。对于听障学生来说,他们的视觉能力较强,教学内容应多用简洁、友好、生动的图形呈现。图像呈现要突出图像的选择、呈现的时机,促

进图像效果使用的最优化,抓住学生的兴趣点,提高线上教学的实效性。

(五)结合疫情特点,提高课堂思政的实效性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不仅生成了听障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新场域,也对听障学生课堂思政教学提出了新的任务要求和内容架构。一是要把疫情防控工作中蕴含的中国精神、中国力量、中国智慧挖掘出来,加强生命意识教育,引导残疾学生珍惜生命、热爱生活,做到敬畏生命和向阳而生的有机呼应和递进生成。二是加强健康意识教育,引导听障学生树立健康的生活理念,做到体魄康健,心态平和。三是要加强生态文明意识教育,引导残疾学生践行绿色发展理念,敬畏自然,保护环境,做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四是要充分利用线上教学的新技术特点,形成生动、有效的教学效果,将思想价值、人文情怀润物无声的引导学生,达到入脑入心的效果。

参考文献:

- [1]解红,刘建.“互联网+”背景下混合式教学模式研究与实践:以大学计算机基础课程为例[J].中国现代教育装备,2020(5):50-52.
- [2]中国残疾人联合会网.特殊教育学校教学用房的设计[EB/OL].http://www.cdpf.org.cn/ywzz/jyjb/jy_254/jyzcfg/200711/t20071125_337639.shtml
- [3]张东淑,张湘.图式交互可视化教学策略在大规模疫情期间应用价值探析[J/OL].中国电化教育,2020(4):1-13[2020-04-13].<http://kns.cnki.net/kcms/detail/11.3792.G4.20200317.1105.004.html>.
- [4]王利民.线上教学的挑战不仅仅来自技术[N].中国教师报,2020-03-11(006).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of the Effective Online Teaching for Hearing – impaired Students During Pandemic

TAN Xiaofeng

(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Hearing – impaired students are a special group of education audience. In the process of teaching, the effective transmission and input of teaching content need the cooperation of 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and other multi – dimensional teaching information transmission methods. The request of conducting online teaching during the pandemic has posed a challenge to the effectiveness of the teaching work for students with hearing impairment. At the same time, it also can be an opportunity to carry out education and teaching reform for hearing – impaired students by applying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By making full use of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this article explores ways to put the lecturers, sign language interpreters and students from different physical places on the same learning platform. It compares the advantages of different teaching platforms and builds a compound framework in which the sign language translation, courseware and voice can conversion.

Key words: Emergencies; teaching; information technology; hearing – impaired students

新冠肺炎疫情下专业课程“思政元素”的挖掘与应用

孙钢军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特殊教育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2020年的全民抗疫,是高校教师进行课程思政的契机。从中华民族共同体、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中国人的家国情怀、奉献精神三方面分析抗疫中“爱国主义元素”的具体体现;从敬业、精益、专注、创新四个方面阐述“工匠精神元素”的具体内涵;基于“做中学、学中做”的教学理念,以鲜活案例导入为引领,以作品创作实践为抓手,进行疫情下课程“思政元素”的融入与应用实践探索。

关键词:思政元素;全民抗疫;爱国主义;工匠精神;挖掘应用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7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92-05

疫情是一场严重的危机,同时也是一个教育契机:全国人民众志成城,严防死守,最终战胜疫情,无疑是一本“厚重而鲜活的教材”,作为高校艺术专业教师,要有足够的敏感性和执行力,要立足于“课程思政”的高度,把“传道”,蕴藏在“授业”和“解惑”之中,借助疫情防控的契机,深入挖掘“思政宝藏”,将鲜活丰富的“思政元素”渗透在专业课教学全过程,并通过“春风化雨、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引导、帮助年青学子正确面对疫情防控形势,正确理解全民抗疫精神和爱国主义内涵,在技能训练、作品创作过程中践行工匠精神,并塑造正确的家国观、价值观。

一、全民抗疫实践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1. 抗疫英雄,彰显了“家国情怀”的人性光辉

抗“疫”中涌现出来的千千万万“最美逆行者”,用感人肺腑的实际行动,诠释着国人非凡的家国情怀与奉献精神。

“家国情怀”,是一个人对自己国家和人民所表现出来的深情大爱,是对自己国家一种高度认同感和归属感、责任感和使命感。也就是古人所讲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以及“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朴素情怀。实际上,“家国情怀”就是爱国主

义的一种表现形态。

“爱国主义”是个人或集体对自己国家的一种深厚情感,不仅仅表现为热爱祖国的壮丽山水,热爱自己的骨肉同胞,还应体现在对民族文化和国家制度等方面的认同和传承。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爱国主义是中华民族精神的核心。”

在这次抗击疫情的战斗中,充分展现了中国人民“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家国情怀。疫情严峻之下,一批批“民族的脊梁”站出来,义无反顾地冲向疫情一线,成为“最美逆行者”。钟南山院士,2003年一马当先率领医护人员奋力抗击非典,取得辉煌战绩;17年后,已84岁高龄的他,再次请缨出征,一方面带队科研攻关,一方面深入一线,指导治疗;陈薇少将曾参加过阻击非典、埃博拉等硬仗,1月26日,她率专家组进驻武汉,2天后便研制出新型冠状病毒核酸检测试剂盒,4天后投入移动检测实验室使用。随后他们又开始争分夺秒地研制新冠疫苗。武汉市普仁医院黄晓霞医生,在即将踏上回乡之路之际,接到了医院就地转岗到传染病科室的通知。虽然三年都没有回家过年,她依然毫不犹豫地退掉火车票,立即加入接诊工作之中;武汉大学中南医院

收稿日期:2020-10-15

基金项目: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思想政治教育研究课题“新冠肺炎疫情下高校艺术专业课程思政探索实践”(2020YBLX007)

作者简介:孙钢军(1968—),男,河南郑州人,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殊教育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聋人艺术教育。

护士郭琴,在“抗疫”中不幸感染病毒。但这丝毫没有击退她抗疫的决心,痊愈出院后,她又投入到一线抗疫战斗中;73岁的李兰娟院士被口罩勒出深深压痕的照片让无数人为之动容;还有主动接触医护人员、为他们排忧解难的“最美快递员”汪勇,以及千千万万奔波在街道社区、奋战在抗疫一线的青年志愿者,他们无愧是新时代的英雄。习近平总书记说过:“一个有希望的民族不能没有英雄,一个有前途的国家不能没有先锋。一切民族英雄,都是中华民族的脊梁,他们的事迹和精神都是激励我们前行的强大力量。”在“战疫”前线,“抗疫英雄”撑起一片蓝天,筑起一道防线,保家卫国,成为一道道最美的风景线。

2. 全民抗疫,凸显了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团结精神

此次全国人民众志成城抗击疫情的伟大壮举,深刻而形象地诠释了中华民族患难与共、同舟共济的大团结精神。我们经常说,“中华民族一家亲”,但是,由于缺乏切身的体验,这句话似乎只是一句说教,在许多学生的心里仍然是一个空洞的概念。而通过此次“全民抗疫”,广大学生从亲身体会和海量的视频、音频、图文报道等渠道,完全可以深刻体会到中华民族“同呼吸共患难”,并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活生生的现实。

在疫情面前,亿万人民并没有像某些人所说的“一盘散沙”、各顾自己,而是“一方有难、八方支援”,中华民族血脉里奔涌的团结精神,被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所激发。昔日繁华无比的武汉,被迫于2020年1月23日开启“封城模式”,但这并没有阻隔全国各地对武汉人民的援助之手。在最短的时间内,一支支医疗队日夜不停,驰援武汉;一批批加急生产的消杀产品捐赠给各大医院;一个个爱心援助团队,从千里之外奔赴湖北,开展对口帮扶;还有数不尽的民间热心人士,自发开展的对武汉和湖北各地的个人捐助……真可谓是全国人民“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在合力抗疫中焕发出国人团结一心、患难与共的团结精神。

坊间曾流传着一句所谓的“名言”,“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一群中国人则是一条虫”,意思是讽刺中国人不团结,窝里斗。平时觉得这句话似乎蛮有“道理”,并不觉得这句话有啥毛病。但是,在大是大非面前,尤其在本次疫情暴发的现实面前,我们能够切身体会到,这句“名言”是何其的荒谬和错误!中国人民团结一致所取得的“战疫成果”,不仅极大地彰显了中华民族的团结精神,同样也是为全人类做出了巨大贡献。但一些西方媒体和政客,不顾

客观事实,肆意歪曲和丑化中国人民的“抗疫”斗争,称新型冠状病毒为“中国病毒”,中国是“病毒发源地”等,诸如此类的污名化行为不仅不能掩盖病毒无国界的事实,反而增强了中华民族作为一个命运共同体的抗“疫”斗志与信心,反而凸显了中华民族命运共同体中“民族同胞”的价值意义。^[1]

3. 战疫奇迹,呈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在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万众一心的抗击疫情战役中,充分地体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特别是在“战疫”初期,我们能够在极其艰难、极其紧迫的情形下,创造出来世界建筑史上的奇迹:10天建成武汉火神山医院,床位达到1000张,15天建成雷神山医院,床位达到1600张;截至3月8日,全国已有346支医疗队共4.26万人驰援湖北,19个省市对口支援湖北16个市县;各级财政安排疫情防控补助资金超过1000多亿元,数以百万吨计的粮油、蔬菜等援助物资源源不断运往湖北。这些数据虽然只是整个“全民抗疫”中的冰山一角,却能够充分彰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一是党中央的坚强领导。疫情暴发之际,党中央及时成立应对疫情工作领导小组,及时向湖北等疫情严重地区派出工作领导小组,谋划、组织、推动地方全面加强防控工作;建立联防联控机制,做到了“全国一盘棋”,统筹兼顾,统一指挥,上下联动。二是集中力量办大事,全党全军全国人民拧成一股绳,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使。依据“集中患者、集中专家、集中资源、集中救治”的原则,将重症病例集中到综合力量强、救助体系完备的医疗机构进行治疗,有效避免了大规模疫情的进一步爆发。三是依靠人民,建立健全了市、区、县、乡镇、社区联防联控、群防群治的网络体系,通过各种渠道,号召、引导、组织14亿人全面参与,全员“战疫”。正是因为上述这些独到的优势,很快便遏制了疫情的爆发与蔓延,并获得了宝贵的抗疫经验。在海外疫情暴发之际,中国便成了世界范围内最安全的地方。相反,一些曾被人们奉为“人间天堂”的部分发达国家,由于制度的缺陷和组织不力,导致国内疫情迅速爆发、快速扩散,相继沦陷。世界卫生组织流行病学专家布鲁斯·艾尔沃德感慨地说:“我若感染,我希望在中国治疗。”这些活生生的例子,无一不凸显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在当代社会的优越性,同时也大大增强了我们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信心和自豪感。

二、艺术作品创作过程中“思政元素”的挖掘

(一)工匠精神的内涵

“工匠精神”,是一种职业精神,是职业道德、职

业能力和职业品格的集中体现,是敬业精神、精益求精、专注精神、创新精神、创新精神的结合体,也是做人做事的态度的一种精神内化,是从业者应该具备的一种价值取向和行为规范。

李克强总理在 2016 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国家、各企事业单位要着力培育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提品质、创品牌。

(二)工匠精神的主要内容

工匠精神,主要包含四个方面的内容:敬业精神、精益求精、执着精神、创新精神。

1. 敬业精神

敬业精神是从业者应当具有的一种良好职业精神状态,是从业者对所从事的职业既敬畏又热爱从而尽职尽责的精神状态。中华民族自古就有着丰富而珍贵的敬业思想资源。春秋时期,孔子道出了“执事敬”“修己以敬”等经典话语,主张人在一生中始终要勤奋、刻苦,为事业尽心尽力;荀子也主张“凡百事之成也,必在敬之”;中国经典著作《礼记·学记》中也有“敬业乐群”的记载。敬业,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民层面的重要内容之一。^[2]

2. 精益求精

精益求精,就是精益求精的精神,是从业者在工作中精雕细琢、力求极致、追求完美的良好职业品质。中国古代思想家、哲学家老子在其旷世奇作《道德经·第六十三章》中说道:“天下大事,必作于细”,这种“必作于细”的态度,其实就是精益求精的体现。

3. 专注精神

专注精神,就是专心致志,全神贯注,心无旁骛。它所体现出来的是从业者对所从事的工作的耐心、执着、坚守,是一种难能可贵的职业品格。有很多民间老手艺人往往终其一生专注于一门手艺,数十年如一日的坚守,初心不改,最终练就“绝技”,这是一切“大国工匠”们所具备的宝贵精神品格。正如蒲松龄在《聊斋志异·阿宝》中所说:“书痴者文必工,艺痴者技必良”。

4. 创新精神

创新精神,是指要具有能够综合运用已有的知识、信息、技能和方法,提出新方法、新观点的思维能力和进行改良、革新的意志、信心、勇气和智慧。创新精神是一种勇于抛弃旧思想旧事物、创立新思想新事物的精神。它是一个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现代人应该具备的素质。

科技部原部长,现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科协主席万钢曾在 2016 年答《环球时报》记者问时指出,

“创新也是工匠精神的一种延伸”。其实,任何一个时代的伟大工匠,都不仅仅只是满足于师傅所教的技艺,还要有一种“青出于蓝而胜于蓝”的突破与创新精神,否则,科学技术难以有大的进步,制造工艺也难以有更新换代。

三、艺术课程讲授过程中“思政元素”的应用

(一)“思政元素”融入课程的原则

1. 力争自然,避免生硬

要将“思政元素”融入专业课程讲授中,必须立足于自然而然,水到渠成,不能生硬地把思政元素强加到课程中。要做到“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要求教师像高水平的“厨师”一样,将“思政元素”做成易于溶解、消化的“食盐”和“佐料”,均匀地撒在课堂教学的环节中,并让它和专业教育的“饭菜”融为一体,烹饪出一道道适合学生口味、容易消化吸收的“美味佳肴”。

2. 力求鲜活,避免死板

课程思政的元素,要力求鲜活生动,避免死板教条。全民抗疫的伟大实践中,涌现出千千万万的抗疫英雄,传扬出数不尽的感人故事,这些都是最鲜活、最生动的案例,用这些案例中的某一个或几个闪光点,作为“思政元素”,恰到好处地融入课程之中,就显得比较自然,远比用死板教条的理论作为讲授资源要好得多。

3. 紧贴专业,避免虚浮

专业课的思政,与思政课程相比,虽然都有立德树人这一基本准则的要求,但是两者之间还是有很大区别的。专业课不可能像思政课那样用大量的课时,深入、全面地对学生进行思政教育,必须紧密结合专业教学内容,找准思政契合点,在专业教育的基础上,进行思政教育,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离开了专业知识的和技能的训练,课程思政也就成了浮云。

(二)爱国主义精神元素的课程融入与培育

遵循着立足自然、力争鲜活、紧贴专业的思政元素融入原则,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特教学院聋人视觉传播设计与制作专业的老师们,充分利用网络资源优势,将疫情中涌现出来的爱国主义教育元素充分地挖掘出来,并结合专业课的特点和聋生的身心特征,在教学过程中进行了课程思政的有益探索。

在《创意摄影》课程教学中,笔者以“抗疫英雄”的故事作为一条思政主线,引导学生关注、学习疫情防控中涌现出来的“最美逆行者”,组织学生用创意摄影的方式,通过创意、光影、构图、数码后期等手段,以视觉化、形象化的形态,彰显抗疫英雄们高尚的“抗疫精神”,表达聋人学子对家国情怀、奉献精神

神的理解和歌赞。马晓倩同学创作的作品《扫除病毒》，韩晓娜同学的作品《改天换地》，利用电脑后期制作技术以超现实艺术手法，韩海比布同学的《抗疫英雄》，则以现实主义的风格，表达了对抗击疫情英雄的敬仰之情，对家国情怀的讴歌之意。

聋人艺术设计专业的徐东华老师，将爱国主义教育的元素融入平面设计课程之中，引导学生用艺术设计的思维，通过点、线、面、色彩、肌理等构成要素，以艺术设计和数字绘画为载体，勾勒出“战疫英雄”们的伟岸形象，在电脑屏幕上设计、绘制出这些“民族脊梁”的光辉形象，传递出“舍我其谁”“召之即来”的“战疫精神”内核。表达自己对爱国主义精神的理解，抒发对抗疫英雄的赞誉之情。

艺术设计专业教师贺志强，利用精于绘画的优势，身先士卒，用画笔表达对战疫英雄的歌赞，并在课堂教学中，带领学生用素描、油画等艺术形式创作出一批高质量的“战疫”作品。

在授课过程中，老师们除了利用网络平台融合课程思政的元素，在课下和业余时间，也不失时机地将富含“家国情怀”“抗疫精神”的“战疫故事”，以图文并茂的形式，分享到班级微信群、钉钉群。同时，还在学院层面以“战疫”为主题，组织学生进行摄影、设计、绘画等艺术创作活动，为一线抗“疫”英雄加油，为爱国主义精神点赞，活动内容的鲜活性和艺术性有效激发了学生们“宅”在家里积极创作的劲头，优秀作品不断脱颖而出。

（三）工匠精神元素的融入与培育

在全民抗疫的火热实践中，涌现出一批批“最美逆行者”，他们在自己的岗位上所展现出来的不仅是奉献精神，也有让人为之感动的敬业精神。专业课老师可以通过网络、媒体等诸多信息化平台，收集、整合相关信息，做成图文并茂的课件，以学生喜闻乐见的形式，在课堂教学实践中，引导学生充分理解敬业精神的实质、内涵、价值和意义，从而端正自己的职业态度，提升职业素养，践行“工匠精神”。

在高校艺术专业的学子当中，有一种不好的风气比较盛行，那就是做事马虎，不求精细，凡事只追求“差不多就行了”。由于缺乏精益求精，做事情往往是粗枝大叶、潦潦草草。反映在作品创作中，就是作品构思不够缜密，不注重细节打磨，做工较为粗糙，作品经不起推敲。在本次抗击新冠肺炎疫情过程中，奋战在战疫一线的医护、科研人员身上所折射出的精益求精，对学生们来说是活生生的、真真切切的，仿佛就发生在身边，因此会在内心深处引发学生的思考和感悟。在辅导学生进行“抗役”艺术作品

的创作过程中，不少同学最初是抱着一种得过且过的态度去完成任务的，但是，由于专业课教师本着“从严”“从细”“从精”的要求，死抠学生作品的瑕疵，对作品存在的问题进行毫不留情的剖析，并逐一紧盯学生不放，直到学生按要求完成作品的修改为止。让学生在作品不断打磨的过程中，渐渐改掉马马虎虎、不求精细、粗枝大叶的毛病，树立精益求精的观念和意识，养成做事认真踏实、一丝不苟、追求完美的良好职业习惯，即使是“做一个钉子，也要做得最好。”

当下，年轻的学子们中间还普遍弥漫着浮躁的气息，做事不够专注，往往“一心两用”甚至“一心多用”；做事也不够持久，时常会“浅尝辄止”，遇到大的阻碍，还会选择“另立山头”。这种做事不能专注，极易分心的浮躁风气，已经成为不少学生专业学习和身心健康成长的巨大障碍。

以钟南山院士为代表的抗疫精英，立足本职岗位，数十年如一日，奋战在抗击病毒、细菌的科研和医疗前沿，专心致志，全神贯注，不达目的誓不罢休，从而突破一个又一个科研和技术难关，为中国乃至全人类的卫生健康事业做出了卓越的贡献，这恰恰就是对专注精神最直接、最贴切、最深刻的诠释。

真正的艺术创作，本身就包含着创新的元素。习近平总书记在2014年10月《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指出，“文艺创作是观念和手段相结合、内容和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是各种艺术要素和技术要素的集成，是胸怀和创意的对接”。2016年11月30日，在中国文联十大、中国作协九大开幕式上的讲话中，习总书记“希望大家勇于创新创造，用精湛的艺术推动文化创新发展。优秀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文化创新创造的能力和水平”。因此，引导学生从观念创意、技术应用到作品制作等各个环节进行“内容与形式相融合的深度创新”无疑就是艺术专业课教师应有的职责和历史使命。

然而，创新精神，在多数学子当中是极其匮乏的。其中一个主要原因在于应试教育使然。学生们天天是在中招、高考的“指挥棒”驱使下进行机械、被动的学习：考试考什么，老师就教什么；老师教什么，学生就学什么。整天围着考试大纲、试题册、练习题转圈圈，几乎没有真正的进行过主动性的知识探究，更谈不到有什么创新。导致绝大多数的学生成为“考试机器”，对死记硬背的知识烂熟于心，对考试技巧得心应手，对解题方法运用自如，但对于创新却束手无策。

到了大学，这种仅仅满足于一般知识学习的现

象依然存在。甚至有不少学生希望老师能够提供“保姆式”的教学服务,自己则“饭来张口,衣来伸手”——不想费劲思考,不想劳累动手,更不想有所创新。

特教学院聋人艺术设计专业教师在辅导学生创作的过程中,始终“逼”着学生自主学习,自主思考,自主设计,克服“等、靠、要”的被动式学习弊端,在不断地打磨过程中,增强学生的创新意识和创新能力。从期末作业的情况看,不少学生在构思、创意和技术应用以及后期制作等方面,都进行了一定的创新尝试,作品整体上呈现出较强的创新意蕴,基本上做到了“内容与形式相融合的创新”,作品得到认可,其中部分优秀作品被学院微信公平台采纳,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进行了线上展播,作品深受师生的好评。

四、结束语

爱国主义精神,是中华民族几千年来能够屹立于世界之林,立于不败之地的最根本的精神支柱,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传承和发扬;工匠精神,则是助力

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助推器和软实力。当下的中国,需要一大批具有深厚爱国情怀的“大国工匠”。这要从高校的教育抓起,从专业课的课程思政抓起,如果落实到人才培养环节,则需要具体的教学过程和教学任务中去强化、去培育。这种强化和培育,不仅仅停留理论教学环节,更在于实践环节的巧妙掌控,让学生在“做中学”——通过实践真正理解、体悟爱国主义和工匠精神的精髓,并付诸行动。

参考文献:

- [1] 李焕武. 新冠疫情危机与爱国主义教育契机[J]. 教育科学论坛, 2020(5).
- [2] 顾恩平. 课程思政视野下的高职生工匠精神培养策略[J]. 岳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8(2).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in Curriculums Under the Period of the COVID - 19 Pandemic

SUN Gangjun

(School of Special Edu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In 2020, Chinese people fought against the COVID - 19 pandemic across the nation, which is a good opportunity for teachers to conduc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n colleg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concrete manifestation of the patriotism in fighting against the COVID - 19 pandemic from three aspects, including Chinese national community, the superiority of the socialist system, the Chinese people's family and country feelings and the spirit of dedication. This article also illustrates the connotation of the Chinese craftsman's spirit in terms of dedication, proficiency, focus and innovation. Based on the teaching philosophy of “learning by doing” and combined with true cases and stories, as well as the practice of creation of works serving as the starting point, it conducted a practical exploration of integration and application of curriculum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under the pandemic situation.

Key words: Fight against pandemic nationwide; patriotism; craftsman's spirit;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elements; exploration and applications

基于华为鲲鹏生态的地方高校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

——以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为例

曹 敏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信息工程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 要:产教融合校企合作是地方高校提高人才培养质量,服务本地区经济和市场需求的重要举措。对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转型发展面临的问题进行分析,结合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产教融合教学模式探索与实践,阐述产教深度融合的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教育教学新模式,以达到促进地方人才培养供给侧和区域产业需求侧要素全方位的对接的目标。

关键词:产教融合;人才培养模式;鲲鹏产业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8

中图分类号:G642.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097-04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主动对接郑州市区域经济和行业产业发展需求,集聚优质工程教育资源,以提升人才培养质量为主线,以办学模式创新为切入点,以体制机制改革为动力,着力开展“产学研用思政”办学模式创新与实践;根据河南省数字产业布局和郑州市软件技术、大数据等支柱产业发展规划,结合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办学特色,成立了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致力于打造产教融合、协同育人、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工程教育示范样板,力争形成可推广的改革成果。

一、地方高校计算机类专业在教育教学存在的问题

当前,各地应用型本科院校都积极响应国家号召,已不同程度地开展了产教融合校企合作的探索和实践,也获得了一些经验和成绩^[1]。但是也普遍存在以下问题:

(一)人才培养定位与地方产业岗位需求脱节

目前河南省地方高校计算机类专业人才培养

存在定位不准、特色不够明显,与计算机软件产业融合度不高,学生实践操作能力和新技术运用能力不强等问题,如地方高校信息类专业存在开课内容雷同,特色不显著,服务地方企业及区域经济带专属课程不多^[2]。此外,高校信息类人才培养的规模、质量和结构不能满足河南省计算机软件产业和数字经济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二)课程体系不能满足地方政府经济结构战略的需求

当前河南省及郑州市的重大决策是发展数字经济,郑州市经济结构调整和产业转型向着国家数字中心城市发展建设,但目前省内地方院校信息相关专业还是遵循过去传统课程体系办学,不能适应计算机等相关信息技术日新月异的发展变化,特别是对省市政府的经济发展战略决策领悟滞后,站位不高,与服务郑州市打造国内一流、国际先进的数字经济发展高地的结构战略需求存在一定差距。

收稿日期:2020-10-09

基金项目:河南省新工科研究与实践项目 2020JGLX087;河南省大数据双创基地 20174101546503022265;教育部协同育人项目“大数据技术”实践实训平台建设 201701031013

作者简介:曹敏(1970—),男,山东曹县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信息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计算机网络技术、大数据分析。

(三)学校教师的实践技术能力与培养学生的双创能力之间不匹配

现计算机相关专业的教师大多都是毕业于院校后,就直接就职于高校,企业一线的实践工作经历不多^[3],加上计算机等相关行业技术提升迭代很快,使得教师所教知识基本原理较多,企业一线最新技术技能缺乏,对市场及企业技术未来发展方向缺乏前瞻性,指导学生创新创业理论技术指导引领性不强,进而造成高校培养创新创业的双创学生的效果不理想。

(四)高校专业课思政讲授生搬硬套学生兴趣不高

当下高校课程的专业知识的显性教育和政治思想的隐性教育不协同统一,专业课程实践和思想政治教育的结合不紧,专业课老师在挖掘本课程的思想政治课程资源不足,教育方式和方法单一^[4]。尤其是在专业方面的职业道德、职业理念等教育资源储备及更新不足。同时高校课堂缺乏对学生企业素养培养,包括守时守信,敬业爱岗等方面。主要原因是高校老师缺少企业工作经验,优秀企业文化氛围感受机会较少,掌握的思政教育资源和经验碎片肤浅,导致课堂专业课思政教学牵强单一。学生感觉授课思政内容相对专业课知识是简单植入,思政教学效果不佳。

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在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探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于2020年5月18日,与黄河科技集团创新有限公司及华为技术有限公司共同签约暨揭牌“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是河南省首批签约建立鲲鹏产业学院的高校之一。

鲲鹏产业是基于华为自主研发的鲲鹏处理器构建的全栈IT基础设施及行业应用,包括PC、服务器、存储、操作系统、中间件、虚拟化、数据库、云服务及行业应用等。鲲鹏产业秉承开放,务实,共享,共赢的生态建设理念。在当下面临西方信息技术封锁和脱钩的威胁,河南省政府适时推出了对鲲鹏产业的发展政策,具有深远的战略意义,其不仅牵引省各行业基于鲲鹏的商用解决方案落地,建立标杆行业应用示范,而且通过高校的参与丰富了鲲鹏产业生态,做大做强了国产品牌产业空间。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成立鲲鹏产业学院不仅是为了实现学校整体转型发展,建设特色鲜明的应用型本科院校进行有力探索,而且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还将致力于落实省政府与华为公司签署深化战略合作协议,支撑中原区域、郑州市区产

业链的创新型和应用型技术人才培养。学院将依托鲲鹏计算产业,从人才培养、专业共建、课程共担、师资共训,到课程思政、技术研发、招生就业等方面全面谋划,深入推进校企合作育人新模式,不断拓宽社会服务平台^[5]。并以此为契机,与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黄河科技集团创新有限公司在人才培养、立德树人、科学研究、平台建设等方面进行全方位的深入合作。

(一)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组织架构模式的探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探索推行理事会领导下的院长负责制,理事会由郑州市政府、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和中原鲲鹏生态创新中心双方联合国内鲲鹏生态龙头企业共同成立。理事会负责制定鲲鹏产业学院的发展方针、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目标计划,审议管理团队人员构成,决定其他重大决策事项。鲲鹏产业学院可根据需要设立院务委员会、学术委员会、教研部等相应内部组织机构。设置方案由院长提出,报理事会批准的模式。

学院宗旨是:校企双方互相尊重,互惠互利。按照市场原则推进双方合作,拓展发展空间,共创美好未来;自愿平等。坚持自愿合作,校企双方在合作框架中享有平等地位和权利;开放公平。坚持合作的公平、开放,坚持非排他性和非歧视性;优势互补。充分发挥各自优势,加强全方位合作,形成优势集成与互补;互利共赢。校企双方落实合作措施,提高合作效益和水平,推动加快发展,实现互利报理事会批准的模式。

1.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合作模式的探索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的校企合作是从人才培养方案到课程实训实施,从场所环境到实践条件建设,从教学资源建设到师资培训,从创新创业到科研服务,从企业文化到课堂思政建设等涉及专业建设和人才培养各方面的合作。具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通过三实教学模式提升学生培养的质量

鲲鹏产业学院将遵循工程教育认证标准而设计实施的人才培养方案,能够有效地将OBE理念贯彻到产学合作过程中,从而协助院校按照认证标准进行专业改革和人才培养。为此,鲲鹏产业学院独创的三实教学模式,通过实际场景、实践项目、实战检验,将企业真实操作环境搬入课堂,通过真实的实践项目来对知识点进行巩固和加强,将零碎的知识揉合在一起,让学生对知识有一个整体性的认识,例如:在开设的《鲲鹏应用技术与实践》课中采用的就

是华为企业丰富的真实应用场景和运行方案供同学进行分析和学习,涉及政府、金融、教育等8大行业100多个真实场景案例,帮助学生全面掌握鲲鹏云服务涉及的计算、存储、网络、数据库、容器、管理、安全、迁移、灾备等核心技术,并且学生在华为鲲鹏云计算平台上进行业务应用的部署与迁移、性能测试与调优测试,华为给所有鲲鹏课程提供了足够支撑线上课的鲲鹏云计算资源,免除软件环境安装维护的复杂性,让学生专注于实验设计本身,真正做到产教融合。同时配备从云计算行业的专家对同学实验进行指导和评价,最后,在有足够技能储备的基础上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实战学生不仅对项目用到技术理解进一步加深,而且达到郑州市数字经济发展对专业人才的需求。

(2)与国内领军企业共建实训基地深化课程体系改革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获得了包括华为公司在内的鲲鹏产业生态在平台、技术等方面的巨大支持,通过鲲鹏生态合作伙伴,向院校提供一系列教学产品和教学资源,更好地保障了建设内容和服务的一致性和流畅性。此外,校企共建人工智能创新实训基地,基地部署鲲鹏计算架构基础设施,以国产自主品牌黄河牌服务器和黄河计算机为硬件平台,以国产操作系统作为软件平台。实训基地引入华为企业资源,提供人工智能、大数据和商业分析的企业真实项目,学生在基地中组成工作组由企业导师带领完成企业项目,积累工作经验与项目案例,提升就业竞争力。一方面可以提升人才培养方案的质量,深化课程体系改革,另一方面在实训基地完成目标课程及企业项目实训的学习之后,可将学生推荐到华为生态企业和专业对口的企业岗位进行实习,帮助学生更好地巩固所学知识,增加社会阅历,积累工作经验。

(3)建立教师能力认证体系改进师资培训质量

鲲鹏产业学院通过共建教师发展中心,共同承办各级各类师资培训活动,对于郑州工程技术学院的相关教师进行基于华为云鲲鹏云服务、人工智能、大数据、Design Thinking 等技术培训和项目实战训练。同时,院校教师跟听由企业负责实施的课程或实践环节,并到企业进行挂职锻炼,联合行业权威企业、组织、机构,建立教师能力认证体系;优化教师培训模式,全流程线上操作,提升管理效率;提供教师能力信息管理,推荐学院优质教师为行业和社会提供创业技能培训。此外,华为公司及生态合作企业协作学院师生开展创新创业训练,通过联合组织参

与各类创新创业讲座、轮训、竞赛等形式,提高师生创新创业能力,并且优先对师生的创业项目进行孵化,提供扶持政策。

(4)政府—学校—企业协作联动多层次提升课堂思政教育效果

在顶层方面,通过政府一系列政策宏观宣传扶持,2020年9月28日,由河南省政府主办,以“鲲鹏新时代、中原更出彩”为主题的2020数字经济峰会暨黄河鲲鹏生态发展大会在郑州举办,会上再次明确内高校、企业等开展的鲲鹏人才培养,将全部纳入省职业技能提升行动补贴政策支持范围内,让社会再次见证了河南对于人才培养的重视和关注。中观层面,省内各高校在专业建设的方向性引导,将鲲鹏课程导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举办或鼓励师生参与鲲鹏开发者大赛,鼓励师生利用鲲鹏生态系统解决实际问题、创造新的模式和价值,并且利用学院网站宣传或通过视频直播方式大力宣传鲲鹏产业,有效激发更多优秀的师生参与其中,成就鲲鹏生态产业的全面发展。微观层面,把华为的企业文化和理念引入到课堂中,华为企业工程师实践教学的真实案例的讲解和剖析,包括美国科技打压华为的真实目的,和华为为了摆脱科技封锁展开的国内产业的鲲鹏和布局和今后的鲲鹏生态面临的问题及未来发展的前景等,不仅可以增强学生学习的动力,加快国产鲲鹏生态的普及和推广,而且还可以激发学生的创新的热情,及不怕困难挫折的创业精神,强化当代大学生勇挑重担不负历史使命的爱国主义情怀。达到知识传授与社会价值引领之间协同发展的教学目标。

(5)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产教融合协同育人的成效

目前,因为疫情原因,学生培养采取的是课程植入的方式,从5月13日到7月17日,共110课时,112名郑州工程职业技术学院的学生参与,经过为期两个多月的学习,结业网上答辩是由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华为技术有限公司、黄河科技集团、慧科集团等校企组成答辩评委对学生结业项目进行考核。通过学生课程前后作品对比,同学们不仅学会了在鲲鹏云服务器上的网站部署,对云服务也有了更深刻的认知。而且学生的爱国情怀、思维模式、动手解决问题、团队协作的能力都得到了锻炼和提高。

在专业建设方面,在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鲲鹏产业学院在成立不到半年时间里,与华为等企业一起完成了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的人才培养方案的修

订,并且智能科学与技术专业 2020 年 8 月被确定为河南省一流本科专业建设点,依靠鲲鹏产业学院立项了一个省级新工科研究与实践教改项目。

三、结束语

作为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协同育人是高校新工科转型发展的必然趋势,在 5G + 云 + AI 这样的时代背景下,企业对于人才的需求也在变化,数字人才严重不足。郑州工程技术学院通过鲲鹏产业学院,以校企合作的方式走产教融合之路,对打造一支适应高素质人才培养的一流“双师型”师资队伍,建立持续改进以产出导向的人才培养目标、课程思政、毕业要求、课程体系和课程大纲,学科专业的实现良性发展都具有重要的作用。同时也对连接各方力量,培养真正适应时代潮流的人才,提供社会化服务,共同推广鲲鹏生态,助力河南省计算产业的发展有着重要的意义。

参考文献:

- [1] 邓红卫,何敦培,孙文静,等. 地方应用型本科院校产教融合实践与探索:以衡阳师范学院中兴通讯信息工程学院为例[J]. 衡阳师范学院学报,2017(6).
- [2] 张胜,高先和,胡学友,等. 产教融合模式下创新型应用人才培养研究[J]. 哈尔滨学院学报,2020(8).
- [3] 郑鑫,张晓洁,唐文翰,等. “产教融合协同育人”背景下应用型人才培养模式探索与实践[J]. 科技视界,2020(20).
- [4] 习近平主持召开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座谈会强调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 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N]. 人民日报,2019-03-19(1).
- [5] 成宝芝,徐权,陈立勇. 地方本科高校产学研合作协同育人模式的研究与实践:以大庆师范学院为例[J]. 齐鲁师范学院学报,2019(5).

(责任编辑 许峻)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Teaching Model of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in Local Universities Based on Huawei Kunpeng Ecology

——Tak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Kunpeng Industry College as an Example

CAO Min

(Information Engineering College,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and school – enterprise cooperation are important measures for local universities to improve teaching quality and serve the needs of the local economy and market. The article analyzes the problems faced by th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local applied undergraduate colleges, combined with the exploration and practice of the integration of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teaching model of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 Kunpeng Industry College, and elaborates the new education and teaching model of computer – related majors that integrates production and education, so as to meet the goal of promoting the all – round connection between the supply side of local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demand side of regional industries.

Key words: industry – education integration; talent training model; Kunpeng industry

大学生时代精神现状、问题分析及教育对策

董华丽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传媒学院,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髓。高校是时代精神培育的重要基地,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传播源、辐射源,加强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是实现“立德树人”这一教育根本任务的具体表现,对培育引导大学生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和建设,对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重要意义。

关键词:大学生;时代精神;爱国主义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19

中图分类号:G64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101-06

习近平同志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凝结着全体人民共同的价值追求。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激励中华儿女为民族振兴不怕困难、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是中国人民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过程中不断创造新成果的力量源泉,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不竭动力,也是我国高等院校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客观要求。时代精神也是高校开展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和重要资源,是高校进一步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具体体现。

一、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现状

(一)研究现状

近年来,时代精神教育研究主要从新时期全球化背景及市场经济条件下,加强时代精神教育的必要性入手,从加强时代精神教育路径等宏观角度来研究。高校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的重要基地,是时代精神培育的传播源、辐射源。从研究领域来看,较早有针对性的研究始于2001年于桂贤《高校德育应率先关注时代精神》、任健雄《以德治校,塑造大学生的时代精神》。2009年后,研究领域才

愈加关注时代精神培育研究,如轩欣《加强大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的思考》、林泽红《论多元社会思潮背景下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等都为研究提供了丰富的借鉴价值。但随着时代精神在新时期的不同体现,又给我们带来新的思考,如从“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到“时代楷模”“双百人物”“改革先锋”“大国工匠”等先进典型代表的宣传报道,给人民带来充满正能量的牵引力。特别是教育部、中宣部等多部门组织开展的《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活动,贴近大学生群体,传播同辈群体的正能量,更能激发大学生对时代精神的共鸣,使研究者对新时期时代精神教育有了更加深刻的思考。

(二)大学生时代精神现状

1. 浅层的爱国认知

调查中,对是否会关注国家大事的调查,选择没什么关注占15%,选择经常关注的占45%。但是虽然如此,大学生的爱国主义的非理性因素仍占据着相当的比重。63.7%的学生表示身边存在不理性爱国行为或过激言论,但对不理智爱国现象的看法,选择反感的仅占17%,16%认为无聊,认为解恨和有趣的占绝大多数,可以看出,部分存在爱国认识简单化、浅层化的表现。

收稿日期:2020-11-20

基金项目:河南省社科联2018年调研课题“大学生时候精神培育对策研究”(SKL-2018-99)

作者简介:董华丽(1982—),女,陕西佳县人,硕士,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传媒学院讲师,研究方向高等教育管理。

2. 淡化的责任意识

调查对参加社会志愿活动的态度,愿意主动参与的仅占33.7%,对于毕业后选择奉献自己的仅占8.4%,而选择工资水平占大多数。大学生有一定奉献精神,但功利性明显,大学生的责任感不强。面对社会不文明现象的调查。部分大学生仍然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调查对遇见小偷偷东西的现象,37.6%学生仍处于“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认识。

3. 陈旧的教育思维

调查中,对是否喜欢本校的思想政治理论课程时,仅有31.2%的学生表示喜欢,对思想政治课课堂讲授效果进行调查,大部分学生选择枯燥无味。不难看出,目前的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大部分还停留在原有传统的教学模式和教学内容中,原有的教学思维和固有模式很难让新时代的时代精神进行传承。

二、当前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存在问题及原因

(一)大学生时代精神欠缺存在的问题

1. 大学生对时代精神认识不够深刻

目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取得举世瞩目的成就,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脱贫攻坚工作深入推进,经济稳步快速增长,社会主义各项事业有序发展,大学生对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具有高度的认同感。但由于多方因素干扰,一部分大学生的价值观受到不同程度影响。社会中存在的诸如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精致利己主义等消极思潮影响着大学生的思想观念及行为表现。如很多学生对社会中存在爱国行为、拾金不昧、乐于助人的事例表示高度的赞同和认可,但对各类典型事例、先进人物背后隐藏的情怀和精神实质没有深刻体会。存在只知好,不知为什么好,怎样才会好的深度思考,所以很难映射到个人的成长中去。

2. 大学生时代精神行为表现力较弱

在深刻感受中国精神带给我们的启发和鼓励时,面对一例例鲜活的具有时代精神的典型人物,如具有天下英雄气敢于担当的官东,以国家利益至上的科技报国楷模黄大年,见义勇为退伍军人吕保民等等,他们将这个时代呼唤的精神展现的淋漓尽致。由于大学生的自身特点,时代情感易接纳,但就其行为表现力方面,特别是对社会现象的处理,仍然是站在个人的角度思考问题。时代精神落实到每个个体上,就是日常生活的点滴行为,学生的点滴生活行为从另一个方面映射出个人的品格。如面对学生中遇到的不诚信现象,不文明现象,部分学生虽觉得行为不妥,但往往会视而不见。面对违法违规现象,采取躲避、逃避行为,在展现新时代精神方面,实践能力

较弱。

3. 大学生感知时代精神动力不足

大学生价值观的成熟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高校基础课程如马克思主义理论、思想政治教育等相关课程是高校开展思想政治教育的主要途径,但高校在教学活动中,更注重专业课的教学,忽视基础课程教学,必然导致时代精神教育的有效性。而在日常学习生活中,如各类奖学金、助学金的评选又只注重学习成绩,忽视学生的道德水平和行为规范,对学生践行时代精神产生一定影响。对部分高校教师来讲,虽然社会阅历丰富,但自身思想道德水准不高,对弘扬时代精神主旋律不能发挥积极的作用,也不能在学生中达到示范效果。

(二)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存在问题的原因

1. 市场外部环境对大学生时代精神认知的干扰

在思想解放、中西文化相互碰撞的背景下,文化的多元化发展已经成为全球化的必然产物,也正成为我国社会发展中不可否认和忽视的现实。特别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一些不良社会思潮也应该引起人们的广泛关注,如利益最大化,重视物质层面追求,忽视精神层面追求,甚至出现权钱交易、以权谋私的缺失公平正义的乱象,影响着青年大学生思想观念的变化。在这样文化多元、环境复杂多变的背景下,大学生刻苦奋斗的意志容易松懈,部分大学生存在不劳而获、坐享其成的错误认识,想通过走捷径达到目的,失去提升自我,失去改革的决心和斗志。

2. 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够完善

高校思想政治教育肩负着培养学生形成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重要任务,思想政治教育内容成为培根铸基的关键所在,更应当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不断发展。受外在因素的影响,如果思想政治教育内容不能占领思想政治教育的主阵地,不能与时俱进、因势而新,必然会受到错误价值观的侵蚀,影响大学生正确的社会理想信念的形成和良好的社会行为方式的养成。传统的思想政治教育内容已不能满足当今社会特点,不能抓住时代发展特色,更不能将中国精神贯穿始终,不能满足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的新要求。

3. 大学生接受时代精神的主动性不够强

在大学生成长过程中,每个阶段都有其成长特点,特别是在校大学生脱离了高中高压的学习状态,身心得到放松,自然容易对此年龄阶段共同关注的新鲜事物和人物产生共识。尤其受外来文化及思想的干扰,大学生追逐明星蔚然成风,如谈及明星的姓

名和基本情况,能做到如数家珍,但问及具有当代精神人物,如“中国天眼之父”——南仁东,守岛、守国的时代楷模王继才,还有张玉滚、黄大年等等充满强烈时代精神的鲜活事例关注度不够,主动学习和接受力不强。

三、加强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的对策

(一) 固本强基,丰富时代精神教育内容

1. 发挥思想政治理论课主渠道作用

2004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意见》指出:“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主渠道。”大学生要系统掌握时代精神的实质,就不可忽视思想政治理论课的作用。2016年,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上进一步强调,“做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要用好课堂教学这个主渠道,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

正确分析和全面把握时代精神的内涵是培育大学生时代精神的首要任务。培育大学生时代精神,思想政治教育理论课程发挥着不可替代的作用。一是要将时代精神内容纳入思想政治理论课的教材中,不断丰富教材内容,使教材知识更加生动;二是注重课堂的授课方法。传统灌输的方法已不能满足学生接受新知识的需要,教师在授课中要把时代精神的实质与生动事例相结合,利用多种教学方法使时代精神内化于心。三是要实现时代精神与专业课程教学有机融合。大学生由于所学专业的差异性,在时代精神教育过程中,也要有针对性地开展培育内容,使时代精神的表达更加深刻。

2. 进一步加强创新创业教育

2010年教育部颁布《教育部关于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和大学生自主创业工作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大力推进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工作,提出大学生是最具创新、创业潜力的群体之一。2014年李克强总理在夏季达沃斯论坛上提出“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号召。2015年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高等学校创新创业教育改革的实施意见》,对加强高校创兴创新教育改革提出明确要求。经过几十年的发展和努力,创新创业教育已成为经济社会发展和国家战略的必然要求。

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时代环境下,创新创业教育作为一种新的教育理念融入高等教育教学中,指导推进高等教育改革发展过程。高校创新创业教育要面对前所未有的机遇与挑战,从以下方面推进创新创业教育发展。首先,高校创新创业教育

要转变狭义的创新创业教育就是培养企业家的片面认知,而是应当树立创新创业教育理念,掌握创新创业教育的本质及其发展规律,使大学生理性、客观地看待创新创业教育,努力学习和掌握创新创业知识,在个人成长发展过程中践行改革创新精神,促进人的全面发展。其次,高校要将创新创业教育贯穿高等教育整个过程,在与专业学科相结合的同时,与学生成长的未来规划相结合,与思想政治教育的内容相结合,协同协作,共同发展,形成优势互补的教育教学体系。最后,要坚持创新创业教育推陈出新的观念,在成长过程中坚持自我批判,及时反思审视自己,革除不合时宜的思想观念,改变陈旧的思维模式,用新视角、新观点、新思维指导新的实践。

3. 发扬传统民族精神的传承

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长期的共同生活和共同社会实践基础上形成和发展的,为民族大多数成员所认同和接受的思想品格、价值取向和道德规范,是一个民族的心理特征、文化传统、思想情感等的综合反映。^[1]中国几千年历史告诉我们,中华民族已经形成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爱好和平等具有丰富内涵的伟大民族精神。

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北大师生座谈会上提出,爱国是人间最深层、最持久的情感,是一个人立德之源、立功之本。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已经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情感纽带和精神支撑、价值引领和力量源泉,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的重要内容。

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在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纵观中国发展史,古有“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的文天祥,今有心系祖国,淡泊名利,甘于奉献的黄大年。古今生动事例给我们诠释了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是相辅相成的中国精神。民族性和时代性不能割开来看待,它们是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只有坚持培育民族精神,才能使时代精神不移根基、不失本色;同时,只有注入时代精神,才能使民族精神博采众长,日益丰富。二者相辅相成,相互支撑。新形势下,高校思想政治教育应该围绕民族与时代相统一的原则开展工作,要在继承的基础上不断完善和发展,既要保留民族精神,又要使其真正融入现代的生活中传承和弘扬,体现时代精神。

(二) 精准施策,着力拓宽时代精神教育新载体

1. 把握主流媒体发展新机遇

2019年1月25日,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

政治局第十二次集体学习时,深刻诠释了“全媒体”的概念:“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2]明确提出了推动媒体融合向纵深发展的重大要求,按下了推动媒体深度融合的快进键。现在打开手机,我们所有的衣食住行各类APP都能根据个人所需,选择性地进行了订阅服务。全媒体时代带给人类的,不仅是多渠道的信息资源,而且信息覆盖广阔,获取方式便捷,速度更快,直接影响和改变着人们的思维方式、行为方式及生活方式,全新的媒体技术革命带来了全球媒体格局的重组,中国必须把握好时机,在全球媒体发展新格局中赢得与我国国际地位相适应的话语权和影响力。

高校应当将时代精神化作一种隐性的教育渗透在学生大学生活的各个角落。有学者提出:“这是一个‘同一时代,不同声音’的时代,在这样一个时代中,我们的思想政治教育……就不能完全停留在‘同一音’在传播、‘主流媒体’在宣传的阶段。”^[3]高校要在主流媒体搭建时代精神培育和传承新平台,利用校园网站发布时政新闻,传播社会正能量;校园网络电视要多播放宣传中华民族精神的优秀影片、人物传记,为大学生树立典型,使时代精神更多地出现在校园网、qq群、朋友圈、app客户端等。要进一步把握好主流媒体对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的引导,杜绝不健康的舆论氛围,虚假的舆论环境,错误的舆论导向对大学生成长的影响,让大学生在时代精神影响下,激发内心共鸣,使主流声音传得更远,唱得更响。

2. 发挥校园文化熏陶作用

丰富的校园文化活动有利于学生形成积极向上、健康乐观的品质。校园文化以各类校园文化活动为载体,生动展现当代大学生的精神风貌,主要的表现形式有社团活动、文艺活动、体育竞技比赛、专业技能比赛和社会实践活动等形式。校园文化的组织发展方式是丰富多彩的,这与高校建立的培养人才目标相辅相成。在校园文化长期的引导和帮助下,将时代精神融入校园文化活动,是全面发挥高校校园文化功能的内在要求,也是新形势下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提升时代精神教育的重要措施。

至今,教育部开展了九届高校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成果评比活动,对促进高校继续深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牢牢掌握高校意识形态工作领导权和话语权,充分发挥高校文化传承功能起到重要作用。

高校要根据学校发展实际情况,结合高校办学层次和专业特长,因地制宜地发挥校园文化的熏陶

作用,努力把思想道德教育的内容和要求融入校园文化建设的各个方面,使校园文化在提高学生时代精神教育中发挥积极作用。进一步发挥文化传承创新功能,努力创建繁荣的校园文化建设新载体。高校要结合学校办学特点,开展具有品牌影响力、深受学生喜爱,感染力强的校园文化建设优秀活动。河南省教育厅一直重视高校校园文化建设,近几年,在校园文化建设成果评选基础上,开展“大美学工”先进集体和个人评选活动,开展“最美大学生”评选活动,在学生中营造积极、励志的文化教育氛围。郑州工程技术学院从2003年至今,坚持制作的毕业生纪念光盘,分别以《我的大学》《风雨彩虹》《源》等作为主题,其影响范围大,多次获得教育部和河南省校园文化优秀成果奖。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继续传统颂中华情,学经典圆中国梦——“传统文化月”活动》和郑州科技学院《春雨计划》等校园文化优秀品牌,在学生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教育中发挥重要作用。目前,高校校园文化活动主要由学校社团参与,社团的建设及活动开展,都应该明确其标准和目的。学校社团要严格按照规范来审批和开展活动,为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发挥积极作用。

3. 构建实践育人共同体

实践活动是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过程中的重要载体,是检验思想政治课堂教学成果的重要途径,也是进一步强化时代精神,提升时代精神教育效果的重要方式方法。

2017年12月,教育部党组印发《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提出的基本任务是构建十大育人体系,其中明确提出:“实践育人质量提升体系。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养成相结合,整合各类实践资源,强化项目管理,丰富实践内容,创新实践形式,拓展实践平台,完善支持机制,教育引导师生在亲身参与中增强实践能力、树立家国情怀。”^[4]

高校肩负着培育大学生时代精神的重要任务,其最重要的一个环节就是把具有改革精神、创新思维等融入大学生的意识形成过程中。在培育过程中,最有效的方法就是开展生动的社会实践活动。这里的实践活动,已经不仅仅是教学计划规定完成的几个实践课时。高校要聚焦课内课外、校内校外、网上网下,围绕实践教学和网络实践、社会实践和创新创业、军事训练、志愿服务等领域,为学生创造更多实践机会和舞台,让学生在亲身参与中了解世情、国情、社情、民情和教情,在亲身体验中树立对人民的情感、对社会的责任和对国家的忠诚。要根据学校和自身的情况,广泛开展勤工助学、志愿服务、社

会公益等社会实践活动,开展好大学生暑期“三下乡”“志愿服务西部计划”等传统经典项目弥补时代精神的欠缺之处。要明确各项社会实践活动的目标和希望达到的效果,如果盲目开展社会实践,不但消耗时间和金钱,还会使大学生参与社会实践的积极性和热情大打折扣。高校要努力发展建设实践育人平台,打通实践育人“最后一公里”。

(三) 统筹联动,构建时代精神教育大环境

1. 构建培育大学生时代精神的教师队伍

古人说:“师者,人之模范也。”教师承担着传道授业解惑的重任,而且“吐辞为经、举足为法”,一言一行都给学生以极大影响。如果没有一支道德品质高尚、专业素质过硬的教师队伍,就很难实现教育质量的提升,更谈不上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而这之中,师德永远排在第一位。2018年5月,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又再次重申2014年教师节在北京师范大学师生代表座谈会上提出做一名好老师的四点要求,即有理想信念、有道德情操、有扎实学识、有仁爱之心,强调“建设政治素质过硬、业务能力精湛、育人水平高超的高素质教师队伍是大学建设的基础性工作”^[5]。高校要从培养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的高度,统筹考虑教师队伍的素质要求、人员构成、培训体系等。要建成一支理论强、业务精、作风正的教师队伍,坚持教育者先受教育,使他们成为高校思想政治教育队伍中的典范,担当起学生健康成长指导者和引路人的责任。要制定高校教师的职业道德规范,只有制定完善的包含法规、准则和工作纪律的教师道德规范,才能更加有利的指导教师职业道德建设,提高教师道德修养。要发挥教师群体榜样示范作用,开展争先创优评比、先进事迹展示等活动,对认真负责,以身作则,团结协作的优秀教师,给予充分肯定和表彰,使教师获得鼓舞和支持,让他们更加积极地参与到教学管理活动中去。要引导教师把教书育人和自我修养结合起来,更好地为学生服务,为党的教育事业服务,做到以德立身、以德立学、以德施教。

2. 树立大学生身边的时代楷模

时代楷模就是具有鲜明时代特征,践行时代精神的榜样和模范。在我国社会主义事业发展中,涌现出一大批代表中华儿女特有的民族精神,生动展现中国精神的时代榜样,他们以特有的精神品质,激励、鼓舞、感召着每一位中华儿女。

2002年至今开展的《感动中国》年度人物评选活动,受到社会各界强烈反响,170名鲜活的感动中国人物和17个特别荣誉,沉甸甸地传承着中华民族

伟大的优秀品质,延续着中国精神、中国价值和中國力量。《感动中国》也被誉为“中国人的年度精神史诗”,感召着每一位普普通通的人。2006年至今,由中宣部、教育部、共青团中央、人民日报举办的《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贴近大学生群体,集体展现大学生的时代精神风貌,在高校大学生中形成一股从我做起,争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青年力量。

高校在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过程中,要善于挖掘学生中出现的典型人物和优秀事迹,加强典型报道,这不仅是对大学生时代精神风貌的有力展现,也是高校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生动体现,通过这种方式起到引导人、教育人、鼓舞人、武装人的作用。要在树立时代楷模,进行时代精神教育的同时,遵循贴近实际、贴近生活、贴近学生的原则,寻求贴近大学生学习生活的时代精神榜样,《中国大学生年度人物》评选就是最真实的体现。河南省紧跟步伐,在高校大学生中寻找真实的、感人的、与大学生贴近的时代精神榜样,开展《最美大学生》评选活动,在河南高校中反响强烈。要注重新闻宣传,在深入挖掘思想内涵的同时,生动刻画时代精神形象,把握时代脉搏,弘扬时代精神,唱响时代正气歌。

3. 发挥家庭教育功能

家庭是个体早期生活最基本的环境,父母是学生个体的最早执行者和基本执行者。个体在家庭里学到了最初的生活知识和技能,道德行为规范等,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也促进了孩子的心理、能力、角色意识、角色行为的获得和发展。^[6]习近平在2018年9月全国教育大会讲话上指出,办好教育事业,家庭、学校、政府、社会都有责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所学校,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要给孩子讲好“人生第一课”,帮助扣好人生第一粒扣子。

高校在大学生时代精神教育过程中,要组织倡导“校一家联动”的教育机制,进一步扩大和营造时代精神教育的大环境,使家庭教育在时代精神培育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家庭教育中,家长要以身作则,成为孩子成长中的表率,使自己的言行举止在潜移默化中引导孩子,帮助孩子形成良好的思想和道德品质。要营造良好的家风,在日常的生活中弘扬优秀民族精神,倡导勤俭节约、尊老爱幼、艰苦朴素的生活习惯,培养热爱祖国、诚实守信的道德品德,将时代精神贯穿到家庭教育中,为孩子成长营造良好氛围。

参考文献:

[1] 陈再生. 高校加强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教育的思考[J].

- [2] 人民观点. 让主流媒体成为“全媒体”:回答好媒体融合发展的时代课题[EB/OL]. 人民网. <http://theory.people.com.cn/n1/2019/0130/c40531-30597870.html>.
- [3] 张春梅,陈佳. 对大学生民族精神培育现状的思考[J]. 学校党建与思想教育,2015(5).
- [4] 高校思想政治工作质量提升工程实施纲要[EB/OL]. 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 <http://www.moe.edu.cn/srcsite/>

- [5] 习近平在北京大学师生座谈会上的讲话[EB/OL]. 人民网. <http://politics.people.com.cn/n1/2018/0503/c1024-29961468.html>.
- [6] 王德强. 大学生社会化家庭影响因素的分析及教育对策研究[J]. 教育与职业,2009(29).

(责任编辑 许峻)

College Education on Spirit of the Modern Era: Status Quo Analysis and Countermeasures

DONG Huali

(School of Cultural Communication,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The national spirit with patriotism as the core and the spirit of the modern era with reform and innovation as the core are the quintessence of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 system. Strengthening education of college students on the modern era spirit is a concrete step for the fundamental task of “cultivating morality and cultivating people”. Based on the status quo of modern era spirit education for college students, this paper analyzes deficiencies and possible causes, and points out three feasible countermeasures to improve the education. This research is expected to contribute to the education and practice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mong college students.

Key words: college students; modern era spirit education; patriotism

(上接第 86 页)

- [2] 郭玉成,李守培. 少林功夫在孔子学院的传播与中国国家形象的构建[J]. 体育学刊,2013(1).
- [3] 栗胜夫. 少林功夫演进论[M]. 北京:人民出版社,2017.
- [4] 吕宏军,滕磊. 少林功夫: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M]. 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12.

- [5] 万正峰. 中华源·河南故事·少林功夫[M]. 开封:河南大学出版社,2019.
- [6] 汪升,朱奇志. 中国少林功夫文化对外译介的内容、原则与方略[J]. 西安体育学院学报,2018(2).

(责任编辑 谢春红)

Research on Shaolin Kungfu Translation History, Values, Translation Problems and Solutions

JIAO Dan, ZHAO Zhin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Henan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01, China)

Abstract: Through the visualizing map of researches on Shaolin Kungfu, this article mainly traces the history of Shaolin Kungfu translation, formation,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analyzing the status quo of Shaolin Kungfu translation and its problems and discussing the language used in translation practice, in order to refine the value of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and propose the relevant solutions.

Key words: Shaolin Kungfu; translation; translation communication

库尔勒香梨果实发育过程中有机酸代谢规律研究

张军^a, 姚虹^b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 a. 化工食品学院; b. 分析测试中心, 河南 郑州 450044)

摘要: 库尔勒香梨果实发育阶段有机酸代谢是果实品质形成的决定因素之一, 有机酸作为植物生化反应的中间体和终产物, 其含量和组分变化对植物机体发育过程具有调控作用。以8个发育关键阶段库尔勒香梨果实为试材, 分别测定总酸, 开发并使用高效液相色谱法同时定性、定量8种有机酸组分及含量变化。结果表明: 库尔勒香梨果实在发育前期总酸含量高(1.3 g/L), 9月份后降低的趋势平缓(从0.43 g/L逐渐降至0.36 g/L)。库尔勒香梨果实以苹果酸型代谢为主。

关键词: 库尔勒香梨; 有机酸; HPLC

DOI: 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20

中图分类号: S66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8-3715(2021)02-0107-05

库尔勒香梨(*Pyrus sinkiangensis* Yü. cv. 'Kor-laXiangli')属蔷薇科、梨属, 新疆梨系统自然杂交品种, 有近千年的栽培历史^[1]。库尔勒香梨果实具有皮薄肉细、酥脆多汁、香味浓郁等特点, 深受国内外消费者的青睐。由于其品质独特, 国内外市场需要量大, 其栽培面积正逐年增大, 已经成为地理标志产品和产区优势支柱产业^[2]。近年来, 随着“互联网+”等销售平台的崛起和物流高速网的建成, 新疆优势产业的发展势头迅猛。因此, 研究库尔勒香梨采前管理、改良果实品质, 提升库尔勒香梨产业市场竞争力显得尤为重要。

果实有机酸组分与含量是果实品质的重要因素, 通常有机酸在果实生长过程中积累, 在成熟过程中作为糖酵解、三羧酸循环(TCA环)等呼吸基质(ATP来源), 以及糖异生作用基质而被消耗^[3]。因此, 有机酸在果实发育过程中是果实品质形成的基础“物质”和代谢“能量”保障。分析有机酸的变化是研究呼吸和能量代谢途径变化的重要手段。成熟果实按照主要有机酸含量可分成3大类: 柠檬酸型果实、苹果酸型果实和酒石酸型果实^[4]。了解果实类型, 研究果实发育过程中的有机酸代谢及其变化规律, 对于提高果实品质具有重要意义, 而目前关于

库尔勒香梨果实发育期的有机酸组分及含量变化的研究鲜有报道。

本研究分别检测库尔勒香梨果实生长发育过程中8个阶段的总酸, 采用高效液相色谱法(HPLC)鉴定分析乙酸、乳酸、苹果酸、富马酸、酒石酸、琥珀酸、莽草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等10种有机酸在不同阶段的动态变化, 旨在为今后库尔勒香梨果实品质及其风味的形成机制研究奠定基础, 为合理的田间管理提供理论支撑。

1 材料与方法

1.1 材料与试剂

供试植物材料为新疆库尔勒沙依东园艺场梨园(北纬41°43'56"东经86°1'59"; 北纬41°43'17", 东经86°2'18")25年左右树龄香梨树(间种授粉树为砀山梨), 采样时间选在12:00~14:00进行, 选择生长正常、无病害的库尔勒香梨植株果实。每隔30d左右采样一次(5月15日、6月16日、7月18日、8月20日、9月16日、10月17日、11月21日、12月20日), 保鲜库取样, 依次命名为A1, A2..., 用冰盒进行冰鲜运输, 放置于-80℃冰箱超低温保存备用。

氢氧化钠、酚酞、磷酸二氢铵、磷酸二氢钠、磷酸氢二钠、三乙胺、乙酸、氯仿、氯化钠、石油醚、乙醚、

收稿日期: 2020-02-21

基金项目: 河南省高等学校重点科研项目(20B550009);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自然科学基金项目(2016D01A053)

作者简介: 张军(1978—), 男, 河南南阳人, 博士, 郑州工程技术学院化工食品学院副教授, 研究方向为食品代谢组学。

乙醇、无水碳酸钠、硝酸铝:均为分析纯,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有限公司;L-抗坏血酸(Vc):德国 Dr Ehrenstotfer GmbH 公司;乙腈、甲醇、水:美国 Thermo Fisher Scientific 公司;正己烷:天津市福晨化学试剂有限公司;乙酸、乳酸、苹果酸、富马酸、酒石酸、琥珀酸、莽草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等 HPLC 标准品:上海源叶生物科技有限公司。

1.2 仪器与设备

Ultimate[®] AQ-C18 柱(4.6 × 250mm, 5 μm):月旭科技(上海)股份有限公司;10A 液相色谱仪(紫外检测器):日本岛津公司;多样品定量回旋震荡浓缩仪:瑞士步琪 Buchi 公司;BS210S 电子天平:德国 Sartorius 公司;冷冻离心机:德国 Eppendorf 公司;HH-2 数显电热恒温水浴锅:常州普天仪器制造有限公司;SHZ-D(Ⅲ)循环水式真空泵:巩义市予华仪器有限责任公司;W-HL328 超低温冰箱:中科美菱低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GL-4L 冷藏保温箱:广州佳冷冷藏科技有限公司;移液器:大龙兴创实验仪器(北京)有限公司。

1.3 方法

1.3.1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中总酸测定

参照文献[5]氢氧化钠-酚酞法测定总酸含量并作适当修改。

1.3.2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中有机酸 HPLC 法测定

本方法参照文献[6]和文献[7],结合月旭科技公司 Ultimate[®] AQ-C18 色谱柱说明书并作适当修改。

样品处理:香梨果肉(带皮)5.0 g,加 5 mL 流动相于冰浴条件下研磨匀浆,用流动相定容至 10 mL,于 50℃ 超声提取 25 min,冷却后 15000 r/min 离心 10 min,上清液经 0.45 滤膜过滤后用于液相色谱。

色谱条件:使用月旭 Ultimate[®] AQ-C18 色谱柱(4.6 mm × 250 mm, 5 μm),流动相为甲醇-50 mmol · L⁻¹磷酸二氢钠(pH 2.5),柱温 26℃,流速 1 mL/min,进样 10 μL,紫外检测器检测波长为 210 nm。

定性分析:将乙酸、乳酸、苹果酸、富马酸、酒石酸、琥珀酸、莽草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 10 种标准品,各 25 mg 分别配制成 25 g/L 的贮备液,在已优化的色谱条件下将以上单个标准品稀释一定浓度后分别进样,比较每个标准品和混合标准品溶液的保留时间,若保留时间相同或很接近,则可证明是同一种物质。其余贮备液置于 4℃ 冰箱保存。

定量分析:上述 10 种贮备液准确吸取若干,混合稀释,得 5 组混合标准溶液,分别进样制作标准曲线,既在已优化的色谱条件下,根据各标样的浓度与峰面积,在 LCsolution v1.26 化学工作站中得到标准

曲线、回归方程、线性范围及相关系数。

1.3.3 数据处理

以上所有试验数据分析、图表处理等,使用 SPSS 22 以及 Origin 9.0 等软件。

2 结果与分析

2.1 不同时期库尔勒香梨果实总酸的变化

梨果实中有机酸的含量是果实风味物质的重要指标。总酸测定时每次取样 1 mL 加 19 mL 双蒸水,加 1% 酚酞 20 μL(试验中发现酚酞的用量也能影响溶液显色,为保证实验结果一致,减少误差,确定使用酚酞 20 μL)。梨、桃、李等果实中所积累有机酸以苹果酸为主^[8],故换算系数 K 取 0.067。

库尔勒香梨果实总酸变化如图 1。坐果 1 个月后果实总酸含量较高,此后香梨总酸含量总体呈下降趋势,可能由于果实幼果期代谢旺盛,总酸被消耗而快速下降,其中也有果实水分增加引起的“稀释”作用。9 月份至货架期香梨总酸含量下降趋势平缓,变化不显著($P < 0.0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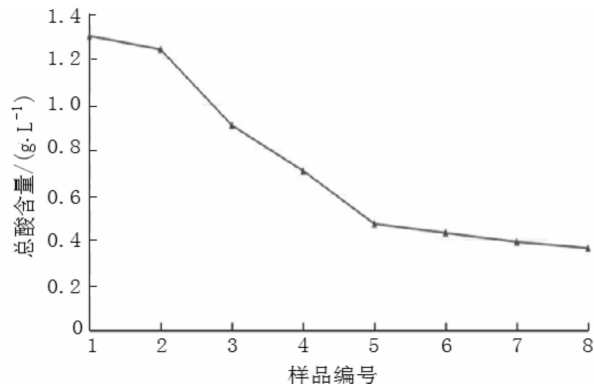


图 1 不同时期香梨果实总酸变化

花后 1 个月左右(5 月中旬)香梨总酸含量为 1.3 g/L 左右,9 月总酸含量降为 0.47 g/L,随后至鲜贮期(12 月份)总酸含量从 0.43 g/L 逐渐降至 0.36 g/L,显示总酸含量下降逐渐平缓,这与前人对梨果实^[9-10]总酸变化趋势研究结果基本一致。

2.2 HPLC 法检测香梨果实有机酸方法开发

梨果实中有机酸组分和含量是影响其风味品质形成的重要因素^[11],不同树种果实中的有机酸类型存在较大的差异。使用 HPLC 对香梨中有机酸进行分析,根据前人对梨、桃、杏等果实中已经测定的有机酸种类^[12-15],选择乙酸、乳酸、苹果酸、富马酸、酒石酸、琥珀酸、莽草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作为研究对象。检测有机酸一般采用 C18 反相柱,为了得到更好的分离检测效果,本研究选用有机酸专用色谱柱,能将 10 种有机酸中的 8 种完全分开,如图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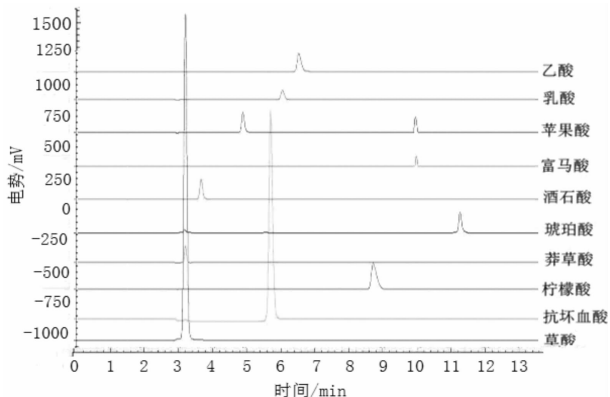


图2 10种有机酸在HPLC中保留时间

图2显示在混标中出现了峰型互相掩蔽的现象,其中富马酸出峰时间(RT)9.373 min,由于峰形较小,刚好被苹果酸的杂质峰遮掩(苹果酸有手性C原子,因此有旋光活性,有可能两个峰分别是苹果酸的D型和L型,一般是苹果酸D型和L型共存),故忽略不计;莽草酸出峰时间(RT)3.174 min,由于峰形较小,刚好被草酸的峰完全遮掩,故忽略不计,这个结果与文献[6]的研究结果不一致。8种有机酸RT分别为:草酸3.173、酒石酸3.651、苹果酸

表1 8种有机酸的线性关系

名称	线性方程	相关性 R^2	线性范围	相对标准偏差 $RSD/\%$
草酸	$y = 8E + 06x - 14314$	0.9992	0.0015 ~ 0.36	0.98
酒石酸	$y = 1E + 06x - 10899$	0.9991	0.012 ~ 1.975	0.81
苹果酸	$y = 687410x - 26271$	0.9993	0.015 ~ 2.415	0.83
抗坏血酸	$y = 9E + 06x - 29909$	0.9993	0.001 ~ 0.285	0.92
乳酸	$y = 547975x - 9125.6$	0.9985	0.001 ~ 2.1	0.73
乙酸	$y = 385037x - 60619$	0.9993	0.041 ~ 10	0.85
柠檬酸	$y = 1E + 06x - 46607$	0.9998	0.015 ~ 6.13	0.88
琥珀酸	$y = 578445x - 43691$	0.9989	0.015 ~ 5.12	0.91

表1显示相关关系 R^2 都在0.99以上,相对标准偏差 RSD 在0.7~1之间,分布较为合理,说明该检测方法适用于库尔勒香梨果实有机酸的检测。

2.3 HPLC法检测香梨果实8种有机酸在不同时期的变化

用HPLC法检测有机酸,检测器是紫外检测,原理依然是紫外吸收,既不同的酸生色基团不同,产生的紫外吸收效应不同。本文中开发的方法适合有机酸的分离和检测。检测结果如图3。

8种有机酸在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时期的含量变化差异明显,主要有有机酸为苹果酸、柠檬酸,而李芳芳等^[18]认为香梨主要以苹果酸为主,本实验结果显示两者相差不显著。香梨从花后1个月左右(5月中旬)至12月中旬有机酸含量变化如图4。8种有机酸中,在5月份苹果酸含量最高,达到1.198 g/L,柠檬酸含量为0.476 g/L,酒石酸含量为0.382 g/L。随着生长发育的不断进行,有机酸含量开始下降,第5批样品(9月份)开始下降较为明显。

4.819、抗坏血酸5.478、乳酸5.978、乙酸6.472、柠檬酸8.554、琥珀酸10.972。

本试验使用的HPLC检测器是紫外检测器,利用紫外吸收原理对物质进行定性定量。紫外吸收是有机酸分子中生色团的特征,而不是整个分子的特征^[16],有机酸因为含有羧基而具有紫外吸收,预试验中相同浓度的10种有机酸紫外吸收强弱差异非常大,草酸(乙二酸)有最强的吸收峰,而柠檬酸吸收峰却非常低,原因可能是草酸的两个羧基在空间上互相排斥,类似于形成了两头的伞形,且外围的羟基也是较强的生色基团,显色的累加效果致使在HPLC的紫外检测中较低浓度获得了较明显的峰型。乙酸只有一个生色基团,浓度很高时才有明显峰型;柠檬酸(3-羟基丙三羧酸)可能是中间的羟基有未成对电子与溶剂形成氢键,产生 $n \rightarrow \pi^*$ 对称性禁止跃迁,所以吸收峰非常弱^[17]。

根据以上对有机酸保留值RT的分析,制备混标进行精密度测定,得出8种有机酸检测方法标准曲线、不确定度等相关信息,如表1。

按照果实中有机酸含量不同,将水果分为苹果酸型、柠檬酸型和酒石酸型3种类型。从图4可以明显看出,在香梨生长发育过程中苹果酸和柠檬酸始终是主要有有机酸类型。由于抗坏血酸分子结构中的烯二醇基,尤其是C3位OH由于受共轭效应的影响,酸性较强($pK = 4.17$),C2位OH由于形成分子内氢键,酸性极弱($pK = 11.75$),故一般认为抗坏血酸为一元酸^[19]。由于抗坏血酸在果实中是高效的抗氧化剂,同时也是参与各种生化反应的辅酶^[20],本试验将其列为研究对象,考证与香气品质的关系。7月后香梨果实中有机酸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以抗坏血酸为主,占总酸的66.93%,而苹果酸和柠檬酸总共占30%。

从7月份开始酒石酸(包括乙酸、乳酸等)的含量明显下降,所占比例减小显著。分析不同时期香梨果实有机酸含量变化,可知苹果酸、柠檬酸和抗坏血酸是香梨果实的主要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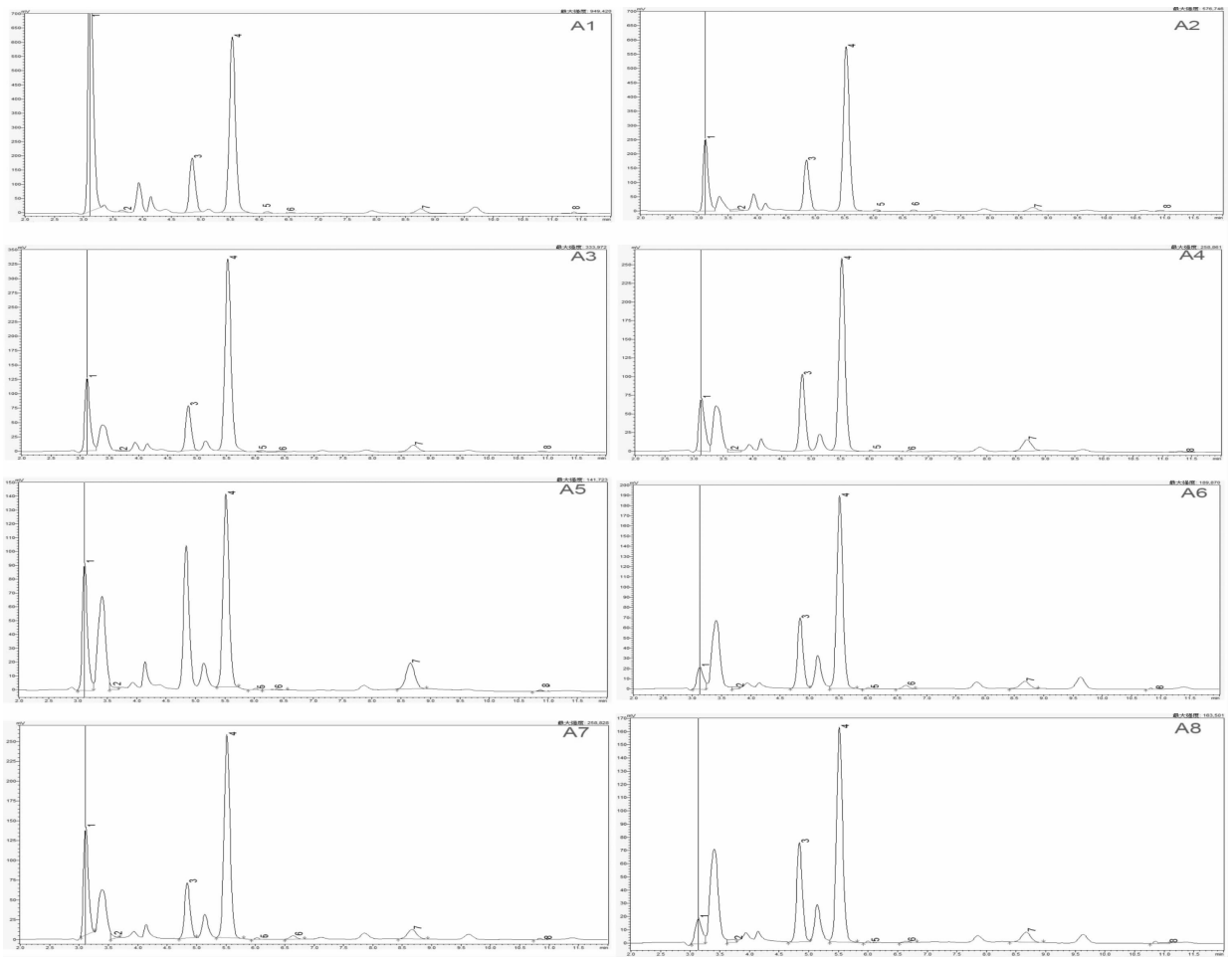


图3 不同时期香梨果实有机酸含量液相色谱图

注:色谱图中:1-草酸、2-酒石酸、3-苹果酸、4-抗坏血酸、5-乳酸、6-乙酸、7-柠檬酸、8-琥珀酸;A1~A8表示不同时期采摘的8个样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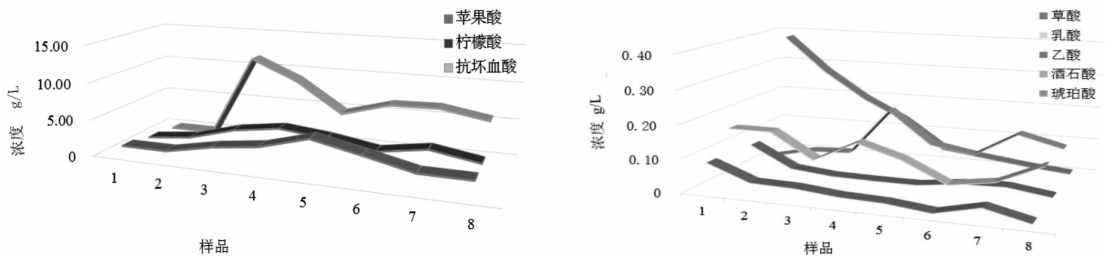


图4 不同时期香梨果实有机酸含量变化

在前7批次(货架期,11月中旬左右)样品中柠檬酸所占比例变大,随后在第8批次样品中(货架期,12月份)苹果酸和柠檬酸含量所占比例很接近,分别为21.52%和20.04%。香梨果实中8种有机酸含量总和呈现先升高再下降的变化趋势,与测定的总酸含量变化趋势基本一致。

3 结论与讨论

开发的HPLC方法可以同时定性定量乙酸、乳酸、苹果酸、酒石酸、琥珀酸、柠檬酸、抗坏血酸和草酸等8种有机酸。库尔勒香梨果实不同阶段的有机酸含量变化差异明显,在5月份苹果酸含量最高,达

到1.198 g/L,柠檬酸含量达到0.476 g/L,酒石酸达到0.382 g/L。到7月后,库尔勒香梨果实中有机酸构成发生了明显变化,以抗坏血酸为主,苹果酸次之。成熟果实中所积累的主要有机酸大体分为苹果酸型、柠檬酸型和酒石酸3大类型,香梨果实可以划分为苹果酸型。

有机酸作为果实风味和营养物质的重要构成因素,影响水果的口感、色泽及生物稳定性,同时还是果品成熟度、耐藏性以及加工性的重要依据。库尔勒香梨果实生长发育过程中,总酸及其各种有机酸组分含量变化较大。库尔勒香梨果实在发育前期总

酸含量高(1.3 g/L),9月份后降低的趋势平缓(从0.43 g/L 逐渐降至0.36 g/L)。库尔勒香梨果实在花后1个月至10月份采摘,于常温下贮藏两个月后,总酸变化始终是降低,总酸含量从1.3 g/L 降至0.36 g/L。发育过程中酸含量降低主要是因为部分有机酸转变成糖,有些则氧化成 CO₂ 和 H₂O,或者被碱性物质中和,也有在次生代谢的过程中提供大量的羧基,形成酯类代谢物。

参考文献:

[1]张军. 库尔勒香梨果实香气代谢机理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2017.

[2]张峰,李养义. 库尔勒香梨产业发展现状与对策建议[J]. 西北园艺(综合),2020(6):3-5.

[3]陈发兴,刘星辉,陈立松. 果实有机酸代谢研究进展[J]. 果树学报,2005(5):526-531.

[4]周先艳,朱春华,李进学,等. 果实有机酸代谢研究进展[J]. 中国南方果树,2015,44(1):120-125.

[5]高向阳,宋莲军. 现代食品分析实验[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13:128-131.

[6]高海燕,王善广,廖小军,等. 不同品种梨汁中糖和有机酸含量测定及相关性分析[J]. 华北农学报,2004(2):104-107.

[7]NOUR V, TRANDAFIR I, IONICA M E. HPLC organic acid analysis in different citrus juices under reversed phase conditions[J]. Not. Bot. Hort. Agrobot. Cluj,2010,38(1):44-48.

[8]王一州. 采后黄冠梨果实有机酸代谢及品质变化规律研究[D]. 天津:天津大学,2009.

[9]姚改芳. 不同栽培种梨果实糖酸含量特征及形成规律研

究[D]. 南京:南京农业大学,2011.

[10]许娟. 库尔勒香梨果实生长发育期及贮藏期生理生化特性研究[D]. 乌鲁木齐:新疆农业大学,2015.

[11]陈发兴,郑少泉,蒋际谋. 果实香气成分和生物合成代谢研究进展[J]. 福建果树,2010(2):26-30.

[12]姚改芳,张绍铃,吴俊,等. 10个不同系统梨品种的可溶性糖与有机酸组份含量分析[J]. 南京农业大学学报,2011,34(5):25-31.

[13]沈志军,马瑞娟,俞明亮,等. 桃果实发育过程中主要糖及有机酸含量的变化分析[J]. 华北农学报,2007(6):130-134.

[14]郑惠文,张秋云,李文慧,等. 新疆杏果实发育过程中可溶性糖和有机酸的变化[J]. 中国农业科学,2016,49(20):3981-3992.

[15]张城珍,崔素芬,辛明,等. HPLC法同时测定不同种类枱果中10种有机酸的研究[J]. 食品科技,2014,39(3):276-280.

[16]李昌厚. 紫外可见分光光度计[M]. 北京:化学工业出版社,2005:140.

[17]柯以侃. ATC 007 紫外-可见吸收光谱分析技术[M]. 北京:中国质检出版社,2013:10.

[18]李芳芳,张虎平,何子顺,等. 套袋对“库尔勒香梨”果实糖酸组分与香气成分的影响[J]. 园艺学报,2014(7):1443-1450.

[19]段振华. 高级食品化学[M]. 北京:中国轻工业出版社,2012:247.

[20]王镜岩. 生物化学:上册[M]. 3版. 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

(责任编辑 姚虹)

Study on Organic Acid Metabolism During Fruit Development of Korla Fragrant Pear

ZHANG Jun^a, YAO hong^b

(a. School of Chemical Engineering & Food Science; b. Center of Analysis and Testing, Zhengzhou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Zhengzhou, Henan 450044, China)

Abstract: Organic acid metabolism during fruit development is one of the decisive factors for fruit quality formation of Korla Fragrant Pear. Organic acids are intermediates and end products of plant biochemical reactions, and the changes of content and components play a regulatory role in plant development. In this study, eight key stages of Korla fragrant pear fruit were used as materials to determine the total acid content, and high performance liquid chromatography (HPLC) method was developed to determine and quantify the components and content of eight organic acids simultaneously. The results shows that the total acid content of Korla fragrant pear is 1.3 g/L at the early stage, and it decreases gradually from 0.43 g/L to 0.36 g/L after September. Through analysis, it is confirmed that the fruit of Korla Fragrant Pear is mainly malic acid metabolism.

Key words: Korla fragrant pear; organic acid; HPLC

基于相互作用矩阵的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

王志强, 辛晓斌, 刘 硕

(青岛理工大学 管理工程学院, 山东 青岛 266520)

摘要:被动式建筑精细化施工复杂,为了对其施工安全进行定量评价研究,运用安全事故致因理论,结合施工安全因素交互耦合作用的视角,建立了多维轨迹风险交叉耦合作用模型。从四大维度构建了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运用相互作用矩阵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进行评价研究。通过在项目案例的应用,发现技能培训与安全教育、安全制度与责任体系、现场施工作业环境和作业人员安全意识等因素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大,需加强相应的防范措施。研究表明,该方法具有科学性和实际应用意义。

关键词: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研究;相互作用矩阵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21

中图分类号:F407.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112-05

1 引言

随着社会建筑业的不断发展,“可持续性”逐渐成为一个最有意义的理念。在此背景下,德国菲斯特教授于1998年提出的“被动式建筑”,很快在西方国家推广开来,到现在已经遍及全球。被动式建筑舒适度高并且以超低能耗实现保湿、保温、隔音、隔热等功能特性,是顺应时代潮流的所有建筑新理论的综合。^[1]与传统建筑的施工相比,被动式建筑的精细化施工不仅降低了建筑自身能耗,还增加了建筑的使用寿命。在施工过程中,被动式建筑在门窗安装、围护结构、气密性和保温系统等方面与传统现浇建筑存在显著差异。复杂的施工技术和工艺给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管理带来大量不确定性因素,使安全隐患变得繁杂。同时,我国被动式建筑的发展与世界先进水平之间的差距明显,施工条件与作业人员素质对满足被动式建筑施工阶段工艺复杂、技术复杂的安全要求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容易发生安全事故。因此,建立科学的评价体系准确地对被动式建筑施工阶段安全风险进行评价研究具有一定的必要性。

在被动式建筑评价方面,国内外学者对建筑性能和控制方面的研究相对成熟。Liang Xinxin(2017)等对传统住宅与被动式住宅进行了建筑性能监测比较以及评估研究^[2],Proietti(2013)等人对被动式房屋进行了全生命周期评估,考虑了所有的生命周期过程^[3],宋琪(2015)使用了层次分析法对指标进行赋权,然后运用模糊综合评价法对被动式建筑性能进行评价分析^[4],李强年(2018)等利用模糊综合评判法建立被动式建筑评价模型^[5],李辉山(2019)等运用AHP方法与可拓物元评价模型对被动式建筑全生命周期成本控制进行综合评价^[6]。在施工安全评价研究方面,Amiri(2017)将识别出的安全影响因子添加到安全评价方法中,利用模糊评价模型对工程施工安全问题进行了分析^[7],Clyde(2016)利用系统动力学和VENSIM软件识别出装配式建筑的施工安全风险因子^[8],冯亚娟(2019)运用了熵权法和集对分析法对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进行评价分析^[9],陈茸等(2020)通过改进的CUOWGA算子和建筑施工安全灰色聚类评价模型对案例进行分析^[10]。

收稿日期:2020-10-28

基金项目: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71471094);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一般项目(2019RKB01459)

作者简介:王志强(1976—),男,江苏新沂人,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建筑工业化、建筑信息化等。

但是,当今国内外学者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的研究未几,并且针对多风险因素交互耦合作用条件下的评价研究主要集中于地铁^[11]、煤矿^[12-13]和工程场址^[14]等领域,很少有关于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领域的探索。鉴于此,本文根据被动式建筑的相关文献和有关标准建立了评价指标体系,在分析风险因素耦合作用的基础上,利用相互作用矩阵方法对案例进行评价分析,以期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防范提供借鉴与思路。

2 多维轨迹风险交叉耦合作用理论分析

在施工进程中,被动式建筑的串联性比传统建筑烦琐。不少传统现浇建筑的工序、节点和工法可以进行简易处置,但在被动式建筑中这些并不能掉以轻心,有的反而需要更加注意。被动式建筑的工序、工艺以及专业器材的操作,对施工现场及作业人员来说是极大的考验,安全风险因素隐蔽且复杂,容易发生安全隐患。

运用安全事故致因理论可以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进行客观分析,但是传统意义上的安全事故致因理论往往局限于单个风险因素的作用。而在现场作业中,多因素交叉耦合作用下可能会形成一连串较大的风险隐患。因此,本文基于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因素的复杂性,综合考虑了人为因素、物的因素、管理因素、环境因素四大维度。同时,在借鉴风险交叉耦合理论的基础上,建立了多维轨迹风险交叉耦合作用模型,如图1所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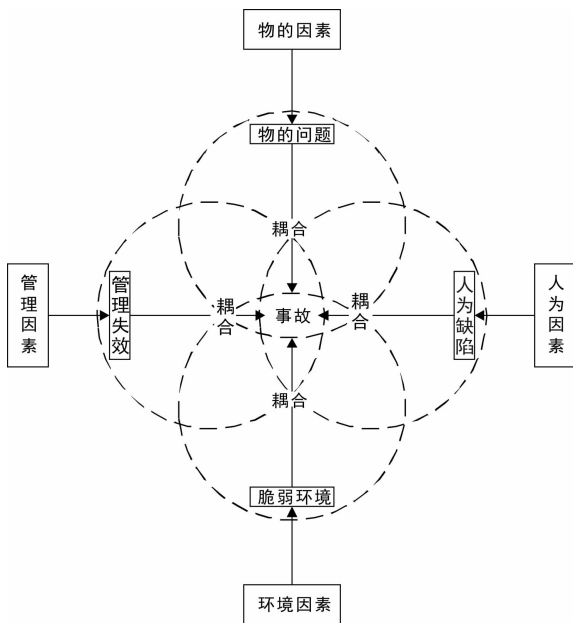


图1 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多维轨迹风险交叉耦合致因模型

从图1中可以看出,物的问题、人为缺陷、脆弱环境以及管理失效都会导致安全事故的发生。单一

的风险因素在超越自身风险极限后,能直接酿成安全事件的发生。但是一些未达到自身风险阈值的因素会与其他风险因素之间引起耦合反应,诱发风险极值的降低而引起事故的发生。如项目对从业人员的技能培训与安全教育投入不足时,会导致作业人员技术水平低和安全意识薄弱,最终引起安全事故的发生。因此,利用科学的方法去分析被动式建筑各施工安全风险因素以及多因素间的作用具有必要性。

3 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模型

3.1 构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被动式建筑在施工过程中牵连到多部位、多工种,并且作为我国新兴事物,相关的实验数据寥寥无几,短时间内对其风险因素进行定量解析难度较大。本文在参考以往的文献后,根据被动式房屋的施工特性和业内有关的技术标准^[15],利用风险分解结构(RBS)方法,从安全事故致因角度出发,筛选出管理因素和环境因素。在对青岛中德生态园实地调查和与之合作项目的研究中,筛选出人为因素和物的因素。按照评价指标建立的原则,从以上四大维度中筛选出16个主要影响因子作为二级指标,建立起科学的、完整的施工安全评价指标体系,详细见图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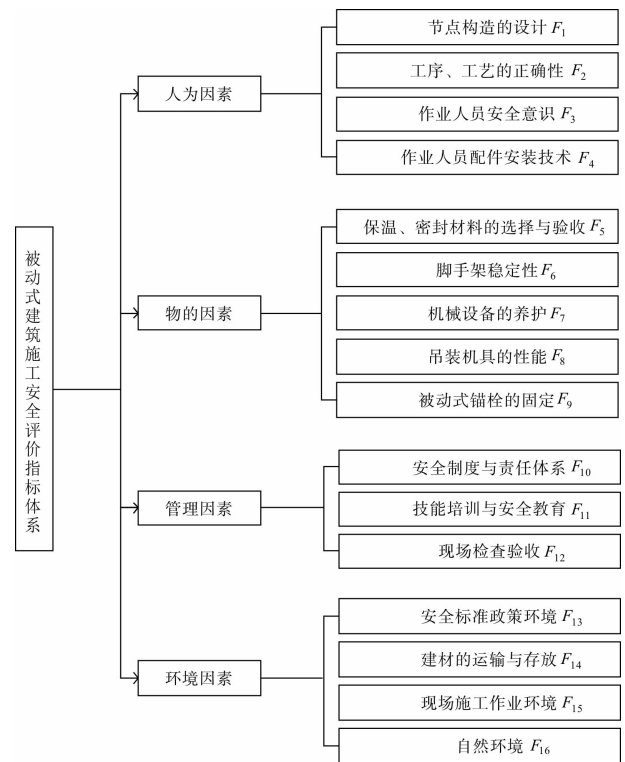


图2 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指标体系

3.2 相互作用矩阵

相互作用矩阵方法在考虑每个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因素对整个系统产生影响的同时,综合酌

量了安全风险因子之间交互耦合反应下对整个施工安全的影响。此方法的运用可能会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的探究达到一个可观的效果。

运用相互作用矩阵方法,最先是筛选影响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的主要因素,明确风险影响因子。其次把这些影响要素作为评价指标进行定量分析,构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多因子交互作用矩阵,对施工安全程度展开定量探究。建立相互作用矩阵时,把每个风险影响因子对施工安全影响程度的数值安放在矩阵的主对角线上。把多因素间的耦合反应关系布置在非对角线的位置上,数值的高低呈现出多因子间耦合反应对施工安全的影响程度。具体的矩阵如下:

$$P = \begin{bmatrix} X_1 & X_{1,2} & \cdots & X_{1,j} & \cdots & X_{1,n} \\ X_{1,2} & X_2 & \cdots & X_{2,j} & \cdots & X_{2,n} \\ & & \cdots & & & \\ X_{i,1} & X_{i,2} & \cdots & X_i & \cdots & X_{i,n} \\ & \cdots & \cdots & & & \\ X_{m,1} & X_{m,2} & \cdots & X_{m,j} & \cdots & X_{m,n} \end{bmatrix}$$

矩阵 P 中, X_i 表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因子 F_i ; X_{ij} 表示施工安全影响因子 F_i 对影响因子 F_j 的影响程度; n 表示施工安全影响因子的个数。之后,可以通过以下公式进一步计算出被动式建筑施工过程中安全影响因子 $F_i (i, j = 1, 2, \dots, n)$ 的权重 K_i 。

$$K_i = \frac{C_i + E_i}{2 \sum_{i=1}^n \sum_{j=1}^n X_{i,j}} (i, j = 1, 2, \dots, n) \quad (1)$$

其中,

$$C_i = \sum_{j=1}^n X_{i,j} (i, j = 1, 2, \dots, n) \quad (2)$$

$$E_i = \sum_{j=1}^n X_{j,i} (i, j = 1, 2, \dots, n) \quad (3)$$

公式中, C_i 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因子 F_i 对其他因子的影响程度总和,数值为 X_i 所在行之和; E_i 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因子 F_i 受其他因子的作用程度总和,数值为 X_i 所在列之和。然后再根据下式求得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程度。

$$SD = \sum_{i=1}^n K_i V_i \quad (4)$$

式中, SD 是评价被动式建筑施工风险的一个无量纲数,称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系数。 $V_i = P_i/4$, P_i 为因子所对应的评分(0~4), V_i 为风险因子 F_i 参数的值。

3.3 风险衡量

要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进行定量描述,

首先建立相互作用矩阵,利用(1)~(4)公式得出风险评价系数 SD 。在借鉴相关领域文献^[16]和《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17]的基础上,按照 SD 数值大小划分为表1所示的4个层级。如果工程项目属于I类低风险状态,不用采取必要措施进行防治。若工程项目是第II类中等风险状态,应采用必要程序进行监控施工。如果达到了III类高风险状态,应马上采取有效措施进行限期整改。如果该施工工程属于IV类极高风险状态,应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对风险隐患进行排查和消除。

表1 风险评价系数划分

SD 值	风险等级	类别
$0 < SD \leq 25\%$	低	I
$25\% < SD \leq 50\%$	中	II
$50\% < SD \leq 75\%$	高	III
$SD \geq 75\%$	极高	IV

4 实例研究

4.1 工程概况

青岛西海岸新区中德应用技术学校位于中德生态园团结路以南、昆仑山路以西,总建筑面积8万多平方米。其中学校的6号和7号宿舍楼为被动式超低能耗居住建筑示范区,是按照被动式建筑标准来进行设计的,同时获得了德国PHI认证。两座宿舍楼的施工建设在外围护结构、选材、热桥处理、气密性、保温性等节点和细节进行了严密设计与控制。本文借此宿舍楼为例,利用上述方法对其施工安全进行评价研究,并确立了图1所示的指标体系。

4.2 确定矩阵元素

为了能够对每个风险因素和多因素耦合作用下对施工安全的影响进行定量描述,通过专家半定量取值的方法将安全影响因素间的作用程度进行了划分。通过影响程度,区分为0、1、2、3、4五个等级,详见表2。

表2 相互作用矩阵的专家半定量取值法

级数	影响程度
0	影响很小
1	影响小
2	影响中等
3	影响大
4	影响很大

根据上述的相互作用矩阵方法,通过对青岛中德生态园的专家们进行问卷调查和专家打分,对16个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影响因子进行风险赋值,并把多因子耦合作用的影响值分别填入相互作用矩阵中对应的位置,构建如下矩阵 P :

$$P = \begin{bmatrix} X_1 & 2 & 1 & 0 & 1 & 0 & 0 & 0 & 0 & 2 & 2 & 3 & 2 & 0 & 1 & 0 \\ 1 & X_2 & 2 & 3 & 1 & 1 & 0 & 0 & 2 & 2 & 3 & 3 & 2 & 1 & 3 & 0 \\ 1 & 2 & X_3 & 2 & 1 & 1 & 2 & 0 & 1 & 2 & 3 & 2 & 1 & 1 & 1 & 0 \\ 1 & 1 & 1 & X_4 & 0 & 2 & 0 & 0 & 2 & 1 & 2 & 1 & 2 & 0 & 1 & 0 \\ 0 & 2 & 0 & 1 & X_5 & 0 & 0 & 0 & 0 & 1 & 2 & 1 & 1 & 1 & 2 & 0 \\ 1 & 0 & 2 & 2 & 0 & X_6 & 2 & 0 & 1 & 2 & 2 & 2 & 2 & 0 & 2 & 0 \\ 1 & 0 & 2 & 0 & 0 & 2 & X_7 & 3 & 1 & 1 & 2 & 3 & 1 & 0 & 2 & 0 \\ 0 & 0 & 0 & 0 & 0 & 3 & 1 & X_8 & 1 & 0 & 0 & 2 & 1 & 0 & 3 & 0 \\ 1 & 0 & 2 & 2 & 0 & 1 & 2 & 0 & X_9 & 2 & 2 & 2 & 2 & 0 & 2 & 0 \\ 1 & 2 & 2 & 0 & 1 & 1 & 3 & 0 & 1 & X_{10} & 4 & 3 & 1 & 2 & 2 & 0 \\ 1 & 4 & 3 & 4 & 2 & 3 & 3 & 1 & 3 & 3 & X_{11} & 2 & 2 & 3 & 2 & 0 \\ 0 & 0 & 2 & 0 & 0 & 0 & 2 & 1 & 2 & 2 & 1 & X_{12} & 2 & 0 & 1 & 0 \\ 2 & 2 & 2 & 1 & 1 & 1 & 1 & 0 & 1 & 1 & 2 & 1 & X_{13} & 2 & 2 & 0 \\ 0 & 0 & 2 & 0 & 0 & 0 & 2 & 0 & 0 & 2 & 1 & 2 & 2 & X_{14} & 2 & 0 \\ 1 & 2 & 2 & 0 & 1 & 2 & 2 & 2 & 2 & 2 & 2 & 2 & 1 & 2 & X_{15} & 0 \\ 1 & 0 & 2 & 0 & 1 & 1 & 2 & 0 & 1 & 1 & 1 & 0 & 1 & 2 & 2 & X_{16} \end{bmatrix}$$

4.3 计算结果与分析

得出矩阵 P 后,利用上述公式(1)~(3)计算得到该项目 16 个施工安全风险影响因子的权重 K_i ,如表 3 所示。

表 3

影响因子	风险赋值	C_i	E_i	权重 K_i	权重排序
F_{11}	4	36	29	0.057	1
F_{15}	3	23	28	0.045	2
F_{10}	2	23	24	0.042	3
F_3	3	20	25	0.040	4
F_{12}	3	13	30	0.038	5
F_{13}	2	19	23	0.037	6
F_2	4	24	17	0.036	7
F_7	2	16	22	0.034	8
F_6	3	18	18	0.032	9
F_9	3	18	18	0.031	10
F_4	3	14	15	0.026	11
F_{14}	2	13	14	0.024	12
F_1	2	14	12	0.023	13
F_5	2	11	9	0.018	14
F_8	2	11	7	0.016	15
F_{16}	1	16	0	0.014	16

从表 3 中可以看出,对被动式建筑项目施工安全影响较大的因素包括管理因素(技能培训与安全教育、安全制度与责任体系)、环境因素(现场施工作业环境)和人为因素(作业人员安全意识)。所以在以后的施工过程中应加强以上几方面的风险防范。但是,其他施工安全风险因子的权重数值相差并不大,也不能有所懈怠。

最后通过公式(4)计算得出该建筑项目施工安全评价系数 $SD = 34.52\%$ 。根据表 1 知,该项目施

工安全已经达到中风险状态,应采取必要的监控措施,完善安全管理体系,使施工规范化。经过实地的调研,上述的分析结果跟实际情况较为吻合。

4.4 对策建议

本文根据上述的结果分析和实地调查研究,提出以下预防措施。

(1) 增强现场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安全意识。对被动式建筑的施工安全来说,人为风险因素相当敏感,作业人员的整体水平对施工安全至关重要。由于被动式建筑在我国推行不久,应通过专业的培训和教育来提高作业人员的专业水平和安全意识,确保作业人员的安全水平。

(2) 提升施工现场的安全管理。加强对现场施工作业的动态监控,完善安全制度与责任体系,对人、物采取得当的安全监督,定期排查安全隐患。及时组织对现场人员进行技能与安全方面的集训,提高综合水准。此外,被动式建筑施工中对材料和设备的要求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应对材料和设备实施严格把控。

(3) 加强现场施工作业环境管理。现场施工作业环境是安全事故多发的隐蔽地带,应对施工现场的物料、设备进行合理化安置与分配,同时确保作业场地的面积和有序性,为现场人员提供一个适宜的工作环境,从而使发生安全事故的可能性下降。

5 结论

(1) 通过构建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风险交叉耦合作用模型,可直观地发现,单个风险因素与不同因

素之间存在耦合反应以及它们之间交互影响的形态。

(2)构建的相互作用矩阵方法,综合考虑了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对系统的影响。在实际案例的应用中,验证了该方法的可行性,在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研究中达到了一个可观的效果。

(3)本文引入案例,发现了对被动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大的风险因素,并对相应的风险预防给出了一些建议,这对实际施工中的安全防范具有借鉴意义。不过本文在等级划分和专家打分环节存在主观影响,这将是今后的研究方向。

参考文献:

- [1] 惠星星. 基于 BIM 技术的被动式节能建筑设计研究[D]. 合肥:安徽建筑大学,2017.
- [2] Xinxin Liang, Yaodong Wang, Mohammad Royapoor, Qibai Wu, Tony Roskilly, 9th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n Applied Energy[J]. ICAE2017, 21 - 24 August 2017, Cardiff, UK.
- [3] Proietti S, Sdringola P, Desideri U, Zetc. 2013. Life Cycle Assessment of a passive house in a seismic temperate zone[J]. Energy Build. 64, 463 - 472.
- [4] 宋琪. 被动式建筑设计基础理论与方法研究[D]. 西安:西安建筑科技大学,2015.
- [5] 李强年,赵丽娟,周岩,等. 被动式建筑评价体系研究[J]. 建筑节能,2018,46(5):59 - 63.
- [6] 李辉山,张浩浩,李小雪. 基于全生命周期的被动式建筑成本控制评价[J]. 建筑节能,2019,47(8):130 - 134.
- [7] Amiri M, Ardeshir A, MHF Zarandi. Fuzzy probabilistic expert system for occupational hazard assessment in construc-

tion[J]. Safety Science, 2017, 93(C):16 - 28.

- [8] Clyde Zhengdao Li, Geofrey Qiping Shen, Xu Xiaoxiao, et al. Schedule risk modeling in prefabrication housing production[J]. Journal of Cleaner Production, 2016, (134):482 - 494.
- [9] 冯亚娟,都思竹,张竞一. 基于 EW - SPA 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及预测[J]. 中国安全科学学报, 2019, 29(5):85 - 90.
- [10] 陈革,韩宝安,韩宝华,等. 基于 CUOWGA 算子赋权的建筑施工安全灰色聚类评价[J]. 安全与环境工程, 2020, 27(5):98 - 105.
- [11] 闫文周,门雪,杨翻艳. 基于相互作用矩阵的地铁施工风险评价[J]. 武汉大学学报(工学版), 2019, 52(9):796 - 801.
- [12] 周科平,田勇刚. 基于因子交互作用矩阵的采空区危险度评价研究[J]. 中国安全生产科学技术, 2016, 12(10):107 - 112.
- [13] 乔万冠,李新春. 多因素耦合作用下煤矿企业风险评价[J]. 煤炭工程, 2014, 46(4):145 - 148.
- [14] 李坤,尚彦军,蒋毅,等. 基于改进多因素相互作用关系矩阵的场址评价:以 CSNS 工程选址为例[J]. 岩土力学, 2016, 37(S1):400 - 408.
- [15]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被动式超低能耗绿色建筑技术导则(试行)[S]. 2016.
- [16] 杜婷,宋艳红,李智莹,等. 基于模糊综合评价法的建筑项目施工安全评价[J]. 土木工程与管理学报, 2019, 36(6):400 - 408.
- [17] 住房和城乡建设部. 建筑施工安全检查标准[S]. 2011.

(责任编辑 吕志远)

Safety Evaluation of Passive Building Construction Based on Interaction Matrix

WANG Zhiqiang, XIN Xiaobin, LIU Shuo

(School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20, China)

Abstract: The refined construction of passive buildings is complex. In order to conduct a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and research on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of passive buildings, a multi - dimensional trajectory risk cross - coupling action model is established by using the safety accident causation theor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interaction coupling effect of construction safety factors. The safety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passive building construction is constructed from four dimensions, and the interaction matrix is used to evaluate the safety of passive building 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application in the project cases, it is found that factors such as skill training and safety education, safety system and responsibility system, on - site construction environment and safety awareness of operators have great influences on the construction safety of passive buildings, and corresponding preventive measures should be strengthened. The research shows that this method has scientific and practical significance.

Key words: passive building; construction safety; evaluation research; interaction matrix

承灾体视角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研究

姜东民, 张哲, 何栋良, 孟玮

(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 山东青岛 266525)

摘要:采用文献分析法和 Apriori 算法构建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采用组合赋权法和云模型对装配式建筑进行脆弱性评估,并用于实证研究。研究表明:该项目整体脆弱性等级为不太脆弱,并针对脆弱性相对较高的人员提出了降低其脆弱性的建议和措施;该模型为装配式建筑安全评估提供了一定参考。

关键词: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云模型;Apriori 算法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22

中图分类号:TU7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117-06

1 前言

近些年来,国家开始鼓励并扶持建筑工业化的发展,由传统的“粗放式”的建造模式向“精细化”的建造方式转型,装配式建筑凭借施工速度快、绿色环保等优点得到国家大力推广,而装配式建筑的安全问题制约着装配式建筑的发展,为了更好地推广装配式建筑,大量学者对装配式建筑安全管理进行深入探讨。冯亚娟等联合应用熵权法和集对分析法,构建基于 EW-SPA 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模型,并用于实证研究^[1];王志强等针对装配式建筑特点,联合 FTA-SPA-灰色聚类模型对装配式建筑进行了安全评价^[2];陈伟等分析引发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事故的因素及其相互作用机制后构建 SD-MOP 模型,分析应对事故的安全投入关键要素并构建及评价其资源投入优化配置方案^[3];其他学者也将属性数学^[4]、可拓学理论^[5]应用到装配式建筑安全评价中。

本文在承灾体的视角下,对装配式建筑开展脆弱性评估研究,针对脆弱等级较高的承灾体提出相应的建议与措施,达到预防安全事故的目的,促进社会和谐发展。

2 承灾体视角下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构建

2.1 Apriori 算法

Apriori 算法是由 Agrawal 和 R. Srikant 于 1993 年针对购物篮分析问题提出的,是一种布尔型算法。该算法的核心思想是对目标事务库进行扫描,对每个项的出现次数计数,收集大于等于最小支持度的项,即频繁项集,当不能产生更高阶频繁项集时停止,然后挖掘大于等于最小置信度的关联规则,从而实现挖掘数据之间隐藏的关联关系的目的。利用 Apriori 算法挖掘关联规则分为四个步骤,由于篇幅有限,详细步骤参考文献^[6]。

2.2 装配式建筑安全事故类型及承灾体分析

结合装配式建筑特点和国家安全生产通报,整理出发生频率较高几种安全事故有:①高空坠落。装配式建筑施工需要进行大量的高空作业,工人在复杂多变的环境中长时间作业会导致疲劳、走神或身体不适,稍不注意就会导致高空坠落。②物体打击。在预制构件吊装、拼接的过程中,任何零星部件、建筑材料等坠落下来,对施工人员、机械设备等都会产生较大的伤害。③机械伤害,机械设备的使

收稿日期:2020-12-14

基金项目:山东省重点研发计划(软科学项目)一般项目(2019RKB01459)

作者简介:姜东民(1963—),男,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人,博士,青岛理工大学管理工程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工程项目管理、信息化管理等。

用需要专门的人员操作,操作不当或操作人员专业水平不足都会导致机械伤害事故。④起重伤害。预制构件的形状不规则且质量、体积和起吊难度较大,在吊装前起重机械设备选择不当、吊装过程中点位固定不牢、人为操作失误以及吊点设置不合理等问题都有可能致导致预制构件在起吊过程中脱落。⑤坍塌事故。构件在生产、运输、堆放的各个环节中都有可能发生坍塌,严重威胁附近的施工人员的人身安全。

根据对上述5种发生频率较高且造成影响严重的装配式建筑安全事故的分析与总结后,汇总各类安全事故的承灾体得到表1,根据表1可得,人员、机械设备和建筑物本身是装配式建筑安全事故的主要承灾体。

2.3 构建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建立科学合理、全面客观的评估指标体系是进行准确评估工作的第一步。遵循客观性、独立性和全面性的原则,在CNKI进行高级检索,选择主题或关键词为“装配式建筑”“风险评价研究”“安全评价研究”等进行检索,搜集相关文献研究,选取近4年相关度较高的40篇文献,对文献中的指标进行数据清理、数据集成等操作后,得到如表2所示的初始指标库。

表1 安全事故承灾体

事故类型	事故承灾体		
	人员	机械设备	建筑物本身
高空坠物	√		
物体打击	√	√	√
机械伤害	√	√	
起重伤害	√	√	√
坍塌事故	√	√	√

表2 初始指标

编号	指标名称	编号	指标名称	编号	指标名称
A1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	A16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	A31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
A2	人员安全意识	A17	设备安全防护措施	A32	有无可操作平台
A3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	A18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	A33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
A4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A19	机械设备操作规范化程度	A34	建筑材料的质量
A5	疲劳施工程度	A20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A35	预制构件拼装准确程度
A6	人员文化素质水平	A21	机械设备正常运行情况	A36	预制构件进厂检验情况
A7	人员配置情况	A22	人机混合作业、高空作业	A37	预制构件吊装水平
A8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A23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	A38	危险品管理情况
A9	从业人员资质水平	A24	塔吊交叉作业	A39	工程质量是否合格
A10	人员责任心水平	A25	是否有高空坠物	A40	临时用电风险
A11	安全管理制度	A26	吊装超载、超重	A41	安全标志设置
A12	承包商偷工减料	A27	设备作业干扰程度	A42	预制构件生产
A13	施工现场环境	A28	临时支撑的强度	A43	安全措施费投入情况
A14	自然环境	A29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A44	吊点设置合理程度
A15	安全标准政策环境	A30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质量	A45	事故预防及应急处理

本文采用Apriori算法挖掘频繁项集是为了筛选初始脆弱性因素清单中相对重要的指标,使得指标体系更加科学,因此只进行挖掘频繁1项集的工作。经过征询相关专家建议之后,本文设置最小支持度为0.25,最小置信度为0.8。在本研究中,频繁1项集表示在初始数据库中出现次数较多且相对重要的评价指标,support表示此频繁1项集的支持度。将频繁1项集作为初次筛选后保留的指标,如表3所示。

由于是在承灾体的视角下进行脆弱性评估研究,采用Apriori算法第一次筛选脆弱性指标后,仍存在若干与本研究关联不大的指标,采用专家调查法可以有效地剔除此类指标,进行二次指标的筛选修订。经过专家讨论后,一致认为A38、A11、A15、A32、A13、A14六项指标与本文研究视角不吻合,将这些指标予以剔除,然后对指标进行重新编号后,构建出如表4的评估指标体系。

表3 频繁1项集列表

编号	频繁1项集
A13	施工现场环境
A6	人员文化素质水平
A14	自然环境
A38	危险品管理情况
A11	安全管理制度
A32	有无可操作平台
A31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
A29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A1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
A16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
A3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
A30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质量
A4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A33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
A15	安全标准政策环境
A2	人员安全意识
A18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
A20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A8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A23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
A28	临时支撑的强度
A7	人员配置情况

表4 承灾体视角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承灾体视角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U	人员 U1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 U11
		人员安全意识 U12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 U13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U14
		人员文化素质水平 U15
		人员配置情况 U16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U17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 U18
	机械设备 U2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 U21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 U22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U23
		临时支撑的强度 U31
	建筑物本身 U3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U32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重量 U33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 U34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 U35

3 装配式建筑承灾体脆弱性评估模型构建

3.1 指标权重的确定

3.1.1 权重方法的选择

装配式建筑脆弱性指标包含人为的主观因素和实际情况的客观因素,开展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研究应同时考虑主观因素和客观因素,通过参考相关脆弱性评估研究成果,为了能更准确、科学的确定指标权重,本文采用组合赋权法分别计算各指标的主、客观权重,然后利用数学公式计算组合得到各指标综合权重,并在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进行应用。

3.1.2 AHP 确定主客观权重

AHP 的基本原理是将复杂的问题分解成多个层次,按照因素间的相互关系及上下层关系,将因素按不同层次分类组合,建立一个多层次分析结构模型,最终把复杂问题转化为最低层相对重要程度的权值的问题。利用 AHP 解决问题的计算步骤参考相关文献^[7],在此不再赘述。

3.1.3 熵值法确定客观权重

熵是描述对象系统混乱程度的一种度量,一个对象的信息熵值越小,其信息量就越大,评价对象的权重相应的也就更大。熵值法的计算步骤如下:

Step1: 设待评价项目数为 m , 评价指标数为 n , 构造如下的判断矩阵:

$$R = \begin{bmatrix} R_{11} & R_{12} & \cdots & R_{1n} \\ R_{21} & R_{22} & \cdots & R_{2n} \\ \cdots & \cdots & \cdots & \cdots \\ R_{m1} & R_{m2} & \cdots & R_{mn} \end{bmatrix}$$

$$(i = 1, 2, \dots, n; j = 1, 2, \dots, m)$$

Step2: 对数据进行标准化处理,其标准化公式为

$$x'_{ij} = \frac{x_{ij} - x_j^{\min}}{x_j^{\max} - x_j^{\min}} \quad (1)$$

Step3: 计算第 j 个指标熵值, 设 e_j 为第 j 个指标的熵值, 其计算公式为

$$e_j = -\frac{1}{\ln n} \sum_{i=1}^n y_{ij} \ln y_{ij}, i = (1, 2, \dots, n) \quad (2)$$

$$y_{ij} = \frac{r_{ij}}{\sum_{i=1}^m r_{ij}} \quad (3)$$

式中 y_{ij} 为第 j 个指标在第 i 个系统中的特征比重。

Step4: 计算第 j 项指标权重, 其计算公式为

$$W_i = \frac{1 - e_j}{\sum_{i=1}^n (1 - e_j)} \quad (4)$$

3.1.4 确定综合权重

AHP 法考虑到了评估结果主观性, 但不同专家对不同事物的认识始终存在差异; 熵值法以客观数据为基础进行分析, 使得评判结果更加客观。结合上述两种方法加权计算确定综合权重, 使得权重系数更加科学。综合权重计算如公式5所示。公式中, $W_i^{(1)}$ 为主观权重, $W_i^{(2)}$ 为客观权重, W_i 为综合权重。

$$W_i = \frac{W_i^{(1)} W_i^{(2)}}{\sum_{i=1}^n W_i^{(1)} W_i^{(2)}} \quad (5)$$

3.2 云模型

李德毅于 1995 年提出了云模型理论, 其定义如下: 设 U 是一个用精确数值表示的定量论域, C 是 U 上的定性概念, 若定量值 $x \in U$, 且是定性概念 C 的一次随机实现 x , x 对 C 的确定度 $\mu(x) \in [0, 1]$ 是有稳定倾向的随机数 $\mu: U \rightarrow [0, 1], x \in U, x \in \mu(x)$, 则在论域 U 上的分布成为云, 每一个称为一个云滴^[8]。

3.2.1 云模型的数字特征

云用期望 Ex 、熵 En 、超熵 He 三个数字特征来表现云模型的整体特性。期望 Ex 是论域的中心值, 也是云滴在定性语言概念中确定度最大、最典型的点。熵 En 是对定性概念不确定性的度量, 反映了模糊性和随机性。超熵 He 是熵的熵, 用来表示熵的不确定性, 即云滴的离散程度。

3.2.2 云发生器

云发生器即云生成算法。在云模型中, 通过云发生器来实现定性概念与定量数据之间的转化^[9]。正向云发生器是从定性到定量的转化模型, 利用云的 3 个数字特征生成云滴, 具体过程如图 1 所示。逆向云发生器是从定量到定向的转化模型, 根据已有云滴计算出 3 个数字特征, 具体过程如图 2 所示。将正向云发生器和逆向云发生器相结合, 可以实现

定向与定量之间的任意转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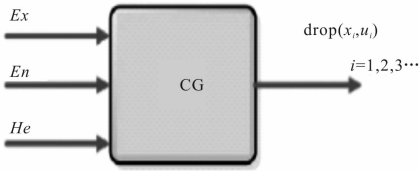


图1 正向云发生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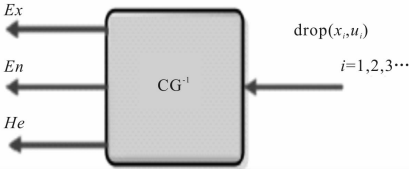


图2 逆向云发生器

4 基于云模型的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

4.1 确定脆弱性评估指标集

根据本文研究视角,建立了如表4所示的装配式建筑承灾体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其中包括人员、机械设备、建筑物本身3个一级指标和16个二级指标。

4.2 评语云模型化

结合 GB/T 27921—2011《风险管理 风险评估技术》风险等级划分方法和建筑领域相关专家的建议,本文将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价指标的评语集划分为三个等级,脆弱性系数在 $[0, 0.33]$ 内为“不脆弱”等级、脆弱性系数在 $[0.34, 0.67]$ 内为“不太脆弱”等级、脆弱性系数在 $[0.68, 1]$ 内为“脆弱”等级,被划分的三个脆弱性等级均有对应的评语数值区间,都有左右两个临界值,形如 $V[C_{\min}, C_{\max}]$,属于双边约束,且该区间对应的标准云的数字特征为 (Ex, En, He) ,其计算公式如式6。

$$\begin{cases} Ex = (C_{\min} + C_{\max})/2 \\ En = (C_{\max} - C_{\min})/6 \\ He = k \end{cases} \quad (6)$$

式中: C_{\max} 、 C_{\min} 分别为某等级标准的最大和最小边界; k 为常数,可以根据变量本身的不确定程度进行调整, k 的取值不宜过大,参考专家的意见,本文中 k 取0.01,根据公式6可计算出评价标准的云模型参数为:不脆弱(0.165, 0.055, 0.01)、不太脆弱(0.5, 0.053, 0.01)、脆弱(0.835, 0.055, 0.01)。

4.3 计算指标评估云和综合云

采用专家打分法邀请专家对各指标进行判断打分,可以得到指标评价矩阵 Z ,有 m 个专家, n 个评价指标,其中 Z_{ij} 表示第 i 个专家对第 j 个指标的评价结果, $i=1, 2, \dots, m; j=1, 2, \dots, n$ 。指标评价矩阵表示如下

$$Z = \begin{bmatrix} Z_{11} & Z_{12} & \dots & Z_{1n} \\ Z_{21} & Z_{22} & \dots & Z_{2n} \\ \dots & \dots & \dots & \dots \\ Z_{m1} & Z_{m2} & \dots & Z_{mn} \end{bmatrix}$$

对矩阵 Z 处理后,根据公式8、公式7分别计算得到二级指标评估云和综合云,将综合云与标准评估云对比,进而确定其整体脆弱性等级。

$$\begin{cases} Ex = \frac{Ex_1 w_1 + Ex_2 w_2 + \dots + Ex_n w_n}{w_1 + w_2 + \dots + w_n} \\ En = \frac{w_1^2}{w_1^2 + w_2^2 + \dots + w_n^2} En_1 + \frac{w_2^2}{w_1^2 + w_2^2 + \dots + w_n^2} En_2 + \dots + \frac{w_n^2}{w_1^2 + w_2^2 + \dots + w_n^2} En_n \\ He = \frac{w_1^2}{w_1^2 + w_2^2 + \dots + w_n^2} He_1 + \frac{w_2^2}{w_1^2 + w_2^2 + \dots + w_n^2} He_2 + \dots + \frac{w_n^2}{w_1^2 + w_2^2 + \dots + w_n^2} He_n \end{cases} \quad (7)$$

$$\begin{cases} Ex = \bar{X} = \frac{1}{n} \sum_{i=1}^n x_i \\ S^2 = \frac{1}{n-1} \sum_{i=1}^n (x_i - \bar{X})^2 \\ En = \sqrt{\frac{\pi}{2}} \times \frac{1}{n} \sum_{i=1}^n |x_i - Ex| \\ He = \sqrt{S^2 - En^2} \end{cases} \quad (8)$$

5 实际案例应用

5.1 工程概况

青岛市某装配式建筑项目A地块,位于青岛市黄岛区,总建筑面积156316.61 m^2 ,于2018年8月开工,计划2021年10月完工。本工程1#、2#、3#商品住宅楼为装配整体式剪力墙结构,四层及四层以上采用装配式剪力墙结构,预制构件主要有复合保温外墙板、内墙板、楼梯,单品预制率为54.15%。

5.2 计算指标权重

借助MATLAB求解可得各指标权重,一、二级指标权重如表5所示。

5.3 计算评估指标云

邀请10位从事装配式建筑领域的相关专家和部分参建项目各方的管理人员对各指标进行判断打分,打分区间为 $[0, 1]$,打分精度为0.05,打分情况如表6所示。根据公式7计算各二级指标云模型数字特征,根据公式8计算得到各一级指标特征和综合云数字特征,具体数据如表7、表8所示,根据各指标的数字特征借助MATLAB生成云图,如图3所示。

表 5 各级指标权重

目标层	一级指标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二级指标	主观权重	客观权重	综合权重
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估指标体系 U	人员 U1	0.6483	0.3348	0.6422	U11	0.0399	0.0245	0.0190
					U12	0.2019	0.0180	0.0707
					U13	0.1434	0.0185	0.0516
					U14	0.0770	0.0434	0.0650
					U15	0.0186	0.0605	0.0219
					U16	0.0302	0.0382	0.0224
					U17	0.0894	0.0708	0.1231
					U18	0.078	0.0592	0.0898
	机械设备 U2	0.1220	0.2960	0.1069	U21	0.0104	0.0953	0.0193
					U22	0.0330	0.1086	0.0697
					U23	0.0786	0.0921	0.1408
					U31	0.0119	0.1170	0.0271
					U32	0.0897	0.0766	0.1336
					U33	0.0721	0.0560	0.0785
					U34	0.0181	0.0539	0.0190
建筑物本身 U3	0.2297	0.3692	0.2509	U35	0.0379	0.0657	0.0484	

表 6 专家打分情况表

二级指标	S1	S2	S3	S4	S5	S6	S7	S8	S9	S10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 U11	0.3	0.35	0.25	0.3	0.2	0.3	0.25	0.2	0.15	0.3
人员安全意识 U12	0.45	0.5	0.45	0.6	0.55	0.55	0.55	0.5	0.5	0.45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 U13	0.45	0.35	0.35	0.4	0.4	0.45	0.45	0.4	0.35	0.3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U14	0.25	0.25	0.35	0.4	0.4	0.35	0.35	0.3	0.3	0.3
文化素质水平 U15	0.4	0.5	0.5	0.35	0.45	0.4	0.45	0.5	0.4	0.45
人员配置情况 U16	0.25	0.35	0.2	0.2	0.3	0.2	0.25	0.25	0.35	0.3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U17	0.4	0.35	0.35	0.4	0.3	0.35	0.4	0.4	0.3	0.4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 U18	0.5	0.5	0.45	0.4	0.5	0.4	0.5	0.45	0.5	0.4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 U21	0.1	0.2	0.25	0.2	0.3	0.25	0.1	0.15	0.2	0.2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 U22	0.35	0.3	0.25	0.3	0.35	0.4	0.35	0.3	0.4	0.35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U23	0.25	0.25	0.3	0.3	0.25	0.25	0.35	0.2	0.3	0.2
临时支撑的强度 U31	0.25	0.25	0.3	0.3	0.25	0.25	0.35	0.2	0.3	0.3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U32	0.25	0.3	0.3	0.25	0.1	0.4	0.3	0.25	0.2	0.3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重量 U33	0.2	0.1	0.1	0.15	0.1	0.15	0.15	0.2	0.15	0.2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 U34	0.25	0.2	0.15	0.15	0.15	0.25	0.2	0.2	0.25	0.15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 U35	0.4	0.3	0.3	0.35	0.4	0.35	0.35	0.3	0.4	0.35

表 7 二级指标的云模型数字特征

二级指标	云模型数字特征(Ex, En, He)
人员操作技术水平 U11	(0.26, 0.063, 0.023)
人员安全意识 U12	(0.51, 0.053, 0.019)
安全防护佩戴情况 U13	(0.39, 0.053, 0.019)
人员身体健康状况 U14	(0.325, 0.056, 0.024)
文化素质水平 U15	(0.44, 0.053, 0.019)
人员配置情况 U16	(0.265, 0.060, 0.024)
安全教育培训情况 U17	(0.365, 0.044, 0.020)
违章作业等违规操作 U18	(0.46, 0.050, 0.025)
机械设备的选择与安拆 U21	(0.195, 0.059, 0.016)
机械设备安全定期检验 U22	(0.335, 0.048, 0.016)
机械设备的维护与保养 U23	(0.265, 0.048, 0.016)
临时支撑的强度 U31	(0.265, 0.060, 0.024)
施工安全防护措施 U32	(0.265, 0.069, 0.028)
预制构件的强度和重量 U33	(0.15, 0.038, 0.009)
预制构件的存放和运输 U34	(0.195, 0.045, 0.018)
构件连接部位的强度 U35	(0.35, 0.038, 0.009)

表 8 一级指标云模型数字特征

一级指标	云模型数字特征(Ex, En, He)
人员 U1	(0.397, 0.049, 0.021)
机械设备 U2	(0.280, 0.048, 0.016)
建筑物本身 U3	(0.245, 0.059, 0.022)

根据图 3 可得,该项目整体脆弱性处于“不太脆弱”和“脆弱”两级之间,属于“不太脆弱”等级,说明该项目安全状况较好,与实际情况基本吻合。各一级指标中人员脆弱性最高,应提高工人的安全意识,对进入施工现场的作业人员进行充分的安全教育培训工作,要不定期和定期地组织施工人员学习相关安全知识和安全标准常识。针对不同教育层次的人群采取不同的安全培训,从班组层次抓好基础工作,提高施工人员的安全素养,从而降低人员脆弱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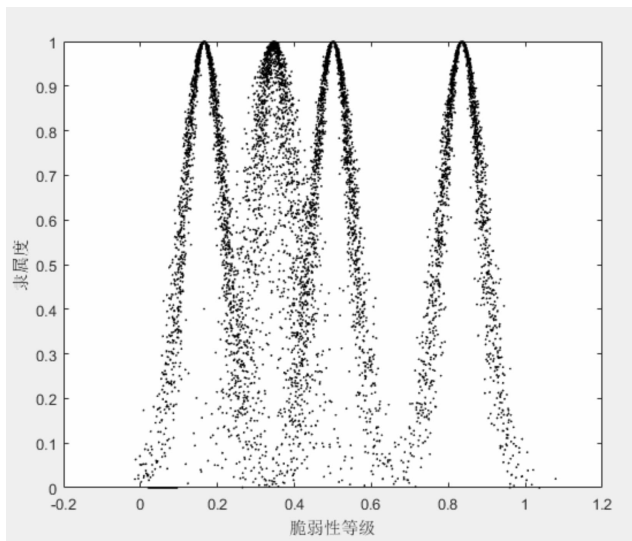


图3 综合云与标准云对比云图

6 结语

本文在承灾体的视角下,对装配式建筑安全事故进行承灾体分析,采用文献分析法和Apriori算法构建脆弱性评价指标体系,结合组合赋权法和云模型构建脆弱性评估模型,对装配式建筑脆弱性评价研究工作,并应用于实际案例,评估结果显示该项目处于不太脆弱等级,与实际情况符合,为装配式建筑安全管理提供了新思路。研究表明,该模型具有可行性及科学性。

参考文献:

- [1] 冯亚娟,都思竹,张竞一.基于EW-SPA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评价及预测[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9,29(5):85-90.
- [2] 王志强,张樵民,王国强,等.基于FTA-SPA-灰色聚类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测评[J].安全与环境工程,2018,25(2):166-173.
- [3] 陈伟,付杰,熊付刚,等.装配式建筑工程施工安全灰色聚类测评模型[J].中国安全科学学报,2016,26(11):70-75.
- [4] 董云锦.基于属性数学的装配式建筑施工安全影响因素分析及测评研究[D].成都:西华大学,2018.
- [5] 黄桂林,胡明路.基于可拓学理论的装配式住宅施工过程中安全风险评价研究[J].工业安全与环保,2017,43(2):33-38.
- [6] 黄黎明.基于Apriori和FP-TREE的频繁项目集挖掘算法[D].衡阳:南华大学,2018.
- [7] 梅柠.基于AHP-熵值法的低碳绿色公路运输发展研究[D].大连:大连海事大学,2013.
- [8] Li D Y, Liu C Y. Study on the university of the normal cloud model[J]. Engineering Science, 2004, 6(8): 28-34.
- [9] 杨文.基于云模型的宁海县地表水环境质量评价[D].杭州:浙江师范大学,2013.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zard – bearing Bodies

JIANG Dongmin, ZHANG Zhe, HE Dongliang, MENG Wei

(School of Management Engineering, Qingdao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Qingdao, Shandong 266520, China)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have developed rapidly in my country, but frequent accidents concerning with safety restricted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Therefore, it is imperative to conduct safety management on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hazard – bearing bodies, the author analyzes several types of safety accidents and hazard – bearing bodies that occur with high frequency and greater hazards. Combining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nd safety production notifications, it applies literature review analysis and Apriori algorithm and constructs a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vulnerabilities. It adopts combination weighting method and cloud model to evaluate the vulnerability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and applies it to an empirical research. The research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vulnerability of the project is not very high, and suggestions and measures to reduce their vulnerability are proposed for people with relatively high vulnerability. This model provides a certain reference for the safety evaluation of prefabricated buildings.

Key words: prefabricated building; vulnerability assessment; cloud model; Apriori algorithm

CPE 非视距路径与弱信号场景下 5G 毫米波接收研究

张永亮, 刘 洋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 上海研发中心, 上海 201203)

摘要:5G 毫米波在逐步应用与推广, 目前关于 CPE 在各种室内外场合 5G 毫米波信号接收性能数据大多聚焦于城市街区、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场馆等非视距路径和弱信号场景, 很少涉及基站近处局部复杂环境下的场景。针对 NSA 网络架构环境下的 CPE 在基站底部非视距路径、楼梯间以及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等相关弱信号场景多向接收室外 5G 毫米波基站信号接收探究, 并对相关场景下信号接收的不均衡性给出优化提升建议。

关键词:毫米波; 客户终端设备; 非视距路径; 弱信号; 接收

DOI:10.13783/j.cnki.cn41-1275/g4.2021.02.023

中图分类号:TN929.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3715(2021)02-0123-06

1 引言

5G 网络主要使用两段频率, FR1 频段(450MHz~6GHz, 即 Sub 6GHz 频段)和 FR2 频段(24.25GHz~52.6GHz, 即毫米波频段, 3GPP R17 进一步扩展支持从 52.6GHz 到 71GHz 频段以及免许可频段)。毫米波虽然有传播距离短和穿透性差的缺点, 但其带来大带宽和高速率: 带宽能达到 400MHz 甚至 800MHz, 传输速率可达到 10Gbit/s。同时, 由于毫米波频率高, 天线尺寸小, 终端可以集成更多的天线, 形成更窄的波束。当前毫米波应用场景主要是基于网络的数据热点, 如交通枢纽、展馆、体育场、步行街等; 智慧园区, 与人工智能技术结合, 叠加丰富的智能业务, 提供本地化园区的解决方案; 固定无线宽带接入以及接入回传一体化, 可以通过毫米波做宽带接入乃至接入回传一体化的服务。

CPE(Customer Premise Equipment, 客户终端设备)是上述毫米波主要应用场景中的典型终端载体, 室内外都能用到, 可以像手机一样通过插卡获得移动网络, 然后直接充当有线网络接口, 或者将其转化为 WiFi 信号, 供家庭或者办公等场景内设备进行连接。基于当前毫米波主要应用场景, 目前关于 CPE 在各种室内外场合 5G 毫米波信号接收性能数据大多聚焦于城市街区、交通枢纽以及大型场馆等

非视距路径和弱信号场景, 很少涉及基站近处局部复杂环境下的场景。因此, 在实际的实验环境中, 需要增强对 CPE 置于基站近处的非视距路径、楼梯间以及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等弱信号场景多向接收室外 5G 毫米波基站信号接收探究。

2 毫米波信道特征

毫米波相比厘米波带宽宽, 但随着射频频段升高, 无线电信号的传播行为与光的传播越来越类似, 准光学传播的低衍射概率导致高的阻塞概率, 在较低频段中很少能观察到的几何因素如路灯、树木和小家具等形成了阻塞的损耗, 使得位于建筑物后面或角落附近位置处的通信终端所接收的信号会被严重衰减^[1]。同时, 移动的人或物等很多在不影响低频信号传播的因素也会引起高频传播扰动, 使得高频信道变得不稳定。

2.1 毫米波传输路径损耗参数

空间传播的损耗与载波频率和距离有关, 当载波频率从 6GHz 提升到 60GHz, 则相同距离的衰落会提升 100 倍。

$$P_L = \beta + \alpha \cdot 10 \lg d \quad (1)$$

这是路径损耗随距离的变化公式^[2,6], 其中, α 为路径损耗指数因子, 表示路径损耗随距离变化的情况; β 则涵盖了其他影响传播的损耗因素, 并在特

收稿日期: 2020-11-25

作者简介: 张永亮(1975—), 男, 河南信阳人, 硕士, 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上海研发中心工程师, 目前从事 5G 终端研发工作。

定场景下会抽象为一个常数; d 为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对于高频传输,更多关注的是路径损耗的因子,因为其直接影响实际部署时的覆盖范围。

对典型毫米波应用频段 28GHz 和 38GHz 来说,其路径损耗可进一步表示为^[3]

$$P_L = 20\lg\left(\frac{4\pi d_0}{\lambda}\right) + \alpha \cdot 10\lg\left(\frac{d}{d_0}\right) + X_\sigma \quad (2)$$

其中, d_0 是近似自由空间的参考距离(设置 $d_0 = 5\text{m}$); λ 为波长(28GHz是10.71mm,38GHz是7.78mm); α 是距离和所有指向角的平均路径损耗因子; X_σ 阴影随机变量,为均值0、方差 σ 的高斯随机变量。

在无线蜂窝的城区场景中,当终端和基站距离较近且没有建筑物遮挡时,通常包含视距路径(Line of Sight,简称LOS);其他经过建筑物的绕射及反射损耗的传播路径称之为非视距路径(Non Line of Sight,简称NLOS)。表1给出5G毫米波常用的28GHz和38GHz频段下路径损耗因子 α 和阴影随机变量 σ 标准差。

表1 5G毫米波常用频段 α 与 σ

参数		α	σ
25dBi 天线在 38GHz	LOS	2.20	10.3
	NLOS	3.88	14.6
13.3dBi 天线在 38GHz	LOS	2.21	9.40
	NLOS	3.18	11.0
24.5dBi 天线在 28GHz	LOS	2.55	8.66
	NLOS	5.76	9.02

上述典型5G毫米波应用频段参数说明,高频传输的信号衰落并不会随着距离的增大而显著提升。特别从损耗因子 α 角度看,Sub 6Hz在LOS和NLOS下分别为2.2和3.67,毫米波与低频只是仅仅有着固定的差值(LOS下差距极小,NLOS下差距略大),说明高频传输的更大损耗可以通过技术手段克服。

根据费叶思公式^[2]

$$P_R = P_T \cdot G_T \cdot G_R \cdot \frac{\lambda^2}{16\pi R^2} \quad (3)$$

P_R 是无阻挡自由空间的接收功率, P_T 是发射功率, G_T 和 G_R 分别是发射和接收天线的增益, R 是发射机和接收机之间的距离, f 是载频, c 是光速。在理想的全向发射($G_T = 1$)和全向接收($G_R = 1$)条件下,接收信号功率与载频的平方成反比。在实际应用中,天线增益(G_T 或 G_R)大于1的天线或天线阵列被用于发射机和接收机,在给定天线孔径的条件下,天线增益与载频的平方成正比,也就是说,高频段的发射和接收天线,能够通过相对较窄的方向

性波束,以更集中的能量进行发射和接收。

2.2 毫米波传输 LOS 概率和路径损耗计算模型

进一步地,在毫米波传输信道建模过程中,通常使用LOS概率来建模终端和基站间的传播路径中是否包含LOS路径。在UMa(基站高于周围建筑物)环境下LOS概率不仅与基站和终端的室外水平距离 d_{2D-out} 相关,还与终端高度 h_{UT} 相关,LOS概率 P_{LOS} 具体可表达为^[4,8]

$$P_{LOS} = P_{LOS-ITU-UMA} (1 + C(d, h_{UT})) \quad (4)$$

其中, $C(d_{2D-out}, h_{UT})$ 表示近距LOS(用户在基站周围建筑物中,基站与终端之间无障碍物)与远距LOS(通常是指终端和基站间有矮障碍物阻隔,但障碍物对高层用户起不到遮挡作用)之间的概率之比。

比较高的终端在距离基站比较远时与ITU信道规定的LOS概率相差较大,需要通过增加相关性因子对于距离大于18m高度以及在[13m,23m]范围内的用户增加LOS概率进行修正。

$$P_{LOS} = \begin{cases} 1, d_{2D-out} \leq 18\text{m} \\ \left[\frac{18}{d_{2D-out}} + \exp\left(-\frac{d_{2D-out}}{63}\right) \left(1 - \frac{18}{d_{2D-out}}\right) \right] \cdot \\ \left(1 + C(h_{UT}) \frac{5}{4} \left(\frac{d_{2D-out}}{100}\right)^3 \exp\left(-\frac{d_{2D-out}}{150}\right)\right), \\ 18\text{m} < d_{2D-out} \end{cases} \quad (5)$$

其中

$$C(h_{UT}) = \begin{cases} 0, h_{UT} \leq 13\text{m} \\ \left(\frac{h_{UT} - 13}{10}\right)^{1.5}, 13\text{m} < h_{UT} \leq 23\text{m} \end{cases} \quad (6)$$

UMa场景下毫米波频段的NLOS 3D信道路径损耗

$$PL = \max(PL_{UMa-NLOS}, PL_{UMa-LOS}) \quad (7)$$

即,取UMa场景NLOS和LOS路损值的最大者。

在阴影衰落标准差 $\sigma = 4$ 的情况下,

$$PL_{UMa-LOS} = \begin{cases} 22\log_{10}(d_{3D}) + 28 + 20\log_{10}(f_c), 10\text{m} < d_{2D} < d'_{BP} \\ 40\log_{10}(d_{3D}) + 28 + 20\log_{10}(f_c) - 91g((d'_{BP})^2 + (h_{BS} - h_{UT})^2), d'_{BP} < d_{2D} < 5\text{km} \end{cases} \quad (8)$$

在阴影衰落标准差 $\sigma = 6$ 的情况下,

$$PL_{UMa-NLOS} = 161.04 - 7.11\log(W) + 7.5\log_{10}(h) - (24.37(h/h_{BS})^2)\log_{10}(h_{BS}) + (43.42 - 3.11\log_{10}(h_{BS}))(\log_{10}(d_{3D}) - 3) + 20\log_{10}(f_c) -$$

$$3.2(\log_{10}(17.625))^2 - 4.97) - 0.6(h_{UT} - 1.5),$$

$$10m < d_{2D} < 5km \quad (9)$$

上面系列公式中, d_{2D} 为基站和终端的水平距离, d_{3D} 为基站和终端的实际距离, h 为建筑物平均高度, W 为建筑物中间的廊道宽度, h_{BS} 和 h_{UT} 分别为基站和终端的实际高度。Uma LOS 场景下, 分界点距离定义为 $d'_{BP} = 4h'_{BS}h'_{UT}f_c/c$, 其中 f_c 为中心频率; h'_{BS} 和 h'_{UT} 为基站和终端的有效天线高度。 $h'_{BS} = h_{BS} - h_E$, $h'_{UT} = h_{UT} - h_E$ 。 h_E 为有效环境高度, $h_E = 1m$ 的概率为 $1/(1 + C(d_{2D-out}, h_{UT}))$, 其他情况下, h_E 为 $(12, 15, \dots, (h_{UT} - 1.5))$ 范围内的均匀分布。

由式(9)看出, UMa 环境布局对 NLOS 传输路径损耗有很大影响, 建筑物的平均高度和建筑物中间的廊道宽度会影响传输链路的路径损耗。

3 CPE 毫米波 NLOS 弱信号具体场景下接收性能

目前毫米波通信收发系统基于毫米波上述特性, 配置了物理紧凑型天线实现大规模 MIMO 操作, 提升天线和波束赋形增益, 提高能量效率; 提升空间复用增益, 提高频谱效率; 提升窄带波束方向性通信, 提高空间复用性能。

当毫米波通信的双方为毫米波基站和客户终端设备 CPE 时, 两者的功率地位是明显不对等的, 后者尤其在上行功率方面是明显不足的, 因此其在 NLOS、封闭半封闭狭窄空间、拉远低功率等弱信号场景下的具体表现是非常需要关注的。

为此, 组建一个 UMa^[1] 场景实验环境, 采用 NSA 构架的数模混合波束赋形结构^[5] 的毫米波基站(AAU)和 LTE 基站(天馈 + RRU)置于一中间有较大天井空间的口字形楼群南侧裙楼四楼楼顶, 机械俯角 12 度并朝北向, 基站方面锚点频率为 LTE Band1, 毫米波频段选 n257, 毫米波基站为 512 阵子(4 个射频通道, 每通道 128 阵子), 单个信道最大输

出功率 25dBm, EIRP 最大 51dBm; 同时, 把用于接收毫米波信号的 CPE 置于手推车上, CPE 上下行 MIMO 均为 $2 * 2$, 单个信道最大功率 14dBm, EIRP 最大 23dBm。

然后分别把 CPE 置于基站底部非视距路径、楼梯间以及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以及关联弱信号场景多向接收室外 5G 毫米波基站信号场景下进行针对性的测量。

3.1 CPE 反射环境下的 NLOS 位置毫米波信号接收

CPE 非视距 NLOS 位置选取的是基站底座下部裙楼一楼内的半开间, 半开间朝向口字型楼群天井(基站位于口字型楼群中的南侧裙楼上), 即基站和半开间间隔着二楼和三楼楼体。

实测场景如图 1 所示, 接收机 CPE 位置是位于相对空旷环境, 但地面对毫米波基站信号形成反射环境, 使得 CPE 在地面反射环境下的 NLOS 位置接收毫米波信号。



图 1 实测场景一

进一步地, 如图 2 所示, 分别把半开间内的 CPE 按东、西、南、北四个朝向进行实测(和图 1 视角正好相反, 可以看到具有绿地、行道和车棚的完整天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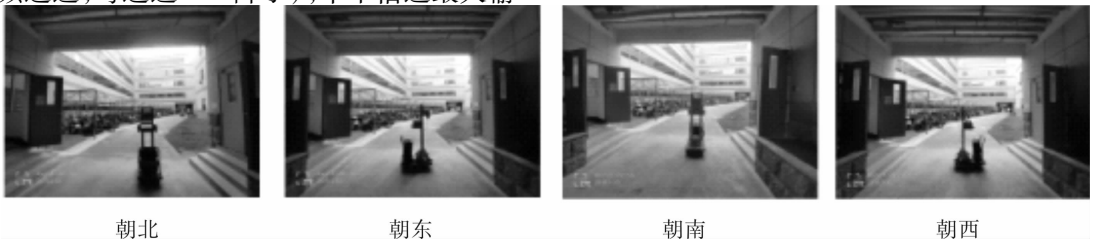


图 2 实测场景二

实测 Beam ID (波束标识)、RSRP (Reference Signal Receiving Power, 参考信号接收功率)、MCS (Modulation and Coding Scheme, 调制编码方案)、BLER (Block Error Rate, 误块率)、THP (Throughput,

吞吐率, 也简作 TUP, 分物理层和应用层) 以及 PD-CP (Packet Data Convergence Protocol, 分组数据汇聚协议) 数据, 具体数据如表 2 所示。

表2 实测数据

测试位置	测试方向	Beam ID	RSRP	MCS	BLER	THP (Mbps)	PDCP (Mbps)
天井底部半开间	东	15	-98	20	10%	311	269
	南	15	-94	22	10%	344	296
	西	33	-96	14	10%	195	168
	北	15	-90	24	10%	402	346

这组数据中,位于天井底部一侧裙楼一楼半开间内的CPE,因在空旷地面反射环境的NLOS路径



朝北

朝东



朝南

朝西

图3 实测场景三

测试共测5个楼层,每个楼层测4个方向,CPE朝北和朝南均距离窗户0.65m,朝西距离窗户0.40m,朝东距离窗户1.25m。测得的数据如表3所示。

表3 实测数据

测试位置	测试方向	波束ID	RSRP	MCS	BLER	THP (Mbps)	PDCP (Mbps)
一楼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28	-99	8	10%	106	99
	西	29	-88	25	10%	594	540
	北	28	-105	11	10%	158	118
二楼	东	54	-106	10	10%	154	114
	南	不能稳定捕捉					
	西	15	-97	20	10%	501	258
	北	54	-97	45	10%	187	168
三楼	东	54	-105	15	10%	187	152
	南	54	-98	21	10%	558	295
	西	54	-86	22	10%	582	504
	北	54	-85	18	10%	282	224
四楼	东	17	-99	11	10%	156	151
	南	17	-95	16	10%	224	195
	西	17	-82	21	10%	556	254
	北	17	-74	24	10%	407	361
五楼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不能稳定捕捉					
	西	16	-96	12	10%	185	127
	北	16	-92	17	10%	256	205

从上面数据看出,一方面,CPE在不同楼层的楼梯间,其毫米波接收性能是不相同的,即终端高度和基站高度相对变化时毫米波接收性能会相应变化,与前述第2节所述理论部分基本相符。另一方面,在具体某层的楼梯间内,CPE不同的朝向其毫米波接收性能也有很大不同,且由于楼梯间内涉及不同朝向的LOS和NLOS路径下因毫米波信号传播路径

下毫米波衰减小,对毫米波信号的接收数据情况还是比较理想的(应用层在MCS 28理想值,THP可以达到均值459.7Mbps,上述四个朝向MCS值和THP总体情况除了西向略差,其余均尚可)。

3.2 CPE楼梯间位置毫米波信号接收

如图3所示,把CPE放置在狭窄空间的楼梯间内(图1基站所在楼左侧的楼内楼梯间,该楼共五层,总层数高于基站所在楼)接收毫米波信号。

很复杂,已经超出前述第2节所述的理论模型所覆盖的场景。

具体到不同楼层方面,一楼和二楼距离基站较远,一楼和二楼的朝东向和朝南向都是完全NLOS路径,基本情况差不多,虽然表中反映的是一楼的朝东和二楼的朝南毫米波信号不能稳定捕捉,但实际CPE位置稍挪动也会存在二楼的朝东和一楼的朝南不能稳定捕捉毫米波信号的情况;一楼和二楼朝西向是朝向楼梯间窗户,有比较大的LOS概率,MCS值和吞吐率都比较高;朝北向都基本靠楼梯斜面反射,由于楼梯斜面和基站是正对方向,反射的信号还是有保证的,但由于距离基站较远,数据表现比较勉强。

三楼和四楼CPE位置由于接近基站,各个朝向都是有效接收数据的。朝西向是朝向楼梯间窗户,有比较大的LOS概率,MCS值和吞吐率都比较高,朝东向都背向窗户数据相对较差;朝北向虽然都基本靠楼梯斜面反射,但由于楼梯斜面和基站是正对方向,反射的信号有足够保证所以数据也还是有足够保证,不过也因具体NLOS路径呈现差异;三楼朝南向和四楼朝南向有一定的差异,这也和三楼、四楼的具体NLOS路径有一定关系。

五楼楼梯间实际位置是高于具有机械下倾角的毫米波基站的,朝西和朝北方向有信号是难得的,说明楼梯间外部存在一定的反射环境,导致可以接收到一定速率的毫米波信号。

3.3 CPE穿楼层局部孔洞外部拉远位置毫米波信号接收

基于图1和图2,进行CPE相对基站水平距离

表5 实测数据

测试位置	测试方向	波束 ID	RSRP	MCS	BLER	THP (Mbps)	PDCP (Mbps)
一楼	四个方向	不能稳定捕捉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不能稳定捕捉					
	西	0	-111	0	99%	20	0
二楼	北	34	-114	0	87%	19	0.9
	东	34	-119	0	99%	20	0
	南	34	-114	2	10%	35	25
	西	34	-103	14	10%	204	177
三楼	北	34	-100	17	10%	230	199
	东	7	-114	0	99%	20	0
	南	17	-111	2	17%	39	25
	西	17	-98	19	10%	287	245
四楼	北	16	-98	16	10%	229	201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不能稳定捕捉					
	西	16	-114	1	10%	30	24
五楼	北	16	-112	1	21%	30	19

图4 实测场景四

表4 实测数据

测试位置	测试方向	波束 ID	RSRP	MCS	BLER	THP (Mbps)	PDCP (Mbps)
0m	东	26	-85	15	10%	220	190
	南	25	-80	25	9%	382	333
	西	不能稳定捕捉					
	北	不能稳定捕捉					
3m	东	25	-97	14	10%	201	172
	南	26	-87	26	9%	401	395
	西	25	-95	12	10%	157	133
	北	不能稳定捕捉					
6m	东	26	-102	4	10%	60	49
	南	26	-99	10	9%	157	115
	西	26	-101	7	10%	94	79
	北	不能稳定捕捉					
9m	东	26	-110	0	12%	26	19
	南	26	-99	17	10%	257	205
	西	25	-106	2	12%	57	27
	北	不能稳定捕捉					
12m	东	不能稳定捕捉					
	南	26	-101	11	9%	156	133
	西	不能稳定捕捉					
	北	不能稳定捕捉					
15m	四个方向	不能稳定捕捉					

从穿楼层孔洞拉远测试看,毫米波信号强度依照拉远距离逐渐衰减,从口字型楼群北侧裙楼底楼门洞通道内的反射、绕射后,还是有一定距离能够有效通信的,一直拉远到了门洞外部15m才脱网。

这个拉远测试南向是有部分LOS路径的,但因裙楼底楼门洞通道空间有限,拉远到较远距离时,LOS概率逐渐降低,直至脱网。

3.4 CPE在模拟弱信号状态下的毫米波信号接收

模拟弱信号测试,基站功率下降20dB, gNB这项, TX Power也降了20dB为5dBm, EIRP降为31dBm。追加楼梯间弱信号测试并得到数据(表5所示)。

从表5可以看到弱信号下楼梯间信号衰减程度非常大,楼梯间一楼和二楼覆盖非常弱,基本没有速率,整体覆盖范围明显减小。此外,之前的强点峰值速率也明显下降。

毫米波相对于低频会出现近距离完全收不到信号的情况,这是由于随着频率的升高,电磁传播的粒子性增强,反射和衍射的特性增强,散射特性降低,再考虑本身传播损耗就比较大,从而会导致此种情况发生。

综合CPE在非视距、楼梯间、穿楼层孔洞拉远、模拟低功率场景下毫米波信号接收的数据来看,相对于大空间室内,楼梯间干扰因素更大,有反射、散射、小物体阻塞阴影区绕射、衍射参与;毫米波反射在天井底部一侧裙楼一楼半开间数据良好表现方面,贡献突出;穿楼层孔洞拉远测试表明,毫米波透过裙楼底部门洞通道还有一定辐射能力,有反射、散射、绕射参与。

4 结论与建议

通过对NSA网络架构环境下的CPE在基站底部非视距路径、楼梯间以及穿楼层局部孔洞拉远等相关弱信号场景多向接收室外5G毫米波基站信号试验发现,除了毫米波在纯地面反射的NLOS路径下衰减不严重外,其余弱信号下衰减均非常严重,毫米波这种源于对几何阻塞的脆弱性和传播环境的敏感性造成的高路径损耗会最终形成时间和空间上的不平衡性,呈现稀疏的信道特征。

但是,实验也发现毫米波反射、散射、绕射确实弥补了相当程度的辐射能力,这是增强基站近处局

部复杂环境下 CPE 接收毫米波信号的有效方式,为此可以基于此方面进行针对性的接收环境和接收设备性能增强改进。

4.1 接收环境方面的增强措施

基站侧增强多站覆盖和协作,使得单基站近处局部复杂环境得到其他基站信号增强覆盖^[5,7]。

在普遍接收信号弱点方向集中区,找到合适的界面位置,如墙体、广告牌等,加装基于界面电磁学技术的毫米波相控阵天线,对基站毫米波信号进行反射或透射,实现毫米波信号增强^[1]。

基站近处局部复杂环境特别是室内加装有源室分微基站,强化热点覆盖。

4.2 接收设备方面的增强措施

毫米波基站内部天线阵列后方增加反射透镜,增强集中弱信号拉远区的信号强度^[9]。

CPE 设备本身增加旋转性,通过人工智能统计信号强区,实现自适应旋转到信号强度高的方向进行信号接收。

CPE 设备分拆为室外和室内部分或者 5G 通信部分和 Wifi 通信部分,室外部分或 5G 通信部分在信号强区接收的毫米波信号经有线线缆传到信号弱区的室内部分或 Wifi 通信部分转换为 Wifi 信号。

参考文献:

- [1] R1 - 135588, Remaining detail of fast fading for 3D - UMi and 3D - UMa [EB/OL]. NSN, Nokia, 3GPP RAN 1#75, 2017.
- [2] 刘光毅,方敏,关皓,等. 5G 移动通信:面向全连接的世界[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9:223 - 234.
- [3] [美]胡飞. 5G 网络的机遇:研究和发展前景[M]. 中国通信建设集团设计院有限公司,译.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345 - 409.
- [4] 王映民,孙韶辉. 5G 移动通信系统设计与标准详解[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20:350 - 355.
- [5] 李萍,魏浩,黄静月. 高频通信技术[J]. 中兴通信技术, 2019,25(2):13 - 17.
- [6] 王毅,张宝菊,王为. 高频段下的 5G 系统对地球探测卫星系统干扰研究[J]. 移动通信,2019,47(5):73 - 74.
- [7] [美]罗发龙,[美]张建中. 5G 权威指南:信号处理算法及实现[M]. 陈鹏,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2018:280 - 293.
- [8] 王映民,孙韶辉,高秋彬. 5G 传输关键技术[M]. 北京:电子工业出版社,2017:22 - 78.
- [9] 黄宇红,刘盛纲,杨光,等. 5G 高频系统关键技术及设计[M]. 北京:人民邮电出版社,2018:175 - 178.
- [10] 杨帆,许慎恒,刘骁. 基于界面电磁学的新型相控阵天线[J]. 电波科学学报,2018,33(3):256 - 265.

(责任编辑 吕志远)

Research on CPE 5G Millimeter Wave Signal Reception under the Non - line - of - sight Path and Weak Signal Scenarios

ZHANG Yongliang, LIU Yang

(Zhongxing Telecommunications Equipmment Corporation, Shanghai 201203, China)

Abstract: 5G millimeter wave is gradually being applied and promoted. At present, data on 5G millimeter wave signal reception performance of CPE in various indoor and outdoor occasions mostly focus on non - line - of - sight paths and weak signal scenarios such as urban blocks, transportation hubs, and large stadiums, and rarely involve the local complex environment near base stations. This article summarizes the multi - directional reception of outdoor 5G millimeter wave base station signals in the non - line - of - sight path at the bottom of the base station, stairwells and partial holes through the building as well as the associated weak signal scenarios under the NSA network architecture environment. Suggestions are given to improve the imbalance of signal reception.

Key words: millimeter wave; CPE; non - line - of - sight path; weak signal; reception